

世界知識叢書之四

戰後蘇聯印象記

英 坎脫勃里 十倉森高 符符 副主 教



上海世界知識出版社發行

四之書叢識知界世

戰後蘇聯印象記

著 森 詹 里 勃 脫 坎 英
譯 符 賓

版 出 社 識 知 界 國 傳 聖

月 二 年 八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戰後蘇聯印象記

世界知識叢書之四

••

民國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出版

作者 英坎脫勃里 詹森

譯者 賓符

出版者 世界知識社

上海(〇)河南中路八十二號
電話一八四八九

經銷者 全國各大書局

基本定價每冊國幣十四元

◀印翻准不★有所權販▶



森詹者作書本

Soviet Russia since the war

I welcome this Chinese edition of my book. I welcome it because what is happening today in China is, I venture to suggest, of world importance and because from Russia's effort to achieve a new morality which gives equality between races & the ~~sex~~ sexes, which gives economic equality with equal opportunity for all to health & to education & to the cultural amenities of life, China like the rest of the world has much to learn.

Your great Sun Yat Sen drew his three principles largely from modern German thought, and the

稿手言序作所本譯文中爲者作書本

problem before you come, is, as I see it, how to
apply those principles in practice. This book will, I
hope, provide some elements necessary to an answer.

You possess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as a grand foundation} to build upon.

I am well acquainted with your wonderful ~~old~~
heritage. Few Englishmen, perhaps, have travelled further
afield in your land than I - through Kansu to Tibet in
the west as well as to K. north & to K. South - & few
can love it more.

The thought often recurs to me that of Russia
amidst incredible difficulties ^{could have} ~~can~~ achieved so much

in so short a time, with ^{500,000,000} ~~500,000~~ China do "with her
grand host & with all the benefit of Russia's experience &
with Russia ^{to aid her}
as a sympathetic neighbour
~~stop the old ways~~ to the west & to the north.

For long little Europe has led the world & given
hope some noteworthy gifts. It is, now Asia
day once more & we look with eager eyes to
what surely China is about to yield. May
this small book which deals with achievement in
another part of Asia render some small
service to your land in her tasks.

Yours sincerely
Hester Johnson.

原著者中譯本序言

我歡迎拙作的這本中譯本。我歡迎這本書，我冒昧地覺得，是因為今天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是有全世界的重要性的，是因為從蘇聯的努力得到了一種新的道德，這道德把平等給予各民族人民以及男女兩性，這道德以平等的機會把經濟平等給予大家，在健康上、在教育上以及在文化生活的享受上。中國和世界其餘部份一樣，有許多要學習的。

貴國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大部份是吸取了現代蘇聯的思想的。依我看來，貴國的問題是怎樣把這些主義付諸實施。我希望，這本書將對一個答案提供若干必要的要點。

貴國有古老的文化，可以作為有所期待的偉大基礎。我非常熟悉貴國驚人的傳統。或許很少有幾個英國人會在貴國土地上像我一樣地旅行過這麼遼遠——在西邊經過甘肅到了西藏，還有到北方，到南方——很少有人能更愛這片土地的。

我常常反覆着一種思想，如果蘇聯在難以置信的困難之中，還能够在這麼短暫的時間以內得到這麼多，中國以它偉大的過去，以蘇聯所有經驗的好處來幫助它，以蘇聯為西方和北方兩邊的一個同情的鄰居，就不能這麼辦嗎？

長期以來，小小的歐洲曾經領導過世界和亞洲，我希望這不是不值得的禮物。現在，亞洲的

日子又來了，我們以熱望的眼睛看着中國將產生怎樣的豐富果實。這本關於亞洲的另一部份之成就的小書，可以對貴國的任務提出若干小小的助力吧。

H·詹森

目 錄

原著者中譯本序言·····	(一)
第一章 到蘇聯途中·····	(一)
一·遼闊地方的交通·····	(九)
第二章 破壞和重建·····	(三)
一·戰爭的代價·····	(三)
二·新的史太林格勒·····	(六)
三·蘇維埃生活中的城市計劃·····	(三)
第三章 新時代的新人民·····	(五)
一·知識份子的女青年·····	(五)
二·貴族出身的女青年·····	(四)

第四章

蘇維埃成功的工程師

- 三·農民出身的青年……………(四)
- 四·女彫刻家及其子……………(五)
- 五·兩位畫家……………(六)
- 六·科學家……………(六)
- 七·外科醫生……………(七)
- 八·蘇維埃青年的素質……………(七)

第五章

蘇維埃個人的發展

- 一·訪問哥里……………(七)
 - 二·史太林在克里姆林……………(八)
 - 三·莫洛托夫……………(九)
- ### 蘇維埃個人的發展
- 一·體格和健康……………(九)
 - 二·蘇維埃家庭生活……………(二一)
 - 三·領導世界的蘇維埃婦女……………(二六)
 - 四·蘇維埃的兒童……………(三〇)

第八章 喬治亞……………(二七)

第九章 亞洲……………(二七)

一·引言：地理和歷史……………(二七)

二·工業和平衡經濟……………(二七)

三·亞洲的農業：棉花……………(二七)

四·烏茲貝克的文化生活……………(二七)

五·薩瑪根……………(二七)

六·亞洲的宗教制度……………(二七)

第十章 蘇維埃外交政策……………(三五)

第十一章 批評家和批評……………(三一)

第十二章 結論……………(四)

譯後記……………(四)

詹森先生訪問記(陶大鏞)……………(三一)

第一章 到蘇聯途中

蘇聯，和美國並肩成了凌駕世界其餘部份的一對強國：「這新的巨像」，史默資將軍會恰當地這樣稱呼她。蘇聯和西方世界的相互瞭解對於世界和平與繁榮的利益是極端重要的。

而且，蘇聯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大規模地完成了和實行了社會主義，並在一百七十種民族和集團中間樹立了一個榜樣，對於贊成社會主義組織的人們，或是害怕它的人們，都是值得研究的。蘇聯的榜樣啓示了可接近的路線和危險之點：何者應採取，何者應避免。相互和廣泛的知識的缺乏——蘇聯之於我們和我們之於蘇聯——正需要着不嫌其多的著作，尤其需要根據廣泛範圍接觸的著作。

我自己會發願寫一本書，希望真能寫下蘇聯的一切，那全在乎機會和方便，能够偶然獲得某種相當的條件。我的母親鼓勵了我的好奇心，使我去旅行、探險和研究。

那授我以科學學位的曼徹斯脫大學，教我怎樣去觀察事物。在曼徹斯脫一個工廠中的貧窮生活，教我經歷了一個工人所經歷的勞動的過程。後來在大小企業中當過實習工程師，我又知道了怎樣從一個工業屋主比較適當的眼中，去觀察工業的生活。我的具有精神和道德力的這種敏感，使我能用眼睛去看促進人類幸福的一切，那是應該感謝我的雙親、牛津大學和基督教牧師的。起

先在曼徹斯脫後來在坎脫布里的副主教職務，很少妨礙到這種機會。許多各種各樣的書籍，敵意的和善意的，加上那些畢生研究世界政治特別是蘇聯的人們的友誼，使我負了一筆無可補償的債，因為否則，這些材料是無法獲得的。

在這些友誼之中，最顯著的是狄埃（A. T. D'Eye）先生，他自從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一直是世界問題的埋頭研究者，當他從戰爭受傷中復原後，就獻身一意爲人類服務，擔任了牛津大學康德哲學的巡迴講師。由於狄埃先生的創議，我們聯名發起了蘇聯醫藥援助的基金，這不但捐輸了一百二十餘萬鎊的醫藥物資到蘇聯去，同時，由於贊助英國與蘇聯工人間永久連繫，由於傳佈（用文字和村鎮市民集會的方式）蘇聯人民和蘇聯方式的知識，已喚起了和平與戰爭中對於蘇聯成就的景仰，這又足以凝固和必將凝固現在正在進行的促進蘇聯人民和我們打成一片的一切努力。

狄埃先生伴着我到過戰後的蘇聯、波蘭和捷克斯拉夫。我們一回來之後，他自己就寫了一篇動人而有趣的遊記，他又好意地對我的遊記和以後考察報告的原稿校閱了一遍。

二十五年來對蘇聯密切的同情的研究，獲得了負責而熱心的蘇維埃人民的無數友誼，這使我在三個月廣泛旅行和考察中看到了戰後蘇聯的真相，要比別人化上許多年所看到的還多。

雙方仍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猜忌和強烈的誤解，這本書的目的乃在消除它們。同樣簡單的字對於蘇聯人和對於我們往往具有不同的意義。例如「報紙」這個字，對於我們的統治者的主要意義

是一種報道的機關；對於蘇聯統治者卻是一種教育的機關。「自由」對於我們主要的意義是我們有選擇言論或出版的權利；選擇我們議會代表的權利；不受我們兄弟侵犯的權利。對於蘇聯人，它的主要意義卻是衣食的權利，工作的權利，教育的權利，醫藥互助的權利，直接而負責的參加工業生產生活組織和地方社會事情的權利；那自由主要是對抗天然的困難和沒有效率的組織生活的。

無論是他們和我們的兩者人民，都是過去歷史的犧牲者。以第一次大戰後野蠻干涉開始的二十五年的外國的敵視；沙皇時代落後的遺產；對外面全部世界被迫的孤立；以及最後德國的進攻，造成了蘇聯生命悲慘的損失；蘇聯財產的損失，據估計佔她五年計劃果實的三分之二；這些以及更多的因素，在估量蘇聯現行狀況和政策時，是應該記住的。

我們也不應忘記了第一次大戰以後，九國武裝部隊對蘇聯直接或間接的進攻，那是通過了包圍蘇聯的一連串的敵國，從波蘭到波斯一直到日本，英國是其中的領導者。蘇聯現行的統治者，爲了保衛蘇維埃的秩序，打擊着他們。約莫二十年後，這嚴重的搏戰在史太林格勒達到了頂點，而無論此時或彼時，史太林都是它的保衛者。

正如我們所預言的，戰爭時期簡短的蜜月證明是太短了，那還不能達到真正的理解，或徹底消除猜疑。

在另一方面，再來看我們的國家，二十五年來對於蘇聯的誤解已在英國思想上印下了深刻的

痕跡，這同一的蜜月也並未把它消除。報紙無線電以及一大套書籍都把蘇聯的圖畫描繪成不道德的、橫行無忌的、無宗教的、工業沒有效率的、趨向必然分裂和立即崩潰的，好像是一個立脚不住的魔鬼，這甚至當戰爭期間，黑的忽然變成白了，蘇聯被捧上三十三天的時候，也是如此。

因了不喜歡蘇聯社會主義而造成的以前的長期的對蘇誤解的贊助，以至對蘇聯力量的低估，乃是我們在慕尼黑時期前後拒絕與蘇聯合作的主要原因，這結果使我們走向綏靖的危險道路，犧牲了捷克，並最後使我們陷入了戰爭。

在某些人們的設計和鼓動之下，歪曲的宣傳是如此徹底地發生了效力，當納粹侵入蘇聯時，甚至在有力的圈子中間也發現了這樣的叫嚷：「德國人將在六星期之內進抵巴庫了。」

史太林格勒真正完成了一個決定的轉變。蘇聯的士氣和蘇聯的工業經受了戰爭的最後試鍊：英美報紙終於接受了這判斷，至少有一時期一致讚揚蘇聯和蘇聯人了。但當危險過去時，這一讚揚也就消弛。於是批評代替了稱讚。仇視抬起頭來，充塞了報紙的大部份。仇視的浪潮又一次激盪了。就是當短促的蜜月期內，在大多數人民中間也從未有過任何關於真實蘇聯的普遍知識，雖然這種知識，在自覺的工人階級的意見中，業已形成了堅實的核心。在今天，對於戰後蘇聯社會市民、工業、文化或民族生活的真正知識或深刻瞭解是更少了。從一個又一個的誤解中，東方從西方隔離着，戰雲威脅着地平線。

然而，儘管如此，人民仍尋求着關於蘇聯的知識。到處地方，無論東西南北，無論是從談話

和通信，我總被提出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便是本書企圖解答的，這本書，乃是經過長期研究結果和蘇聯境內幾千哩長途旅行的結晶，它並且還根據了蘇聯的日常生活、著作和成就的長期繼續的密切的研究。

問題的簡單範圍是這樣的：

(一) 蘇聯在戰爭中的損失多少，她的重建將採取什麼步驟？

(二) 在蘇聯戰爭創傷的地平線上，那生活水準——物質的和道德的——迅速恢復的遠景怎樣？那生活水準，就是給她以槍礮、以意志、以勇氣、以團結的，照邱吉爾的說法，就是「摧毀德國戰爭機構的心臟」的？

(三) 蘇維埃的經濟是否在離開早期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回向更早的資本主義呢？

(四) 蘇聯農業、工業和貿易的現狀怎樣？

(五) 戰後蘇聯對於科學、教育和文化採取了什麼立場？她對於強壯的體格鍛鍊和自由的心靈發展採取了怎樣的步驟？

(六) 對於一般宗教，對於各種格式的宗教習慣，蘇聯採取了什麼立場，特別在它廣大的統治區域內？

(七) 「列寧是民族的解放者」這句大言是否完美無缺呢？在鐮和斧的旗幟下，蘇聯對於一百七十種以上的民族或民族集團的態度怎樣呢？

(八) 蘇聯對於鄰國和對於我們的態度是怎樣的？

這些問題以及還有更多的問題——如關於蘇維埃聯邦立法議會和共產黨的問題；關於性和家庭的問題；關於藝術、戲劇、文學、繪畫和彫刻的問題；關於出版的問題；關於工資、物價、分配和財產的問題；關於捐稅的問題；關於自由的問題——都也會提了出來，而必須加以解答的。

然而最重要的問題是：在蘇維埃統治的二十九年之後，究竟已經產生了和正在產生着什麼樣典型的個人呢？任何制度的最後考驗，乃是它所產生的個人。蘇聯所產生的個人是否自發的和熱情的；男男女女，是否都有敏銳的能動性，是否都是道德的、動人的、可愛的，願意與別人共同建立個人自由平等的一個完整的社會呢？

為了解答這些問題，我會化了三個月的長途旅行，許多次的接觸和辛勤的工作，還有許多不斷的的研究、閱讀和沉思。我又在事物中心的莫斯科化了三星期縝密的研究，作為開始，接着是廣泛的旅行，北至列寧格勒，南至史太林格勒，更南到亞美尼亞和喬治亞共和國，然後又向東到亞洲的塔什干和薩瑪根 (Samarkand)。

我在考察中真有好運氣。我遊歷了我所要遊歷的，看到了我所要看的，也遇見了我所要遇見的。在蘇聯教士之中，我遇到了全俄總主教亞力克梭 (Alexei)；基輔的主教尼科拉 (Nikolai) 和列寧格勒的主教格雷哥里 (Gregory)；我遇到了喬治亞自治教會的主教，和亞美尼亞新選出

的教長 (Catholics)。我遇到了齊達科夫 (Zhidkov)，他是浸禮教徒和福音教徒新聯合的主腦。我遇到了猶太教會的領袖和莫斯科回教徒的領袖；在塔什干，我又遇到了所有亞洲回教徒的總領袖，並且和他消磨了整整的一天。

我遇到了教育家戲劇家、科學家、和建築師：蓋拉錫莫夫 (Gerasimov) 和珂林 (Korin) 是畫家，莫慶那夫人 (Madame Mukhina) 是女雕刻家，卡必蔡 (Kapitza) 是原子能的專家，乞欽 (Tsitsin) 他曾發明種植人造麥；亞歷山大洛夫教授 (Prof. Alexandrov) 他曾建造鄧聶伯的大水閘；安和芬 (Iofan)，他曾設計世界最大建築物蘇維埃宮的建造；尤丁 (Yudin) 他是世界聞名的莫斯科醫生。我遇到的作家們如像愛倫堡，跳舞專家們如像烏拉諾娃 (Ulanova)。我遇到了許多學院研究員以亞及美尼亞喬治亞和烏茲貝克的官員。我遇到了那在塔什干製造有色棉花的科學家們。我遇到了許多民族的農民和技術人員。我遇到了現任最高蘇維埃主席斯維爾尼克 (Svirnik)。我遇到了莫洛托夫，我遇到了史太林。據人們告訴我，從來很少有人比我在三個月中所看到的更多，或遊歷得更廣的，而且，有一時候，雖切望求得旅行和接觸，也很難辦得到。

我的第一本書「世界六分之一的社會主義」(The Socialist Sixth of the World)，會簡單的講到我們正在蘇聯，目擊着世界政治的一個新時期的破曉。我注意到——我在序文中就這麼說——蘇聯過去歷史中黑暗的破片；也注意到我所要描寫的偉大的創造因素，具有壓倒醜惡的力

量。黑暗的破片不是一個單獨地方的獨佔品。那給予我們以今天我們所保存的自由的議會，照特里味蘭 (Trevelyan) 的話說，是曾經割去了國王的頭。

這一信念獲得了證實。我寫第二本書「蘇維埃的力量」(Soviet Strength) 的時候，蘇聯已經通過了而且勝利地通過了全體主義戰爭嚴格的考驗。一九四一年六月三十日，當希特勒發動侵略戰爭的八天之後，我會寫了一篇文章寄到美國，題目叫做「最後勝利不容懷疑」，結論這樣說：「我不相信納粹的軍事機構，能够掃蕩紅軍像掃蕩法國、英國、波蘭、荷蘭、南斯拉夫和希臘的軍隊一樣，儘管它表現着怎麼樣瘋狂的效率 and 徹底性。軍火和裝備，是更近乎相等的。」

「我相信最後在折敗和崩潰中被趕回德國的必將是納粹的軍隊。假如這樣，那時又將揭開了人類競爭歷史上新的和更好的一章。因為蘇聯的立場是爲了一切的進步；爲了階級和種族間的正義和平等；爲了結束人對人的剝削；爲了一個更公平而高尚的經濟社會的秩序。這就是爲什麼她這樣的遭痛恨。這就是爲什麼現在希特勒要打她。」

這一信心，提出在幾乎普遍悲觀的時候，證實於戰爭勝利之後，就我在戰後蘇聯所見，毫無基本的改變。戰爭曾在他們身上留下了創痕，猶如在我們身上一樣。一切都遭受到戰爭的痛苦，精神的和物質的。經過了這樣的人類苦難之後，現在還有誰能不更敏感一些呢？我們聲音的調子變更了。而戰後蘇聯聲音的調子也常常跟列寧時代不同了。

蘇聯的前線士兵，當然是受到了最深的精神損害。舉例說，關於他們在奧國不好行爲的故

事，百分之九十無疑是不確實的——只要你發現了誰在供給資料。但部份是真實的。史太林也知道可能會這樣，他提醒貝奈斯（捷克總理）說，經過二千哩叢山峻嶺的跋涉和無數生命的屠殺，人們從幾年來的地獄生活中走向了勝利，難免要造成精神上的低落。他說，有許多人是壞的。戰爭使壞人變得更壞了。而且蘇聯最優秀的部隊從未在奧地利息足。蘇聯的損失，就是在直搗柏林之前，已經十四對一的超過了我們。跟我們在奧地利和德國會師的是素質最低的份子，不是最優秀的。所以，要從那心理上瀆害最深的人們來判斷蘇聯是錯誤的。

但蘇聯是會恢復的，而且，如果跟我們一致聯繫起來，必將恢復得更快。我們對於世界未來幸福的貢獻是互相補充的。倘如她西方的門關閉了，這對於蘇聯是不好的日子，對於我們也是如此。瞭解我們是蘇聯的責任。瞭解蘇聯是我們的責任，而這就促使我來陳述我的故事。

一 遼闊地方的交通

我們是從南方進入蘇聯的，經過開羅、巴格達和德黑蘭。在開羅，我們會與哥溫主教（Brook-Gwynn）逗留，他是英格蘭高教中一位最優秀的典型人物。他無所不談。他曾在開羅教堂的門口，對擠集着的慶祝亞拉眠（Alamien）勝利的一羣漂亮的官員說話，痛斥了開羅的戰爭諜利者：「我寧願是一個亞拉眠陣亡的兵士，卻不願成爲今天在開羅活着的富翁。」哥溫主教談起華維爾將軍大爲驚異的事情，當他向埃及總理對於一萬五千個農夫（Fellahéen）專指操阿拉伯

語的農夫)的損失表示我們的同情時，他只聽見這位總理激怒地說：「你幹嗎爲了這些小事來麻煩我？爲什麼難過？我們毫不。他們這種人真是多着呢！」我們會看到埃及的農夫和他們的貧窮。當三個月之後我在別的東方村鎮——例如塔什干或薩瑪根——看到農民時，我不禁又記起了他們和這位總理的話。

在另一個亞細亞的市鎮巴格達，我們在人羣中自由行走，穿過他們的大街和小巷，美麗的和醜陋的面對在一起，到處是貧窮、污穢和疾病。孩子們的眼睛上塵集着蒼蠅；砂眼盛行，瞎了眼是常事。

我從當地英軍的隨軍牧師那裏知道了許多關於官場腐敗的故事；關於當局如何在遠處市鎮中囤積小麥，而巴格達的人民卻在餓死；但當這批小麥因壓力而放出來時，裏面卻盡量闖入了碎石，以賣得較好的價格，雖然因重量增加而增加了運輸的費用，但糧食的成本是減少了。

下面的故事正好反映了巴格達對於婦女們估價的標準。有一個富有的巴格達商人，因妻子難產去找一位著名婦科專家的加拿大醫生，他是和隨軍牧師住在一起的。這位醫生動了很久時間的手術，結果情形良好，母子都獲保全。他和牧師商量後送上一張二十英鎊的帳單，看來是並不過份的。

這商人暴跳如雷地叫了起來：「二十鎊！你笑話！我可以買十個更好的老婆了。」

我細細地考察着這樣的東方城市，想找尋一些好與蘇聯東方城市比較的標準。在德黑蘭，英

國官員對蘇聯的態度是確定的不友誼，一再的說蘇聯的極端必將回復原狀。一位英國高級官員縮統地說：「我們是沒有什麼可從俄國學習的。」

從德黑蘭到莫斯科，一千六百哩，好比是從斯托克霍爾摩到西西里一樣遠，我們飛了一整天，從大清早一直到黃昏。一次會在巴庫降落，一次在史太林格勒。我們的飛機是一架未經改裝的軍用機，裏面是飛機骨架縱幹裝成的長凳。我們同伴的旅行者是各色各樣的。當我們越過高山的時候，一位健談的波斯人拿出最好的酒來饗所有願意喝的人，以禦寒氣。後來飛降到比較暖和的水平線上，一個名叫娜塔莎 (Natasha) 的俄羅斯孩子，這纔從一條華麗的橘色圍巾中伸直了身子。她感到暖和了，喫了一隻橘子，又喫了一隻石榴，然後又喝了一些滾熱的甜品，她把剩下的都分給了同伴。三位旅伴都是英國人，兩位是英國盟軍參謀部的官員，一位是「蘇維埃戰時新聞」的英文翻譯。

巨大而雄壯的高山保衛着蘇聯南方的門戶；山脈的外面伸展着裏海，在山脈的赭色的對照之下，裏海碧藍的顏色顯得更藍了。

巴庫，我們降落加油的地方，是現代化的，它的建築物是用美國式長方形的線條建成的。一個俄羅斯女官員指揮着海關人員，嚴密地檢查我們的行李達三小時之久。英國的報紙都給移去了。我個人因有外交護照，免除了許多麻煩和搜查。盧布和英鎊的換算率是二十六對一，但要是難到普通店舖裏買物，這卻並不代表實際的價值，這是因為戰爭造成了國內通貨膨脹的緣故。照

正式的換算率，一杯茶得化五六個先令。我們的主人蘇聯對外文化協會（Voks），好意地供給我們大量的俄幣，以作當地的另用。

重登飛機後，我們越過了卡爾梅克（Kalmyk）的大沼澤和平原。上午十一點三十分離開巴庫，我們飛得很快，而且很低，一小時又一小時，儘是單調的草原，那草原一塊又塊的伸展着，極目望去，沒有任何顯著的區別。接着是茫無涯埃的大海的寂寞。我的日記這樣寫着：「十一點三十分前進，草原，……草原……沒有樹，沒有山，地平線上連一座丘陵也沒有；三點四十分，伏爾加在我們下面了；很大的島，工塲和熔爐……史太林格勒到了。」我們盤旋了一圈，然後筆直的毫無騷擾的在史太林格勒機場降落，除了破毀的殘跡外，一些也看不見什麼。我們加了油，又於四點三十分起飛。這以後到莫斯科的六百五十哩路是險惡而多風暴的。我們在陰暗的雨中降落於莫斯科機場。衛生人民委員部副部長科立斯尼科夫（Kolesnikov）先生、蘇聯對外文化協會的克米諾夫（Kemenov）先生、邁斯基大使夫人以及其他人員歡迎着我們。我們的旅館是「國家的」，可以望見紅場、列寧墓和克里姆林宮的玫瑰紅的牆。

從德黑蘭飛到莫斯科；從莫斯科到亞美尼亞；從莫斯科到亞細亞；從莫斯科到列寧格勒；從莫斯科到華沙，和從莫斯科到布拉格，真恰如一句俗語所說：「俄國是幅員遼闊之國」。然而這樣的飛行在蘇聯也算是短的，那從東到西的海參崴——莫斯科快車，得化上九天九夜的時間呢。在這個廣大的「世界之島」——麥金特（Mackinder）這樣稱呼它，——具備着所有的各種氣

候：在阿富汗邊境，那「頭部愛好太陽」的棗椰樹在熱帶的炎熱中滋長；契留斯金角（Cape Chelyuskin）有着十個月的冬天，要到中夏時候纔能看到冰山的裂開；耶庫西亞（Yakutia）保持着世界最低溫度的記錄，攝氏表另下七十度；卡拉庫姆（Kara-Kum）沙漠則在零上七十度。蘇聯的邊境西連捷克，南距印度僅九哩，她的外圍島嶼離美國東部的邊境僅四哩。單是俄羅斯的一羣共和國就有七十個英國的大。

這廣大無涯的蘇維埃領土，是世界上最大的，她擁有着十二個海，通到三個大洋；她有着最大的湖——裏海，在海洋水平線的八十五呎以下；最大的平原；最廣泛的可航行的水路；最大的森林地帶，供給着最豐富的木材；還有最大的草原。帕米爾高原僅比埃佛勒斯脫山（Everest）略低幾呎。巨大的河流貫穿着這無邊的土地，在蘇維埃經濟上具有高度的重要性。運輸的河流穿過了肥沃的俄羅斯平原的心臟。灌溉的河流，保障了中亞細亞和東高加索沙漠的生活。動力是充足的。在蘇聯，廉價的水電的潛力，要超過挪威、瑞典、瑞士、巴西、阿根廷、中國、加拿大和美國合起來的總量。

亞美尼亞的薩凡湖（Lake Sevan）是世界最高的大湖，貝加爾湖則是最深的，包含着比波羅的海還多的水。帕米爾的薩拉茲湖（Lake Saraz）是世界最新的天然大湖，十六哩長，一千六百呎深，那還是一九一一年的一次山崩，壅塞了巴塔格河（Bartag）的狹道而造成的。人造的湖每年在地圖上出現，許多河流都被築了堤，以作水力電、灌溉和運輸之用了；其中的一個便是

「莫斯科海」，長達一百六十哩。另一個是蓄水池，約等于奧尼加湖（Lake Onega）一半的小，那是將伏爾加河在雷賓斯克（Rybinsk）築堤造成的。農夫變成了水手，漁艇和海洋船代替了曳引機和耕犁。

蘇聯的森林是無窮的，有的都天賦有他們自己的魔力。很少被人知道卻饒有趣味的是「烏蘇里泰加」（Ussurian Taiga）的大森林，那是遠東南部一種無比性質的混合森林。烏蘇里的動物界和植物界，逃過了冰河的時期，從較早的時期生存了下來，它們已能適應逐漸變冷的氣候了。落葉松、榆樹、楓樹、橡樹、紫杉、滿洲的蘋果、烏蘇里的梨和非洲金盞草（有着柔韌的樹皮和樺樹的幹，彎曲起來有着鐵似的抗力），都擠集在一起，還有如禮拜堂的塔尖一樣高的西洋杉。馴鹿跟雄野豬同處；六呎長的老虎在烏蘇里的森林裏徘徊。

一望而知，蘇維埃地理廣漠的特點，包括了一塊巨大的低伏的平原，即東歐平原；它是被那從北到南的烏拉爾山，從第二塊幾乎像平地一樣的西部西伯利亞平原割開來的。然後是蘇聯的東部，幾乎被葉尼西河（Yenesei River）割裂為二，包括着中部西伯利亞的高原，貫穿着各種各樣的山脈。西部巨大的中央平原，南面有着一連串的東西山脈的屏障，那起伏的山脈隨時有着高峯：在高加索為一萬八千四百九十呎，在帕米爾為二萬四千五百九十八呎，在天山則為二萬二千九百七十五呎。

蘇聯幅員的遼闊給蘇聯交通運輸當局帶來了許多的問題。不列顛廣大的帝國有着它自己的問

題。我們可以想像，我們的遼闊，會造成更大的問題。但並非如此。廣大的海洋，是比巨大沙漠和山脈易於通過的路。我們習慣於島嶼的距離，是很難把握蘇聯的鐵道距離的。海參崴鐵路上的里程碑是五千八百二十七哩，從地角(Land's End)在英格蘭最西部到約翰·奧·格羅茨(John O'Grats在蘇格蘭)卻只佔其十分之一長。鐵路使用費(Haulage)是一個經常的迫切的問題。重要貨物的製造和出產，往往離開需要地方很遠：南部區域產穀，北部區域產木材。交換等於是運輸。中部莫斯科和北部列寧格勒工業所需的煤和油，在鄧尼茨盆地，在巴庫或烏拉爾山區一帶是極豐富的，那是遠在南方和東方。烏拉爾區域有着豐富的鐵礦：但把鐵鍊成鋼所必需的熟煤最近的供給區，卻在它東西七百五十哩的庫茲尼茨克(Kuznetsk)。

因此，鐵路河流和空中的運輸具有最大的重要性。蘇聯靠了她廣泛的運輸網——鐵路、公路、河流和航空——纔達到了它經濟的統一。在一九三九年，鐵路的總哩數為五六、二五〇哩，足以從赤道繞地球兩圈，這當沙皇時代是只有它的一半的。這些鐵路主要集中在西部中心和烏克蘭。西伯利亞鐵路，除了主要的幹線外——那是世界最長的鐵路——和通土耳其斯坦的支線，即將依照預定的計劃進行拓展了。

在蘇維埃計劃的努力下，蘇維埃的地理改變着，運輸制度也跟着它改變。工業移向東方，新鐵路的百分之八十也築在東部的區域。土耳其斯坦鐵路是蘇維埃的偉大成就，它連接了中亞細亞和西伯利亞。另一條線則配合着外西伯利亞鐵路，連接了卡柴赫斯坦(Kazakhstan)中心的巴

爾喀什湖 (Lake Balkhash)。

在戰爭中，蘇聯的運輸制度遭到毀滅的打擊。那破壞性達到了難以把握的規模：三萬八千五百哩的路軌被毀壞了——我會看到惡魔似的機械，那是德國人用以破壞的傑作——還有一萬五千八百架的車頭，四十二萬八千輛的車廂，四千一百處車站，無數的橋樑，和一個完整的電報和電話設備。

恢復邁步進行着。新的進步伴隨着。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約已有三萬哩的鐵路修理完竣，而且通了車。鐵路橋樑總共達一百八十哩——幾等於從倫敦到曼徹斯脫的距離——需要着十五萬噸的金屬和六百萬立方公尺的三和土，已決定在以後五年中恢復或重新建築了。

蘇維埃修繕的工作人員，不但在蘇聯而且也在波蘭、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拉夫恢復着橋樑，這是我親眼看到的。在戰爭中毀壞的一萬六千座橋樑、隧道以及別的建築物（總共約長二百四十哩）都已經重新築好了。有許多新的橋樑，如計劃在柴卜羅慈 (Zaporozhe) 跨越鄧聶伯河的，便是出色美麗的一座。

車輛是要增加的，並將更使其現代化。第息兒 (Diesel) 式的發動機，有着四倍蒸汽的效率，且特別適用於亞洲這樣缺水的地方，正在替換着從前的蒸汽車頭。經過最大壓力硬化後的木料，有着相等于鋼的耐力，再加上塑料 (Plastic) 和鋼合金，據估計可減少空車重量的百分之三十。利用空氣的輪轉車頭正在實驗中；流線型的高速度的電氣火車，如像我在喬治亞所看到的，

將在那可以利用水電力的地方去發展。

電氣控制又是對於運輸便利的一種幫助，那便是，一個人可在一幅幕前察看某一廣大區域內所有火車的行動，這一來就能控制鐵路的交通，和減少貨車在側線上的延擱；鐵路成了巨大的搬運機，部份與部份交相倚賴，而全部則以正確的韻律活動着。

新的路線會在戰爭中發展：例如北貝科拉（North Pechora）鐵路，把北極的煤運到了中部區域。伏爾加中部與高加索和別的區域間的鐵路也聯接起來。雖然鐵路的長度比之沙皇時代僅僅增加了一倍半，但由於路軌的改善，車廂的擴大，自動的制動機，電力的曳引機，以及更高馬力的車頭，那載重能力在一九一三到一九三八年間卻增加了百分之四百。蘇維埃鐵路制度維持着每哩噸位的世界紀錄；在戰爭的緊張中，它仍毫無間斷地維持着後方與前線的聯繫。

水上運輸在蘇聯是大規模的，她的河流佔世界第一位。伏爾加常常聯繫了森林地帶和草原。在史太林格勒，我看到巨型的拖駁船順着伏爾加南下。駛船的人和他的家庭，就住在甲板上所建的艙房。臥床露天安放着，掛着蚊帳。伏爾加供給了聯繫森林地帶和草原的水。木材漂流南下，油槽船向北駛行。伊爾鐵許（Irtys）河和鄂畢（Obi）河配合着西伯利亞的幹線，聯繫了更北的地區。河道的運輸，隨着蘇聯的成熟發展而增加。新的港口興起了；舊的港口擴展了；水路航行的里程增加了。

廣漠平坦的東方平原，以及他們偉大的靜靜地流着的河，允許着運河制度把歐洲蘇聯所有的

海——波羅的海、白海、裏海和亞索夫海——聯繫在一起。

那七十五哩長的斯太林運河，完成了白海和波羅的海的聯繫。六十二哩的莫斯科運河，加上伏爾加，供應了一條從首都到大洋的深的水路，也對這個城市供給了大量的水。鄧聶伯水閘使得鄧聶伯河的基輔以上的一段也可以航行了；鄧聶伯——勃格（Dnieper-Bug）運河的重建，聯接了黑海和波羅的海。這些工程一完成，五個區域就將聯繫起來，一個統一的深大的水道，將灌溉和滋潤了整個的歐洲蘇聯。巴倫茲（Barents）海上的墨曼斯克（Muransk）不凍港，給蘇聯北方以通到世界大洋的出路，也日益增加着它的重要性。

北方的海路，通過北冰洋聯接了蘇聯的西部和遠東，那裏有很多的港口、破冰船和偵察的航空基地。汽車運輸補充着鐵路，東部區域所建的偉大公路，有好幾千哩長。

空中運輸在這幅員遼闊、人口分散的國度中是特別重要的，在一九三八年，已經開發了七萬八千七百五十哩的航空線。

我們於五月五日抵達莫斯科。在不久後的勝利日那天，我受我國大使寇爾爵士（Sir Clark Kerr）的邀請，到大使館的感恩節禮拜儀式中演說。儀式靜穆莊嚴，虔誠而動人，由駐居當地的海軍軍醫，一位波禮教會的牧師主持。

邱吉爾夫人也參加這儀式，她剛完畢了我要開始的旅程。邱吉爾夫人主持着蘇聯的紅十字會基金，在英國時，會替蘇聯和蘇聯的友誼做了出色的工作。她在蘇聯更發揚着這工作，她誠摯而

平易的態度，博得了大家的好感。在毫無拘束的愉快中，她顯然是欣慰的。蘇聯平民的可愛，大地感動了她。她的演詞簡短、坦直、扼要，而且說得天真動人。

勝利日破曉。青年們一大清早就聚集在競技場和紅場。當我們從大使館的感恩禮拜回來時，終於從戰爭長期緊張中解放出來的一簇密集的人羣，封鎖了我們的路，包圍着我們，熱烈地，懇切地，向着每一個英國人和美國人歡呼。他們舉起了楊格將軍（Gen. Younger），一個全身制服的英國軍官，把他拋擲到空中，然後又溫和地抱住他，彷彿他是一個嬰孩似的。接着輪到了我，因此我在相當的高度中看到了莫斯科的人羣。

這天下午，我們應邀去拜訪亞力克綏，俄國東正教的總主教，也是全俄教士的最高領袖。跟他一起的還有基輔的主教尼科拉和別人。我們在總主教的私邸中會見，那房子又豪華又偉大。漂亮而古雅的傢具，給清靜的房間平添了莊嚴，外面的一間是更衣室，掛列着美麗的法衣，以備取用。

總主教是一位面容溫雅的端莊的人物，長長未剪的頭髮和鬚鬚。照例的寒暄之後，他以深摯的聲音和其慣有的溫和的微笑歡迎着我，他送了我一個華貴的珠串的彩色十字章，掛着一條很大的金鍊。他親手把這掛到我的項頸上，又對我行了友善的吻禮。我在蘇聯三個月我一直備帶着這個十字章。我在坎脫勃里，或者是有什麼集會或什麼事情，也終是備帶它。這常常使我想起了莫斯科的勝利日。

喫過茶，主教駕了自己的車子送我們到教堂，一進裏面，入口處密集着人羣，我們只好用力的擠，這樣情形是我以前很少見到的。俄國的教堂不備椅子。人們只能站立着，那天密密縫縫的人羣擠得動都不能動。我們好容易擠到了聖壇與人羣之間的隔離線，坐在榮譽席上。

唱詩班靠近我們歌唱着，男男女女都穿着日常的服裝：領班的放大喉嚨指揮着，聲音響徹了巨廈，傳佈到街上的人羣。後來我們又驅車去參加了蘇聯對外文化協會的招待晚會。

招待晚會中有一項節目，在我記憶中留下了生動的印象。一位短小的着棉布衣的人，有着一副廣闊、高興和絕頂聰明的面孔，從容地在大鋼琴前面踱着步，他的兩手食指上面放了兩隻網球大小的印度橡皮球，上面繪着人面孔，他在導演一幕小型木偶戲。手指完全變幻地伸縮自如，權充身體、手臂和腿，這位藝術家安得立也維區先生（Andriyevich），便是莫斯科著名木偶戲院的創辦者，他可以表演愛戀、感情、快樂、失望以至于「大家後來都快樂地生活」。

我們在走廊上看到了偉大的勝利焰火的表演。東南西北的天空中，照耀着彩色的探照光線。探照光線又照着一千呎上空的一幅大紅旗，這紅旗是繫在看不見的汽球上的。

第二章 破壞和重建

一 戰爭的代價

我旅行和以後研究的最先目的，是在估計戰爭造成的破壞程度，和檢討蘇聯從事重建的步驟。我的最後目的，是在求取過去二十五年中在蘇聯所產生的一種人類的印象。爲此，我對那形成六分之一社會主義世界的人類生活的各種勢力，物質的、教育的和文化的，重又作了一番考察。最後對那各種勢力所賴的經濟基礎，也重又作了細究。

誰要是在蘇聯旅行越遠越廣，對於戰爭破壞巨大範圍的印象便越深。史太林格勒是令人觸目驚心的，一個六十萬生靈的現代的都市，只剩了寥寥幾所可住的房子；在羅斯托夫，或在……都是如此。要把全部或部份破壞的更多城市或市鎮——有一千七百十個——都列舉出來是不可能。從天空長程的飛行——例如從莫斯科到華沙的飛行中看來，那破壞程度給人以更深刻的印象。

在七小時低及樹頂的飛行中，我每分鐘寫日記，那內容是單調而呆板：「戰壕，更多的戰壕，坦克壕，彈洞，破壞的橋樑，倒塌的茅屋，毀滅的村莊」。七千個村莊毀滅了，還有一千一

百三十五個煤坑，三千個油井，六十一所大動力站，三十七所鋼鐵工廠，七百四十九所機械廠，六十六所化學工廠，四萬哩路軌，一萬五千八百具火車頭，四十二萬八千輛車廂，四千一百個火車站，一千四百艘船，十三萬七千架曳引機，四百萬具耕犁，四萬九千架的混合收穫機，一百五十萬個家庭，一千七百萬頭的牛，二千萬頭的豬，二千七百萬頭的綿羊和山羊……

對於人類生活的損害又是怎樣呢？我會經得到一份傷心慘目的文件，那是列寧格勒一位工程師的日記，小小的皮冊子，篇末附有字母索引，最初部份的記載是用銅板印成的。日記的主人打了。那日記傳給了他八歲的女兒丹孃（Tanya）；後面部份，在篇末索引的字母之下，是用藍筆續成的，字跡像小孩的塗鴉。它簡短而確實地記載着：「祖母死於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時」。這樣接下去，是九百天圍困中親屬死亡錄：「叔父梵涅（Vanya），死於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三日上午二時」；萊克沙（Lexa），她的哥哥；她的母親，然後是家庭的名字：「全都死了」。最後一行的記錄：「孤露餘生：丹孃」。

那是空前無比的故事。戰爭使二千五百萬人無家可歸；人類生命的損失是可怕的。七百萬是死亡的總數。未受影響的家庭寥寥無幾，我在莫斯科會遇見一位少婦，她是我一九三七年雅爾達認識的。她的小兒子死了，丈夫死了，……的兄弟也死了。……單是列寧格勒市民死亡的記錄（那只是幾百個城市中的一個），就比英國兵士、水手、飛行員和市民死亡的總數，超過兩倍以上。在最後一次的反攻之前，軍事上傷亡超過我們的比例，為十四對一。

像這個樣子的損失、對於蘇聯應付戰後問題的態度是有深刻影響的。蘇聯人相信，他們在所有的參戰者中間最爲無辜。他們覺得兩次戰爭之間幾年的特點，是機會的喪失，是英法最惡劣的接連幾次的政府，縱容德國重整軍備，以希望希特勒移師東向。

正因了這種態度，他們促成了一九三九年莫斯科英蘇談判的破裂，在德國佔領布拉格之後，又縮回了他們召集一次會議的建議。

照他們的看法，戰前幾年的不穩定，乃是由於蘇聯的被排斥於凡爾賽和約，以及德國從對布爾雪維克惡魔的恐懼中，被縱容着重整軍備。

蘇聯的政策決定要阻止這種錯誤的再演，因爲這會使她償付了這麼巨大的代價。

假如檢討蘇聯在不宜而戰的戰爭中所受的損害是我訪問最先目標的一面，那末，檢討蘇聯復興的努力便是另一面。史太林格勒提供了圖畫的悲慘的一面，也提供了例證的另一面。因此我們便向史太林格勒飛。當在上空到達這城市的時候，人們就可以從這個歷史上最慘烈的戰場之一，得到一個生動的鳥瞰印象：遼闊的田野，四面八方都給戰壕和砲彈的窟窿摧裂得粉碎了。我們下了機，就登車向着這會是繁榮的市鎮的斷垣殘壁和砲彈的空壳中間駛去。

史太林格勒是一個象徵，這不朽的靈魂的城市。史太林格勒標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捩點。史太林格勒打出了最後的一擊，把德國無敵的神話，掃蕩到地獄的邊緣。在史太林格勒，戰

爭的浪潮逆轉了。從史太林格勒，開始了浩蕩的長征，直到紅旗在柏林破碎的德國議會大廈上飛揚，纔告停止。

沒有一個走進史太林格勒的人毫不感動的；這是一個神聖的地方。我們的車默默地駛行着，通過破碎的街道，駛向那寥寥僅存的部份完整的建築物之一，那是樹木林立的清靜街道上的一座小旅館。我們受着令人感動的歡迎。我的臥室是一間窗戶明淨的房間，充滿着夏季花的芳香。玫瑰、金魚草和矢車菊，都精緻地插在一張桌子上的大花瓶；靠近的另一張桌子上，則放着香水、香皂和烟捲。簇新的毛巾，簇新的被褥，和白軟的枕頭，照烏克蘭式摺疊得審如絕佳的金字塔。

下午的天氣是熱的，而史太林格勒顯得比亞美尼亞、喬治亞、亞細亞或我們所訪問過的地方更熱。但我房間裏的窗子敞開着，微風徐徐地從伏爾加吹來，那伏爾加河是附近流過的，瓦鏗堆外有一條深藍的支流，在它遠遠的岸邊，隆起着翠木的河堤。進餐時候，我熟識了卡拉加諾夫生（Karaganov），他是蘇聯對外文化協會的副主席，令人難以相信的年青，他是我們在這裏的伴侶，後來又同到亞細亞。

這次餐敘，是生動有趣，而無所不談的，跟蘇維埃的青年談話，通常總是如此。我們從討論泰晤士報所有的標題，——這在我們一般算是消息靈通的報紙——一直到估計當馬丁路德和胡司（Huss 英國十五世紀宗教改革家）時代，什麼是歐洲較大的宗教力量。喫過了飯，我們與當地

的市民領袖們，繞着破碎的城市走，首先參觀了一個殘破的巨大倉庫中的小地下室，這裏，保魯斯（Paulus）——進攻史大林格勒的德軍總司令——曾經設立他的司令部，這裏，也就是他的最後投降處。這間小地下室仍保留着保魯斯離開時的原狀，據他們說，保魯斯在做慢地要求一個高級的官員來提解他之後，在替他自己乞求一些食物之後，就離開了這房間，一些也不顧到他同伴們的需要。

朝西兩百碼，我們走下中央公園的一所四十呎深的地下室，中央保衛委員會曾在這裏進行英勇的抵抗，當時，包括醫生、護士、陸軍上校和九名兵士的一小羣人，曾用手榴彈殺出血路，在東面幾百碼的河堤上找到一個隱蔽所，他們就一直在這裏堅持到九月五日，德國抵抗力崩潰了，納粹法西斯統治開始完結了。這個險削河堤的每一碼土地，都記錄着他們的英勇。

早晨四點起身後，我在寒冷中繞着中央的瓦礫堆漫步。四點三刻，德國人在牧場的廢墟上開始工作。他們袒露着上身，看來倒是結實而健康的。復興工作一心一意的進行着。大家都得出力。有一連可紀念的房屋，那是因了九個士兵和一個隊長反抗可怖命運的三十天搏鬥而出名的，現在靠了幼稚園女教師的勞動，已經可以居住了。書記、工人、科學家和家庭主婦，都使用着鑿、鋤或銼。一位志願的理髮匠給人理髮，他們卻說：「現在還沒有理髮的功夫，去學習製造磚塊吧。」他照辦了。

復興的熱誠是令人興奮的，工作立刻就在曳引機廠、在紅色十月革命鋼鐵廠、在巴力開兌

(Barricady) 的機械工廠開始了。最要緊的是必需的機器。假如烏克蘭肅清了德國人，就須輸送穀物以供蘇維埃的需要，那末史太林格勒必須供給工作所需的水槽和曳引機，在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德國人離去後兩個月內，曳引機廠就製出了第一批的機器。接着是建築：到一九四五年的夏天，已經有五十六所學校，一百十八所幼稚園，和二十所醫院開起來了。

二 新的史太林格勒

史太林格勒是要重建的，重建的勇敢跟保衛的勇敢競賽着。重建已有了一個偉大的新計劃。那位城市的建築師，把地圖攤在汽艇的甲板上，向我們說明建設一個河邊城市的計劃，這河邊城市將與世界任何一個同樣的豪華。

就物質價值說，從舊的史太林格勒留下來是很少的，除溝水渠、水道、電報、斷垣殘壁和破毀的建築物，便是一切了。除了重新來計劃和改正無數舊有的缺點的機會之外，再也沒有什麼了。

史太林格勒有許多重大的缺點。它的矩形棋盤似的佈置，實不合於丘陵、小谷和山壑密佈的地面。這個城市是沿着伏爾加河伸展開來的，但在一個廣闊河面的地方，卻被貨車的路軌割斷了，因此，它的大路造成了市間交通的困難。市鎮上又缺少蒼翠的地帶和休憩的公園。崎嶇不平的山谷破壞了自然的偉大美麗。高建築物的佈置失調，更妨礙了觀瞻。

新的計劃彌補了這些缺點。它要把史太林格勒造成一個有效的工業中心，它又充分利用了山坡和光榮的伏爾加河的自然美。河道前面不復有鐵道。貨車的停留站集中於城廂的南部，巨大的金屬工廠則集中於北部。河流中部的狹長地帶，有着險峭的堤岸，斜傾的山坡和交叉的峽谷，將開闢為一個與城一樣長的巨大的遊娛的公園，可以讓每一個居民去隨意盤桓。

史太林格勒是長而且狹的，三十哩長，最闊的地方也沒有超過三哩以上；它的重建將充分利用其河岸的形勢。跟河岸並長的幹路將有三條。最低也是最近河的一條，將闢為公共汽車線，繞越公園、廣場和紀念塔的全部中央區，跟北部金屬工廠的市鎮和南部的卡拉斯諾爾梅斯克（Krasnoarmeisk）相聯接。中間的一條路較高，並更向內伸展，它將聯接所有的住宅區。這條中間的路有着許多交叉道，將有利貨車的行駛。最高的一條路是環城的，它將闢為行駛高速度車輛的支路。

一個城市，在四分之一的世紀裏會兩次證明為生死鬥爭的轉捩點，它的偉大的意義是不能忘記的。史太林格勒的中心將闢為巨大的廣場、公園和紀念的建築物，而由一條直通乘客上下的碼頭的勝利路（Victory Avenue）與伏爾加河聯結在一起——它們的名稱，如帕夫洛夫廣場（Pavlov Square）等等，它們的性質，如戰爭紀念博物館以及許多紀念的碑塔，這一切，都在叫人回憶到史太林格勒不朽的史詩。中央公路、陣亡英雄廣場、勝利路和新廣場，將構成一個單一的廣大的設計系統，而在它們中間將矗立着一千呎高的紀念的巨柱。

山谷和斜坡的便利，將充份的利用，以造成住宅區幽靜的環境，與車輛騾擾的塵囂完全相隔絕。那把城市截成一半和察里察河（R. Tserisa）所流經的大峽谷，將被位置在園林的風景區，該區內的大街，將均由架橋建設之。貨運的車輛將予禁止，史太林格勒的中央站僅作乘客上下之用。遠在三公里外的第二站，將加以擴充，以應貨運分配之需。鐵路將是隱蔽不見的，都從下面地道通過。在卡拉斯諾爾梅斯克，水上運輸亦將加以同樣的安排，內河的旅客只能在中區上岸。從河上或峽谷的土堤上望去的城市的側影，會加以濃密的勘察，沿岸建築物的磚石，主要以兩層為限，摩天高度是不許可的。公園、靜靜的流水和樹林，將使城的內部愈增佳勝，而蜿蜒的蒼綠的地帶，又使城外平添了幽美的環境。

史太林格勒只是全國市政重建的例子之一，固然這是一個特別出色的例子。有些像史太林格勒這樣的蘇維埃城市，都計劃進行徹底的改造，有的規模較小，有的則將造成完全用作休養的城市。例如距莫斯科四十哩的伊斯脫拉（Istra），從前是一個小小的荒涼的鄉鎮，在戰爭中幾乎夷成了平地，現在將恢復為一個美麗的休養的鄉鎮，將完全適宜于健康、休養和文化。

蘇維埃政府加速進行着列寧格勒的重建，這也是個特殊的典型。城市公園的面積將予增加。無數的殘跡將加清除，而種植樹林。兩個新的區域將建成模範的市政中心。伐西里夫斯基島（Vasilievsky Is.）上將建造碼頭的道路，以適應久斯葛到的需要。豪華的建築物，例如羅凡爾

伯爵 (Count Laval) 的大廈，也將恢復其完全原來的形式。

在會遭戰爭破壞和戰時弛廢的莫斯科，巨大的建築的改造，也將在一夜之間進行了。新的五年計劃將完全重建所有的交通要道，並擴充更多的市政設施。我的旅館前面的電車軌道，在一天之間不見了，換上了無聲的公共汽車線。到一九五〇年，各種各樣的公共汽車將增加四倍，汽車十倍，煤氣量十倍。在一九四六年，種植了十四萬株樹和一百萬顆以上的灌木。莫斯科的城市建築師乞巧林 (Dmitri Chechulin)，正計劃要把莫斯科造成世界最美麗的城市之一；他的傑作恰依科夫斯基音樂廳 (Tchaikovsky Hall)，現代化、宏壯簡單而嚴肅的線條，已預示着很好的未來。

蘇聯很快的在開步。正好在最後一個德國兵離開卡科夫之後的四十八小時，重工業機器建築物委員會的專家們，就已經到達，來計劃建設巨大的發電廠了。在斯摩倫斯克解放後的五天，當局就宣佈該城到冬天將有二萬二千座的新農舍。包括全蘇聯的巨大的計劃，要在十年內造成二千五百萬座的住宅。在一九四六年底，史太林格勒的家庭，都已經搬入新屋了。

重建像鄧聶伯水閘這樣巨大的工程，是一種自然的征服。這個巨大的工程，每年生產着三十億瓩時的廉價的電力，並在它的周圍造成了全國最大的工業中心之一，已經被戰爭破壞了。水閘破裂了。動力站完全毀壞了。水位降低了七十呎。激流重現了。航行停止了。只剩下破毀的水閘和歪斜的設備，算是以前巨大工程的遺跡。

工作於一九四四年勇往直前地開始：鉄軌、動力線、三和土膠、和鋸木廠出現了；三十萬噸炸裂的三和土和十萬噸建築用的鐵不見了。在一九四五年有五萬個男女青年自願貢獻勞動，他們在那低落七十呎的激流瀑布的怒吼聲中工作着，水平線重復漲高了。一九四五年的工作比一九四四年超過了百分之三十。他們喊出了「一九四六年興建鄧聶伯動力站」的口號。這已經完成了。列齊格勒重建工廠所製的兩個巨大的水力旋轉的摩托，現在已裝好了。四周鄉間軍又發了光。兩年之內，還將裝置五個水力旋轉的摩托。不久以後，那新設備的動力產量，將比舊的超過九萬瓩的單位。

煤是另一種征服的對象。在頓巴斯，有百分之九十的煤礦遭洪水沖毀或破壞，現在，重建的臺架已經搭起來了。無論什麼地方，工程毫不延遲地在開始。煤礦開工了。戰前產量的百分之四十已經達到。礦工們並不等磚匠來恢復煤坑，他們自己學會了燒磚，而在掘煤之前鋪好磚層，毫不違反職工會的規則，並不致使別人無事。

「把臥榻變成飛機；把飛機變成臥榻」是命令，一個個的工廠會從和平改變到戰爭，現在，重又從戰爭改變到和平了。在烏拉爾，乞爾耶賓斯克（Chelyabinsk）的基洛夫工廠，曾在戰爭中出產了一萬八千架的坦克車和四萬八千架的第息兒（Diesel）式機，經過改裝和轉換，現在它在出產曳引機了。工廠的改裝，僅化了四個半月的時間。

工人們的運動員精神和志願，造成了迅速的效率。每一件事情都是爲了人民的幸福打算。他

們明白這點，因此都抱着一個志願，發揚合作的精神。男子工作着，婦女工作着——在我所住的列寧格勒旅館中，婦女在每一樓梯頭貼標語，修理或清潔，都是非常興奮的樣子。有幾個女人在尼瓦(Neva)河邊的高牆上貼標語；那標語這樣寫着：「我們保衛你，列寧格勒；我們一定恢復你。」

三 蘇維埃生活中的城市計劃

蘇聯經了四分之一世紀刻苦的學習和廣大的經驗，在計劃的藝術上，已經有了許多教訓了——工業的計劃、農業的計劃和市政的計劃。工作完全簡單化了，因為事實上，土地、資源、水道、森林、煤礦、工廠，以至於城市中的住屋，一切都屬於人民的整個社會。

一般計劃都獲得了全體人民誠心的合作，他們在計劃的形成中既確有重要的份兒，因此就感到責任心，而切望它的實現了。假如我們要瞭解蘇聯為什麼說是世界上最民主的民族，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我還將另闢一章來說明。

她費了十年的時間，替計劃打定了基礎。在一九二八年，第一次五年計劃開始時，會計劃要在蘇俄建設九十六個市鎮和城市，烏克蘭三十六個，喬治亞亞美尼亞和亞塞爾拜然三十五個，此外人口在五萬左右的市鎮還不算。到了一九四〇年，單是蘇俄就計劃要建設二百二十五個市鎮，其中一百四十五個已經完成了。

國家的計劃局、區域的計劃局和像莫斯科這樣大城市的設計所，都有着建築計劃部的協助，專事負責技術上細節的計劃。

負責最大問題的最大組織，叫做「極北勞高」(Giprogor)，計劃着北海的航路以及北冰洋和遠東的城市。當伏爾加的水電站造成了二十六個城市的氾濫時，這就由「極北勞高」來負責遷移、和重建。至於個別城市設計的最大組織，當然是莫斯科的蘇維埃，它負責一圈四百五十英畝地區的設計，在這圈內包括了二百個居住的中心。

無數的計劃原則提了出來，並需要着適當的選擇：民族的城市、花園的城市、超級巨型的城市、巨大住宅毗連的城市或小茅舍住家的城市。我會看過基輔的大住宅和小茅舍；在史太林格勒，新建了一連木造的活動小屋——有些是俄國的，有些從芬蘭作為賠償搬來的——位置在曳引機工廠的旁邊。

一切計劃擬定之後，是分三個階段執行的：

(一)先作地方和區域的考察，搜集一切有關現行鐵道公路、工業、鑛藏、氣候、風向、雨量等的材料，再估計市民對於燃料、電燈、電熱、糧食或工業上原料的需要。

(二)舉行專家會議——衛生專家注意健康，工程師着眼于運輸交通，建築師注意適當的位置和美觀，經濟家注意財政上等問題——以決定計劃應採取何種方式。

(三)最後的第三階段便是計劃本身的執行和時間表的規定。

特別選定的團體——如政府部門、工廠聯合委員會、合作社組織等——負責建築計劃的實際執行。地方的建築和計劃部門則協助實際的工作。

第三章 新時代的新人民

一 知識份子的女青年

現在，要談到我最基本的問題，照人們在戰後幾年中所看到，蘇維埃社會究竟產生了怎樣的個人典型呢？且讓我描寫幾個我所熟悉的個人，和我所遇到更多的典型人物，來回答這一問題吧。大部份的青年，都是誕生在新秩序中的。

考察蘇維埃公民，尤其是蘇維埃青年的性格的機會是很多的：在蘇維埃的農場和工廠裏，在蘇維埃的廣播電台、戲院、醫院、實驗室和家庭中，我都遇見過他們。我會和各種民族的青年，到遼遠的高加索——這對於我的同伴和我都是新鮮的地方——去作廣泛的旅行，在毫無拘束的快樂中，在危險、困難和疲勞中，或者是一同在對古文化、特殊宗教和現代的成就的初步考察中，顯示了多方面的蘇維埃個人的生活。青年和青年打成了一片，我看到俄羅斯青年和高加索青年在一起，還有喬治亞、猶太或烏茲貝克的青年；我又看到烏克蘭的青年同着列寧格勒的青年。我不但看到了他們，也參加了他們的生活，他們的遊宴，甚至於他們的祕密。我看到過他們歡笑和流淚。我看到過他們熱烈的情感表現，也聽到過他們對於抱負和困難的訴說。

我第一個要描寫的是我所最熟悉的伊娜·考拉科美斯卡耶 (Inna Koulakovskaya)，她是我們主要的引導者和三個月旅程中的伴侶。

一九一七年，伊娜生於離烏克蘭的基輔不遠的齊托米爾 (Zhitomir)，一個真正的革命的孩子。她的父親是藥劑師，是因戰爭而死的，母親則是學校畢業生，後來當教師，現在和伊娜同住。在莫斯科的家中。伊娜的丈夫是戰死的；她有兩個孩子，一個四歲，一個六歲，都由她撫養着。

伊娜給我以細細考察的機會，那是別人很少能夠得到的。我從每一不同角度中看到了她的活動：無論在遊樂中，在危險中，在困難中，在勞苦工作中，或在心神不安中。經過了她自覺或不自覺的指示，我對蘇聯婦女知道了許多。在她由嬰孩而女兒、而學生、而妻子、而母親的經驗中，我可以追溯過去三十年來蘇聯婦女的解放和擴大的階段、的動機、的推進力。

有許多事情我是偶然知道的；當我們日益熟悉時，伊娜說出了她幼年的經驗。她答應我把它們記下來。她的父親是中等階級激進的知識份子，第一次大戰出征波蘭時，在布番尼指揮的紅軍中充任醫生。雖然他到一九二二年纔成爲共產黨員，他卻被士兵們選爲他們的代表，那是他軍中惟一這樣選出來的官員。他受了傷。他在內戰中一直患着病。

他切望伊娜變得一個男孩子似的強健、活潑和敏捷，他很早就教着她爬樹、游泳和騎馬——這已成了她從不荒廢的習慣了；在我們的旅行中，亞細亞或高加索的每一株樹，每一條山谿或河流，她都熟悉的。一個夏天的下午，我和她繞着列寧格勒大廣場作了一次自由車的比賽，比賽的

工具是從當時正等候着長距離步行競賽員到達的裁判員那裏借來的。

第一次大戰以後，伊娜的母親充當了第一個女律師。伊娜當時是唯一的被送進了幼稚園；其實，家庭對她的影響，要比學校還深刻。

謙謹而溫和，她父親是一位高尚的人物，善於跟小孩子們說故事。他編造了一則小矮人到孩子面孔上旅行探險的童話——那是用一隻手指一步一步裝勢的——從藍色的湖（眼睛）、大平原（眉毛）、黑森林（頭髮）、神祕的洞窟（鼻子和耳朵），一直到可怕的張開的洞窟（嘴巴）為止，就在這令人戰慄的深處，那小矮子恐怖地逃走了——說得小孩子津津有味地着了迷。

自己是誠實不欺的，他更教他的孩子誠實。「伊娜」，當他發覺孩子有欺騙的情形時，就烏溜溜地望着她的眼睛說。「伊娜，我看到你眼中有一個黑點呢：你沒有說出了真話。」她從此就再也不撒謊，而她的父親終於說：「我是可以永遠信任伊娜的。」

考拉科美斯卡耶醫師是一位博覽的人物，他設置了一個有趣的圖書館，伊娜可以自由去借書；家庭中對於報紙以及每一政治和社會問題的透切討論，對伊娜的教育無疑有很大的影響。

伊娜七歲那年受了許多疾病的困擾——麻疹、猩紅熱、肺炎——有兩個月徘徊在生死的關頭。她的父親從不離開她。醫院當局允許他減薪，每天只做三小時的工作；他其餘的時間就消磨在孩子的身上，當那緊張的日子裏，他只是睡在她旁邊的木凳上。從此以後，她沒有生過重病。

十四歲時，因為她學校裏沒有第四級，她進了技藝學校。那裏的課程都是些針線縫紉和刺

誘，她毫不感興趣，而且目光也不及格。她進了語文學校，在那裏學習數學、化學、文學概論和英文，十七歲時，她已表現了翻譯家的才能。

伊娜在作學生時是好學不倦的，對於任何成績永遠不滿足，她探求着每一種學術研究的背景，廣泛閱讀着有關某一問題的材料，並加以深入的探討。十六歲時她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莊嚴地宣誓為團員。這在她是一件嚴肅的大事，有類于她進大學時的感覺，有類于一個英國女孩子在宗教上「堅信禮」那天（Confirmation day）的感覺，她在家裏備置了一個典禮的蛋糕，以資慶祝。

她對於交友有誠摯的熱情，伊娜在二十二年前結識了一個真正的知己，至今不變。這定交始於兩個孩子在公共花園中爲了一枝紫丁香花的爭執，那時她的父母初次到莫斯科去了。伊娜要一枝較好的紫丁香花，遭到拒絕。她抓住了另一個女孩子。一星期後，她們就成了永久的好友。

雖然是自由自在地生長的，伊娜卻從她雙親的教養下養成了端莊和自制的習慣，她對於一位親戚講着叫女孩子臉紅的不愉快的故事，表示憎厭。像大多數俄國的女孩子一樣，她既不吸煙也沒有輕佻浮薄的舉止。

十六歲時她和一個男孩子發生了戀愛，而這孩子又愛上了她的女友，青年期的熱戀繼續了兩年。伊娜看到這是無望了，她離開了這孩子。待那孩子再來愛她時，可已經太遲了。後來他和一位物理專家結了婚，他起先所愛的女孩子，同時也與另一個英俊的青年結婚。這兩個婚姻都沒有

孩子，這個人現在教養着伊娜的孩子。

伊娜在一個朋友家裏遇到她的丈夫，當時她十九歲，他二十四歲。他們一見就愛上了。雖然受的是地質學者的教育，他卻又進了語言學校，由于他的才能，他被派到莫斯科，就在這裏他和伊娜相遇，五個月後就結婚了。結婚生活的快樂受到了挫折，他們終於分離了，據他說，這是因為她生理上太年青，不喜歡兩性的接觸。他們仍是朋友，而他撫養着她的孩子。最後，他們重又結合，過着完全快樂的生活，直到他在戰爭中陣亡。

伊娜猶如其他更多的學生，當她結婚時還沒有畢業。她以已婚婦人的資格繼續讀書。大考在六月。她在五月裏養了孩子。在她生產以前，她得到兩個月的休假，她仍在家裏用功學習，學校特許她提先在四月底考試。

在歷史考試時，監試教師看到她健康的情形，就說：「我想還是不用通常方法來考問你的好；拿你的書本和摘記給我看看吧」●她婉言辭謝了，仍舊參加通常方式的考試，她得到三個優等之外，又加上了「超等」。

當她將分娩時，她丈夫把伊娜送到產科醫院裏；她的朋友們都紛紛贈送玫瑰花；後來她丈夫又把她和孩子接回家中。以後的六個月是伊娜一生最快樂的時期。接着是她丈夫被指任為對外交化協會的主任編輯並在家聽候軍役的命令。孩子三歲了。德國人疾趨莫斯科，她丈夫志願加入了工人的步兵大隊。他還不是黨員。

她和丈夫在莫斯科衛隊守壕裏一同工作之後，莫斯科越來越緊了，而她又再度懷孕，伊娜和她的妹妹，就于十月底被遣送到伏爾加河畔新喀山（New Kazan）的喀列斯托波爾（Christopol）。她被指定在喀列斯托波爾的一個牛油廠工作，經了三星期的訓練，她被派定了職務，並有了糧食配給證。懷着四個月的身孕，站立在徹骨寒冷中，那真使她難以忍受，甚至比在莫斯科用凍僵的手指掘壕還不如。

消息傳來，她丈夫可以有兩個月的休假。她要回莫斯科；這是一段危險的路程，大半得坐馬拖的雪車。她在市集上碰到兩個不相識的人，動身到喀山去，她加入了他們，答應付給他們所希望的最高的費用。事情還不止此，她更遭到了怒詬。那兩個四十八歲或五十歲的粗漢，操着俄語，在他們的馬上兇狠地咒詛着，他們把她當作小孩子，給她蓋上皮，忽東忽西地帶着她到半路休息的屋子裏，讓她佔着最好的位置，她總算能在溫暖中乘間小睡。兩人中之一是回來的傷兵——另一個則是預備兵。他們不時對她戲謔，說着：「幹嗎還把她帶到遠遠地方去；爲什麼現在不就殺了她，搶了她的錢；她一定有錢的。」

伊娜父親在喀山車站迎接她，勸她回去。她堅決地說：「爸爸，如果他永不回來了，你一生還能寬恕自己麼？」他立刻回答說：「去吧。」她就又上路了。到了莫斯科，她走進他們的房間。房間是空的。她奔到鄰家去，這纔知道他還在鎮上。她快樂極了，買了果醬和珍貴的油炸的乾菓——那是糧食的代替品——算是慶祝相見的小宴。

這時莫斯科正遭着嚴重的破壞。但他們在共同愛好的心光的映照下，一起在小而溫暖可人的房間裏工作着，過了快樂的一月。伊娜教她丈夫讀英文。他再度被召入伍了，於是他們備了一些糖果、餅乾和酒，作為離別的聚餐。他知道伊娜需要一件黑絲絨的上衣，便對她說，到她二十五歲那年會有的。他送給她一本巴爾扎克的書，上面寫着：「這不是作為絲絨上衣的代替品，那上衣要等到相當時間纔會來。」

伊娜看着她丈夫離去後，她就獨自面臨着一天勝過一天的困難——食物缺乏，沒有電火，沒有配給證，她每天只在印刷所的餐室裏喫一餐，那還是從她父親分出來的一部份：她常是挨餓。四月中，一封信來了。「這是你丈夫的筆跡麼？」一位善良的鄰人說。「我沒有回答她，我只能叫喊。」

這就是結局。伊娜拍了電報給父親。他回來了，重行恢復他在衛生研究所的工作。他們是安慰的。他們一同讀着學習着英文。他們打算寫一本關於前線的蘇維埃醫生和護士的書。他忽然生了病。兩天之後他死了。他在臨終的時候說：「不要哭，孩子；那會影響到嬰兒的奶汁的。」又是孤獨地剩下了她和嬰兒。

伊娜在大學的成績非常好。三年之中她得到三十七次的優等。但因了一位同屋裏友人的死，忙亂了一陣，她不幸錯過了大考的機會。第四張的考試紙上有三個問題。第三個題目出自她所未會讀過的一本書，但她回答得很好。考試的教師問她：「你可讀過這本書？」「沒有，」她說。

她的誠實使她喪失了優等的成績。她可以要求重考，但遭拒絕。現在她沒有什麼需要了；但她繼續學習着。

她的記憶力是可驚的。在一次宴會中，有二十次以上的演說歡迎我。演說者中有一個是愛倫堡，說着很快的法文，而且離開我十分遠。後來我問伊娜，「你能記得起愛倫堡的話麼？」

「每一句話我都記得，」她說。

另一次，我們整個早晨在塔什干的棉產科學研究所，我仔細地摘錄着一張科學的表格。「你儘管隨便寫下來，主教，」伊娜說，「要是你怕麻煩，我可以把它全記住。」

在列寧格勒，我希望有一份丹孃日記的摘要，我提議回去抄一份。雖然我從未請伊娜加以記憶，但她卻已記住了每一要點，而且完全寫了出來。

她精通英文，能讀綽塞（Chancer）的原文，會和她的朋友化五天功夫，譯出了帕列斯脫萊（Priesty）最近的劇本「檢查官的來訪」（The Inspector Calls）。她可以討論任何時期的文學、哲學或神學。她的法文程度也不下于英文。她真是一個動人的伴侶，誠懇、溫和而機智；她供給我以豐富的俄國俗諺。她對每一個人總是溫和而有幫助。她做着大家認為要做的、可貴的自動的公眾工作。永遠思慮周到，永遠非常快樂，雖然因組織我們長程旅行的極度緊張，常常累得她精疲力盡，但她從不疲倦，從不推卸一件小事情，也從不犯過失。伊娜是最堅強的愛國者，她信仰着蘇維埃社會主義新秩序的正確和智慧，認為她和別人在這個秩序之內工作，是爲了偉大的

目的。她尊重史太林爲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工程師。任何別的政權，要產生一個伊娜·考拉科芙斯卡耶這樣的人，是不可能的。

二 貴族出身的女青年

達瑪拉·索洛維也夫 (Tamara Soloviev) 引導我們到了莫斯科的戲院、音樂院、歌劇院和木偶戲的世界。經了她的嚮導——她是一個研究文藝批評的大學生——我開始了解戰後蘇聯的文化活動。我知道了更多關於達瑪拉自己的事情，她個人的歷史，她的性格和精神。星期六那天，經了一星期辛苦的工作，她加入了我們，到莫斯科河上的很遠地方去野餐。

前夜我剛從克里姆林見了史太林回來，我得詳細寫下這次訪問的經過。晚上睡得遲，一大清早就起來，我寫着本書關於史太林的一章，和另一篇給報紙發表的。當我早餐的時候，一位雜誌界的朋友衝了進來，嚷着：「你是今天的頭條新聞啦！」交給我一份眞理報。他奪去了我的原稿，我就被解放去享受了一個逍遙的假日，但甚至到了河上，當我們的車駛向港口碼頭的巨大階梯時，那昨夜訪問的回聲，仍像通過無線電似的抓住了我。

遊艇隊的總指揮是一位穿海員制服的姑娘，仍充份顯示着女性的美。她領我們到了那供我們專用的第息兒引擎 (Diesel-engine) 的遊艇。從低低的敞開的窗戶中，我們享受着習習的涼風，就這樣整整的消磨了一個美麗的周末的上午和下午。

兩個英國人；中國文學家兼政論家郭沫若先生——他是我們以後長程旅途中的伴侶，像多數的中國人一樣，溫文爾雅而沉着深思；一位伊拉克的藝術和考古學教授，說着法語，卻不能說俄語或英語。再加上來自各共和國的我們年青的俄國伴侶，構成了一個混合的國際集會。伊娜也去，還有達瑪拉。這天是達瑪拉領導的日子。

我們在遼闊的河上，緩緩地順流而下，經過船塢和建築的廣場，進入了一條運河，幾乎和威爾斯脫敏斯脫的泰晤士河一樣闊，經過丘陵起伏的地方是狹仄的。但遇到大湖，它又開闊起來了，兩岸是木造的河堤，農家的村舍和兒童的休憩之家；或者是遊艇上的旗，鸞鷲形的遊艇，它尖細的桅桿高聳入雲，在淀泊中順流迴盪着。莫斯科人是喜歡遊艇的，大的集體組織如動力工廠都有俱樂部，並備了小遊艇，它們的會員，只要納少許的會費就可使用。藝術家作家和別人等，也都有自備的遊艇。

河灘上羣集着老老小小的洗澡者，在炎熱的夏天太陽中，皮膚都曬得黝黑了——他們大部份是夜班的工人，帶着他們的孩子消磨着這一天。星期六的假期尚未恢復。

小孩們在游泳，迎着我們小艇起伏的浪花。有一個頑皮的少年，把水恰恰濺到波斯教授的身上，他穿着整齊的藍襯衫，正探首在窗外。

靜靜的河給我所尋求的機會，達瑪拉講了許多關於她的家世，和新秩序對它的影響。她的黑而大的眼睛，耀人的美麗，她的風度和性格，早已訴出了她貴族的南方系統的祖先。

達瑪拉對我到克里姆林的訪問很感興趣，像一般蘇聯青年一樣，懇切而感情地提出了關於史太林的問題。他看上去還好嗎？他老了一些嗎？

她別有使她發生興味的理由。原來她跟史太林的兒子瓦西里（Vasily）和史太林的女兒史維脫拉娜（Svetlana）是同學，他們的母親，一個褐髮的漂亮女人——「雷奧娜多·達·芬奇最愛畫的美麗的典型」——早死了。

瓦西里有着他母親一樣的藍眼睛，紅紅的頭髮，他不喜歡學校的功課。「我們告訴你父親去，」是唯一逼他用功的方法。他可並不笨，戰爭時期他很快在空軍中有了地位，而且擢昇得很快。二十四歲就當了上校。軍事當局要把他昇到將級。史太林反對說：「他還太年青。」

史維脫拉娜是另一種的性格。聰明用功，她二十一歲時已作了母親，但仍在大學裏研究歷史。達瑪拉說，她的這位同學的孩子時期，一些也沒有特別好看的地方，但一到十六歲，却變成一個美麗的女人了。十八歲時，她嫁了一個剛復員的英俊青年，他從國際問題研究所畢業後，就服務于外交界。

達瑪拉的祖母，一個美麗的貴族出身的姑娘，曾在斯摩爾尼（Smolny）學校念書，那是彼得格勒的一個貴族女兒的學校。她很早就嫁給一位貴族。後來，她又與一位學生從事森林學的農業專科學校的教授結了婚。他們都以知識份子身份參加了革命，最後也因此喪失了自由。達瑪拉的父親是生在牢獄中的。當達瑪拉還是孩子，每每發脾氣的時候，她的母親總是打趣地說：「我

能想望什麼，你父親是養在牢裏的！」

革命使這位教授恢復了自由。列寧派他到巴庫去，他在那裏從事於石油工業社會化的組織，這樣就與油田的英國老闆發生了衝突。他是最早獲得紅旗獎章的三人中之一。

達瑪拉的父親喬其·索洛維也夫（George Soloviev）是紅軍的工程師，已昇到高級將領的地位。有一天晚上在戲院裏，達瑪拉興奮地低聲對我說：「我父親得了列寧獎章啦。」

達瑪拉在歷史哲學研究院讀的是文藝批評，這研究院現在已併入大學了。

當我們談着的時候，別人都在忙碌地準備野餐：魚子醬啦，鰾腸啦，薩丁魚啦，還有當地的礦泉水。他們需要一只開罐頭的傢伙，于是要求女船主設法。過了一會，船面的餐室騷動了，大家站了起來，艙口露現着那位女工程師蓬鬆的頭，在用一把小斧敲着罐頭！蘇聯人都戲稱這些罐頭爲「第二戰線」——這樣的難開。用餐以後，遊艇駛入一個遼闊的湖，傍着較低的河堤碇泊下來，我們就通過甲板跳下去洗澡——男人在一邊的小河，女人在另一邊，只有深深的水是混雜的。這是一個晴朗的好天，七月的太陽曬得河水非常之溫暖。我們在赤楊灌木叢中如茵的草地上沐着日光浴，聞折着野花。

那位伊拉克教授不諳西方的習慣，跑到正在穿着衣服的女孩中間去，他自己也幾乎沒有穿上衣服，因爲他的襯衫全沾了泥，他手足無措地不知怎麼辦纔好。達瑪拉大聲說着生硬的法國話，叫他避開。她說，這種事情在蘇聯是不慣的。最後，她要求我們幫忙，把這位教授拉了回去。

原來這個不幸的人當時遺失了手錶，我們怎麼替他找也找不着。最後我尋出了他原來下水的地點。我們的女工程師，穿着長靴跳到水裏，伸下手去，把那隻錶從泥淖裏拾起，她倒像是銀色的透視鏡似的。

重又上了船，我們就在薄暮的寒冷中轉棹歸了。這位中國學者把腳踏在船舷上，露出細瘦的小腿和短襪，提出中國的音樂問題來，我們大家討論着，我喜歡笛，達瑪拉喜歡笙；她愛笙的抑揚的完整的嬋嬋不絕的韻味；完整得像是沒有開始又是無窮盡的。

別位也加入了討論，都很誠摯而熱烈地從這個扯到那個。青年的蘇聯，今天比之十二年前是在更廣泛的環境中活動着。這一天最後又有一次酒會，在酒會中我遇到了約有四十位藝術界的人物。達瑪拉給我們一一介紹了。我在下面寫到女雕刻家莫慶那夫人和她兒子味沙伏洛特——達瑪拉的友人——時，她還要在本書中重現的。

三 農民出身的青年

卡拉加諾夫 (Alexander Karaganov) 於一九一五年生于農家。我在他從羅馬尼亞講學回來時遇到他，他說得很流利的一口羅馬尼亞語。

他說，羅馬尼亞是缺乏紀律的。她沒有計畫。她的人民無精神。蘇聯的飛機在索菲亞降落時，爲了避地上的兩隻羊，而不得不在機場上空盤旋兩周。這是典型的常事。這種漫不經意的臨

便的精神，在開會時也到處可見，預定七點鐘開會，總要到七點四十五分纔開始。

他的一位朋友在義大利更惡劣的見聞使他喫驚。管制義大利南部煤礦的美國當局，並不鼓勵應用機械去掘煤，他認為換了蘇聯，那一定是要鼓勵的，只有孩子們在煤礦中工作，沒有足夠的糧食，攀懸着長長的繩索梯子上下煤礦，每天要背負着煤塊經過這樣八次的來回。在年青的卡拉加諾夫看來，這樣的條件實在不能忍受。但西方的盟國卻既不抗議和設法改善，也不對那些工作者表示同情。卡拉加諾夫眼中的羅馬尼亞，和他朋友眼中的義大利，是他們最初也是惟一看到資本主義所處理或管制的國家。他們喫驚了。他們是年青的。

不像伊娜生在職業人士的家裏，也不像達瑪拉有着貴族的血統，卡拉加諾夫的父母乃是瑪脫諾伏 (Martenovo) 地方的貧苦農民，這地方是摩爾達維亞 (Moldavia) 的深藏在森林中一個小村，離鐵路線很遠，粗陋的鄉村生活，文化很低。直至一九二六年，教育纔達到瑪脫諾伏。靠了卡拉加諾夫的父親、母親和姑姑的犧牲和努力，給他積聚了一些衣食住所需的錢，他這纔能以優越的成績，讀完了初等學校，後來他又進一家很小的地方報工作，他當了新聞記者。他有着豐富的鄉村生活的知識，拿耕鋤比拿什麼都內行，他一心想要繼續受教育。

一九三四年六月，地方蘇維埃選派他進大學。八月二日開始甄別試驗，需要學校第十年的程度。他的教育只受到第七年。三年的課程得在三五天內補修。朋友們幫助他。他夜以繼日地用功，終於通過了考試，而為西方研究學院的學生，他選定了西方文學這一門。在那艱難的幾年

中，他每年所得一百十五盧布的學生膳食費只能勉強維持。特別食堂和店舖幫助他：第二年的情形就改善了。從第三年起，他被選派到中學裏担任功課，能够寄錢給他父母了。「我的母親，」他說，「是簡樸而高貴的。」

一九三九年，卡拉加諾夫畢業了。由於軍隊的徵召，和幾位老師的死亡，他只能自行從事文學史的科學研究的進修。戰爭的發展，中斷了他繼續研究的工作。他被邀請演作為文化敵人的法西斯主義，它的起源及其發展。他發表了一套小冊子。

情勢越來越緊，他在史太林格勒經了一個月的訓練，就加入軍隊，參予莫斯科的保衛。他在前線受了傷。第二次受傷較重，他只得在上達林斯克（*Sudzhinsk*）休養八個月，有時講演着莎士比亞、巴爾扎克和托爾斯泰。後來他又回軍隊當軍事記者。

因當局的要求，他改行担任了共產主義青年聯盟的迫切的文化工作。他教青年研究歷史和別的文化題目，他又把少年男女組織起來，分組到一個大的軍事工廠去工作。他的成就，使他負責着烏拉爾南部青年的所有文化工作，在那青年工人戰鬥隊中，這是重要的任務，他們都是從事坦克車和其他軍備的大量生產的。前線的緊張使烏拉爾的責任更形迫切。虎型坦克車和新型的機關鎗出現了，俄羅斯型對抗的武器也在二十天內大量地生產出來。

製造工作的規模是巨大的，但熱情很高。三百個熟練工人和三千個生手工人在七個月之內造成了一座大僚轟，這在平常是需要三十個月的。報紙同聲贊揚。然而這些少年們實在比小孩大不

了多少，他們總是喜歡在餐桌上投來射去，或是叫嚷着自己的一些小困難。卡拉加諾夫的任務就是教他們生活的藝術。他組織突擊隊、補習班和特種的學校，俾少年們繼續文化上的學習。工業的效率，卡拉加諾夫在羅馬尼亞看到需時四年的，在烏拉爾南部就只需三個月，較難的也不過四個月。

當局鑒於他的工作和他在外國文學教授上的貢獻，叫他回來担任少共真理報的四位編輯之一；後來他又被任爲對外文化協會副主席，我就是這時遇到他的。

卡拉加諾夫是一個英俊的青年，活力十分強，常喜在伏爾加河中游泳，或在樹蔭下野餐作樂。他最喜歡辯論和討論任何社會和文學的問題，這很能誘發蘇維埃青年的思想。有一次和他討論到勞動效率和工作的產額，我認爲蘇聯總的計劃，固然杜絕了無用和非社會的工作，不致造成畸形繁榮、蕭條和失業，是可羨慕的，但在小的事情方面，我們的效率還是勝過了他們：例如我們普遍應用尖鋤代替了鐵桿；用一人推的手車，代替了兩人抬的担架。

「你對的，」卡拉加諾夫說，「但有很多的原因。第一，我們缺少工業文化的深切基礎；我們年青，你們年長；我們學習着；第二，這還不過是閃電似的迅速歷程的第一階段。無疑頗有偏於單方面的地方，常像詩人的構思，只集中注意到遙遠的前面，却看不到放在他面前桌子上的東西。我們也是往前看的。我們前面有巨大的目標。我們加緊努力的向着它。我們常常忽略了比較不急的事情。但我們學習着。」

卡拉加諾夫說到專家的缺乏，又描述了訓練熟練的領導者和熟練的組織者的努力，一棒艱難而緩慢的工作。他也完全知道蘇維埃秩序暫時的不可避免的弱點。他說：「你們，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有一種先於我們的便利。你們有錢袋的支持，以及謀利的動機。我們千百萬的人民却連想都不想到這點。要在大眾心理上造成社會主義的理想，誠然不是容易的」。但他又接着說：社會主義的競爭，「直接訴于爲了謀取較高收入的利益的動機，同時也鼓勵着爲了幫助整個社會的更廣泛更莊嚴的動機」，完全指示着正確的方向。

話題又轉到蘇聯好的和壞的人民，卡拉加諾夫重複了一遍史太林的話，——他以爲是至理名言——這是當他向軍隊乾盃時對着貝奈斯說的：「軍隊是由千百萬的人民組成的，他們未必個個是天使。有些人的行爲不及我們所希望的好。但要記住，他們是會從死亡和幾千哩路的戰鬥中跋涉而來的。他們覺得他們是征服者，還有那些沒有征服者念頭的人們，他們也都可能照自己喜歡的做；他們的行爲也許有好有不好。請你了解這一點，讓你作仁慈的判斷吧。」

有一天走過史太林格勒的一條破碎的街道，卡拉加諾夫停下來，望着瓦礫堆說：「就是這地方。」這就是他故居所在的地方；現在一切都完了，連同他一千卷以上精藏的圖書，大部份是英國的古典文學。

卡拉加諾夫三十來歲就担任了他現在的職務，他小孩似的面孔，看上去只有二十歲。他有敏銳而誠實的頭腦，他可以討論蘇維埃的感情和蘇維埃的問題，對於我們也有同情的了解。他致力

于英國的文學和一般的文化，他很想了解更多英國的觀點。

四 女雕刻家及其子

在五月的一次歡迎我們的宴會中，許多來賓都發表了演說：波羅亭（Borodin）、科立斯尼科夫、卡必蔡、愛倫堡……我旁邊坐着一位中年婦人，短小強健，溫文和易的面孔，自若的態度——彷彿是卻爾騰漢（Cheltenham）或貝特福（Bedford）的貴婦人。在她簡短的歡迎詞中，她說願意替她國家的友人坎脫勃里副主教雕塑一座半身像，獻給國家作永久的紀念，希望他能允許並且到她的工作室裏去。這人叫做伊格娜底芙娜（Vera Ignatievna），已故柴姆科夫博士（Dr. Zamkov）的夫人，以筆名莫陵那夫人出名的，蘇聯最有名的女雕刻家，我感激地接受她的邀請，到了她精緻的家。莫陵那夫人跟她兒子味沙伏洛特·柴姆科夫（Vesvolod Zamkov）住在一起，還有一位忠實而能幹的女管家，年青的時候就一直跟着她，等于是家庭的一員了。

我起初幾次的訪問是在夏天的黃昏。那房子位置在莫斯科郊外一個廣大的車馬雜沓的五角場的一角。外表如同它所在地方一樣的簡陋——荒涼的廣場，進去是一座經過戰時損壞的精巧的老屋。大廳裏堆着木料，那是備莫陵那夫人的雕塑之用的。高敞的居室遺留着以前的偉大的標記，現在則靜穆地佈置着許多動人的陳設；咖啡桌上是瓷器和銀器，從柴姆科夫鄉間園圃中摘來的菊花；圖畫和書籍凌亂地散放着，偉大藝術家的家裏常是如此的——通書齋的休息室，代替了一般

家庭的會客室。到處是文化的象徵。毫無富貴或奢侈的氣息，藝術工作者是屬於蘇維埃勞動者報酬最高的一羣的。

那位老看家婦知道我是教士，看着我的十字架，熱情地握着它，吻着它。「她是一位信徒。」莫慶那夫人溫情地望着老婦說，並用了東正教徒所習用的名詞。

在工作中間，我們不時喝着上等的咖啡，愉快地聊着天。伏爾耶——我們對味沙伏洛特的簡稱稱呼——是一個二十六歲有思想的青年，那溫雅的舉止，常可以從那因幼年身體不好而隔絕平常活動的孩子們身上看到的：他曾經生過各種結核病。

伏爾耶年少時候很用功，老早就學着看書了，對於文學方面涉獵很廣。他說着生硬的英語。他專門攻讀的是光學，我到他家的時候，他正好完畢了大學中的最後考試。我跟他和他的好友達瑪拉談論着，萬花筒般的無所不包，接着一陣歡樂的大笑。莫慶那夫人抬頭望着，微笑着，然後又繼續工作。他們剛看過「亨利五世」的影片，大加稱贊。他們認為這雖比一般影片較少現實性，但在藝術的解放和集中上，却開展了更廣大的範圍。

達瑪拉穿着黑衣，黑眼珠，綠色的項鍊；伏爾耶是短袖的硬領藍襯衫，敞露着項頸，恰形成了動人的一對。我覺得伏爾耶是一個英俊的青年。假如我有一個兒子，我就要選擇像他這樣。他應該是蘇維埃青年最近的「典型」；猶如他的母親——那身世自然與他相關的——應該屬於那從革命中達到早期成熟的男女的最初的「典型」。

伏爾耶和達瑪拉興奮地談論着，對於每個問題都顯示着了解和智慧；有時談藝術，有時談考古學，有時談神學和哲學，有時談科學。就藝術和考古學而言，伏爾耶覺得所有文化中最有興趣的乃是「聖母瑪利亞和小孩的像」。他希望將來能寫一篇這方面的論文。我不禁回想起戰前，當我偕同尼赫魯赴中國展覽會的時候，尼赫魯對那古代的基督以前的「聖母瑪利亞和小孩像」表示狂喜的神情。

伏爾耶眷戀着英國的生活、文學和文化，他希望將來能到牛津大學去研究。一天，他拿出一大包十七世紀英國作品的原稿來，那是他在一家舊書舖中發現的。他也曾在書上看到一種療治濕疹的藥方——蕁菜葉。他的朋友在巴黎患濕疹，找一位法國專門醫生去診察，這醫生給他配了一種蕁菜葉煉製的藥，他說這是最新特效藥。

對於哲學問題，伏爾耶具有着熱烈而自由的頭腦。像許多俄國人一樣，他同意死亡僅是一章的終點，而不是全書的終點，但同時又認為靈魂的繼續進展是難以解釋的；于是又從科學的事實中去找論據的力量，因為依照科學的解釋，在不斷增長的整體中包含着不斷增長的個人，乃是生活演進的法則；因此他假定這同樣的分化和整體，是生命繼續的特徵，也許並非不合理。伏爾耶有他非常實際的一面，他幫助他母親是無微不至的。例如柴姆科夫家要在莫斯科建造一座新房子和工作室。伏爾耶做到了所有的計劃，這在目前是困難的事情。在工作室中，他幫助着母親，他是最愛最欽慕他的母親的。他準備着雕塑用的泥土，他從每一角度替被雕像者佈置立足點、椅子

和照相。他的攝影技術也是高明的。

雕刻室中陳列着美麗的東西，和雕塑的模型——有的是造像，有的是擬作。莫陵那是既能塑又能雕的，她的工具是一種棕色的沒有節的硬木。一個教授的紀念像矗立在雕刻室中。關於我的半身像我要說兩件事。第一件是我從這座像上看到了我自己，在鏡中從未看到的東西——一種不思議的酷肖我母親的神情。第二件事是當工作快完成時，我對她說，她已替我塑成一種上帝意想中的人，而不復是我原來的一種人了，她很開心。她的作品是有紀念價值的。

我們最後一天有說有笑的早晨叫人不會忘記。莫陵那夫人剛從法國參加了三千位婦女的會議回來，這三千位婦女中有英國人，有義大利人，但大部份都是法國人；一位代表來自西班牙，最使她驚異的是比利時惟一的代表，因為婦女在那裏還沒有選舉權。照莫陵那夫人看來，婦女沒有選舉權的地方也就是沒有自由的地方。

莫陵那夫人精心結撰的一篇藝術論文在馬賽被錯誤百出地宣讀，因為那裏是不瞭解它的，但倘如在巴黎就能被瞭解。她批評法國的藝術太抽象，缺乏內容。我問她所謂內容究竟是什麼，她指着一個強健的年青女農的銅像，發達的胸脯，豐滿的全身站立着，兩臂交叉成正方形，頭是挺直的，完全表現了忠實工作的自信，和從一種有秩序的經濟產生出來的富裕。

「這就是內容。」她說。

像蓋拉錫莫夫一樣，莫陵那夫人不能賞識庇卡索（Picasso——義大利名畫家）的作品，她

喜歡阿立克·愛斯脫 (Alex Exter) 的作品，認為除了細緻的色彩的情調外，它至少也有些內容。我們的談話是徹底的坦白，有趣而談諧。

蘇聯是我所知道最少誨淫的國家，也是道德最高尚的，有時候，又往往是說話最爽直的。俄國人可以談論英國人會客室裏所不談的事情，但態度完全自然，毫不涉及猥褻。

例如，達瑪拉剛引導一位澳大利亞科學家去參觀了馬羣繁殖場回來，在那裏，這科學家會懇請她說明實行人工受孕的經過，家裏的人都笑她受窘了。我們又討論到伏爾耶父親亞歷山大·柴姆科夫的工作。關於他生死的故事，我是剛從莫慶那夫人那裏知道的。莫慶那夫人和伏爾耶用完全自然的語句，說明柴姆科夫博士關於產婦小便注射的發現和實驗，他說產婦小便中含有一種過剩的生命力，對於嬰孩是有益的；他曾用這療法治了多種的疾病，他的目的倒不是在直接征服疾病，而是藉那些因素增強人體對疾病的抵抗力。莫慶那夫人說，柴姆科夫的統計很有成績；她自己經過這種注射後，十八年來就從來不會生病過。更使我感到興趣的，就是一個青年和一個青年女子居然在那青年的母親前面，自由自在的討論這些事情，而毫無猥褻或誨淫之處。而且這同一的達瑪拉，最近還爲了伊拉克勃授闖入女子更衣的地方而羞怒地叫起來的。莫慶那夫人很羨慕她丈夫的發現，因不能到巴黎巴斯德研究院學習，以致對於產婦小便無法繼續作實驗，而感到失望。我們又討論藝術的問題。莫慶那夫人和達瑪拉一致以爲，蓋拉錫莫夫的作品雖是第一流的，但最好還是讓珂林替我畫像：「這將更能表達出精神來。」莫慶那夫人又對我的半身像作着新試

驗。這是銅的，黑色的衣服，用特別的方法把頭髮染白，面孔則用了一種暗紅色的銅。

莫陵那夫人把她的身世告訴我。她父親是一個繩索製造者；很富有，革命時候喪失了二百萬盧布的財產。她鄭重說明蘇聯人對於這種損失倒並不比西方人來得重視，因為他們一直受韃靼人和波蘭人的進攻，是久已慣了的。

她從母親繼承了外國人的血統，德國人或法國人，這也許是由於拿破崙侵入的緣故；一八九一年，她母親死於太不魯根（Tarbrugen）年僅二十九歲，莫陵那只有一歲半，她父親因怕小孩子的騷擾，搬到克里米亞去住，後來在斐奧圖西亞（Feotasia）設立了一家荳麻油廠。

莫陵那夫人自幼就對繪畫有興趣。我看到過她的一張舊照片：一個美麗的小孩，闊闊的眉毛緊鎖着，專心地在繪圖。

她十四歲那年，父親死了，她由她的保護人帶到戈爾斯克，她就在那裏上學，後來又轉到莫斯科，進了與達瑪拉母親同一的學校，學習繪畫，她從當時著名畫家馬斯科夫（Maskof）學了繪畫的入門知識。一九一二年這年是她一生中的轉變點。

她坐雪車經過一段崎嶇的山路，馬滑了脚，雪車在山邊撞毀了。她的面孔碰在石塊上。她清醒過來時，纔知道自己已經受重傷。她起先只覺得傷的是前額。其實是全部，鼻子傷得最重，只掛着一線了。幸而立刻請來的一位醫生是專家，他把重傷的創口縫好，縫得如此的巧妙，所以只有當我靠近莫陵那夫人時，纔看得出她面上還留有創疤。

那時候，她容貌是被毀了。她原是美麗的。她又是一個敏感的姑娘。在當時情形之下，她惟恐被迫進修道院，或孤獨地了結一生。她完全沉入抑鬱中。她忽然發願到外國去，那裏沒有人知道，她可以繼續藝術的學習。她的保護人起先反對，因為在當時，一個二十歲的少女獨自遠涉重洋是不妥當的，但終於執拗不過她，最後讓她去了巴黎。莫慶那夫人用藝術的成就，彌補了她臉孔的缺陷，她說：「這次山上的覆車幫助着我，使我的生活豐富了。」

在巴黎，她進了波第爾（Bourdelle）的繪畫學校，波氏是羅丹（Rodin）的學生。她留居兩個冬天就離開了：「這便是我生平所受的全部教育了」，她說。「我不過是個業餘的藝術愛好者。」

她講到羅丹的「街道」眼。他能看到人們要到街道上去纔看見的事物；這樣的看就這樣的畫。她說，她可以舉出這種庸俗的二十八個例子來。她又從羅丹作品中看到性感的因素，這在她是一樣不喜的。

她在巴黎的兩年完成了重要的轉變。她會看到過許多人，並且很用功的研究。她會進過立體畫派的學校。她想學習一切能够學習的東西，她想瞭解一切。她覺得自己是在兩個世界中工作，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波第爾使她學習了自然；立體畫派使她學習了抽象。立體派的抽象家必須從自然着手，但又竭力避免自然的感覺。

她會努力把握了立體畫派的論據，懂得了它的技術：「我不能忽略我所不懂的東西，直到我

把握了它，」她說。一等到把握了它，她也就揚棄了它：「抽象的藝術總是離開了事物的現實，」她說。她對於立體畫派學校仍懷着某種感激的心情：「這是一種實驗室，讓我們對一切事物作試驗。」這在她的藝術生活中是有很好影響的。在她離巴黎以前，她發現了自己的藝術路線：她必須追求和擷取事物的內在靈魂和內容，然後顯明地來表現它。她懷着現實主義藝術的感情離開了巴黎；她認為僅僅表現事物的表面只是開始，而並沒有完成；必須一步一步的從「它是什麼」深入到「它可能是什麼」以至於「它應該是什麼」？她的藝術是劃時期的、崇高的、有激動性的。

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莫慶那夫人回來了。全國正號召着服軍役。她離開俄國時候是一個面容貌被毀而鬱鬱不樂的姑娘；兩年以後她回來時，卻已是一個成熟的有懷抱的女青年，她立刻當了紅十字會的護士，以替國家服務。在內戰中，她在紅軍和白軍戰線之間，莫斯科的一個醫院裏工作；貴族、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都一樣要她看護。她照顧着所有的人。她的醫院在重重困難、供應缺乏和糧食缺乏中勉力支撐着。最後，她把病勢最重的病人移到一個軍事醫院去，她記得這一天是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就在那裏，她遇到了亞歷克西·柴姆科夫，一年以後，即一九一八年，她就跟他結婚了。

莫慶那夫人的結婚生活是快樂的。她丈夫有偉大的人格，使她受到很好而有力的影響。他尊重地藝術的成就。他鼓勵她專心致力於藝術。

在整個內戰時期中，生活是艱難的。她藉繪製「招貼」來維持，後來又從事於雕刻，最後，她在莫斯科中央學校中得到了一個位置。

一九二〇年，伏爾耶出生，起先莫慶那忙於家務，但不久就又回復了工作，一九二七年，得學校紀念獎章，並去義大利。後來，她受政府的委託，設計雕刻，以裝飾巴黎博覽會中有名的蘇維埃大天幕，我就在展覽會中第一次看到她的作品。這是浩大的工程，有二百個工人包括了三十個工程師，協助着她。空中飄蕩的闊帶有巨大的拱門，長三十米突，重五噸半，只有兩點着地。全部工程是困難的，這只有在政府的全力資助下纔能使她完成。這是有教育性的，也給工人以新的瞭解。許多人都仍要求加入她的工作。她讓工人也分享了她所得獎章的榮譽。

伏爾耶和達瑪拉都愛英國的文化。他們說，他們對美國注意的是工程、大量生產和技術，對英國注意的則是文化。他們又說，美國太繁榮，太物質主義了。美國的文化尚在以後。一國的文化，只有當國家像一個成熟而且確乎有些爛熟的櫻桃的時候，纔是它最好的當兒；那時候，財富適中，它的追求可不致吸收民族能力的精華，而生活也具備了精神上的享受：英國是已經到了這個階段了。

在更精緻的她的內室裏——莫慶那夫人寫作、讀書和休息的地方——我會看到小桌上放着一個非凡英俊的、面容堅實而和善的男人的照片。照片面前總是放着鮮花。這是莫慶那夫人丈夫柴姆科夫博士的遺像，就在這最後一天，她告訴我關於他一生的故事，關於他如何成爲醫生的奮

門，以及關於他在科學聲譽上創造性的活動。他死得跟他活的時候一樣，毫無一些自私；他仔細地安排了所有事業上的問題，直到最後也從不提到他致命的病症。

我黯然地離開了雕刻室，農村少女的銅像，教授的面影，堅強的露臂少年的半身像——莫慶那夫人的親戚，遭納粹酷刑致死的——，藍色的大花瓶，大塊的玻璃，古舊的陶器，老邁的管家婦，以及伏爾耶和達瑪拉和莫慶那夫人，還有那我越來越愛的快樂、風趣、熱托、嚴肅而有意思的蘇維埃的家庭。

五 兩位畫家

一天晚上，當音樂會休息的時間，我和達瑪拉在布爾蕭（Bolshoi）戲院的客廳中踱步，我們遇到一個強健的中年人，穿着椒鹽色軟呢的衣服，敞開着，露出了灰藍色的背心和金錶鍊，襯衫的有色軟領上，法國式的有色領帶寬鬆地打着蝴蝶結。

「這個，」達瑪拉說，「就是畫家蓋拉錫莫夫。我來替你介紹好嗎？」我們攀談着。他接受我的邀請到我們的包廂。音樂終了時，他約我到他家裏再見。他要給我畫像。

蓋拉錫莫夫的房子是一個典型的莫斯科小別墅。它位置在通列齊格勒去的大路旁邊的小村中。必經的小巷崎嶇不平，莫斯科郊外的小巷大都如此。我們拐過小巷，就轉到一條清潔的兩旁都是樹木和草地人行道的大路，我們找到了一座小屋，有一間很大的工作室和簡陋的花園，那便

是蓋拉錫莫夫居住和繪畫的地方。

工作室是一間白磚砌成的很大的外屋，光線充足，統間刷白，連那磚砌的壁爐，上面覆着泥塑的雄偉的馬頭也是白的。一張黃楓木的闊大的睡椅，鋪着波斯毯；一扇窗口下是散放着雜誌書報的舊桌子，另一扇窗口下則是幾隻書架，散亂地堆滿了畫稿，還有一隻精巧的黃木椅子，那是「主人」常常所坐的，這樣便是全部的傢具了。地板曾經打過蠟。

各國的雜誌都有：英國的、法國的、美國的、和西班牙的。蓋拉錫莫夫保持着全世界藝術活動的接觸。他有他的選擇，喜歡的和不喜歡，猶如所有的藝術家一樣。他對底卡索的作品有批評。他一頁一頁的翻着底卡索的畫冊，說明他不喜歡的理由：「底卡索缺乏對客觀世界的接觸。底卡索畫的是主觀的事物，那事物只憑了他主觀的想像，都是稀奇古怪和幻想的東西。」

蓋拉錫莫夫工作室的牆壁，充滿了一種莊嚴的形式和色彩的光輝：那是魯本茲（Rubens-gue——十六七世紀盛行的佛蘭明畫派）式的房間。大的油畫和小的油畫。在一個很大的畫架上，釘着一幅未完成的三巨頭在德黑蘭會晤的畫像。此外還有其他更動人的圖畫：一條鄉村的街道，春日的赤楊樹下的木屋，那是藝術家自己誕生的地方；一個烏茲貝克舞人的大畫像。其中最傑出的是一羣女人在俄國的澡堂裏：那是一幅大油畫，表現了蓋拉錫莫夫藝術的極峯。他神妙的畫筆活生生地畫出了浴池水蒸氣中溼淋淋的肉體：那真是一幅傑作，是值得在世界任何畫廊中展覽的。

在描繪我的畫像時，蓋拉錫莫夫銳利的目光對我從頭到腳打量着，他烏溜溜的注視好幾秒鐘，然後又很快的移向我旁邊的大畫布，把顏色東一塊西一塊的塗上去，似乎在竭力捉住霎那間的神情。過一會他總要停下，燃起他的煙斗，叫他屋子裏所有的人，無論是燒飯的、打掃的和其他服役的人，都來批評他的工作。他們大家一起討論着手或頭等等。蓋拉錫莫夫是歡迎批評的。當伊娜提出我的神情表現還缺少一些什麼時，他一而再的研究着，最後，他終於很快地悟到了她所建議之點，於是又仔細的注視着。

他工作的手法和敏捷是權威的。我永不會忘記，怎樣在三兩秒鐘之間，我的金珠十字章，我的手錶或戒指就給賦予了閃爍的生命。他真是絕對的一筆不苟；當他畫面孔、眼睛和嘴巴時尤其見得神妙。

休息的時候，我在他簡陋的小花園的陽光中閒步，這很像我年青時候在蘇格蘭北部所熟悉的花園，甚至那隱藏在花園一角充作廁所的披屋，也是很像的。一個蘇維埃藝術工作者的家，毫無一些奢侈的地方。

「我喜歡蓋拉錫莫夫的畫像，」有一天達瑪拉說，「但我希望珂林也替你畫一幅。蓋拉錫莫夫畫像用傳統的方法，畫得很工。」珂林是畫靈魂的。人們很少看到珂林，他的作品更少看到；珂林是一位隱居者；珂林是宗教的。我希望你能見到珂林。」

果如她的希望，我們有一天見到了。達瑪拉從中安排了這次的會見。

我們晤見珂林在他的家裏，那是鬧中取靜的一座小屋。有一個花園，恰在莫斯科的中心，四圍環繞着亂七八糟的房屋；那真正是一個隱居的地方，作爲隱者的珂林夫婦，就像尼斯脫洛夫（Nesterov）遠離塵世般地住着，不過他的用意，卻是藉此更深入地觀察生活，不致錯過別人可能忽略的一面。

保爾·珂林五十二歲；看上去不過三十二歲。頭髮剪得很短，寬大的襯衫，灰色的一套衣服，沉靜而不矜持，一些沒有藝術家的樣子。我們在餐室裏一見到他，一間整潔的十九世紀式的房間。我們趁等待主人的時候，細看着各種圖畫，有稀貴的十二世紀的細微畫，那是用多樣色彩——金黃的、大紅的和黑的——畫在厚紙上的；有他自己手筆的精緻細密的畫，風景和村鎮；有三呎闊十呎長的細織的畫架；還有一幅非常之精細的威尼斯全景圖。

保爾·珂林生於帕列克（Patekh），三百年來，他的家庭維持着一種不墜的傳統，現在是被稱爲帕列克精藝的。他妻子的教養、氣質和性格，跟他的很相調和。她在莫斯科的修道院裏由維多利亞女皇的一個後裔撫養長大，她沉靜而能幹，靜淑的超脫態度似乎又含有古代中國人的氣質。珂林夫人給我們奏着美國式大風琴，韻味很帶感情，這她都憑耳朵聽會的。她又奏了教堂的音樂，特別是彌撒曲，這還是她在修道院時期學會的。在花園裏用過茶，我們走到一間很大的書室。革命文豪高爾基，在革命初期時就認識到這位宗教畫家的才能和他作品的價值。他給珂林以一切的鼓勵，並給他安排了這間工作室，珂林一直以來就在這裏工作，他現在很忙碌，除了別的

作品之外，他還繪着三頭會議的畫。

以後的兩小時使我留下了生動的記憶。首先，我們看到尼斯脫洛夫的一幅大油畫，那是上次大戰時所畫的，題目叫做「一個小孩子領導着他們」。背景是美麗的田野和樹林蔥鬱的山陵，許多修道女和盲兵士——後面跟隨着一大羣工人，托爾斯泰也在中間——前面一個老人握着神像，另一個拿一枝蠟炬，穿過百花盛開的牧場，到伏爾加河岸去；一個美麗的天真無邪的農民孩子，領導着他們。

接下去就展開珂林精妙的傑作。他所設計的一套大油畫全部約莫有十五幅到二十幅的個人畫像，他要搜集一九一七年以來震動教會和國家的大事情時期中的主要的宗教人物。人物雖畫得頗具英雄氣概，卻是現實而親切的。我們無異面對着活生生的人們：教長、主教、僧侶、修道女、方丈、聖詩領唱者……特別的人物如教長賽吉斯（Sergius），就決不是一般的教長。畫像不僅僅是畫像。珂林自始至終隨時隨地要表現的就是精神。精神克服了和控制了現實主義，這比我從來所看到的什麼都偉大。技術是高超的。主要的顏色是黑墨，圓轉自如，譬如面孔，只有淡淡幾筆的襯托，而袍子就用濃重的飽墨。

那人物簡直要從油畫裏向你跑過來：高尙的披着長髮的人物。一忽兒是莫斯科的教長賽吉斯；一忽兒是青年的牧師，他爲皈依宗教放棄了醫藥事業而於一九三二年受了聖職。莊嚴的行列一幅一幅的進行着：特別康（Trikon），一個優伶；耶羅斯拉夫（Yaroslav），他直到一九二九

年始終當着建築師；一個修道院的副主教，據小托爾斯泰的意見是查利雅賓（Chalopin）以後最偉大的男高音專家；哥爾黛絲梯娜（Goldstend）公主和兩個修道女；一個尊嚴的尼庵住持，她起先不肯坐下來給繪像，直到最後纔說服她宗教的義務需要一個偉大時期的記錄，使未來的下代可以得到鼓勵。這裏是教會本身血肉的歷史，無論在可見的外表上，和內部的精神上——表現了調和時期的宗教俄國的靈魂。這就是珂林設計傑作的動機和目標，他爲此化了八年的時期纔完成。這裏用圖畫描寫了俄國的宗教制度，猶如托爾斯泰用文字來描寫，那是一種巨大而神聖的意象。珂林個人是可親可愛的。他送給我一幅真正帕列克傳統的細微畫，繪着從他畫室窗口眺望神祕的莫斯科的風景，前面是莊嚴、古老和金色的圓屋頂。

六 科學家

蘇聯科學界一位著名人物叫做卡必蔡（Pyotr Kapitza），以前是劍橋大學魯塞福勳爵（Lord Rutherford）的學生。一九二三年，卡必蔡二十九歲，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和許多榮譽，皇家學會指派他以教授資格，在爲他特設的實驗室工作，年薪一萬五千鎊。一九三五年應召返國，他在蘇聯受到無限的協助和鼓勵，繼續努力於具有世界意義的科學和工業的貢獻。我渴望認識這個人，因爲他對事物的根本問題的研究，具有這樣高的聲望，而同時憑他個人親身的經驗，對於東方和西方的世界都有瞭解，我終於在一九三七年見到了卡必蔡，他告訴我，他在爲祖國而工作是

如何的高興。

一九四五年，我更常常見到他，並且更多知道了他現在的工作，以及他所享有的研究的便利。當我最近訪問時，他在一次招待我的午宴中，和藹地致了歡迎詞，他強調着真實的必要——相互瞭解的真實和科學研究的真實。在他對真實的追求中，卡必蔡所採用的正當的科學方法，就是在探尋支持理論的事實。這樣的事實常被縝密地隱蔽着；必須設法把他們抽出來。卡必蔡不倦地探求着：「難以理解的事情應該耐心的探究」是他喜歡的格言，也是他生活的規律。卡必蔡選定特別降低的溫度，作為他特殊的研究方法。他知道他所做的是什麼。他把他科學研究的工₄作自比於深入不可知的地方的地質勘察家，他可能空手歸來，也可能滿載而歸，但始終指引他的是已知的法則，而不是幸運。

因此，他的應用降低的溫度，並非是偶然的，因為溫度記錄着原子的速率：溫度愈高，速率愈大，反之亦然。溫度愈降低，原子的運動愈慢，猶如網球家慢動作的圖片。原子的運動慢下來，你就可以研究物質如何的構成，正如網球選手研究專家慢動作的圖片一樣。在特別降低的溫度中，物質呈現了完全新的性格。例如氦（Helium），在一種低於室內溫度幾千倍的溫度時就失去了黏力或韌度。水比糖漿少黏性。但當水流注到一個非常精密孔隙的玻璃管時，卻需要較長₄的時間。氦在攝氏表零下二百七十三度時化作了液體，那就流得很快了。它成了高度的流動體。卡必蔡因這一發現得到了史太林獎章。但還沒有人知道這樣知識有什麼用途。

我們終於知道了一些卡必蔡工作的用途，特別是他廉價製造液體氧氣的成功。氧氣可以很容易從空氣中取得的，空氣的兩大部份是氮和氧。提煉的方法在理論上很簡單：把空氣化成液體。氧氣比氧氣蒸發得更快，因此只要加高溫度，便濾出了純粹的氧化液。

液體氧氣有極大的價值，據我們所知，它可以熔鐵，可以切割金屬，或幫助高空中的呼吸。氧是生命主要的動力，也是燃燒的基本因素。自然界中的氧氣是豐富的，它形成了我們周圍空氣的五分之一，倘能用簡易的方法把它大量提製出來，就將無限地加速工業的過程，例如可以加速熔爐中的鍊鐵，可以淨潔因大量運用固體燃料而造成煤灰飛揚的天空。但用唧筒壓力製造氧氣是很費錢的，而且很慢。卡必蔡設法使它簡易化。他實驗了雷力（John W. Strutt Rayleigh 英國物理學家）所建議的冷藏法，別人都會試驗失敗，他卻居然成功了，他不但是科學家，而且也不愧是實際的工程師。他的冷藏旋轉機成了科學研究和工業應用的基本工具：這又使他獲得了第二次的史太林獎章。

蘇維埃政府始終給卡必蔡以鼓勵和大規模的設備：他的冷藏旋轉機無須與私有權益競爭，也無須等待慢慢的從這一工業到那一工業的發展。這新的方法成了一種國家的利益，國家下令凡是需要氧氣的地方，都可採用這方法。一個氧氣用途的國家技術委員會組織了起來，負責監督這命令的執行。卡必蔡受任為委員會的領袖。

「完整的結合」是深深生根于卡必蔡思想中的一種觀念，完整的結合，就是這一科學家與那

一科學家在思想和理想上的接觸，也就是所有科學家與大部份羣衆和大部份世界的緊密聯繫或接觸。卡必蔡主張科學成果必須使之通俗化，雖然這對於科學家是不需要的。這也必須用宣傳來傳佈。一個科學家必須把他的成果讓同道們知道，因此而影響思想、哲學的遠景和技術的方法。

老年人與年青人在相互需要上的完整的結合，在他思想中也很豐富。他念念不忘魯寒福的話：「卡必蔡，你知道，只因靠了我的學生，我纔覺得自己還年青。」而現在，「卡必蔡說，「我也已老了」——他不過五十三歲，因為大家都這樣的年青，使他感到老了——」我覺得只有那青年人的社會纔能使我不至於衰朽。當我把自己的經驗傳授給青年人時，我纔覺得自己還有生氣，對於科學上新的進步的一切還感興趣：保守主義對於一個科學家比早死還惡劣，因為它妨礙了科學的發展。」

七 外科醫生

在特里西亞科夫 (Tretjakov) 的畫廊中，陳列着尼斯脫洛夫的許多繪畫傑作，其中最觸目的是一幅羅馬人面孔的一個青年的側面畫像。頭向前挺直着，燃燒般的熱情，這個人戴着眼鏡和無邊的帽，穿着手術室的全身白衣。長長的彎曲的手指向前指點着，也像他面部一樣有力。桌子上放着一大堆的瓶子，這就是喬治·尤丁的畫像，他是世界聞名的外科醫生，也是莫斯科之寶。我會晤見尤丁好幾次，並會和他在中央急救醫院裏整櫃了可紀念的一天，他在那裏當着外科主

尤丁引導我到病房裏，他受着歡迎，受着無數病人的歡迎。他對每個病人說一句話；在悲慘地擠滿着戰爭受傷者的病室裏，他像是小孩們中間的父親。

我們遇到了一個青年的姑娘，他叫她過來。她把頭放在他的肩上，他輕撫着她的頭髮。他給了她以新的生命和新的希望。他是他的胃病病人之一，是他用無比的手術從九死一生中救出來的。我們又跑到一個新來病人的床前。那面貌的特徵似乎很熟悉。瘦削、黧黑、而美麗——對了，她是亞美尼亞人。實際上她來自一千四百哩外的伊區米亞琴（Echmiadzin），幾天以前我也是從那裏回來的。這醫院裏的病人都從許多地方來，這又是蘇維埃衛生事業普及的一個明證。

尤丁解釋着他出名的手術的大略，他可以換易敗壞的胃管，用管子從口中通到胃裏，那就是，用一根截得和病人腸子一樣長的管子，割開外面的皮肉和肋骨，把它穿縫起來，這樣就形成了一條喉管和胃管之間的新通道。

「這樣一來，那病人豈非受傷了麼，怎麼保護他的胸口呢？」我問。

尤丁招呼了一個女孩子，吩咐她喝水。我們可以看到液體在喉管到胃管的通道上的流動。他輕輕拍着她的「新通道」。她毫不畏縮，只是微笑。

我又問：「這位姑娘怎樣起病的？」

「大概是誤吃了什麼，」他說。「小孩們往往會把放在窗口防止結冰的化合物，當作水一樣

的喝下去。兵士們也常常會誤吃的。」

「有時候，」他說，「也可能是企圖自殺。」最近有一個病人，因失戀喝了石炭酸。她的胃管完全爛光了。要救她的命，就必須用尤丁的手術方法，把銀質的管子直通到她胃裏，因為這樣纔能給她吃東西。朋友和地方官員們急忙把這個病人從一千四百哩外送來急救醫院來。手術經過是良好的。這女孩很快復了原，就回到她父母那裏去，她父母根本不知道也根本不需要讓他們知道她的自殺，或她怎樣在尤丁的手中復原的經過；他拯救了這個女孩的肉體和靈魂。

我們穿過門診的病房，參觀了放着一長列汽車的廣場，醫藥人員都在那裏等候，隨時可以駕車出診。一有緊急的召請，車子在兩分鐘之內就開出了，車上裝置着不斷指示的無線電，告訴醫生應該注意的地方。手術室裏常駐着外科醫生，準備隨時工作。拯救生命是絕對的迅捷。

我們沿着長廊走過去，走進了一間兩旁置列着玻璃瓶的房間，盛在瓶裏的是準備灌輸的血。尤丁露出懷疑的神情，問道：「你認為從屍體中取血來救人的命，是否錯的呢？」

「倘如我的屍體能够救活人，我是樂於貢獻的，」我回答說。

尤丁很滿意。有人從宗教的立場抗議。義大利拒絕出版尤丁的關於輸血的著作。

利用屍體的血液是先從動物實驗着手的；尤丁的兩位助手，史庫第那（M. G. Skudina）和巴倫鮑姆（S. T. Barenboim）曾經證明用屍體的血，灌輸到嚴重貧血的動物身上，是能够把它

救活的。

尤丁醫生常常需要着很快輸送的和大量的血。從活人身上輸送的血太慢，往往量也不够；而且把不同活人的血混合起來，也是危險的。急救醫院常常有死於意外肇禍的屍體。尤丁第一次施於人體的實驗是一個年青的工程師，他因企圖自殺，跌斷了兩腕。他到醫院時，脈搏已經沒有了。於是尤丁給他從一個六十歲老人的屍體上給他輸了血，終於救活了他，這位老人，是在六小時以前死於汽車肇禍的。

屍體的血如在死後六小時到八小時內輸出來是無毒的，它在很長時間內仍保持着生命力。

尤丁的生活很有趣。他生於一八九一年，他的父親在察里欽開了一家魚子醬的廠。他最先選到他的妻子是在醫院裏。她患着麻痺症。「一種愉快的麻痺症，」他說着，對他妻子喜悅的一笑，當時我們都在他書房裏喝茶。他的妻子承繼了一份很大的財產，在革命中喪失了，從此她對爲了她的丈夫和她的國家而努力；在戰爭中，他們一同在前線服務。第一次大戰時，一九一六年七月十四日，尤丁受了傷。到了這次大戰時，一九四三年七月十四日，尤丁卻是英國皇家外科學院的研究員了。他三十七歲那年就担任了急救病院的外科主任，他曾出版了六十八冊書，還有許多論文，又曾訪問過英國和美國。

尤丁對他的醫院以及它的一八〇三年式的華貴建築很發生了感情，原來其中還有一段動人的故事。有一富有而尊貴的伯爵，跟一個農奴出身的女伶結了婚。他憤然的親戚們都咒罵他妻子是不貞的賤人。這伯爵帶同他的僕人在一個黑夜裏跟蹤着她，只見她走進一座老屋，替許多老年的

病人敷藥換綳帶。他帶她到義大利去。後來爲了她待產，他們又回莫斯科。

「你是否還願意幫助老年的病人呢？」他問。

「當然是的。」她答道。

「那末這總得有個讓你工作的地方，」伯爵說，于是就替她建造了這座巨大的宮廈。她生了一個男孩，十七天後伯爵就死了。這便是故事的經過。

尤丁引導我從入口的大廳——以前是病室——走到長廊，「畫棟」用木板遮蓋着。揭去木板就顯露了繪畫，耶穌注視着病人的繪畫。

在實驗室中，架上擠滿了浸着痛癢的藥水瓶，尤丁很小心地拿了其中的一瓶，嚴肅地說：「這個痛是生在我母親身上的。我把它割了。」他停頓了一下，更形嚴肅地對我說：「靠上帝的保佑。我母親在割痛後又活了十三年。她剛在七天以前去世。癌病從未復發。」

我對尤丁最後的印象，是在同他一道到莫斯科各部參觀了他所愛好的古老的建築物之後。我們到一個醫院裏去看一位病人，他是這醫院的顧問醫師。他回出來時，有幾個當地的小孩子，正露着希望的目光，圍繞着他的車子。他把他們抱到踏脚板上，從車窗伸手扶持他們，說：「靠得緊」，于是就馳着車子，在醫院大橢圓形的周圍，兜了一圈，孩子們都高興極了。

八 蘇維埃青年的素質

一講到我所知道的蘇聯個人的生平故事，那實在是很難帶住的。講完一個人牽涉到另一個人。我當然有加以選擇的必要。照我的願望，我還將無窮地描寫替我們駛飛機的飛行員，替我們開汽車的司機，替我們服務的男男女女；我還要描寫那位偉大的露着健康微笑的農業經營家乞欽，他勸我們多留一些時候，俾在他自己指示之下，更仔細地考察他所發明的四季麥的成績；還要描寫那位年少英俊的敖德薩的猶太人，波狄列夫斯基（Bonderevsky），他因戰事避居在塔什干，他的英語成績、他的歷史知識、以及對於世界大事的把握，即使和那成熟的教授、政治家或外交家相比，也是毫無愧色的；還有那位耶列文（Yevan）的汽車司機，他一遇到令人胆驚的危險的彎曲地帶時，總是從容愉快的說：「保險安全，保險安全；我曾在史太林格勒駕駛過坦克車，」他替我服務了兩星期，他照顧我像一個兒子，一個父親，當我們分別時，竟哭起來了……。

他們都湧集到我的記憶中了，這樣的可愛，這樣的可親，這樣的誠摯，這樣的喜歡訴述他們的日常生活、希望和困難，這樣關切地喜聽英國的生活。他們願意分担生活，猶如分享財產。他們又這樣勇敢地重行收拾殘破的生活，如在史太林格勒。然而他們對於在一旁修理曳引機的德國人，卻又表示着這樣的寬大而毫不仇視。

在所有這種個人生活的歷程中，尤其是在年青的蘇維埃個人生活的歷程中，是有若干一般的特徵的，但最主要的卻是沉着的熱情和誠懇的目的。蘇聯青年也有無窮的詼諧和取笑的能力，廣泛的幽默感；但他們對於細碎的事情是既無時間，也無興味。蘇聯的青年決不隨波逐流，絕非毫

無目的，他們知道要的是什麼，他們看清了前面的路，而且是勇於負責的。

蘇維埃青年如有追求任何他所喜歡或他認為適合的志趣，是不會受到阻力或妨礙的。至少在他們自身之外不會有。他們倘如願意成爲一個歌唱家、一個農地經營家、一個醫生或一個原子能的專家，那末，打開的大門一開始就等待着他們，任何人只要確有才能和追求一定目標的志向，就會被引入別的門內的。

蘇維埃的青年知道，在他自己本身之外，沒有重大的阻礙。一個立志要做科學家的孩子，可能缺乏必要的資質；一個想到北極探險的孩子，可能是必需的體格條件不夠。但他們決不缺少機會，機會等待着才能、嘗試和雄心。

由於這些大門敞開的鼓勵，又鑒於別的青年在各部門職業中的成就，蘇維埃的青年都富有責任感。在文化公園中，你可以看到青年們在練習跳降落傘。男女孩子們都喜歡從自己嘗試中成功的，他們切於上進，不怕困難，勇於嘗試。未來的工程師都熱心于担当困難工作的責任。他們開始的時候就不會碰到挫折勇氣的障礙：每一部門的職業和每一種的工業活動，都在大聲號召男男女女裝備自己和負起責任。一個青年負責任，大羣的青年負責任，也不一定是這一階級或那一階級的青年。那些設計蘇維埃經濟的人們都知道，他們可以從廣大的青年羣中吸取人力。青年們也知道那永遠擴展中的計劃需要着他們，在任何部門的活動中都有讓他們自己選擇的負責的工作，他們是不會落空的。

因此，戰爭雖然殺害了許多優秀的青年，蘇維埃計劃者卻是不用愁明天的領袖的：全部青年的戰鬥隊伍已裝備了充份的修養和能力，正準備着担負起現在所加于他們的重任。

一般的蘇維埃青年都知道有重大的任務等待着他們。這一任務，主要是國內的重建，但對於世界將發生最後的影響。首先恢復戰爭的創傷；次則恢復因戰爭而遭破壞的文化和他們的生活水準；最後是產生一種高於世界任何部份的文化和生活水準。他們深信這是完全可能的，儼然接受了這一任務。他們追求的不是軍事的征服，而只是理想和模範的征服，在蘇維埃青年的腦海中，軍國主義是連影子都沒有的。

這種對於明白確定的目標的誠摯熱情，產生了偉大的樸實態度和人格的力量。蘇聯青年是專心致志的，他們的生活統一於一個基本的目標。沒有狂妄的幻想；沒有狹隘的眼光。真的，這目標的一部份，是在發展一種闊大的文化，和一種研究他們國內以至其他各地所有部門文化的誠懇的態度，這更增添了樸素的美，鼓勵了善惡分明的坦白。

蘇維埃青年另一顯著的特點是對於旅行活動和冒險的愛好。他們受着各部門當局的鼓勵——如政府、職工會、集體農場、和合作社。孩子們一到夏天就去參加夏令營；青年們成羣結隊的到各共和國旅行，或者是作着運動和遊戲。俄羅斯平原風景的單調，也許養成了這種喜歡遨遊的感情。他們尋求着多樣的事物，在今天，探險和科學研究的書籍被熱切地閱讀着，猶如當年史太林在脫必列西學校中偷偷地閱讀味恩（Jules Verne）的探險故事一樣。

他們的缺點無疑是有的，這常常受到報紙恰當的批評，我在上面已經說過，蘇維埃的報紙，教育性是強過報道性的。斯泰哈諾夫運動和社會主義比賽運動，目的是在針砭懶惰的習慣，以及對於生活和工作的「沒有關係」態度。缺點的克服往往大大地提高了德行，產生了工作和忍耐結晶的蘇聯偉大的事業，例如史太林格勒的保衛，或鄧聶伯大水閘的重建，便是現代的對於古老的「沒有關係」（俄語 *Nichevo*）的挑戰。

蘇聯已躍昇為一個偉大的強國了。舊日怯懦的自卑過去了，新的無畏的勇敢代替了它。我要再說一句，軍事的野心是沒有的，有的只是不願再受劣等民族待遇的自尊心。他們自然不是劣等的民族。

在大略介紹蘇維埃公民性格的一般因素之後，我們要來檢討一下產生蘇維埃青年的教育路線，以及他們所依據的經濟組織。但先要講到的，是關於負責教育和組織的工程師。

第四章 蘇維埃成功的工程師

一 訪問哥里

我會見了斯維爾尼克 (Shvernik)，我會見了莫洛托夫，最後我又會見了史太林本人，他和別的同志們，在革命先驅者列寧的指示和感召之下，曾經形成了一種統治六分之一世界的新文化。

當我們會見之前三星期，我訪問了一次喬治亞，史太林童年和少年時代住居的地方。在他誕生的哥里 (Gori)，我的思想不自覺地回憶到那圓頂的教堂，矗立在炎熱的義大利平原上，四周附近圍立着別的小教堂——那是令人想起法蘭西斯·奧夫·阿栖濟 (Francis of Assisi) 十三紀義大利法蘭西斯教團的創立者) 的教堂。就在喬治亞哥里村的這個高地的村莊街道上，四圍大理石中矗立着小屋，這便是史太林呱呱墮地的地方。

七世紀來，阿栖濟吸引着它的朝聖者。在以後的日子裏，哥里也將有七世紀吸引着朝聖者，猶如莫斯科的列寧博物館吧，因為列寧和史太林在人類歷史的進程上既留下了深刻而永久的印象，世界自將瞻仰它恩師們卑微出身的地方的。素樸的出身，正是偉大的最高襯托。

史太林的老家有兩個房間。地主住一間，約瑟夫的父親和母親住另一間。十三呎長，十二呎闊，這個雖小倒也樸雅的房間，有着兩扇落地窗，開出去是小走廊，和圓石砌成的街道，這小孩儘可以在街上玩，讓母親一邊照顧，一邊做針線，這便是約瑟夫·朱加雪維里（Joseph Dzhusashvili）少年時期的家了。

每一傢具整齊而清潔，都是由他母親獻贈給國家，並且由她陳列得和那孩子躺在美麗的兩頭有着活動螺旋的舊橡木床裏的時候，一模一樣。牆壁中嵌着兩口裝有移門的碗櫥，一口置藏每天捲起來的被褥；另一口則置放碗碟和烹飪用具。牆壁的一邊放着農家式的粉紅色的衣櫥，旁邊是一隻小小的食器架，掛着一隻洋燈和一面可轉動的圓鏡，旁邊附有洋燭的插架。此外還有桌子和椅子，這樣便是房間裏全部的傢具。約瑟夫就是在這裏學步並從他質樸慈祥的母親學習第一課。

史太林的出生證明書和他年青時代的各種照片都掛在地主房間的牆上。現在，這房間像是一個有力的遮日蔽雨之物，庇護着這個小小的家，使不受氣候的侵襲；它有着大理石的柱子，那柱子細小得整個屋子可以一覽無餘；它又有着發光而剝蝕的屋頂。那暗黑的小柱和上面的白屋頂，跟他們所供奉的屋子，以及方方鋪着的黑白石塊，倒也很調和，這些鋪石聯接了天蓋和一座義大利式的花園，這花園圍着剪短的常綠的高僅及腰的籬笆，後面是較高的灌木之類。

當我們從塵灰飛揚的村街上進去的時候，劈面的一幅圖畫，便是那古跡的凸凹的柱子，反映在靜靜的池水裏，園中百花怒放，炎熱的七月空氣裏充滿着甜蜜的芳香。

哥里莊嚴地位置在一道削壁之麓，高山從這裏陡然低趨，旁邊是一條流向果園毗連的平原的突起的河。一座陰森而頹壞的堡壘高踞山邊，雄視着全鎮。在村街上，我們遇見一個穿着古老的番治亞裝的老婦，長裙曳地，深藍的絲絨帽二吋高，方方切切的戴在頭上，半覆着前額，面上罩了一幅藍色的面幕，一直披到兩肩，完全像是地主房間裏的史太林母親的畫像。母親是慈祥的，孩子從她的口中學習了那些基督教的博愛和道德的簡單的教訓，這已註定要在這個人的身上產生崇高的果實：他一生就會把許多民族團結成一個，而把一切人民從貧窮提高到合理的生活水準。甚至當他的學生時代，也已發生初期的影響，這是我從一位老教師那裏知道的，他是史太林當時的同學，他依然住在他兒童時代所住的隔壁屋子裏；他現在是一個衰弱的老人了，見我站起來需要着攙扶。當他講到史太林時，他的眼睛發着光。

「我仍見到他，好像昨天進學校去一樣。他領導着我們所有的人。」當我問他關於史太林童年的故事時，他接下去說：「有一次，哥里發生了一樁竊盜案。三個竊賊捉到了，而且絞殺了。孩子們受到深深的感動，大家自相討論着這些竊賊到陰間裏是否還會受懲罰，『不，不；當然不會的，』約瑟夫嚷着；『他們在這裏受到懲罰，已經太不公平了。他們到那裏要再受到同樣的懲罰，那就太可怕了。』」

正義、對真理無畏的追求，乃是這個有教養的孩子的主要特質。在他十五歲前——由於他的能力，他在十五歲那年就進了脫必列西的學校——他已在探求各種書籍或小冊子，並且研究着達

爾文自然進化的學說和馬克思社會演進的學說了。

他求知的熱情與日俱進，而當他到脫必列西時，不管教師們怎樣的阻撓，他研究着孟台萊耶夫（Mendelejev）的化學和許多有關的書，又因為脫必列西只有一份馬克思的「資本論」，他便和朋友們湊錢購備了一份抄本。他喜歡文藝，他讀着味恩、果戈理、薩克萊（Thackeray）和別的更多作家的作品。他懂得莎士比亞。他寫詩。他唱歌。學校當局偵悉了他在讀文學，並覺察了他在學校中的影響，便加以最嚴厲的處罰，罰他到禁室中禁閉許多鐘頭。最後他終被開除了。

一九〇三年，史太林藉通信結識了列寧。他們很久就在平行地工作着，史太林早已是這「山鷹」——他對列寧的稱呼——心悅誠服的學生，和虔誠的信徒了。在高加索的他的較小活動範圍中，史太林成了一個著名而勇敢的領袖。他對於辯論和邏輯有很大的自信，在辯論中，他是以沉着自制和合理應付噪鬧的反對者出名的。他對列寧性格最欽佩的地方，也就是這種同樣不可克服的邏輯力，能够壓倒以至最後博得羣衆的信服。

這兩個人直到一九〇五年才會面，史太林對於這次會面的印象和觀察是有趣的。他說：「我希望見到我們黨的這個山鷹，這偉大的人，這不但政治上而且儀表上偉大的人，因為在我的想像中，我把列寧描繪成一個巨人，威嚴而且魁偉。但當我看到一個容貌最平凡的人時，我是多麼的

失望啊，中等以下的身材，外表上一些也沒有跟平常人兩樣的地方。」

史太林對列甯在會議中的舉止也感到同樣的失望，坐在不被注意的角落裏，只跟最平常的人說話。然而，他很快就明白了，這種避免注目或在外表上顯示自己在運動中的崇高地位，對於一個羣衆的領袖是有無限價值的。工人們真心地感到了他是他們中間的一個。

史太林和列甯起先是不常見面的，只是保持着經常的相互接觸；史太林堅定地在自己的範圍中奮鬥，列甯則幹着他自己的。史太林遭警察捉到許多次。他會有六次被放逐到西伯利亞。有一次，「爲了給他一個教訓」，他和別的政治犯被帶到監獄的廣場上，強逼受兩列兵士的「夾鞭刑」。史太林昂然地從夾鞭中走過去，手裏還拿着一本馬克思的著作。

史太林有着淵博的頭腦，了解著作的價值，他曾辦過許多祕密印刷所，內中一處我曾在脫必列西看到過，那是由他的一位親戚所建立，是在他自己市鎮上警察密切偵視下進行的。

這工作幹得很巧妙。史太林的一位親戚女人，在郊外的普通街上造了一座小別墅。這別墅有地下室，下面是很深的地窖，爲了避免耳目，那是換了好幾批工匠造成的。地下室可以從花園裏一口很深的枯井中走進去，經過一條甬道，然後再通過一扇活門。在這地下的廚房中，史太林從事祕密印刷的工作，並有着其他的人的幫助，他們都裝作是這平凡別墅裏的居住者。當一遇到有什麼危險時，這女人便拉動警鈴，印刷立即停止。

當一九二一年在克拉科（Cracow）與列甯同處時，史太林完成了他經典著作之一的「馬克

思主義與民族問題」(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列甯寫信給高爾基。這封信劈頭就說：「這裏有一個了不起的喬治亞人……」。

一九一七年，史太林回到西伯利亞，擔任了革命運動的領導任務，直至列甯來臨，他們纔又在列甯領導之下分負十月鬥爭的責任。列甯留在中心，史太林到各處旅行。史太林解決了最初緊急時期的糧食問題。史太林視察並指揮着內戰的幾條前線，史太林又把紅軍建立成爲有組織的力量，完全顯示了他是一個軍事家而兼戰略家。

即使在戰爭白熱化的時候，史太林也從未一刻忘記著作，在真理報的那篇「十月革命與民族問題」著名論文中，我們可以看出即使當鐵已經熱了，史太林還是在千錘與百鍊。

一九二四年列甯死後，史太林承繼了最高領導的責任。在黨的支持之下，又經過了好幾次的五年計劃，他終於眼見蘇聯已在高度有效機械化的農業基礎上，作爲一個有力的工業社會出現了。

史太林無數的著作，都顯示了他是深入的理論家、頭腦清醒的思想家和卓越的解釋者，他能把握和闡明複雜的問題，將它們的性質和解決的方法，用最清楚的語言，向羣衆說明。例如講到斯泰哈諾夫運動，他寫道：「斯泰哈諾夫運動是男女工人們的一個運動，它以超過現有的技術水準爲目標……要求創造新的更高的技術水準、設計的能力和生產的計畫。……它的意義是在於準備了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條件的這一事實。」共產主義是比社會主義更高的階段，它要求

着更高的生產水準，更高的文化和技術，能够把生產率提高到這樣的水準：即能確保消費品的充分供給，能够依照共產主義社會成員的需要來分配給他們。

關於史太林，亨利·巴比塞這樣寫道：「他一生的故事，便是克服一連串巨大困難的一連串勝利的故事。他是一個鐵人。他的名字就形容了他：史太林——鋼鐵。他像鋼鐵的堅強，又像鋼鐵的柔韌。他的力量是在於他深刻的常識，他淵博的學問，他可驚的內心的集中，他精確的判斷，他不易的堅定，以及他決斷的迅速、確定、和強烈。」

就蘇聯人看來，這是史太林真實的描寫，但任何西方的估計必將加上其他的因素，這至少是必須說明的。從蘇聯人的角度看，當人民大眾拿他們今天在健康、教育、文化、財富和世界的尊敬地位，與他們三十年前的地位相比時，就不由得要敬重這位人物，那是毫不奇怪的，因為這個人和列寧以及其他許多人，對於他們有着大貢獻。他們充份知道這個從哥里一個單間屋子裏誕生出來的嬰孩，這個人的辛艱的、努力的、勇敢的、犧牲的熱愛和了解，那是外國人所從不知道的，他們對於他的感覺，猶如美國人對於那誕生在坎杜干（Kentucky）茅屋裏的阿勃拉罕·林肯一樣。當我訪問克里姆林宮之後，許多人，特別是知識青年，都紛紛向我詢問許多像孩子關懷父母一樣懇切的問題：「他看上去怎麼樣？他看上去健康麼？他看上去老了一些麼？」我永遠不能忘記那個女人激動的面容和聲音，當我無意中自然地問她，如果史太林死了，誰將是繼承者，我更不能忘記她由衷的痛苦的驚呼：「噢，別談這樣的事情；別談這樣的事情！」我馬上明白

了，在蘇聯提出我的這種問題，猶如我在任何家庭裏問一個孩子，「如果你父親死了，誰將是繼承者？」那是同樣的無禮貌。史太林是蘇維埃青年的父親。他們深愛他。我自然切想見見史太林，我終於欣然地接到了約見的請帖。下面是我的一些印象，那是我從克里姆林回來之後，就立刻記錄下來的。

二 史太林在克里姆林

七月十二日下午六時，我接到通知，史太林大元帥要在當晚八時接見我。我當即在腦際安排了許多要討論的問題——宗教制度的問題；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交換訪問和個人接觸的問題；蘇聯是否還需要醫藥的援助，當然也沒有忘記蘇聯女孩與英國青年結婚以及禁止蘇聯女人伴同她們丈夫到英國去的問題——我完畢了訪問的準備。

我悠然地駕車從面河的街上駛去，很快就到了西部的入口，離約會時間還早十分鐘。美麗的黃昏顯現了克里姆林宮最佳的景色。在粉紅色的牆垣下，蜿蜒着線條莊嚴的河流。在河的對岸，靜穆地踞踞着英國大使館，巧小的，靜悄悄的，十八世紀的風味。在河的周遭，環繞着偉大都城蓬勃的生長的氣象。

經過了高大的許多圓屋頂的教堂，經過了那末繫鈴的放在地上的世界最大的一座巨鐘，經過了我們在兒童歷史書上所習見的大礮，我們終於到達了鄰接列甯墓的地方。我立刻在長城後面的

私人入口處受到迎接，這段長垣正面臨着我旅館中的走廊。

走進一個簡樸的門廊，把帽子交給了侍者，我就由一架徐徐移動的電梯靜靜地載到了樓上。那裏是一條長廊，清潔、明淨、新的粉刷和新的地毯，完全是政府嚴肅的派頭，我被導引到休息室，那裏有十三把椅子，圍繞着一隻大桌子。壁櫥裏是各種不含酒精的飲料，一位官員拿來款待着我，直到電鐘指到五點五十八分，我們當即通過三四間有着官員正在伏案辦公的頗大的辦公室，然後走進一個像工場般的大房間，裏面主要放着一張覆有長長呢氈的桌子。這顯然是一間會議室。史太林大元帥和莫洛托夫正等候着我們。

我們寒暄着，握了手。

史太林穿着胸前掛着一顆星的制服，他的肩章表示了他的官位，莫洛托夫則是灰色的便服。史太林是短小的，他的面孔很小。他的儀表端整，英俊的樣子猶如常見的喬治亞人。他墨黑的頭髮，現在已略現灰白了，低低的覆着前額——又是一個喬治亞人的典型。

我一見之下，就知道那一切關於史太林健康已受嚴重損害的謠言，是毫無根據的。他看來是健康的人。

史太林是沉着、安詳、質樸、而富有幽默。說話坦白，毫不給人以懷疑的感覺。在史太林的面上，沒有一些殘酷的戲劇性的或任何裝作威武的表情——有的只是堅決意志和溫和仁愛的表現。再沒有墨沙里尼或希特勒的面孔，跟他不相像的了。我不禁想起了史太林自己在和列甫初次

見面時的描寫，以及他對列甯面容舉止的批評：「直到後來，我纔認識這種樸素與平凡，這種始終隨便的表示，或至少是使自己不受注目和強調自己崇高地位的努力——這種特質，乃是列甯作為新羣衆的、樸素平凡羣衆的和廣大人類的新領袖的優點之一。」

眼前這一個人，就是幫助計畫着新秩序，並替大眾爭公平的人，他自始至終，決心爲着計畫不受阻礙而奮鬥；這個人，爲了完成廣大的正義，對任何反對或任何個人的反對者採取了斷然的行動。這個人，當一九一七年協約軍的大量部隊衝入史太林格勒城門時，始終保持着鎮靜，而當一九四二年，希特勒大軍又攻入這同一城門時，他也是如此。這個人，任何打擊嚇不倒他，什麼原子彈也威脅不了他。

一句話，在歲月沉着的邁進中，這個人便是在五十年前的兒童時代，反叛過「不能忍受的不公平」的人，也便是這個機智的革命青年，鑒於出版宣傳的需要，曾經在沙皇警察的追蹤下，躲過地下印刷所的，他便是史太林，這個人經了五十年不屈不撓的奮鬥，現在已博得了舉世熟知的專屬於他的名字——史太林或鋼鉞。

我們坐下。我坐在史太林對面。莫洛托夫在他的右面。譯員是一位灰色制服的青年，佩着外交官員的肩章，我曾在兩天以前招待宋子文的席上見到他，當時他曾充當莫洛托夫和我談話的譯員。現在他坐在我們之間桌子的一端，把我說的每句話，迅速地用速記寫下來；然後又仔細向史太林翻譯。

坐定後，史太林便說：「你旅途愉快麼？」我剛從亞美尼亞和高加索回來。

「偉大，」我回答說，「我所看到的，使我都有深刻的印象。」

「你以前到過那裏麼？」

「不會，這是我第一次的訪問，但我很快就發現了進步的廣度。例如耶列文，二十五年前是一個只有二萬七千居民的荒涼的大城，今天卻已發展成爲一個有二十五萬以上人口的現代化城市了。」

「更使我有深刻印象的是孩子們，不但體格健康，就是文化修養上也是這麼的進步。」

我們談到喬治亞。我說，「我到過哥里，訪問過你閣下出生的茅舍，那新裝的保護你老家的大理石柱子，跟那小小的屋子一些也沒有不調和的地方。園裏的花盛開。我受到一束玫瑰花。後來又去參觀你讀過書的脫必列西的學校以及那郊外的小屋，就是你曾在這屋內地窖中印刷祕密刊物的。這真是設想周到的工作。」於是我就用手勢裝出印刷機的圖樣，並說明它怎樣觸動了我機械學上的興味。

這時，莫洛托夫微笑着，並且聚精會神地望着我說明那機器的開關。

史太林對於回憶感到了愉快。

「最後，」我說，「我又到脫必列西的險削山崖上的教堂，站在你母親的墓前致敬。」

「我母親是一個簡單的女人。」

「一個善良的女人，」我添說了一句。

「一個簡單的女人，」他重複地說，帶着友善的微笑，聽我說下去，這笑容擴大了。我說：「人們往往可以從孩子的性格上，看到母親的畫像。」

我把話題轉入了正式的談話，問他「能否讓我提出一二問題」時，史太林點頭同意了。

我們談的時候，史太林總是注視着前面的拍紙簿，並且用紅藍的有色鉛筆塗劃着。

他隨時抬起頭來，凝視着我。他似乎聽得很專心，當我這樣問道：

「你能否提出方法，來繼續促進我們國家間在戰後幾年中的善意諒解和團結麼？」

「這不是容易的，」史太林想了一想說，「我們是戰爭中的朋友。當我們大家面臨着一個共同的可怕敵人時，這是十分自然的。現在德國人打倒了，緊張鬆弛了，要避免磨擦就不容易。但我們希望着，我們要鞏固保持這不但從言辭而且從行動中所已經完成的團結。我們絕無意於損害英國或妨礙英國。我們要言行一致地和英國做朋友。至於我們的成功與否，那主要就得靠你們的政治家。如果他們有這願望，我們也有這願望。」

史太林微露激昂地繼續說：「那主要的妨礙就是報紙，它總是散佈虛偽而有偏見的消息。報紙製造着偏見。在戰前，報紙從來不會對蘇聯有正確的記載。」

回溯過去二十年來的歷史，我無法否認這種指責，我對史太林說，他當然比我更明白，英美的報紙，一般都為百萬富翁所有，大部份反映着他們的態度，而把輿論引到這富有階級所希望的

方向。但是，我又接着說：「英國至少也有一家報紙——叫做『每日工人報』(Daily Worker) 我也是它的社論委員之一，——完全是由工人出錢支持的，現在已有了十萬份的銷路，假使有紙張，可能達到五十萬份。」

當我說到這點時，史太林回頭和莫洛托夫相互的一看。

我又講到關於報紙的幾件事情，並且很愉快的認為蘇聯過去確能信守她的言辭，這再加上別的因素，正鼓勵了我的蘇聯報告中更一般的信心。

事情也並非是如此：很少人信任蘇聯的力量，直到它在戰爭中表現了。例如蒙哥茂萊將軍 (Gen. Montgomery) 對於蘇聯在史太林格勒的成就表示了驚奇，終於承認了我個人對她力量信任的根據。

史太林繼續說明英國怎樣取得那對蘇聯軍力的虛偽估計的情報。這責任是在法國人。而法國人後面又是波蘭人。

「邱吉爾先生問甘茂林 (Gamelin 當時法國參謀總長——譯者)，蘇聯的軍事力量如何。『蘇聯是空的，』甘茂林說。『蘇聯毫無力量。』甘茂林和法國人都相信了波蘭人的這種情報，而波蘭人是很久就仇視蘇聯的。」

到了這裏，我又談到英國軍事領袖們在蘇芬戰爭時所主張的關於蘇聯軍事力量的虛偽估計，一估計，後來由泰晤士報軍事評論家的一篇戰後論文加以糾正，但當蘇聯軍事勝利所引起的興這

趣減退時，又被忽視了。

我於是又繼續着，在他的鼓勵之下，談到了宗教上的問題。

「在過去，英國人中間對蘇聯的不信任和仇視，很多是受了處置教會的行動引起的，我完全認爲這有偏見，而且當然是誇大的。但無論如何，宗教問題在英國常有很大的作用，因爲英國人的宗教性是非常濃厚的。」

史太林回答說：

「教會和國家都有它自己戰後革命時期的歷史。當時俄國東正教的大主教，對蘇維埃政府宣佈了惡意的敵視，並且力主不納捐稅。政府必須保護它自己。政府必須採取行動。」

「無疑地，」他半笑着說，「在戰爭和緊急的時候，雙方都有過份的地方。」

「但現在一切都過去了，」他繼續說，「戰爭造成一種新的不同的形勢。戰爭對教會顯示了政府的愛國心，而對政府顯示了教會的愛國心。那教會，」他加強語氣說，「曾經和沙皇政權有很密切的勾結。」

「是的，」我插嘴說，「對沙皇的關係有時也許比對教會的真正領袖耶穌還密切。我個人觀察蘇維埃政府的許多行動，蘇維埃當局爲了人類大眾所做的事情，實在比任何別人都更符合于基督的教義和道德。像一句老話所說，那些自稱信仰正義的上帝的人，他們在行動上似乎並不信仰，而那些並不信仰上帝的人，在行動上他們倒像是信仰的，這句話至少有多少理由。」

史太林和莫洛托夫微笑着。

「自然，」我繼續說，又回到了本題，「教會與政府之間日益增進的互助關係，使我感到很大的愉快。我會和許多教會的高級當局談過話。其中有一個大主教，就是送我這個東西的，」我指着我的十字章說，「還有列寧格勒的主教，亞美尼亞的教長，喬治亞的主教和其他的人。我所聽到和一再聽到的鼓勵了我。這在亞美尼亞尤其是真實，我在那裏看到許多從各地鄉間來遊歷的亞美尼亞人，快樂地帶着體格強健的孩子們，享有着很高的文化和教育的水準。」

「宗教，」史太林說，「是一件信仰的事情。信仰不能取締。信仰是自由的。崇拜和宗教是自由的。」

我們隨後又討論到蘇維埃的醫藥服務。我問道，「你是否希望我們繼續幫助貴國的醫藥工作？我們會看到了戰爭的野蠻破壞，以及一切必需用品和工具的缺乏。」

「謝謝你，我們這樣希望着，」他說。

我們講到英國未來的選舉，我對他表示，即使這一次的選舉不成功，但工黨最後當然要重握政權的。

我看了一下錶。我們已經談了三刻鐘。

「時候遲了，」我說，「我能否再提出一二問題？」
他點頭同意。

「我們非常重視各民族的個人接觸的重要性。我們切望有廣泛範圍的交換訪問。我國有千千萬萬的人，懷着很好的意思，想來訪問貴國。我尤其切望青年們能夠相見。」

「這是最歡迎的，」他強調着說，並且舉例說明關於蘇聯情況的虛偽報道，都是出于第二三手的情報。

在我提出特殊的問題之前，我向史太林確保我國的勞工大眾，對於蘇聯都懷有熱烈而友善的感情。這在知識份子中也日益證明如此，尤其是技術人員。我舉例說到了我在一個雇有四萬五千工人的世界第一流飛機工廠中的經驗。當我在工場裏對工人們作了一次關於蘇聯的演說後，管理員和專家們就和我來討論蘇聯的成就和方法，幾近兩小時之久。

史太林很感興趣的說：「技術人員在性質上是現實主義的。」當我接下去說時，他望着莫洛托夫。我說過去技術人員雖有忽略政治的傾向，以為在技術的範圍之外，但這種情形已很快的消失了，技術人員和工人們一道，已開始認識了這兩者生活活動的重要性。

我的第二個問題是涉到青年婚姻的。英國青年頗有不願上級官長的再三忠告，而仍和蘇聯女孩子結婚的，而蘇聯當局，則不許這些女孩子離國。

「我說的時候實在有些猶豫，因為惟恐這有過問你們內政的嫌疑；這一件事情，與大的事情比起來雖然很小，但卻可能引起很大的反感，而使我們感到困難，因此我們切望消除我們人民之間任何每一不必要的磨擦……。」

史太林請我說下去。

「約有三十個英國青年和蘇聯女孩結了婚，現在要奉命回國了。蘇維埃的法律卻不允許他們的妻子跟他們同走。這一困難的情形能不能補救呢？」

史太林迅捷的望了莫洛托夫一眼，問他是否這樣的情形。

莫洛托夫微笑着，同樣迅捷地點頭示意，並且又補充說明了我所不知道的幾點。我當又指出受影響的人數雖然小，但由敵意報紙喧染起來的磨擦卻是大大的：「過去常有人指責蘇聯共產主義以分裂家庭生活為目的。這一強制的規定，很易被引為證明這虛偽的一點。」

史太林再度詢問那受影響的夫婦的數目。

「大約三十對。」

「可以有些辦法的，」他自然地很熱情的說。然後他又略加修正說：「也許可有辦法的：這是應由最高蘇維埃決定的事情。」

莫洛托夫點頭同意。

我向史太林道了謝，並且告訴他，我國乃至全世界的工人和其他的人，對於他和蘇聯人民在摧毀法西斯主義和創立世界一種新的有計畫的秩序的功績上，都是多麼的感謝。這樣就結束了我的訪問。

史太林點點頭。我們于是都站起來握手。

這次訪問自八點鐘開始，八點五十分結束。這是我第一次也許是最後一次對克里姆林的訪問。但那堂皇的乳白色的官邸，圍繞着巨大的粉紅色的中國式城牆，以及它七座尖頂的城樓，卻至今仍在我眼前呈現着並不遙遠的莊嚴的景象。它們使我想起了鋪着紅地毯的走廊，簡樸而有條理的房間，置放着直背的棕色皮椅、寫字檯、和電話機。這小小的房間實在是比金碧輝煌的政府大廈更適宜的環境，因為他是平凡的人，有着毫不自私的態度，他誠心地傾聽，沉靜地深思，當別人彈着煙灰，他總是拿有色的鉛筆，在他前面的拍紙簿上塗抹着，只偶然站了起來作着周密的觀察，或智慧的考慮。統治克里姆林的不是神祕的人物。史太林是豐富的常識的具體表現，今天作為人民中的一個人，猶如當他在脫必列西鄉間進行地下印刷時一樣；也猶如當他運用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並非作為一種哲學理論，而作為一種行動計劃時候一樣的明快、智慧和實際。我覺得史太林，恰如他二十幾年來演說中所表現的，不愧為新蘇維埃秩序的喉舌，是它對外面世界態度的解釋者：自然、不高傲、沒有一些了不起的樣子；忠實、坦白、而誠懇。還有，他又是誠心追求對英友誼的人，他認為這是可能的。

三 莫洛托夫

莫洛托夫自始就使我感興趣，他的服裝，——白的硬領、領帶和袖口——恰和史太林任大元帥前所着的樸素的「卡其」制服，成了生動的對照。他的面孔也和史太林不同，肥大而方

切。他的頭髮現在變得灰白了，在他靈活的、和藹的帶着微笑的眼睛前面，老是架着一付沒有邊的夾鼻眼鏡。你可以從他看到一個刻苦自礪的學校教師的模範，他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昇到他現有的地位的。他是一個懂得他的世界和他工作的人，權威的力量把他放到現在的地方，信賴他，並且做他的後盾。

我見到莫洛托夫好幾次，又和他談過三次話，他總是這樣子。他挺直地站立着，笑容滿面地望着，聽着，然後又坦白而愉快地說着所有認為必要的話。

莫洛托夫毫不神祕，猶如史太林毫不神祕。兩個人都是革命家，那是都不會使你想得到的。兩個人都達到了最高權力的地位。誰也不怕繁重緊張的工作。誰也不叫苦。誰也不妄自尊大。他們都決心戰鬥下去，如果情形需要的話。但他們都已認識，在他們的後面，現在已有了無比的力量。因此他們的面容都表現着自然而毫不驕傲的堅定。莫洛托夫現在也許是幹着兩人之中更難的工作。史太林的任務是以他的智慧、他的學問、他的常識、他的堅忍和他的威信，來幫助偉大的蘇維埃組織在國內的發展。

莫洛托夫的任務是代表他的國家，在國外的會議室裏奮鬥，溫和的笑容的後面，潛伏着堅強不屈的談判者。他知道他要的是什麼，他想着他了解着怎樣來得到它。他像是而且只有一點像是一個地方銀行的經理，他溫和而謙遜地和那交易合乎他所代表的銀行標準的顧客們周旋，但對於那些標準不合而過去行徑極可懷疑的顧客們，卻又表示囑強與堅決。一個絕不為舊制度 (Ancien

Regime) 的傲慢或冒險家的恫嚇所動的人。

莫洛托夫有他的標準。那是這偉大運動的標準，他自己就是這運動的嬰孩和創造者。那些標準並非是他所必須與之談判的世界的同樣標準。他善於應付這些人們，猶如一個銀行經理善於應付不合于他自己標準的人們；他絕對不冒險，總是決心使談判照他自己的條件來完成。他知道，他有整個組織的偉大力量和意志做後盾，而他便是這組織的當前代表和執行者。他知道他們要什麼，他知道他們信任他，他知道當代價高昂的時候，他決不能對他所交接的有力的人們讓步一吋。他也知道什麼時候應讓問題退後和爭取時間。

總之，莫洛托夫的外交方法和任何別國並無廣泛的不同。蘇聯在國內有一個社會主義的經濟。但在國外，她也和別國談判一樣的談判；她也談條件。例如莫洛托夫在舊金山不贊成阿根廷加入聯合國，但表示如其他盟國承認波蘭臨時政府時，他也可讓步。他可以爲了他所要的，付很大的代價；但如當他爲了別人所要的而斷斷論價時，他會依照理性和智慧，知道什麼時候應讓步。

第五章 蘇維埃個人的發展

一 體格和健康

在身體上、健康上、和文化上，蘇聯對於人類生活的促進、發展和獎勵，究竟採取了怎樣的步驟、方法和組織？我們當先從人生開始的地方開始，先講身體和它健康的成長。根本應該注意的，即蘇聯的醫藥服務完全免費。從生到死，對於醫生、護士、醫院或療養院，不必化分文。

假如一個蘇聯女人上火車。她是待產的婦人。她就可有另外的房間。只有蘇聯，火車上替產婦保留着特別的座位。

我和一位蘇聯醫生參觀了一所產婦院裏的產婦室。在四周牆邊的椅子上，那來自工廠或家庭的蘇聯女人，都在給嬰兒們餵奶。每一個莫斯科嬰孩都享受着充足的人奶，這是嬰孩最必要的糧食。世上還有別的什麼城市，能有這樣的設備？

蘇維埃見解最特異的一點，即在他們對健康幸福的探究中，特別注意城市和鄉村中的婦女和嬰孩。第一次保護母親和孩子的法令，是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列寧簽字的。

在城鎮和鄉村的每一區，都同樣有各自的診察所和產婦院，專門醫師專事照顧母親和孩子，

遇有必要，專門醫師即予以救助。特產的婦女可獲特別的看護。工廠和家庭的環境經常在注意考查中。什麼地方有缺點，就加以補救。母親在產前產後可休息，她和她初生的嬰孩，都可獲得適當的食物營養和醫藥的幫助。

各種的衛生指示都有，但需要的仍很多，因為俄國原來是比歐洲其餘地方落後的。

倘如情形必要墮胎是許可的，並可正式進行。但倘如第一個孩子，那就絕不許可，除非母親生命有了危險。某種特殊的社會條件是例外，但即使在這種情形中，對於第一個孩子還是不許墮胎的。政府總是竭盡努力使墮胎不發生，並使婦女們明瞭它的害處。

現在，所有孩子的出生都是在產婦院裏。

從對產婦的極端注意中，已造成了可驚的成績。例如邱吉爾太太，就會看到一個新生嬰孩重達一磅半。他不過養了十六天。

出生是要登記的，一個區域的護士會到家裏來，經常注意着新生的孩子和母親，惟恐有意外。這樣的看護要繼續到孩子三個月時纔停止。

誕生後的第一年是緊要的一年，特別需要技術上的注意和小心的餵養。在第一年中，醫生和護士經常地到家庭訪問，尤其是第一胎的孩子，母親往往年青而沒有經驗，護士就告訴她適當的程序，並仔細考查是否遵守了她的指示。護士常常會和無經驗的母親，化上整整一天的時間。

現在，蘇聯兒童的腸胃病很嚴重，需要特別注意牛奶和營養的食物。各衛生站都附設了專煮

牛奶的廚房，母親們如有需要，可以從那裏取得特殊的食物。蘇聯的死亡率減低着，甚至在戰爭的時候。

對於一切在幼年期發育中的兒童，也同樣周到的設法注意。例如我常常進去的一座大廈，由子戰時的破壞，外表非常之頹隘而醜惡。但在裏面，卻是光線充足，空氣新鮮，而富有生氣。這是一所學校，走廊外面有一個小房間，裏面的寫字檯前坐着一位全身白衣的女人；聽診器放在她前面的檯上，她的背後放着藥瓶架。這個房間是學校的診療室，那女人是駐校的醫生。常駐的醫生代替出診的醫生，乃是蘇聯的規矩。

那醫生的房間也許簡陋的，很有值得批評之處。這往往是簡陋的，不過，醫生總是常駐在那裏的，——這在英國是很少看到的情形，蘇聯卻是司空見慣的。

顯然地，蘇聯從孩提生活着手，一開始就以科學的態度注意着健康的發展，這全部的科學化，自應加以詳細的考察，而我們居然得到了這樣考察的例外機會。衛生部次長兼蘇聯紅十字會領袖科立斯尼科夫（Kolesnikov），把蘇聯的科學機噐和醫藥工作的合理方法，對我們作了透徹詳盡的說明。

科立斯尼科夫先生是一個魁偉的面孔光滑的人，靜靜的聲音，靜靜的態度，他在莫斯科衛生人民委員部裏接見我們，對我們談了三小時，——中間只略停兩次，愉快地吃了一次茶、餅乾和三明治。他的談話有趣、動人、而興奮，對於全部衛生設施作了一個鳥瞰，範圍的廣泛甚至涉到

它構成的各部份，這就使我們對於蘇聯衛生委員會所有的輔助部門，都有了充分的瞭解。

實驗家之王法拉第（十八世紀英國物理學家）當察看一次新的實驗時，總要停下來，把手放在實驗者的臂上，說：「先告訴我，要探究的是什麼。」科立斯尼科夫也首先告訴我們要探究的是什麼。就在這春天的早晨，在衛生中心的他的房間裏，也表現了這正確的方法被用以探究所有蘇聯多方面而密切交織的目標、活動和成就。

與各部份現有的成就相比，那整個圖畫的光輝是更合乎衛生的。因為蘇聯還沒有完全實現預定的和像科立斯尼科夫談話中所描述的目標，這一點是他首先承認的。但他精密的計劃大綱，卻足使我們看出到處的進步，和不斷接近目標的步驟。在這裏，正如蘇維埃生活中所有的活動一樣，運動和它的方向是必須估計進去的。

要研究蘇聯任何部門的活動，不管它是什麼，必須一面檢討步驟與目標的關係，一面拿過去的背景來衡量現有的成就，這是頂頂重要的。首先，蘇聯的任何階段或任何部門，決不應拿西歐世界的同樣事物來比較。一切應從蘇聯自己計劃的關係來研究，一切應拿俄國以前的成就來比較。

因此，這種方法（這是我在科立斯尼科夫房間裏和以後對蘇聯衛生服務有系統的檢討中學得的），也不祇是限於蘇聯衛生事業的範圍。

我認爲這乃是研究蘇聯各種活動的不二法門：「先告訴我要探究的是什麼。」

如果像許多外國訪問者、記者和作家們所做的，僅僅到蘇聯走馬看花地跑一趟，揀了一個瑣細的項目，不管它與全部計劃的關係，不管它在蘇聯的時間因素，然後拿來與其本國一個較好的有關的瑣細項目相比較，那完全是徒然的。這是幻想的方法。

在戰前，正是這種方法，完全錯估了蘇聯的力量及其工業、運輸和農業的成就。研究之前總需要小心和忍耐，否則那圖畫便將有虛假的危險，不管技術上怎樣精確和詳盡。

照科立斯尼科夫所歸結，顯著的特點是這樣：

(一) 最重要的，蘇維埃醫藥衛生事業形成了統一的密切交織的整體，並且有一個推動的共同計畫，和耗費所需的預算。衛生服務在蘇聯是國家的服務。蘇聯醫藥是國家的事業。所有蘇聯醫藥服務的機構，都在國家的管理下，而且有行政統一的無數便利，一種新的發明和發現，或者是新的治療方法的採行，那果實是立刻會讓大家共享的。

國家負責整個社會的衛生，自始就是蘇聯的願望。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後，蘇維埃政府就宣佈有益衛生的事業必須普及。早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它指派一個人民衛生委員會，負責制定國家的計劃，保證款項的合理運用，及配合地方的條件，使醫藥衛生設施更有效的推行。

(二) 其次，積極的衛生強身，比之消極的治療，成了新的國家衛生部門更重要的任務。預防疾病和推進健康現在成了它主要方針了。治療誠然是重要的。舉例說，倘如一個工廠發現了腸炎病，那就必須設法治療。但更重要的是預防腸炎病發生，尤其重要的是使工廠中工人的周圍，

不但有衛生的環境，可以不受腸炎病的侵襲，而且還使他們有正當快樂和生活豐富的條件，足以增加他們新的活力和飽滿的精神。這三件事情，都分別按相當的比例，成爲蘇維埃衛生部所竭力的注意的。

再舉個例，結核病如一發現，是必須治療的。但結核病也必須盡可能的加以預防。結核病是一種社會性的病症，住所和生活條件大有關係，因此預防結核病和積極的推進健康，就和國家整個的社會結構相聯繫。一切關於縮短勞動時間、工資、保護勞動、社會保險、以及優待母性的法律，對於預防結核病都有很大的幫助，而且已發生了效果。社會立法乃是蘇維埃醫生的右手。

過度擁擠——舉一有趣的例子——容易引起結核病。一般說來，收入較好的工人，可以得到較好的居室，這在蘇聯是不需要如此的。公寓租賃的法律打破了這種情形。房租不但依照住室的容積納付，而且也照居住者工資收入的比例遞減。因此，一個低工資的工人和高工資的工人，一樣有住入衛生清潔的公寓的機會。

(三)蘇維埃的醫生，並非和從前一樣處于一種高過工人的地位；他的地位不過是担任醫病的工作。內外科醫生和科學家，形成了公務員的幹部，這幹部是訓練、指導、鼓勵和保障全國人民的大軍，它的目標在積極的強健，醫治疾病不過是廣大整體中一個技術的部門。

工人都參加着對疾病的搏鬥。政府勸告他們反對任何地方不衛生的情形，鼓勵他們自動檢查傳染病的中心，衛生專家只是指導着他們，但並不代他們動手去做。廁所必須清潔。主要的設備

都有。每一所房子都列在考查的表上。醫生們是擔任不了這樣巨大工作的，要這樣做甚至會不及一位鄰人的。醫生只能指導着工人。

再講到反抗疾病的確定的步驟。

可預防的疾病的發生，應該發現得愈快愈好：一經發現，政府就提供了一切必需的消滅它的方法。

高加索的痴呆病（Creitism）已經因碘化鹽的應用而宣告肅清了，這件事情，已用不到讓病人自己負責任去摸索了。

同樣地，在白俄羅斯影響到百分之三十人口的疥瘡，也已經肅清了。六百萬居民中的每一個人，都經過檢查，或治療。還有，中亞細亞流行的砂眼症和梅毒也同樣消滅了，紅軍和紅海軍都已從花柳病解放，只有那德國人所沾污過的若干區域，仍有這種傳染病。許多的醫藥隊已派到這些區域裏去，因為在那裏，往往有百分之五十人口患着這種病。

國家的全部力量，現在已可以消滅這種特殊的病症了，猶如在當年的武裝鬥爭中，終於消滅了法西斯的威脅一樣。

科立斯尼科夫又講到了家庭和工廠中對付疾病的各種方法，還在鄉村或城市是有多大區別的。

但無論鄉村或城市，醫藥都免費。在城市中全科醫院和藥局，依照當地人口在治療和預防特殊病症上的需要而設立。

醫藥往往集中於特殊病症的治療和預防，例如結核病。每一區域的結核病患者都須登記，有必要時就送到醫院去治療，特殊的情形可以有特殊的待遇，並免費供給必要的生活水準。

全科醫院主要診察一般的病症。任何人可以到全科醫院去求診，那裏另有專科醫生診察特殊的病，普通的病人如發現特殊病症時，就可轉到專科去。倘遇必要，病人可入院療治。

當然，病人要自己出費請私人醫生，也是許可的。一個臨產的婦人，假如她願意，也儘可在家裏生產，不過這種人往往是年齡較大、或過度的神經衰弱者。公私醫生是可以而且確乎同時並存的，不過私人醫生較少，大多數人都寧願找公家的醫生。

絕對多數的醫生，也寧願在國家機關中工作，因為在那裏，個人的福利有保障，而且有同事的合作，有一切工具和設備，可以充份運用現代醫學上的成就。醫生的工作已不復是個人的技藝：它已成爲有組織的社會事業了。

病重而不能到醫院去的病人，可以打電話找醫生，只要報告一下體溫和住址就好了。

指定的醫生負責各個一定的區域，他們必須熟識分組指定的人家；他們的任務是瞭解他們的病人，瞭解他們的衛生條件，和估量他們的生活水準，以便判斷他們的處方是否生效。假如不夠，另外有補救的方法。

在一九三一年，城市中有醫生訪問的爲三十九萬一千家；在一九四一年，增至二百九十三萬七千家。

急症有急救。倒如意外聲禍、暴病或難產，只要一個電話，就會來了病車、醫生和伴同的男護士。

因爲產業工人把他們大部分的生命都消磨在工廠裏，男的女的爲了工廠生活付出特殊的代價，他們自應有特別方便的權利。

從一九二一年開始，蘇聯轉向和平時期經濟和文化的建設。這一工廠生活的調整，對於衛生服務發生了雙重的結果。第一，由於財富的增加，醫藥預防和衛生的設施就可能擴充了，無論是對於母親嬰孩的保護，或是防止結核、梅毒、砂眼和其他病症等。這也增加了生活上的享受，如擴大強身組織和體育會等；都是爲了積極的強身。第二，由於工廠數目的增加，工廠中醫藥設施的需要也增加了。

每一大規模組織的工廠，都設有自己的醫藥中心。在一九四一年，除了當地的工廠醫院外，各企業中的醫藥站共有一萬個，每一工場都有衛生站，常駐着醫生和護士，負責一切有關工人健康的廣泛的服務。他們管理着工場的清潔，空氣的流通，特別注意意外的事件，預防皮膚病症或任何形式的工業中毒或損傷等。

除了衛生站之外，每一大工廠還設有專門治療的醫藥中心。工廠的衛生站是爲了節省寶貴的時間，和便利那在特殊過程中所引起的特殊問題的詳細檢查。每一工廠的醫藥中心，需對疾病的發生、因病告假的人數以及由於醃醃或其他原因所引起的皮膚病等，作每月的統計報告，現在則特別注意着腸炎症，這大概是由於不衛生或飲食的條件所造成的。這樣詳細的報告，使衛生當局對於工廠中疾病的預防，可作有效的佈置。

由於生活方式的不同，鄉村的醫藥工作也就與城市不同。然而原則是一樣的，無論那裏都需要緊急救護、專門治療和注意衛生的條件。爲了方便起見，鄉村都依區域劃分，普通的單位是八萬到十萬個村莊。每一區域中設有幾個醫藥中心站——每一萬五千人設一站——每站由一醫生主管，並有實驗室和臨床室，有時還有一個十張到十五張病床的醫院。周圍各村的居民都可到中心站求診，或者需要專門治療時就送到較大的中心站去。

農民患病較重而不能前去的可以請醫生，如有必要，醫生又可向政府請求特殊的醫藥，或爲病人謀得專門的治療。鄉村的醫藥中心站得利用其藥品貯藏，另行設立托兒所、產婦院和較小的醫藥中心站。最僻遠的地帶，也必須編入衛生機構的網。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政府頒布「加強鄉村醫生崗位」的決議，這大大改善了鄉村醫院的門診服務，而由於全部新的科學化基礎的奠定，鄉間的醫藥服務也有了進步。大量的青年醫生

紛紛下鄉，組織醫藥隊，並隨時有來自大學研究中心的學驗俱富的成千的人們，作者顧問性質的考察，這就使技術與經驗更形加強了。這些蘇維埃鄉村中的醫生，除了替農民診病外，還負責推行着鄉間預防傳染病和其他衛生的措施。

除了少數因某種理由仍願私人開業外，蘇維埃的醫生完全是國家的僕人，不必作經濟上的打算。他的收入是確定的。他的前途是確定的。他可以一心從事本位的工作，促進健康與診察疾病的工作。國家愈繁榮，他的設備愈改善，他的業務範圍也就更大了。

蘇維埃醫生的工作時間——和平時為六小時——有嚴格的限定。臨床工作是輪班的。在長疲勞的一天之後，醫生們半夜裏不會被叫起，他們是不致過度工作的。

自然，醫生應該有經驗，有學識，並且懂最新的方法。因此，每隔三年，他們總有六個月免費進修的機會，而且離職時期仍有全薪；當回來工作時，更有醫藥書報的免費供給，以與現代的醫學保持接觸。

蘇聯對她衛生事業的成就，確是應該驕傲的。她的醫院也值得驕傲，雖然由於德國佔領和劇烈戰爭的破壞，仍有着許多的缺點（科立斯尼科夫對此非常之明白）。主要用品常感缺乏。制度和目標是好的。但已有的成就，甚至是必需的，仍嫌不夠。科立斯尼科夫坦白無隱地訴述着醫院設備的缺點。自然，許多部門的水準都遠比英美的水準落後。我們今天到的是經過幾年破壞戰爭之後的醫院，假如沒有戰爭，那面目便將大不相同的。

從全面的考察，從依照科立斯尼科夫綱領的考察，以及人們從無數的科學記錄中的發現，就可知道蘇維埃衛生事業的貢獻，確乎跟它目標一樣的偉大和廣泛。

戰爭提供了證據。戰爭，是所有範圍活動的嚴格考驗，無論是工業前線或軍事前線，無論是戰鬥意志或大礙。戰爭證明了蘇維埃的衛生事業經得住考驗。籠罩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可怕的死亡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不見了：醫院中的傷兵，有百分之七十三重回了前線。而且，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迅速發展的結果，運輸和醫院的流動是極其困難的。只有拿過去來比較，我們纔能親測現在蘇維埃成就的尺度。例如在一九四一年，醫院裏的病床在城市的共為五十萬張，在鄉間的共為十七萬張，比之二十多年前增加了五倍。所有鄉村的醫院實際上都有藥局，以分配藥品，有的還裝備了實驗室、消毒室、電療室和物理治療的用具。還有，更重要的，即在各民族共和國中的醫藥設施，正在飛快的發展，而這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幾乎是毫無的。例如在一九一三年，烏茲貝克共和國中每一千病人中有〇·九只病床，而到一九四一年，則每一千病人中有八·六只病床。

拿蘇維埃的衛生事業和別國相比較，必須注意一個重要因素的事實，即蘇維埃的衛生設施，固然很多是直接靠了蘇維埃的醫學和藥學，靠了臨牀和醫院，同樣也靠了計劃經濟所造成的財富的增加，靠了那導使財富納於促進人民物質和精神生活正軌的立法，靠了糧食的一般增加和適應特殊需要的特殊食物的分配，靠了工資的增加，靠了工作時間的縮短，靠了調劑身心娛樂健康的

不扣工資的假日，也靠了疾病和老弱的相當保障。

一句話，蘇維埃衛生事業離開它全部複雜的構成是無從瞭解的。在蘇聯，這是不同於其他地方的真實，因為蘇聯的全部經濟是有計劃的。衛生事業有一個全國性的計劃的支持，不會受任何破壞因素抵銷的影響。

現行的五年計劃打算使每一千鄉村的居民有十張病牀，每一萬城市居民有一個熟練的產婦科專家；九萬五千個的醫藥工作者準備在五年內訓練完畢。戰爭所破壞的醫院制度不但要恢復；而且還要擴充三分之一以上。每一醫院，病牀在五十只以上的有X光透視機；七十五張以上的設物理治療部；二百張以上的更有整形的物理教育

一一 蘇維埃家庭生活

家庭對於國家有非常重要的關係。在家庭，我們看到了共同生活的發端，接觸由此開始，友誼由此開始形成。生活主要是共同的；世上從無孤立的人，而家庭便是共同性和個性的最早之家。

伯拉圖在他最不可能、最虛幻的烏托邦思想中，不允許家庭和藝術家有地位，他認為一個是太自發的，將完全顛覆了秩序；另一個是太社會的，先入的忠誠將和國家相對立。伯拉圖因此認為家庭無用。蘇聯以為是有用的。正跟一般的想法相反，世界上可說再沒有一個國家，有像蘇聯

這樣熱烈地歡迎家庭，這樣謹慎地保障家庭的。

基督教堅持一夫一妻制為婚姻的理想方式，它強調家庭的重要性，父親母親和孩子是社會真正的單位，男人和女人的互愛，通過了家發着溫暖的光。愛創造了社會。家庭，那愛的源泉，乃是人類愛和社會的哺育地。

正爲了這同樣的理由，蘇聯基於充份的瞭解支持着家庭。蘇聯堅信，家庭是爲了孩子們正常而健康的成長的基礎，也是爲了發展團結、互助和責任心——這是社會幸福的要素——的美德的基礎。

國家對家庭的這種態度，已有生動事實的證明：在過去二十五年中，蘇聯對於「事實上的結婚」，——即姘居或未經合法結婚的同居——正加以嚴格的限制。

一九一八年頒布的婚姻和家庭法，規定了家庭關係的基本原則，第一條就寫着未經登記的婚姻不受法律的保護；如果她同居的男人死了，女人不得請求繼承他的財產。這是有意制定的。因爲這種不合法的婚姻，可能造成許多不良的結果，如多配偶、不負責任、亂交和家庭的不安等，而這是要取締和處罰的。這條法律後經修改，但那不過是緊急時期一種權宜的辦法。在一九二五年經濟困難的時期，婦女們常缺乏謀生的機會，經濟的平等也尚未達到，假如婦女非與男人同居而不能過活，而男人們又堅持離婚的時候，那末，這種「事實上婚姻」的女人就有權要求生活費，一份「結婚」時候所得的財產，以及男人死後的繼承權。

然而當工業再趨邁進，計劃性的生產給婦女們以謀得工作的更多機會時——工廠中一千一百萬人，農業中一千九百萬人——全部的形勢便改變了。現在，婦女們在經濟上和社會上是獨立的，因此，政府又可以它的立法來規定男女關係的新基礎了。在這新的環境中，政府拒絕保護事實上的婚姻，並且取締它，因為那迫使婦女發生非法律制定的婚姻關係的社會和經濟的條件已經不具備。

這種不規則的婚姻，當然是由於對家庭和對婚姻的浮薄態度的結果。因此，這是必須嚴厲限制的。這同樣的原則，也可以從離婚法律的變更中看出來。在蘇聯，法律隨條件的改變而改變。法律後面的原則是始終一定的，——尊重家庭生活的原則。離婚是可能的，自一九一七年以來一直是可能的，只要任何一方提出請求，可以不必說明動機。這樣就可以打破過去傳下來的人造的不自然的婚姻。但當早期的日子已經過去，當一九三六年大部份的婚姻都變成應有的互愛的結合時，離婚法修正了。這次修改附有許多更嚴格的條件，為的是防止濫用離婚的權利。

一九四四年，蘇維埃政府又採取進一步的步驟，以防止對於婚姻的不在乎態度。離婚必須公開，只有經過法庭的決定纔能獲許。先得調查動機，然後試行和解，和解不成，應再向高級法庭請求。關於孩子們的撫養和管理，以及財產的分配也有規定。請求離婚須納費一百盧布，獲准後須納五百至二千盧布。結婚也須向登記處請求，並附帶說明並無法律上的糾葛，雙方都相互明瞭對方的健全體格等。當男女雙方簽了字，並由證明人加簽後，登記處始發給結婚證明書。

結婚的合法年齡在大部份共和國為十八歲，在若干南方的共和國則為十六歲。一夫一妻制是法律的規定。婦女可以用她丈夫的姓氏，或保留她自己的。任何一方在結婚前所有的財產都屬於他們自己，結婚以後所得的則為共有，婦女在家裏的工作，等於是男子在工廠中的工作。一個家庭的成員都必須互相合作維持，誰也不能倚賴誰。

孩子與父母的關係在法律上也有嚴格的規定。父親和母親，對於子女有同等的權利和同等的撫養責任。國家保護孩子的利益。國家也保護家庭的整體，促進它的幸福，保障它的完整。當登記處發給證明書時，這不僅僅是婚姻的證明。這也表示着國家承認、贊同和支持這一新的結婚生活。國家保護着他們。建立父母與子女間堅強的連繫，乃是國家的指導原則。蘇聯竭力給家庭以發展的條件，她視家庭為一個緊密交織的單位，一個與共同社會密切地聯繫的單位。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的兩個月之內，政府就宣佈保護母親和孩子，是國家直接的義務。年青的蘇聯不管面臨着怎樣的困難——內戰、歉收或飢荒——母親和孩子們總不愁沒有足夠的食物。

在這次大戰的嚴重日子中也是如此。甚至當蘇聯產糧區的三分之一被佔領時，待產的母親，仍可以得到牛油、糖和穀物的額外配給。在一九四四年，那配給增加了一倍，每一待產婦，從六個月到八個月起，除了普通的配給外，每月可另得一磅又四分之三的牛油，一磅又四分之三的二糖，二磅又四分之三的二糖類，和二十一「派因脫」(Pint)的牛奶；已產的母親，在產後四個月內也可獲得同樣的配給。生產前後的休養，已延長至十一星期。

產婦可以無須排隊等候公共汽車，而在城市中，很少有一個女人不在醫院裏生產的。哺乳的母親晚上不工作。產後六個月不得過度工作。在工廠中，每隔三小時半，一個母親可以化半小時去餵孩子的奶，不會減工資。倘如一個哺乳的嬰孩病了，母親可獲准告假，也不扣工資。孩子多的母親，有特殊的享受和工資，以彌補她們的不足，此外還可得獎章和榮譽等。沒有丈夫的女人也有同樣的待遇。無論如何，孩子是不能受苦的。一個母親現在可以無須再上法庭，向掛名的父親要求離婚費或生活費了；因為她可以領到國家的津貼，一個孩子每月一百盧布，兩個孩子一百五十盧布，三個孩子二百盧布，一直可以領到孩子十二歲。

在蘇聯，娼妓流行現在已是過去久遠的事了。娼妓不是用說教或懲罰的方法來消滅的，而是用了再教育和醫學治療的方法，再加上在滿意條件下就業機會的日益增加，使她們明白：紀律、責任和道德，要比放縱和不道德能得到更大的報酬。那原則總是同樣的——一種新的感情的無比權力。

女人們——我預備在下面一章中講到的——現在已和男子們一同在家庭外面無窮的活動範圍中站在一起了。家庭並不因這種對外活動而受到影響。絕對不是這樣。家庭反而蒙了利，因為外面的工作擴大了她的生活，母親可以擺脫許多瑣屑然而重要的事務：公共食堂和公共洗衣處所免除了廚房和其他的勞役；育嬰院、托兒所和幼稚園，幫助婦女大眾更有訓練地更技術地撫養她們的孩子，而這正是別國的每一婦女所切於追求的事情。經驗證明了，而且日益證明着，婦女們注

意家庭外面的事情，並不致減少她作爲一個妻子或母親的興趣，也不致使她的個人生活，會不及那與孩子成天廝守在家裏的女人們的快樂。

從外表上看，蘇聯也是我所知道的世上最道德的國家。當我逗留蘇聯的幾個月中，在大城和小城，在鄉村和海濱，在前街和後街，在白天和晚上，在書店和車站，在戲院和電影場，我從未看到一個年青女郎有眉目傳情的挑逗的舉止。這祕密究竟何在？一個合理的人生目的，大家有創造性的工作；任何女郎沒有出賣她的光榮的經濟需要；沒有任何需要用賣淫來謀利的經濟的動力；大家儘能在生物學上適當的年齡去結婚——這些，我猜想便是這無可懷疑的事實的主要理由吧。

三 領導世界的蘇維埃婦女

在戰前的巴黎博覽會中，蘇聯的旗幟上面高站着莫陵那夫人精構的蘇維埃青年的雕刻像，朝前望和向上進的姿勢：表現了充滿勝利精神的青年男女的典型。同等的體格、目標和興奮，這是表示變革的一幅真實的圖畫，——這一變革也許是蘇聯最偉大的成就之一，這一變革，把六分之一世界上的婦女，從無技能的、不識字的和不懂政治的底層，提高到這樣的地位：現在她無論在工廠、在辦公室、在實驗室和在大學裏，已到處與男子平等了。

而且，這一奇蹟的完成，也並沒有犧牲了婦女的作爲孩子們母親的重要的本能。蘇聯的婦女

證明着女人絕非天然不及男人的。婦女同樣能够担任工業生產和政府的工作。婦女儘能在國家和世界大事中發揮有效的能力，同時對於快樂滿足的孩子們仍是美滿的母親，仍是家庭永久和諧的中心。那抉擇不復是結婚或事業，而是結婚和何種事業了。

戰前蘇聯婦女的社會地位是低的，政府看得她們低，丈夫也看得她們低。在舊日的俄羅斯帝國中，婦女沒有任何的權利。一個妻子不能有自己的意志，未經丈夫的允許，就不能領取一張旅行護照。勞動人民對待他們妻子的態度，有一次會引起列寧嚴厲的指責。婦女在家中或在田野中比男子在工廠中勞作得更苦，但所得卻更少，至於兒童福利的設施，也是少得有限的。

只有一件事，蘇維埃以前的俄國婦人是相等於或超過了男子的——她的作苦工的能力。她從未失去這種的能力，而當廣大生活的大門打開時，她更懷着熱情昂然地走了進去，並且達到了勝利的平等。十月革命使婦女在所有經濟、文化、社會和政治生活的範圍中，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蘇維埃憲法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着男女的完全平等，無論是關於工作的權利、工作的報酬、休息和享受、社會保險和教育。

婦女積極參加着政府的行政。各種民族的一萬七千位以上的婦女，已被選為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或聯邦和自治共和國的最高蘇維埃的代表；四十五萬六千位婦女為地方蘇維埃的委員。千千萬萬的婦女主持着工廠、機關和科學研究所。在一九四六年，蘇聯有了二十五萬位女工程師和女技術家，在大學和研究院裏的學生，有一半是女子，在工廠中工作的至少達一千萬人以上。

婦女解放的過程是需要時間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內戰，會使布爾雪維克的領袖們不能澈底實施他們一開始就確定的解放。直到五年計劃解決了失業問題，增加了勞動的需要，這纔使他們終於說服了婦女，去與男人一同參加生產的工業。

除了戰爭的非常時期，婦女纔被動員參加農業和工業的工作外，在平常，蘇聯女子也和英國的女子一樣，是並不受法律的強迫，非離家參加工業生活不可的。選擇是自由的。通過說服而不是通過壓力。

號召婦女們參加工業，不但是基於擴大生產的願望，而且也基於一種確信，認為廣泛的生活對於婦女和家庭的完整都有好處，這確已有了證明。因婦女的勞動而造成生產的增加，使工時可以縮短，使丈夫和妻子都能享受到更愉悅的生活。母親的廣泛活動也可以給家庭帶來更和諧的空氣。戰前在農場和工廠中工作的三千萬蘇維埃婦女，都感到她們的生活因了新的技能和世界廣泛文化的接觸而更形豐富。一個蘇聯的工廠或集體農場，都有它全力文化發展的一面。離開學校絕非就是離開了教育的環境。工廠中設有文化研究的選修課程，常常還設有寧靜的閱讀室和圖書館。在一九四〇年，各職工會有着一萬五千所圖書館；工廠則約有十萬處的俱樂部。

工廠如此，農場也一樣。婦女的操作，已代之以同等工作同等工資的婦女勞動。很大百分數的婦女，都已成了高級的技術工人。在一九三六年一次重要的畜牧會議中，一千四百四十七位代表中有五百零七位是婦女。婦女參加着各種的自願工作。在蘇聯對外文化協會大廈的前面，或莫

斯科的任何地方，我曾看到婦女工人自動的在廣場上沖洗公共的花園，家庭主婦在自家的門口自動地做着公共的清潔工作。在蘇聯，婦女活動的猛進，無疑是戰爭的結果之一。

戰爭自然加速了婦女工作進展的速度。教育和訓練在戰前已有了基礎。戰爭更造成刺激的機會。婦女們發動了新的努力。戰爭把她們投入了所有的各種工作，從城市的保衛到交通的服務，從無線電的廣播到農場中曳引機的駕駛。在列寧格勒和莫斯科，她們掘着戰壕，在鄉村中，她們替游擊的部隊燒飯。她們主要的貢獻，是在農場和工廠中代替了男子的工作，並且維持着生產的紀錄，沒有這，勝利是不可能達到的。婦女在農場和工廠中的數目，很快的超過了男子。

正和英國一樣，婦女們也以可驚的速度，學會了工業上的新技術；在一九四二年，十七萬三千個少女和婦人，經過嚴密的訓練後，都可以在鐵路上工作了。她們甚至在周密注意健康的條件下，擔任了礦工的工作。戰前認為不適宜於婦女的許多工作，現在因為有了新的技術，都已由婦女和少女們擔任起來了。

女醫生的人數也已超過了戰前的男子。在戰爭幾年中，婦女在醫藥學校學生中佔全部百分之九十。在科學院實驗室各部門担任助手工作的，婦女佔百分之五十，其中也包括了初級的婦女工作者；三百五十七位婦女得到了大學研究院科學博士和科學碩士的學位。就在戰爭時期中，蘇維埃的婦女終於站定腳跟了。

四 蘇維埃的兒童

春天暖和的陽光，碧藍的天空，流動的浮雲，以及溫柔的空氣，觸動了我們的遊興，五月中的一天，我們出發去訪問伊斯脫拉（Istra），那是離莫斯科西面約五十五哩的一個小鎮。

一條簡陋的路，中間是柏油澆砌的碎石，崎嶇而不平，蜿蜒着通向一個典型的俄國鄉間的牧場，四處散立着木屋的村莊、赤楊樹和松林，在戰前，這裏曾是明媚的多林木的小村，建立在一條小河的河曲裏隆起的高地上，仰望着一座雄偉的教堂。那村莊殘存在瓦礫中，化爲平地了。教堂雖遭可怕的破壞，但仍從它所掩蓋的蒼翠的草土中，莊嚴地露出着圓屋頂。通往教堂的迴廊，不在地面上，卻是盤繞在那巨大的克里姆宮似的城牆的頂上，那城牆完全圍繞着草土和外屋。僑侶們儘可以成天的望着金色閃爍的圓屋頂，在陽光中漫步或靜坐。

伊斯脫拉是因聶空（Nikon）主教得名的，他在十七世紀時候建立了這小村，並且獲得幾乎與沙皇相等的權力。後來他因與沙皇爭吵，遭了放逐，直到晚年纔獲許回到伊斯脫拉等死。他的墳就在教堂中。現在的房子是一七四九年大火後建造的，那是異常美麗的奇特的構造。走進以前曾是中央大門的地方，我們站在圓屋頂下的瓦礫堆上，大門只賸了一半，看來仍具有迷人的美，它的乳色的牆壁和浴在陽光裏的金碧輝煌的壁畫，恰與那淺藍的天空成對照。大門的其餘一半已經沒有，那是遭了殘酷破壞的，地雷的可怕威力，連把那支柱的頂也炸成磚塊的平地了。古

代的地下室，大部份仍保留着原始的莊嚴。

農民的市長、我們的司機、和兩個農民婦女，加入了我們在高聳的柳樹下的聚餐，披散的柳枝，在明媚的空中搖曳着。當德軍佔領時期，市長和大部份居民都逃入森林中。他們雖然失去了中心的領導，但仍盡力執行着蘇維埃的任務。現在，人們仍住在洞穴裏，在戰爭的廢墟中蟄伏着。

當我們休息時，有一個強壯的約莫十六歲的孩子，背着書包從我們旁邊走過，他是回到學校去的。我檢視着他的書——物理學和地理。他將繼續讀書到十七歲，然後準備去當水手。我要求把我們的車子開回教堂，我們就在那裏徒步徘徊，並且和一個撐着木腿蹣跚地到學校去的小孩談着，據說他是自己誤觸地雷受傷的。經過了一座新近搭成的也可說是惟一僅存的精美大屋，我們邂逅了一羣回校的小學生，手裏都握着春天的花。有一個美麗的小孩，整齊的頭髮，藍眼睛，張大着微笑的臉，並且充滿着健康的紅潤，自動地跑上來，送給我們一束的櫻花。

這是一幅動人的圖畫：破碎的教堂，破碎的家，憔悴的老農坐在教堂牆下的春天陽光中，對我的十字章大感興趣。還有一羣成年人，很堅強的，絕不吐訴一些生活的辛酸。前面的廣場是整幅圖畫的主要場面，那裏都是快樂的孩子們，健康、肥美而活潑。這彷彿是縮小的蘇聯。小孩子總是處在中心的地位。德國人一離開，第一個念頭便是兒童和教育，第一座造起來的住屋，是就學兒童的寄宿舍。紅軍兵士率先發動，擔任建築的工作。

我走遍東西南北都是這同樣的情形。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在城市和鄉村；在喬治亞、亞美尼亞、亞洲，或在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孩子總是第一。蘇聯是兒童和青年之國。

由於對兒童的厚愛和很高的生產率——比別的文明國家要高過百分之一。四：蘇維埃男童的人數，今天已等於是英國及其白色自治領、德國、法國、和美國所有男童的總和。

研究蘇維埃的兒童和青年，是非常重要的，我第一步既考察了蘇聯兒童的健康，第二步就得考察它的保護和教育，因此我對今天蘇維埃的教育計劃，從頭至尾作了一番檢討。

(甲) 新民主的蘇維埃教育

蘇維埃教育有兩個顯著的特徵：(一)它的興趣和(二)它完全新民主的性質。

一、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有比蘇聯更認真於教育的，它在二十六年中已把擁有二萬萬人口的一分之六的世界，從文盲佔百分之八十一九十的一塊地方變成識字者佔百分之八十一九十的地方了。入學讀書的人數從八百萬增加到三千六百萬，這也反映於聯邦每一構成的部份：例如亞美尼亞，一九一七年的學童為三萬四千人，到一九三九年已為三十二萬人。

列寧自始就堅持：「我們需要一次文化的巨大進步」，而蘇聯確是從未放棄過一個受教育的無產階級的目標。

史太林在一九三〇年說：「現在主要的事情是推行強迫教育……」接着就開始了大規模的教育運動，從城市中心推行到最僻遠的鄉村。

蘇維埃教育採行着最新的民主立場，可以概括為四個特點：

(一)她是文明史上第一個排除了教育的一切經濟障礙的國家，是第一個從托兒所到大學施行普及教育的國家。憲法第一百二十一條規定：「所有公民都有教育的權利。」這不是具文。高級教育也是人人可受的，只要他能造就。必要的話，政府還給學生以膳宿費的補助。下面的數字是雄辯的。

在一九一四—一五年，八個大學中的學生身份是這樣的：貴族和高級官吏，百分之三八·三；中等階級百分之二四·四；商人百分之一一·四；富有者，百分之十四；教士，百分之七·四；手工業者，——一個也沒有。

在一九三八年，所有大學中的學生，有百分之九十七是工人和公務員的子弟。

在一九一七年以前，俄國五分之四的兒童都缺少教育的機會。在今天的蘇聯，任何個人如果願意受高等教育和從事學術的研究，是決不會因經濟的理由而遭擯斥的。

現在，高等教育的若干級，需要少許納些費。但這一最近規定若干學級納費的事實，並沒有改變免費教育的基本原則。中等學校的最高三級，須納少許的學費，約為一百五十盧布。戰爭以來，大學教育須納費四百盧布，但仍有許多免費規定，例如黨員的子女或陣亡將士的遺族。但兒童絕不因經濟阻礙而被剝奪教育的權利，卻仍是確實的。

(二)任何形式的種族或有色的歧視消滅了。一個黑人的孩子，不會因他而孔的顏色，或猶

太的孩子不會因他特高的鼻子，而受到妨礙。

(三) 婦女教育是平等的。在任何教育機關或學術部門，婦女都不致遭排斥。在各種職業中服務的受教育婦女的比例，超過了世界上任何的國家。沙皇時代的大學女生只有百分之十五，到一九三八年，已增至百分之三十八了。

(四) 學校和校外的研究機關建立了密切的關係。它們交相聯繫着。社會對於教育機關培植出來的人材有不斷的需要。蘇維埃青年是不用愁失業的。凡是受高級教育的男女青年，適當的工
作保證等待着他們。倘如他們的最後就業沒有保障，蘇聯要訓練這麼大量的青年就異常之危險，而且，倘如失業不能避免，經濟上這樣的浪費也是不可能。蘇維埃教育的便利並非放在真空中。蘇維埃教育哲學是蘇維埃一般哲學的一部份。蘇聯是一個有計劃的社會，而計劃是根據基本思想形成的。

還有，在一個種族和膚色歧視的社會中，給所有種族和有色人民以教育平等的機會，是無用而危險的。蘇聯是世界上以歧視種族或性別為犯罪的第一個國家。

(乙) 蘇維埃教育的構成

由國家辦理和國家管制的蘇維埃教育是強迫的、普及的、非宗教的和義務的，只除了若干級的高等教育須納少許的費用。

正和過去文盲盛行和五分之四俄國兒童的失學情形相反，「一切公民有教育的權利」這句

話，已在蘇維埃憲法中列為確定的目標。教師和校舍的條件都具備，教育是強迫的。現在入學的學生一共有三千六百萬人。

到中等學校第八年為止的教育完全義務。從第八年到第十年，每年的納費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和別的共和國首都為二百盧布，其餘的地方，為一百五十盧布，那是微乎其微的。大學教育和高級技術研究院的納費，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和其他共和國的首都，每年為四百盧布，其餘地方為三百盧布，那是一個青年做一個月工作就可以得到的。所有優秀的學生可得獎學金，第一年每月一百八十五盧布，一直到最後一年的每月三百盧布，卓異的成績還可得學位。教科書很低廉，四份日報的代價可買一冊數學教科書。教育是非宗教性的——國家對宗教仍保持中立——且由國家管制的，它的任務由國家決定，它的開支由國庫撥付。

蘇維埃教育制度以三種的普通學校為核心：初級學校，一—四級；中級學校，一—七級；高級學校一—十級。課程和教科書是完全一貫的，初級的兒童升到中級或高級的十年學校，可不經教科書和課程的變更，或特別的入學試驗。一九三八年，蘇聯宣佈七年的中級學校為普及的強迫教育。

七歲以下的兒童可入三年到七年的幼稚園，再以下有托兒所。這雖非強迫，但由於房舍、設備和人力的擴充，這方面的教育也在擴展中。

高級學校以上是大學，跟高級學校平行的是各種職業學校——商業學校、技術學校、師範學

校等，那是專為實際應用與味強過學術與味的成年人而設的。十六七歲的男女青年，讀完了七年的高級學校，就可以進各種專門學校：如師範學校、幼稚師範、或藥物學校、護士或助產學校。這些學校的修業期限為三年至四年。大多數的中級學校仍採行男女同學制，尤其在鄉村；但在大的城市中，卻已漸漸改為男女分學了。一九四三年男女分學的命令，主要是為了兩性的發展率有不同。最初四級的所有課目，都由一位教師担任，此後纔分別由專家教授。成績是有記錄的，每年舉行考試，而且是強迫的。

教學的課目——俄文、數學、物理、化學、自然科學和歷史等——都經過有系統的邏輯的設計，特別注意每人自行利用書本、實驗和工具的獨立工作。

「學生的規則」，使校外和校內的行為都有規律。兒童們在上課時候不得進電影院或其他娛樂的場所。兒童對老年人應該溫和，在公共汽車中應該對年長者讓座，倘有必要，更應加以扶助。一個「新人」的訓練或「人格訓練」自有它的重要性。已故蘇維埃主席加里寧曾歸結說：「這新人必須灌輸以人類最好的性格……愛人民、忠實、勇敢、團結和愛工作。」

紀律要求遵守已定的規則。說服和獎勵的方法都採用；倘遇必要，懲罰也有，如扣減分數，由教師或教師會議宣布懲戒等。體罰或絕食禁閉是絕對禁止的。暫時的停學須經當地教育當局核准。

課外活動有各憑愛好的團體和學會，如戲劇和植物標本的採集，這些團體每星期利用課餘時

間開會一次，並有教師的指導。由學生們表演的晚會，每月舉行一次。先鋒隊和共產主義青年聯盟的組織，旨在訓練良好的公民。先鋒隊有特殊規定的聯繫、旗幟和敬禮，訓練隊員在校勤勉讀書並幫助學校和家庭。共產主義青年聯盟的盟員則指導着先鋒隊。

聾啞或精神殘廢的特殊兒童，另有特種的學校；具有例外才能的兒童，另有特種的藝術學校。

孤兒另有供住宿的學校，可受十四年的普通教育。然後升入職業或技術學校，也有寄宿舍。蘇伏洛夫（Сувлов 俄國名將）軍事學校是高級的住讀學校，專為官員和陣亡將士的子弟而設，除了一般課程外，另有軍事操練、騎術、音樂、兩種外國語、以及養成敏捷和靈巧舉動的跳舞訓練。孩子們過着絕對有紀律的生活，飯後有一小時的休息或遊戲，上床之前可閱讀小說之類的書。

讀完高級學校的男女，經過考試或取得學校最後一次考試的完滿成績後，就可進大學、研究院或專科學校。高等學府旨在訓練經濟生活和文化部門中的負責幹部，二十年來，高等教育機關的數目已從九十一增至七百八十八。大學修業期限為四年至五年，畢業的學生保證有工作。

所有蘇維埃高等教育的學程和設備，都歸一個高等教育的特別委員會掌管。這一集中化的方針，使有計劃的訓練能够配合了全國經濟和文化各部門的實際需要。在可怕的戰爭時期中，蘇維埃的教育熱誠仍不稍減，自然那成就是少了一些，兒童們都向東撤退，幼稚園是全部的，其他的

或跟隨學校，或跟隨父母。十萬個孤兒分別由各家庭撫養，神經失常的兒童則受特殊的治療。

教育始終在重重阻礙中奮鬥。教師的人數減少了：在一九四一年，共為一百二十二萬二千二百零五人；在一九四三—四四年，只剩了七十七萬四千七百九十五人。上課是輪班的，學級從四十增加到四十五。在列齊格勒和任何地方，兒童們都能安心上學。

德國人一退出，接着就是復興的努力。父母們指撥他們的房屋作校舍。工程師和技師建造着新屋。大規模的重行裝修開始了。在一九四三年，史太林格勒、羅斯托夫、庫爾斯克和奧里爾（Orel）收到了三萬五千具的新課桌。教育部分配了一千九百四十一萬九千冊的練習簿。在四個月之內，羅斯托夫有了五百二十四所的學校，入學的兒童達五萬人。蘇維埃學校在一九四一—四二年的最高總數為十九萬三千零二十五所，因德國的破壞減到十一萬六千五百四十八所，但到一九四三—四四年，又增至十四萬零一百五十六所了。全國教師的報酬總數從二十二億五千七百萬盧布增加到四十一億五千萬盧布。一九四四年的教育預算比一九四三年增一倍。高等教育的學校，雖形減少，但課程卻加緊，以作為非常的措置。一般課目還是和以前一樣。為了應付戰爭時期的困難，教育費用有相當的調整。

（丙）蘇維埃青年的種族團結感

一天早晨，我在亞美尼亞的耶列文的東區漫步，穿過一個整齊的運動場。這是炎熱的早晨，卻有習習的涼風。運動場中擠滿了青年，富有朝氣的十六歲到十八歲的青年男女，袒露着給太陽

曬黑的手足，頭髮披在後面，橫溢的熱情中充滿了活力。他們都是體育選手，準備動身到莫斯科去參加全蘇維埃共和國的體育檢閱，那檢閱是每年七月在紅場舉行的。

幾百個青年來自亞美尼亞。幾百個來自喬治亞，來自聯邦所有共和國。

在脫必列西的大學中，我會看到更多的青年選手，準備到莫斯科去。喬治亞選手的陣容將為五百至六百人。

在特定的一天，全聯邦所有共和國的青年將聚集在莫斯科慶祝體育的文化。來自亞美尼亞和喬治亞的青年將會合了來自西伯利亞各共和國的青年——烏茲貝克的、喀柴吉斯坦的和吉齊斯坦（Kirgistan）的，還有來自西伯利亞和喀里利亞的，來自基輔和列寧格勒的。在莫斯科，大家會合了——來自六分之一的世界的遙遠角落裏的青年，操着各種語言的、不同膚色和不同生活習慣的少男少女。他們盡是新的社會主義秩序的一員，大家以此為光榮。青年與別地方的青年相熟悉，懂得了不同中的團結的意義。

不但是運動，他們在任何方面都是巨大的競技組織的份子。幾百萬的智識青年固然是運動熱心家，但他們最切於爭奪的還是那G. T. O.——獸身勞動和國防的獎章，自一九三四年以來，已經有七百萬入得到這種獎章了。

在全部的戰爭時期中，體育文化從未一刻停止過。德國人雖然破壞了幾乎一半的運動場和競技場，但在未受波及的其餘地帶，參加體育比賽的總人數實際上還是增加着。在一九四二年的全

國體育比賽中，參加的有五百五十萬人，一九四四年增為八百萬人，一九四五年增為九百萬人。滑冰的競技者在一九四四年為六百萬人，一九四五年躍增至七百萬人。

戰後的熱情發動了七座大運動場的重建，這些運動場將有三十一萬五千個的觀眾的座位。

青年們都是一個更大團體的會員——全聯邦的國防航空和化學協進會，這團體擁有幾千萬會員，二十三萬個分會。青年們在這些組織中學習了怎樣保衛他們的國家。蘇維埃的飛行員和傘兵從這裏學到了控制天空的常識；蘇聯的狙擊兵從這裏學到了他們的技巧，千百萬的人們從這裏學到了怎樣避免空襲，無論是炸彈、噴火彈或化學毒氣彈的空襲。

戰爭對於青年人也如同對於成年人的一種最大的考驗，蘇聯的青年在疆場上碰到了德國的青年，起先時候他們的配備雖然較差，但他們終於制勝了對方。

他們是怎樣成功的呢？

德國青年從小就受種族優秀觀念的訓練；蘇聯青年則相信着每一民族集團無比的價值。希特勒會說必須逐出斯拉夫人，並且殲滅它。羅森堡描寫英國人是一個退步的不能創造生活的民族，法國人不是人，而美國人是腐化的種族。

在梅登轟克 (Maidenek) 奧許維茨 (Auschwitz) 和布欽伐爾 (Buchenvald)，希特勒用他的死亡技術完成了集體殺人的制度。蘇維埃的青年，卻在另一種學校裏，受着另一種目標和另一種方法的教育。同志愛是被激發着；愛自己的國家，也必須尊重別人的。在紅場上攜手行進的

一切語言和膚色的青年男女，從來不會有不同膚色和不同語言的感覺。代替了「我的奮鬥」和梵魯，蘇維埃青年讀着莎士比亞、西萬提斯和海涅的作品，讀着他們自己的普式庚、果戈爾和托爾斯泰的作品，讀着所有種族的偉大古典文學家的作品。像這樣的一種精神，是必然會克服另一種的精神的。

也就是這種幫助蘇維埃青年贏得戰爭的同一精神，現在又促使他們去贏得和平了。他們又以空前的熱情，再一次開始了重建的工作。他們重又回到久為德國人所盤據的地方，他們是既不坐着悲傷，也不立着咒詛。他們工作着。

五 蘇維埃文化

戲劇

(甲)莫斯科的藝術劇院

你對那紙迷金醉的紐約感覺到怎樣：它豪華的店鋪，它繁華的空氣，它的活力？我在紐約的一次宴會席上，曾舉此詢問鄰座的一位蘇聯商務代表的青年。

他經過考慮後回答道：「我們蘇聯人重視身心愉快的價值。我們隨時追求着愉快。我們真正的興味是在於精神，在於文化。然而，」他頓了一頓，又接着說，「倘如當別人還缺少身心的愉快時，我們是不能單獨自己享受的。」

照人們在莫斯科所見，蘇俄以及其他共和國的文化生活，確乎體現着他所說的每句話。豐富的文化生活正在欣欣向榮中。猶如它通過了早期的經濟困難的發展，今天，雖由於戰爭的損傷，它仍是這樣的在成長發展。戰後的都市，在戲院或音樂院的設備方面，沒有一個比得上莫斯科這樣的豐富。我曾在莫斯科逗留三十幾個晚上，因此得能考察了每一種的文化娛樂。拿倫敦的文化娛樂的供應來比，那是大大的相形見拙了。蘇聯的文化生活總是跟她的工業生活一同發展的，並不要延遲到工業完成之後；講到戲劇，總常是以莫斯科藝術劇院為焦點，它的影響，發射到又廣又遠。

莫斯科藝術劇院本身自成一類，它不但是革命以來的領導者和開拓者，而且也是革命的鼓勵者；它暴露了舊式戲劇構造的缺點，也暴露了當時沙皇社會的腐敗。

四十年前，高爾基寫了「夜店」，那是下層社會一個深刻動人的故事。藝術劇院的主持者決定把它搬上舞台，準備着跨出他們狹隘的戲院圈子，打入流浪者的世界，實地從下等客棧和下等人物身上去體驗悲慘的氣氛。

俄國戲院革命的一次新的運動開始了。藝術導演的史丹尼斯拉夫斯基 (Stanislavsky) 和編劇家的丹欽科 (Nestorovich-Danchenko) ——他們的工作是在上世紀的九十年代開始的——便是這一運動的創始者和領導者。

丹欽科會描寫過他所看到的舞台。那時候，在上演之前，對伶人介紹劇本內容的預備談話是

沒有的：初次的排演就在舞台上。劇本的藝術內容既無說明，工作的開始只憑大家的一種空洞的體會，每一伶人挾着一本台詞，裏面只有他應說的話和接尾語：「站到桌子旁去說話……」，「此外就沒有什麼了。

當時，伶人的文化是在低潮中，他的設備不好，他的生活低，他的待遇薄。兩次賣座的失敗，準會垮了台。

蘇維埃政府不惜斥資，給予了一切改革的鼓勵。新的佈景和新的服裝，配合了新的劇本。適當的供應，適當的待遇，適當的安全，成了演劇者的權利；廣大觀衆的要求，更增加了鼓舞。

在他們初次可紀念的會見中，史丹尼斯拉夫斯基和丹欽科確定了今天蘇維埃戲院所遵循的路線。這兩人從年青時期起就沉浸於戲劇。史丹尼斯拉夫斯基在他父親的住所中學習了戲劇的初步，他在那裏遇見柯米薩爾齊夫斯基（Komissarzhchvsky）——當時一個著名女伶的父親，並和他討論着把所有藝術混合爲的一種新型劇院的計劃。這討論促成了一個藝術和文學協會的組織，史丹尼斯拉夫斯基由此獲得了演劇者的經驗和導演者的見識。

丹欽科也是從小就愛好戲劇的。他演戲，他寫作，經了一番廣博的教育後，就被公認爲劇評家。瑪雷戲院收受了他的劇本，並由他自任導演。

因了丹欽科的邀約，這兩個人于一八九七年在莫斯科的一家酒店裏會晤。很久以後，史丹尼斯拉夫斯基寫道：「我們討論着我們未來事業的進行，純粹藝術的問題，我們未來的理想，舞台

的道德和技術，組織的計劃，未來劇目的草稿和我們共同的關係，一個討論國家大事的世界會議，怕也未必會有這樣的仔細和精密吧。」

這談話後來又移到史丹尼斯拉夫斯基的鄉間別墅，繼續達十七小時之久，結果就產生了那著名的莫斯科藝術劇院。

在初期的幾年中，史丹尼斯拉夫斯基和丹欽科摸索着並不順利的路。他們要創造一種脫離舊式戲院常軌的戲院，為人民而服務，戲院的票價必須要為那最窮困的智識份子經濟能力所勝任。這需要着補助費。沒有當局肯給津貼。沒有富人肯予援手。丹欽科向一位富有的律師夫人提出他的計畫大綱，結果遭了冷淡的攆斥。丹欽科訴說道：「爲了從契訶夫劇本中創造一種藝術工作的權利，我們不但化了幾年苦功，努力於藝術技能的修養，而且還得在莫洛左瓦（Varvara Morozova）的會客室裏受侮辱……。」

他們終於克服了一切的困難。他們的戰鬥勝利了，契訶夫的「海鷗」（The Seagull）最後演出了。這是卓越的勝利。批評家向來認爲這是一個不適於舞台的單調的劇本，但結果那演出是這樣的動人，連有名的批評家葛魯辛斯基（Gruzinsky）也寫信給契訶夫說：「從第一幕開始，一種異乎尋常的崇高的情緒就吸住了觀眾。……」海鷗成了藝術劇院的象徵；我常常在幕布上看到的它雪白的展開的翅翼，至今仍會使人回憶起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的黃昏，當這藝術劇院在沙俄生活的風浪險惡的大海中開始航行的時候。

當排演高爾基的劇本「夜店」時，藝術劇院採取了俄國所謂現實主義藝術的初期手法。因為這個劇本是描寫流浪者的，它需要着比畫面表現更深刻的表現，自然主義的藝術表現着幕景的表面；現實主義的藝術表現着它的靈魂。演劇者應該不能說「這就是從外面看來相像的東西，」而應該說「這就是它內部的現實；這就是我所經歷的、我所生活的、我所了解的可怕的現實。」這一點，便是新藝術劇院的心理現實主義的真諦，這已達到了廣大的說服。這使得高爾基也寫信回國。這把鬆下革命的泥土。這告訴着大家，生活也許會把人磨折到淪為野獸，人卻依然是一個人。

莫斯科藝術劇院仍保持着嚴肅的質樸，而這也就是蘇維埃藝術家的特點。在俄國藝術家的家裏，是沒有窮極奢侈的浴室、臥室和遊藝的地方的，藝術劇院中沒有豪華的包廂。我在戰後幾年中所看到的第一個劇本，是契訶夫的「三姊妹」。當我走出藝術劇院時，我想起了一位有名的英國女戲劇家在離國前給我提出的問題：「請注意蘇聯的戲院是否退步了。」我現在有了答覆。我自己在這天晚上想定了回答，更加上以後我所看到的一切，我要強調的說：「沒有。」

假如說悲劇只能為一個健全的社會所欣賞，而為腐敗的社會所拒絕，那末，蘇聯確乎表現着非常的健康，因為悲劇正在發展。講到悲劇，藝術劇院充滿了不平凡的技巧。我永不能忘記托爾斯泰的「安娜·卡里琳娜」的演出，那個女人不幸的結局，是由她的社會環境造成的。

丹欽科總是從教育和社會的意義上選擇劇本的，他要使羣衆捨棄服役於財產階級的心理……

促使羣衆用他們自己的頭腦……對於一切有權控制他們的人要發展一種批評的態度。

契訶夫和托爾斯泰的戲劇很適合他的目的。他們用感情寫作，丹欽科則用感情把它們重編。在他的眼中，劇院的任務不是娛樂，而是爲了自由的教育，是恢復人類對於前途、對於以善制惡的最後勝利的信心。

丹欽科知道道德的目的，不能用言辭說明，而必須用巧妙的藝術來表現。這不能一聽就算，必須一聽再聽。

舉一個例，在那「帶着嫁奩的姑娘」(The Girl With The Dowry)的劇本中，丹欽科巧妙地刻劃了一個社會的婦人，自私而腐敗。這戲劇喚起了抗議。沒有道德描寫的藝術，本身就含有更重大的訴諸道德的意味。這種高級的藝術，把日常的穿插、動人的獨白、打諢以至舞台上進出的表演都省却了。

莫斯科藝術劇院仍是自成一格的。

(乙) 瑪蓄戲院

莫斯科國家戲劇班於一八〇六年成立，一八二四年，在莫斯科中心的一座小建築物中開始了活動。第二年，在它旁邊面臨戲院廣場的地方，一座巨型音樂劇院建立了，這是歐洲第二個大劇院，名稱叫做「大的和小的」，俄文稱爲「布爾蕭(Bolsnoi)和瑪蓄(Maly)」。

瑪蓄戲院的徽章是橢圓形的，包括了八幅畫像：四位戲劇家，格力波也道夫(Griboyedov)、

果戈爾、莎士比亞和奧斯托洛夫斯基——他們形成了戲院的基本劇目。另外四位則選自革命前的男女藝員，他們會協助戲院奠定了基礎：莫却洛夫（Pavel Mochalov）史遷普金（Mikhail Shepkin）沙陀夫斯基（Brov Sadovsky）和葉莫洛瓦（Maria Yermolova）。

瑪麗亞·葉莫洛瓦一直活到蘇維埃時代，一九二〇年，當她過了五十歲生日時，她在瑪雷戲院舞台受到列齊的歡迎，他第一次給她冠上了「人民藝術家」的稱號。

瑪雷戲院在本世紀初期原已日趨衰落，但隨着革命又一躍而達到了創辦者願望的高峯。它成了真正的人民戲院，一面重編俄羅斯和外國的古典文學，一面又創造着足以表現蘇維埃人民、蘇維埃力量和生活的新劇本。

瑪雷戲院組織的機構大概是這樣：戲院的工作，它创造性的發展和劇本的選擇，由資格最老的藝員組織委員會管理，並由一位監督主持。工作幹部是大的——現在共有一百六十三個藝員和一千個工作人員。瑪雷學校每年畢業的學生為二十至二十五人。一九四三年的預算達一千萬盧布。它是自給自足的，雖然政府曾指撥了五百萬盧布給它改造大廈。

（C）中央紅軍戲院

新的戲院在舊戲院的旁邊興起來。在一個闊大的廣場上，——不久以前還是曲折迷人的陋巷，現在卻和莫斯科任何廣場一樣的漂亮了——建立了一座巨大的中央紅軍戲院，模式像五點的星。一九千百個觀眾的每一人，都可一覽無餘地看到有着這種機械裝置的舞台，那舞台恰如布爾

蕭舞台一半的大，可以容納千把個人，可以裝置八層樓的大廈，如有必要，也可以變做一輛裝甲的坦克。紅軍戲院是適宜於偉大場面佈景的。可惜我錯過了細細考察小裝置的機會，原來那巨大的舞台也可以很巧妙的縮小，變做小佈景的場面。

描寫像蘇伏洛夫這樣偉大軍事家的戲劇，在這裏很普遍。戰爭增加了蘇聯對於過去的興趣和驕傲，也同樣的對於現在。我在瑪雷戲院中看了「恐怖伊凡」（Ivan the Terrible）。我又在道裏看了史太林格勒之圍，但我對它是大感失望的。它特別強調了陰謀、不誠實和膽怯，儘管含有教育和警告的意義，但就結果來說總覺不大可信。

令人愉快的演出是莎士比亞的「馴悍記」（Taming of the Shrew）。英國的一般幽默，特別是莎士比亞的幽默，在蘇聯很受欣賞。舞台的演出對原著有新穎的解釋。在結局，不但那妻子，就連丈夫和每一個人，似乎都真的被馴伏了。

在「奧塞羅」（Othello）「註」的演出中，也有同樣不拘礙于原著的傾向。奧塞羅這個角色演得很動人，但他已不復是妬嫉的惡人，卻變成一個相信人性而又可憐地幻滅的人了。演這角色的是奧綽席夫（Ostuzhev）他在奧塞羅冷酷的最後的絕望叫喊中，插入了一段個人絕望中的忠實的表现。狄絲第蒙娜是無辜的，人類的忠實永存。

「註」奧塞羅是莎士比亞所著「奧塞羅」小說中的一個主角，他娶狄絲第蒙娜為妻。有人在奧前誣狄不貞，奧憤而殺之，後知其冤，又自殺。——譯者

在較小的卡滿內 (Kameny) 戲院中，我看了帕列斯特「檢查官的來訪」的初次上演，那就是考拉科美斯卡耶和她朋友，化了五天功夫，把它譯編為五幕劇的。蘇聯駐英大使邁斯基夫婦和英國大使等也都在場。戲演得非常好，特別是男演員，博得了熱烈的掌聲。小動作的表演在英國人眼中看來當是古怪可笑的——在一個家庭宴會中的燕尾服，故意張大的聲音，隨便在桌上傳遞的滿瓶葡萄酒，以及顛倒狼籍的喝乾了的酒杯，餘剩的酒滴都灑在地氈上。

(丁) 木偶戲

要檢討蘇聯的戲劇，是非提到奧勃拉卓夫 (Valentine Odrastov) 及其木偶戲不可的。奧勃拉卓夫是一位傑出的藝術家。我一有空總要到他木偶戲院去，那不但為看了兒童觀眾的面孔，而且也是為了看像吉卜林的 (Mowgli) 這樣的戲劇，這是只能在木偶戲院裏表演的，那木偶的狼嗥、虎咆和蛇啦，都活生生地有了真實的生命，跳着、爬着、和蠕動着。再沒有別的方法能夠這麼逼真地表演出森林的景色了：那裝作跳撲姿勢的花斑貓似的巨虎，那令人望而卻走的懶洋洋地蠕動着的蛇，那漂亮的瞪羚，那古怪的豪豬，那好動而饒舌的猴子以及各種靜悄悄地摸索着的或者是吠着吼叫着的動物，這一切，使成年人也和小孩子一樣的看得出了神。

(戊) 電影院

我們在電影院裏消磨了一個愉快的黃昏，那天映的電影叫做「淑雅」(Zoya)，根據一個愛國的劇本改編，劇中的主人公實有其人，一個十八歲的遊擊隊員，莫斯科的女郎，死後被追稱為

「蘇聯的英雄」的。我對這電影加倍的感興趣，因為我白天剛消磨在一個遊擊隊員的家裏，他的兩個年青的女兒，——一個十八歲，一個二十歲——都像淑雅一樣得過英雄的獎章。

〔淑雅〕爲契爾考夫 (Boris Chirkov) 所作，這是一個真實而樸素的劇本，完全現實主義的。我們看到剛生下來的淑雅，醫生在秤着她的體重。我們看到二歲三歲……時的她，她的年齡由父母用鉛筆記錄在門上。她的成長和力量，跟蘇維埃社會本身的成長和力量，平行地表現着。

她生於一九二四年，她最初的印象之一，是偉大的鄧聶伯水閘。她看到蘇維埃的氣球飛行家飛入同溫層，不惜爲了不斷的科學研究喪了生。她歡迎着英勇的北極探險家的回來，她又在體育檢閱的行列中昂首前進。

形成她性格的環境、人物、理想和希望，都技巧地表現了出來：她的母親，她的同學，以至她的日記，乃是故事的真實根據。在崇高的道德、友誼、愛國心和嚴肅的責任感的氣氛中，她成長爲一個堂堂的女人。她的日記記錄着她對於托爾斯泰、莎士比亞、和普式庚的愛好。「一個人是什麼都該美麗的——面容、服裝、靈魂和意志」，她引用契爾考夫的話說。

當淑雅還是一個小孩子在學校的時候，曾有一段動人的回憶。有一名叫鮑利斯的男孩，不許一個「瘦姑娘」坐到他的書桌前。

「站起來」，淑雅沉靜而堅決地說，剛強的眉毛緊蹙着。

鮑利斯動了一動，又拒絕了。

「去，站起來」，淑雅益發堅決地重複了一遍。

那孩子有些窘，向淑雅投一眼，站了起來。淑雅不慌不忙地坐下去。從此他們便成了朋友。而且還不止此，淑雅舉起她的嘴唇碰上了他的，接了最初也是最後的一吻。

然後是酷刑的場面，倒並非完全是恐怖的堆砌，而是恰到好處地表現了出來。淑雅痛楚的腦海裏回憶着她簡單生活中可紀念的事情：她聽到她母親的「……：到死也要爲了別人幸福……」的聲音。她受到這「聲音」的鼓勵，拒絕出賣她的朋友，死了。

她站在絞臺上，用清晰的聲音對那被迫替她受刑作證的農民叫喊着：「爲什麼垂頭喪氣啊。一切事情到最後總會成功的。我不怕死。」

當劊子手移去她立腳的絞臺時，她高呼着：「同志們：要勇敢。打回去。打倒德國人……：我們是要勝利的，」最後又說：「再會吧，同志們。史太林要來了。」

(己) 俄羅斯舞蹈

俄羅斯的舞蹈當然是傑出的，這自從一百五十年前在列寧格勒首創舞蹈以來，就一直如此。在莫斯科的舞蹈是第一流的，在列寧格勒可以看到它的登峯造極。這很難說我究竟對那一方面特別歡喜些，假使要保持公正：我簡直不敢信任自己把它寫下來。烏拉諾娃 (Ulanova) 的「基薩爾」(Giselle) 舞，是凌駕一切的，我從未看到這樣的通過舞蹈動作的感情的表現。

列寧格勒的著名舞孃賽繆諾伐 (Selyonova)，年齡較大，身體的柔軟也較差；但她的技術

是無法批評的。

我在社交場合中曾見到這兩位女人和她們的丈夫。烏拉諾夫的丈夫驟然看來很易被錯認為英國的西門爵士 (Sir John Simon)。他是大名鼎鼎的編劇家。這兩位女藝人在一下舞台之後，都很樸實而毫不驕傲。賽繆諾伐很愛她的家和她的孩子們。

六 文學

在俄羅斯戲劇的後面是俄羅斯的文學。書籍是蘇聯文化生活的基礎。書籍富有創造性。書籍把思想傳佈到每個人的心靈，激勵着行動。因此，蘇聯對書籍的特別重視是正確的，她擁有着書籍的豐富遺產，特別是充滿着愛自由愛平等的感情的書籍。

當一八五五年到一八九四年的混亂時期，俄國正努力於農奴解放的鬥爭，那時候，詩歌和文學照明了社會的漫漫長夜中的黑暗。普式庚、萊門托夫、果戈爾、屠格涅夫、陀斯妥也夫斯基、契訶夫、托爾斯泰和高爾基的豐富思想和革命精神，喚醒了人民的自覺，並且替自由和社會主義的先驅者鋪好了泥土：乞爾尼雪夫斯基 (Chernyshevsky)、赫爾岑、巴枯寧、樸列哈諾夫和列寧。

遠在尼古拉一世殘酷黑暗的時代，詩人普式庚和萊門托夫，就已和「俄國狄更司」的高爾基一起，表示了他們對道德正義的信心，對荒淫與無恥的痛罵，以及對專制統治的憎恨。他們用無

上的藝術激動了俄國的良心，他們點燃了火花，後來屠格涅夫更把它發揚為光錄，特別是在他「父與子」的虛無主義者身上，對專制統治的反叛，已開始採取了絕對的形式。

詩人涅克拉索夫（Nekrasov）痛責俄國當時的生活，陀斯妥以夫斯基則以其無比的小說，解釋俄羅斯的精神，一八四九年，他險些兒以進歩份子的罪名遭了毒手。

文學批評家勃林斯基（Belinsky）成了那包括赫爾岑和巴枯寧在內的集團的中心，他和烏克蘭的殉難詩人雪夫欽柯（Shevchenko）一同高擎了火炬，並且在革命以前的最後一圈中，灑給了契訶夫、托爾斯泰和高爾基。

人民的政治覺醒現在已經廣泛地喚起了，俄國的變革已經成熟。自由和社會主義的先驅者策劃着進程。王子克魯泡特金擁護着農民；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號召人民用武裝來奪取生產手段。赫爾岑和庇脫拉雪夫斯基（Petrashevsky）在思想的領域中，撲列哈諾夫在宣傳的領域中，給俄國打開了引入馬克思社會主義的大門。隨着時間的行進，那叛亂的時期並不長。一張早期的畫像把托爾斯泰契訶夫和高爾基描繪成一個集團，他們聯合的生活和工作，構成了從專制反動時期通往社會主義勝利的橋樑。

要我們西方人對革命時期以後的俄國文學來作一公正的估價，似乎還早。我們和它站得太近，而我們不同世界的全部生活方式，又相去太遠了。但是若干特點和傾向是可以指出的。第一點，蘇聯曾經有，現在仍然有一種把文藝家限於太狹隘的領域的傾向。總是對他說：「這個或那

個，是你應該做或不應該做的」。確定他的範圍和他的表現：在緊急的時候常常這麼做。表現的絕對自由當然不可能；這甚至是非所希望的。例如某些簡短的字句，從不在公衆前面高喊，或印在紙上。法律不許可。更重要的，是公衆的意見和感情也同樣的不許可。

我們是否覺得太拘束呢？當然不。且把這原則略略引伸一下。在戰爭時期，意見表現要受當局和公衆意見的較大限制。當社會緊張或動盪的時候也是如此。在一個特殊的時期中，任何違反一個民族的主要願望和目標的一切，都可由當局限制，並受公衆輿論指斥爲不良的方式。文藝家對這大概都同意。

這是文藝家在革命初期的大概情形。在今天，國家受了戰爭可怕的創傷，大量的人們在長期離家之後，在眼看德國人溫暖舒適的家之後，重又歸來，這種情形也多少是存在的。當局可能通過它所管制的機構，對於情緒表現加以相當的限制。

記住了這點，我們可以轉而檢討現代蘇聯的文學，並試作大略的分析。我們可以同意蘇聯人的見解，以爲真正的完全的藝術家，必須具有雙重的目標。他們描寫。他們也創造。在一方面，他們描寫那呈現於他們眼前的現實。在另一方面，他們應該根據他們所生活的社會中的累積的經驗，什麼是有價值的，什麼是道德的，然後把那「是這樣的」(What it is)改造爲「應該這樣的」(What Ought to be)。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要把兩者混合起來顯然是難的，我們看到文藝家的傾向，不外乎兩派：

有些人只描寫「是這樣的」事物，卻把「應該這樣的」丟在一邊。另外一些人則描寫「應該這樣的」烏托邦式的圖畫，而和現實很少或甚至沒有關係。

這兩者他們都自稱為寫實主義者。第一派用生動的經驗來表現，着重於原來的事實，並抉出它們內在的本質；第二派則是超越了現在的缺點，着眼於永久的無變動的現實。

一派只是悲劇地描寫了事實；此外便沒有什麼了。它的影響是不能忍受的鬱抑。另一派是浪漫主義的：它的影響是一種任性的興奮。兩者都不能使我們得益。一則不想促進變革。一則不能促進變革，因為缺乏與現實的聯繫。

然而，在一個理想已經成長，而且不斷進向具體的現實的社會中，那描寫的藝術與變革的藝術的結合，就能臻於完備，而不致破壞文學的自由。今天蘇維埃的文藝，確乎就是這樣的。蘇維埃的文藝含有教育的意義，它的目的在教育，不僅僅在暴露。蘇維埃的藝術家，是被稱為建設的工程師的。這樣是否不好的呢？具有一種目的的文學，是否就是不好的文學呢？是的，假如歷史本身沒有目的。不是的，假如歷史本身具 着目的。

總之，真正偉大的文學何嘗缺少目的？即使藝術家所努力的僅在描寫客觀存在的事物，他也不能免於含有主觀的目的，雖然這目的是不自覺的，和無意中表露的。因為對於看到的和描寫的事物不加批評，那等於是對於自在的事物，表示了默許容忍和滿足的被動的目的。

再把蘇維埃的理論深入引伸一下。假如用一種觀點來代替純粹客觀描寫的或主觀感情的藝

術，真要算不得是真正藝術的話，那末，自伯拉圖以來的世界最偉大的藝術家，便一個也不是藝術家了。

好的藝術常常總是強烈地含有目的，而且比冷觀的平鋪直敘的散文更為有效，因為它能深入人心：「包含在一篇故事中的真理能收潛移默化之功。」孩子們從「辛德萊拉」(Cinderella)「註」一類故事中擷取教訓，成人則讀「奧塞羅」一類故事。問題是在於形式。形式是藝術家把他的主張打入讀者心坎的武器。

蘇維埃文學生在新的泥土上。蘇維埃文學跟別國文學的不同，就因為它處在一種新的環境，一種社會主義的環境；而在新的社會主義的環境中，以前一向不可能的事情，現在都成為可能了。

在一個理想不復是空洞的夢的社會中；在那裏，理想已形成了實體，表現於具體的方式；在那裏，我們不但親眼看到了一個不再有為利潤動機而勞動的、不再有人剝削人的世界，而且也面臨着、和生活在一個業已發生變革的社會，因此就可能現實地描寫是這樣的世界，而同時又理想地描寫「應該這樣」的世界。

在蘇聯，社會是實際地不斷地在變動。社會主義的理想在實現的過程中。寫實主義和理想主義
[註]著名童話中的美麗的女主人公。

義的作品在這裏相交而且結合了。至於我們在西方的毫無生氣的寫實主義，——這只能寄望於將來，——只是充滿了醜態的現實的暴露，根本沒有信心或希望。據我們在這裏所知，比較樂觀的作品是被斥為一廂情願的思想的。跟那些毫無生氣的寫實主義者相反的，則是虛無縹渺的理想主義者，他們不滿於世界的現實，把可能的世界織成美麗的故事；但他們純粹是烏托邦的幻想，根本與現實的世界無關。

社會主義時期以前的偉大作家，像果戈爾和契訶夫，都是寫實主義者，但他們的寫實主義不是妥協的寫實主義。那是充滿反叛熱情的寫實主義。當他們從現社會攝取灰色的圖畫時，他們總是說：「這就是現實的一切：起來反叛它。」

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又比這進了一步。在新的社會主義的秩序中，權力屬於理想的一面，社會本身就是反對剝削、鼓勵合作的，因此，藝術家可以描寫那些努力於完成新秩序的男女的生活故事。他們所描寫的事物已成了他們周圍具體的真實。他們描寫着真正的男人和女人。

但除此之外，他們既用藝術來描寫，自然也得略略加些藝術的渲染；他們的描寫，密切接觸現實是顯然的，但同時也指示着更高的方向。

這樣的作品富有創造性。它激發人們應該過更崇高更有意義的生活。它鼓勵着行動。這樣的作品不但在描寫社會，也改造社會。這就是爲什麼史太林稱藝術家爲「心靈的工程師」。

新型的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在革命的早期就開始了：高爾基首先把它灌注在他的小說「母

親」中，他的英雄的精神成長，是經過無產階級鬥爭的初期階段而發展的。

高爾基能够賦予這一鬥爭以實質的形式，那只因爲他周圍的人們確是生活在這一鬥爭中；這些人們都是獻身於新的社會主義秩序的建設。他也能給他的作品以有效的形式。它含着有意的目的，並且確乎在讀者中間完成了這目的。它安排了男的女的都從事勞動，猶如斯默爾（Samuel Smiles）書中工作的角色一樣，不過具有着更崇高的目標。

例如在奧斯脫洛夫斯基的「鋼鐵怎樣鍊成鋼」一書中，工作和發明的熱情的強烈，並不亞於那驅使史蒂芬孫把蒸氣機應用於運輸的熱情；但那目標——人和人的結合——卻更崇高而偉大。奧斯脫洛夫斯基看到了這理想，然後藉他的藝術來表現。

蘇聯的作家不爲那渴望聰明和機智的人們而寫作。他們爲普通的人民而寫作。他們用地方的語言寫，字眼都是日常的口語。他們的英雄是男男女女的平民，而並非無聊的上層階級的智識份子——他們是阻礙新秩序的整個生活激流的。他們的英雄是在激流之中，並引導着它向前流。自然，他們的故事，常常也就是他們自己生活通過藝術表現的複寫：蘇維埃作家自己就處在激流中，並且是瞭解的。

也許就在這裏，存在着和我國戰時作家，特別是詩人的最大的一個區別。許多現代的詩歌，和若干現代繪畫的藝術，都有一種對人民越離越遠的傾向，他們甚至故意的矯揉造作，採用大眾所不瞭解的風格和字句，以及故意的賣弄艱澀，可是批評家卻反認爲是聰明而深刻的。

偉大的藝術決非如此。當一個人燃燒着一種熱情，一種真理，一種體驗時，他內心中總有什麼東西，促使他把這傳達給人類兄弟來共享。正如蕭伯納論到「以賽亞書」所指出的，這一種熱烈的感情和促使發表的動機，創造了藝術。

太多的現代的西方詩人，孳孳努力於他們所沒有的創造力，總是不能產生偉大的藝術。這也許就是他們名字不為廣大羣衆所熟悉的原因——這與維多利亞時代的情形差得多遠啊，那時候，偉大作家的名字，無論小說家如狄更司，詩人如白朗寧和丹尼遜，都是家喻戶曉的。他們說着而且努力說着地方的語言。

這無疑是蘇維埃作家的目標。不做到這點，脫離民衆，輕視他們的語言和感情，是要引起蘇維埃批評家的指責的：一個不斷進修的無產者本身就是批評家。

這種文化修養的程度，可從蘇聯對文學的迫切要求看出來，也可從那供應這種需要的書籍的大量出版看出來。

現在，蘇聯正連年累月地展開着關於文學和戲劇的熱烈討論，討論到已有的成就，現在的趨勢和危機，許多作家、批評家、羣衆和當局都參加着。主要是田作家、讀者和批評家檢討他們的作品，抉發它的缺點，計劃它的改進，和澄清它的理論。這一討論是由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動的。他們絕不如希特勒的做法，離開羣衆的意見和討論，來決定問題和執行判斷。他們不施行新聞檢查。他們不強迫。書籍、戲劇、和電影都允許有自由，猶如批評也一樣有自由。討論和批評

之前先予公開。這絕不是全體主義政權嚴格管制的問題。就我們的觀點看來，這是最完善的辦法。

舉一個在英國所討論的例子，如左琴科 (Zoshchenko) 的著作，並未被禁止：它只是廣泛地嚴厲地受着批評。在作家們自己主持之下，坦白、誠懇、一無顧忌地進行着討論，他們也在追求着文學界的新運動。批評左琴科的「在太陽上昇以前」的論文，發表於一九四四年一月，這篇文章指出他的作品完全漠視了人民的感情。他固執自己的偏見，忘記了他是生活在社會裏。他從過去的感情激動的回憶中找安慰。他敘述到六十二次的淫奔。他描寫一個垂死的老人的荒淫。他舉的都是不值一說的庸俗的例子。

這位批評家奇怪，怎麼一位列寧格勒的作家，面臨着人民無名英雄奮不顧身的保衛這個城市的鬥爭，竟除了寫些不值得回憶的，最好把它忘記的事情之外，就沒有更好的題材，而這位作家，居然還站在我們的文壇上。當左琴科初次這樣寫的時候，大家還以為他不過是在描寫這垂死的舊世界中瑣細、可恥和無望，他的正面戰鬥的英雄也許還在等待較好的時間。但現在明白了，左琴科描寫的人物總是這一種的性格——對人是冷淡、憂鬱、自傲、目空一切和瞧不起婦女。

尤其使人民和批評家憤怒的是，左琴科還描寫着遼遠的平靜的阿爾瑪·阿太 (Alma-Ata) 的沒有價值的故事，在那裏，從未發生過槍林彈雨的戰事。列寧格勒的人民，覺得有這樣的一個

作家爲可恥，因爲他以前也是他們中間一同工作者之一呢。

戰爭破壞了蘇聯平常的生活。作家星散了。有的在前線，用他們的筆來幫助他們的祖國和正義；有的撤退到安全的地帶；有的則仍留着忍受着難以形容的艱苦。列寧格勒是蘇聯主要的文化區域，它在長期蹂躪的重圍中遭到的創傷特別重，作家聯盟會員以及其餘的人們，不得不忙於注意最起碼的生存的需求。平常的水準低落了。文學界的無政府狀態發生了。接着又來了爲藝術而藝術的傾向。

蘇維埃作家們號召停止這種傾向，並要求來一次再出發。蘇維埃作家們再一次要求作品必須要有表演他們國家性格的價值，作家應該能夠鼓勵人們努力戰後的工作。他們認爲左琴科公開蔑視了蘇維埃生活的方式，實是放棄了作爲作家聯盟會員的權利。但他並未遭放逐，也未被送到集中營。最大不了的事情不過是，他的作品不能出版了，因爲引起憤慨的不僅是當局，而且還有人民和作家們自己。忿然的抗議激起了，但這一抗議的對象，不是那個曾經作爲動人幽默的作家的左琴科，而是那個現在灌輸着冷笑的醜態的瑣屑細事的左琴科。

要瞭解和體會蘇維埃人民所看到的形勢，我們必須記住，我們有許多所謂自由，在蘇聯是被稱爲放縱的，在蘇聯，一般都接受了共產主義的信念，恰如我們接受了現代的科學。羣衆對於共產主義的信念，不會比我們對於外科手術的防腐劑，提出更多的問題。共產黨認爲促使藝術家回復他們的信心是對的，這完全和勸告一個不肯用防腐劑的外科醫生一樣。他們的抗議是用批評和

說服，而不是把藝術家送到西伯利亞去。蘇維埃文學界的人士對於這種批評絕不怨恨。我們在實際上所看到的，是整個文學界在努力的整頓。全國的人民，對於那些明知惡劣的作品而不加抗議的文學家的隨便態度是憎恨的。

這次的反應，以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的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決議達到了高峯，這個決議表示了它對於列寧格勒的主要文學刊物的嚴重關切，它說明列寧格勒是英雄的城市，向來以進步的文化出名，而現在主要的文學刊物，竟如此嚴重地脫離了蘇維埃人民的生活，並且忘記了文學在蘇維埃國家中的教育的任務。這決議又強調指出蘇維埃文學的任務，是在協助教育人民——特別是青年，和解答他們的問題。它主要的作用，應該鼓勵人民堅持主義的勇氣和信念，增強他們克服重建中的一切障礙的決心。蘇維埃作家聯盟執行委員會因不能盡責維持他們刊物最高的水準而遭到指責。

列寧格勒作家們用誠懇地從事於文學工作崇高目標的努力，答覆了這次的策勵。他們對所謂「純粹」藝術宣了戰，號召有原則的批評，並重行促進作家和廣大的勞動人民層的聯繫。

接着來了總清算：「蘇維埃作家聯盟主席團」通過一個決議，內容包括檢查若干刊物，蘇維埃作家俱樂部，許多專寫「空洞的鱗口作品」的作家，電影脚本作家尼林（Nelina），以及其他若干戲劇家，他們所寫的劇本，「表現着政治上的中立，對於根本重大課題的處理，都是表面的、浮泛的。」

蘇維埃作家聯盟本身受到了嚴厲的責備，因為它忘記文學乃是教育蘇維埃人民的任務中一種有力的武器；因為它通過了不健全的作品而不加指摘，因為它讓帕斯脫那克（Pasternaks）的那樣毫無內容的詩，竟能不成問題的廣泛流行。

主席團所決定應該進行的主要工作是這樣的：號召作家注意現在的主題；注意復興中的英勇勞動的題材；引導作家們對於黨在國內和國際生活的基本問題上的政策，作系統的宣揚；鼓勵積極戰鬥的精神，和共產主義戰鬥的意識；矯正那反映腐敗的西歐傾向的作品，和取締粗製濫造的作品。

這一切，我們會不期而然地憑我們自己的文學標準，憑我們自己對於藝術家的作用和責任的概念來判斷。凡是像標語製造者似的直接對羣衆和工廬服務的藝術家，是否就在那些僅憑自己的主觀幻想的藝術家之下呢？藝術家究竟應被視爲社會中負責的一員，抑或是他自己意見的法律？藝術的作用是否完全與政治無關呢？現代的藝術家，是否決不應是革命的變革的預言者，如像伯拉圖、但丁、莎士比亞、密爾頓、西萬提斯、史惠夫特、狄福、或托爾斯泰，或更顯著的如聖經中的作家，他們都毫無疑問地，是這樣的預言者？

在蘇聯，人民是這樣密切地交織和熔合成了一個統一體，那是這裏從不知道的，因此，他們對於藝術自由的全部遠景，正如經濟自由一樣，就根本和我們的不同。在這裏，富人所要求的任意所爲的自由，在蘇聯被稱爲放縱；同樣地，任自己的意思寫作的自由在蘇聯也被稱爲放縱，而

受到嚴厲的批評。

在莫斯科的一座舊式白柱的大廈，便是全聯邦的出版局，蘇聯每一本出版的書籍和小冊子都是從這裏刊行的。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四六年之間，蘇聯會出版了三十八萬六千種的書籍和小冊子，印數共一百零三萬萬二千九百萬份。普式庚的著作用七十六種語言出版了三千二百七十四萬九千份；高爾基的著作六十六種語言，四千三百萬份；托爾斯泰的著作六十種語言，二千五百萬份；莎士比亞的著作二十種語言，一千六百萬零五千份。一九四六年出版書籍的總額比一九四五年增加了百分之五七·八，而在一九四七年，將用五十種語言出版四萬萬三千萬冊的書籍。

七 蘇聯的宗教制度

鑒於精密研究蘇聯的宗教制度問題的重要性，我設法和若干宗教團體的首腦去會面，首先接觸的自然是莫斯科和全俄的總主教亞力克綏，他是蘇聯最大的宗教團體——俄國東正教會的領袖。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我們是在勝利日那天，經他邀約我到總主教府會面的。我在這天以及後來別的機會，也曾晤見了卡波夫（George Karпов），東正教會事務委員會的主席。

我從這幾位以及別人方面所得到的知識，看到了一幅革命以後時期的俄國教會明確的圖畫。但要瞭解真相，我們更需要一些俄國教會歷史的知識。

當最早的時期，東正教至少在原意上是一種純粹宗教性的獨立的制度，它存在於國家之內；它的俗界領袖是大公（Prince），後來為沙皇。主教領導下的教會，和沙皇統治下的政府，保持着平衡的對抗。彼得大帝打破了這一調和的關係，取消教會的獨立地位，而把它改組為一個神聖的宗教會議（Holy Synod），參加的會員均可由沙皇任免。教會俗世化了，它的事務由政府宗教事務部掌管，教會的首領相當於一個內閣閣員的地位，主教和教士均由政府付給薪金。東正教會實際上成了政府的一個部門。教會為國家所吸收。因此，當沙皇政府崩潰時，教會也隨着崩潰了。

現在，這種情勢又反了過來。教會重行回復到初期的快樂的地位，在國家之內保持着獨立。在蘇聯，國家和教會自始就是分開的。但初期的關係並不愉快。賽吉斯（Serghius）大主教在他的一篇論文中說得很對：「從一九一七年蘇維埃政權建立的時候起，蘇維埃的秩序和憲法就保證所有公民的信仰自由，那是普遍遵守的法律。」但磨擦的緊張是有的。當我和史太林討論俄國宗教時，他這樣說：「教會起先是仇視國家的，它拒絕繳稅。因之國家不得不行動。」

「固然，」他又說，「雙方是有過感情上的緊張的。但現在卻是兩樣了。教會看到了政府的愛國心。政府看到了教會的愛國心。以前的緊張已經消失了。」

感情上的緊張是真的，但蘇聯的敵人卻把這過份的誇張了。賽吉斯大主教在他最近死前出版的一本書中，曾說過這樣的話：「俄國東正教的敵人造謠說，布爾雪維克黨人曾經在烏克湯姆斯

克主教 (Andrei Utkomsky) 旅行時候把他逮捕並且槍斃了。但這位主教至今依然健在，還有說西蒙主教 (Simons of Ostrog) 受過酷刑，也一樣是謠言。」

一九四三年，史太林邀請由三位東正教主教組成的委員會，到克里姆林宮和他與莫洛托夫討論東正教會與政府的關係。這次會議在友好的精神中舉行，結果官方贊成東正教會召集一次主教會議，以建立一個「神聖的宗教會議」，由此選出總主教；教會方面也接受並且歡迎由政府設立教會事務部，以節制這宗教會議。神學研究機關和牧師學校獲許創辦，「莫斯科教會雜誌」(Journal of the Moscow Patriarchate) 也獲許每月刊行。

主教會議召開了，列寧格勒大主教亞力克緞被一致選為莫斯科和全俄總主教，於二月四日在復活教堂 (Cathedral of the Resurrection) 就職。亞力克緞生於一八七七年，曾在莫斯科大學法律部和神學院畢業。一九二六年，他任諾伏哥洛特 (Novgorod) 主教。一九三三年，被任為列寧格勒大主教，曾在該城經歷了敵人九百天的圍困。他組織教士和信徒到前線擔任救護的工作，他因此獲得了保衛列寧格勒的獎章。一九四六年秋天，他因在戰爭中為國服役有功，又獲得了「勞動的旗幟」的最高獎章。

在他就職之前，卡波夫對各主教致歡迎詞時曾作了這樣重要而明白的聲明：「在蘇聯人民委員會之下的俄羅斯東正教會事務委員會，是經政府決議成立的，它使政府和莫斯科及全俄總主教之間，在那需要政府決定的問題上維持了密切的接觸。」

「這個委員會以絕不干涉教會內部事務爲原則，它推進着教會與國家的平常關係，並督促及時而正確的執行政府對於俄國東正教會的法律和決定。」

教會事務委員會的指定是需要詳細瞭解的。這很容易引起嚴重的誤解。這個委員會絕無意於拘束教會的內部事務。它決不過問教義上的問題或事情，這是嚴格地屬於教士的。俄羅斯的教會並沒有變成了「國家全能主義」（Ertastian）的教會。這個委員會的成立，惟一目的是爲了適應社會主義經濟的要求，因爲在社會主義經濟的社會中，一切的投資、建築物和土地，都爲國家或人民所信賴的合作社所有。在蘇聯，任何個人或機關，都不能靠不勞而獲的收入過活。教會不能有它自己名義的財產：教士們都必須靠現行工作或服務等所得的報酬來維持生活。教會的房屋是租借的，捐稅免除，但必須保持完善的狀態。

又因爲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一切生產和分配都在國家管制下，必須適合總的計劃，因此，所有建築、法衣和裝飾用的物料，所有印刷用的紙張，以至所有電燈電熱和電力，都必須在國家預算中有規定，否則就不能得到。除了若干共同的措施外，混亂當然是有的，不過他們確乎在避免這種混亂，規定教會物質需要的供應，不干涉教會精神的和內部的事情，更絕不統制教會的教義。除此之外，東正教會事務委員會在卡波夫的領導之下，還在全國各地建立着分會。

例如教會想在莫斯科和薩拉托夫（Sarátov）創辦神學校。委員會考慮了這需要，並提出建議。政府命令地方當局予以必要的便利。

教會希望在從列寧格勒到教德薩的各大城市中，建立訓練的中心，已經獲得了許可。四百個教士不久就開始了訓練，在一九四五年，有四百座新教堂開辦了。現有的修道院共有八十九個。許多訓練下級教士的牧師學校正在設立着。在早期的時候，由父母之外的人士向兒童傳教，或由一教士向若干人傳教是禁止的，但這種禁令現在取消了。卡波夫說，隨便多少的孩子，儘可以集合起來受宗教的指示。聖經、祈禱書和一般宗教書籍的印刷和傳佈，本來是禁止的，現在禁令也已開放，教會已明白地獲許可以定印任何數量的新舊約、祈禱書和一般禱告的書籍，只要把所需的數量呈報分配的當局好了。宗教書籍的流行是絲毫不受禁止的。

當我到列寧格勒大禮拜堂的西南圍牆上的小室中去拜訪列寧格勒大主教格雷哥里的時候，我率直地問他，倘如需要，教會儘可印行聖經是否是真的；他拿出一本新約聖經來，指點着出版的時間和地點，一九二二年列寧格勒。至少這時候是自由的。現在又告恢復了。還有關於佈道和宣教的禁令現在也撤銷了。這情形和向兒童傳教的情形是相同的，卡波夫說，「除了那些有意煽惑蘇聯每一守秩序的公民的人們之外，牧師們儘能從事佈道的工作而不受阻礙。」

有一張影片，攝製了新任總主教的選舉和就職的每一鏡頭，這正宣示着政府對於教會表示它的友誼態度的誠懇願望。

★

★

★

★

然而，在蘇聯，教會和國家的同情協調的聯繫不是單面的。教會對國家採取了同情的態度，

一如國家對教會採取了同情的態度。

我會問賽吉斯：「教會內部是否發生了任何的變化？」他答道：「自然囉。東正教會的信徒，已不再從『迫害』的角度，而是從使徒時代的回復的角度來解釋蘇維埃的變革了。」

亞力克緞也抱同樣的見解。

「共產主義，」他說，「除了它唯物主義和無神論的學說之外，是很可為東正教接受的。修道院便是建立在共產主義的基礎上。」

就歷史的久遠言，俄國東正教是蘇聯惟一最大的宗教。但別的宗教團體也存在着，浸禮教派和低教會派 (Evangelical Christians)，——現在據說有教徒三百萬人，猶太教，亞美尼亞和喬治亞的美以美派監督教會 (Episcopal Church) 以及亞細亞的回教。我都訪問過。我和每一教派的領袖接觸過。

浸禮教派和別的教育派，較之東正教會受到了更大的苦難。浸禮教派運動的開始，早在上世紀的後期，它雖在沙皇的迫害之下，仍達到了巨大的發展。它分為兩組，只在名義和起源方面是不同的，現在已在「浸禮教派和低教會派聯盟」的名稱下聯合起來了。

它和舊秩序沒有密切的聯繫，也未像東正教那樣的表現了保護舊秩序的傾向，因之在早期，當高級當局採取分而治之政策的時候，浸禮教徒受到了國家諒解的待遇。就浸禮教徒方面說，它

歡迎教會和國家分開，從而享有不但限於信仰而且也包括宗教宣傳和集會的新自由。聖經可以印行。莫斯科浸禮教會中的聖經上印着「一九二六年列齊格勒」字樣；聖經索引則印着一九二八年。政府規定學校應與宗教隔離，禁止任何學校的年在十八歲以下的學生履行宗教的教條，但離開了學校，兒童們仍被允許參加宗教的禮拜，這也就彌補了缺陷。

由於厭戰結果的和平主義的爆發，造成了形勢的複雜化，因為在當時，國防的紅軍正在組織中。還在危急關頭顯然有沉默阻礙的意味，許多青年浸禮教徒槍斃了。於是又來了補救：兩組的教徒排斥着和平主義；國家方面則仍承認合理的反對是許可的。

當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冬天，集體農場正在形成過程的時候，新的糾紛又發生了。浸禮教徒想由他們自己組織集體農場的天然慾望，引起了誤解，結果產生了一九二九年的取締令，認為現存的宗教團體只能具有一個目的：履行宗教的儀式。文化和經濟的活動，兒童的祈禱，以及聖經的集會研究都被取締了。聖經的印行也禁止了。

自然，倘如我們記得浸禮教徒和西方改良基督教許多相同的地方是在於最着重教義和思想，而並不像東正教的最着重於宗教的儀式——顯然地，東正教有祭壇而無教壇，極端派的新教有教壇而無祭壇——，那末可知浸禮教徒是主要的犧牲者。幸而這些限制逐步取消了。現在，倘如需要，學校中的宗教課是許可的。

我在莫斯科訪問了浸禮教徒，某一星期日的早晨，在一個三百年老的教堂中，我參加了他們

兩小時的祈禱，這教堂在瑪里·布梭爾斯基街上，還是德國改革新教派（Reformed Church）在一七〇〇年那年重建的，後來蘇維埃當局於一九二三年撥給了浸禮教會。在這個簡樸莊嚴的教堂中，我會見了齊達科夫（Jacob Zhidkov），全蘇浸禮教會和福音教會聯合會的主席。

祈禱的教衆虔誠地密集着，那天適逢爲戰時孤兒祈禱的月會。說教簡單、誠懇而動人。充滿感情的讚美詩歌唱着，完全是熟悉的英美佈福音者的調子。

齊達科夫，一個瘦削的高個子，莊嚴而清瘦，他誠摯的面孔上覆着濃密的黃赤色的頭髮，穿了一件黑羊駝絨的「傑克」（Jacket）。他出生於史太林格勒——當時叫做察里欽——的中下階級，當沙皇時代，會充任英美聖經協會的代理人。他有五個孩子，三個在戰爭中死了；都是努力作戰而死的。他的妻子曾在學校裏教書。他的女兒曾在史太林工廠裏做工。一個兒子就是在德國議會大廈插上紅旗的，另一個則是降落在匈牙利的傘兵。第三個兒子最近獲得了記功和獎章，並當選爲地方共產黨的委員。他的父親對此很驕傲。

齊達科夫認爲，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浸禮教會和福音教會已享到了革命以前所未有的宗教平等的權利。浸禮教會確乎是最小的宗教團體，但它現在所得到的待遇，是正和那規模大得多的俄國東正教一樣的，這是以前從來未有的事情。

後來，那天一同參加禮拜的我的一位朋友問他：「從什麼時候開始，你能像我今天在這裏所看到這樣自由的佈道？」齊達科夫答道：「我是一九〇三年受洗禮的，五年以後就開始佈道，從

那時候起，我一直在自由佈道。「我的朋友似乎不相信他的耳朵，於是又問：「那末你在革命時期和革命不久以後也能自由佈道嗎？」這倒使齊達諾夫有些爲難，他笑着，說：「當然。」

講到「主日學校」的制度，齊達科夫說，這裏在革命以前就沒有的：每一母親都慣於給兒童們以教義的指示，每一母親確在這樣做。「你們的主日學校，」齊達科夫說，「純粹是英美的制度。」

波良斯基 (Ivan Vassilievich Poljanski) 負責「宗教禮拜事務委員會」，協助着各宗教團體，猶如卡波夫之於東正教會的協助。他這一部門所掌管的事務，包括了亞美尼亞教會、喬治亞教會、天主教、希臘正教、路德教派、猶太教、回教、佛教以至浸禮教派。

「不但，」齊達科夫說，「我們在工作中毫未遭到阻礙，我們而且還能得到補助，俾使教會工作免費的推行：保持他們的熱情，和指導他們乃是我們唯一的責任。甚至在戰爭最艱苦的時期，我們莫斯科浸禮教會也從不缺乏燃料的。大家可以自由參加我們的集會。我們有權佈道。我們可以印行新書。我們可以替我們的教士創設訓練班。在沙皇時代，這種訓練班只允許開設一班，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我們於一九二四年就在列寧格勒開設了兩班，學生三百人，在莫斯科也有一班。」

「在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八年，我們誠然受到過壓迫，曾向全世界的浸禮教徒發出了呼籲。但這樣的日子已經過去了。我們現在很愉快地和蘇維埃當局一起工作着，跟他們一同担負了重建

與和平的任務。」

這個浸禮教會和福音教會聯盟是異常活躍的。一位常川的代表駐在基輔，以「大長老」（Elder Presbyter）的教銜，統轄了卡科夫、波爾太伐（Poltava）、敖德薩以及其他城市的十個「長老」（Elders），並替返城的公民組織禮拜會，和安排他們祈禱的教堂。另一位大長老指導着從白俄羅斯到明斯克區域的活動，其餘的幾位則駐在北高加索、塔什干和亞洲的阿爾瑪阿太。

猶太人在蘇聯的人數不多，我曾訪問過蘇維埃猶太教會的「拉比」（Rabbi）猶太教的大法師）。他讓我去看了猶太教的禱告所，現在設着一座古代的猶太圖書館。他列舉了蘇維埃當局給予猶太教徒的物質資助，如購買新書的圖書館經費；建造新的浴室以供祈禱前的沐浴之用。

在這個「宗教虐殺」的發源地，反猶已成了過去的事情。反猶運動再度爆發的傳說是假的；十足是假的。在烏克蘭，殺害了全部猶太人的是德國人；在敖德薩，蘇維埃知道了猶太人在德國人手裏將遭到的待遇，就儘先地把猶太人從敖德薩和其他受威脅的城市向東移。

爲了調查宗教的概況和別的資料，我遠遠越出了俄羅斯的本部，也越出了俄羅斯東正教的範圍。我訪問了亞美尼亞、喬治亞和亞細亞。

我在莫斯科時，得知有十六國代表——這時土耳其正虐殺教徒，驅逐大批亞美尼亞人——將於六月中，在亞美尼亞的宗教中心伊契米亞琴（Echmiadzin）開會，選舉新的教長，我便決定

去訪問亞美尼亞。莫斯科派了飛機送我去，我在那裏跟亞美尼亞的人民和教會，有了兩星期密切的接觸。

蘇維埃秩序光明而愉快的反映，也許莫過於那以前的落後民族之間了。窮困的亞美尼亞，一躍而成爲新生活的、繁榮的、文化發達的驕傲的民族。關於這次訪問和選舉的情形，我將在下面另一章中加以詳細的敘述。我在這裏要寫的僅是那位新選出的七十五歲的教長，他驕傲地佩帶着「保衛高加索」的獎章，最近剛和史太林元帥在兩小時的長談中，詳細擬定了教會的新協約，史太林還親筆在草稿旁邊加着批註。

根據這協約，教長又重行得到了他以前的住宅和教堂以前的許多房屋。也有幾所是新的，此外還有一所訓練四十個牧師的神學校，一座圖書館和一架印刷機。

在喬治亞的脫必列西，我遇見了一羣學士院的會員，我也得到了一次和薛西里茲教授 (Prof. Cornelius Cecelidze) 談話的機會，他送我一冊一千面厚的著作，是關於喬治亞教會和喬治亞文學的歷史的。

一位年青的畢業生告訴我，「薛教授的講學，不僅僅是限於歷史的，他也鼓勵學生們去教堂祈禱。」在那裏，他們全神貫注地傾聽着老教長和一位青年牧師的佈道，這位牧師剪得短短而齊整的頭髮，穿着和普通人一般的白麻布服裝，他滔滔雄辯的口才富有說服性。

我們訪問教長是在他很小的有着長廊的家裏，旁邊是教堂，高高俯臨着一條靜靜地流着的河。他是一個短小而莊嚴的老人，長長的銀色的鬚髮，帶着溫和的微笑；他熱誠地歡迎我們英格蘭教的願望，來舉行一次全耶穌教的會議，他的教會也將與全歐洲別的教會一同出席。大家互相乾着盃，爲了我們英格蘭教的教會，爲了國際的團結，爲了年青的客人，爲了年青的牧師。

當我說到因爲「醫生吩咐，」不能再乾杯時，教長便說：「這是我們村中自釀的強身好酒，我們總得再乾一盃。我們常常是爲我們的女客人乾盃而結束的，」於是我們都喝盡了杯中酒。

在喬治亞，國家和教會的活動配合得很圓滑，我又很感興趣的知道脫必列西大學正在考慮添設教會史一門功課。

此外還有回教徒和天主教徒。我在莫斯科和亞洲都會訪問過回教徒，我還去塔什干跟全亞洲回教徒領袖伊默姆（Imam）盤桓了一整天。我和他走過中世紀塔什干的潔淨靜寂的街道，到回教寺院去祈禱，那寺院顯得是太小了，羣集的禮拜者都只能分散到露天裏席地祈禱着。但是那儀式，那宗教的精神，以及那友誼，我還是要把它寫下來的。應該在這裏說明的最重要的事實，便是東方回教世界所表現的感激的情緒。以前他們沒有公民和宗教的自由，現在他們兩者都有了。

天主教會主要集中在波羅的海的立陶宛共和國，有教堂七百座，服務的教士共爲一千六百人。

下面是維爾那主教雷尼西（Mgr. Reinisi）對一位塔斯社記者的談話：天主教會在蘇維埃立

陶宛享有着完全的自由。德國侵入者破壞了教堂，當局幫助着我們恢復和修理，並且供給建築的材料。我們的教士可以獲得一切必需的供給。現在立陶宛的主教有兩個，一個在維爾那，一個在考那斯。天主教會的組織毫無改變。所有七百一十一個教堂共有牧師一千三百二十二名。從考那斯神學院畢業的青年牧師每年有幾十人。

第六章 蘇維埃的計劃

一 計劃的工業

上述所有的福利——健康、家庭、教育和文化的福利——的能够做到，因為蘇聯現在擁有着
一個有計劃的、社會化的以及科學所控制、所管理、所指導的工業。

在蘇聯最主要的字眼叫做計劃。蘇聯的世界是一個計劃的世界。一個莫斯科的嬰孩呱呱墮地，就走進了計劃的世界，計劃爲了營養、保護和教育。計劃使孩子有生得權，嬰孩時期可以有人類所需的乳汁，以後有適當的營養。計劃使那累積的傳統的撫養和教育的技術，在托兒所、幼稚園、學校以及一切高級教育的範圍中補充了母親的教養。計劃指示人在成年時候去工作。計劃統一了人與人的活動，保證他從事有用的工作，不必擔心失業。計劃是蘇維埃對文明生活最基本的貢獻。

家庭需要着計劃。沒有計劃的家庭是一團糟。英國的統治階級完全懂得這一點。英國顯貴的驕傲是在於他的大廈中有秩序的韻律：廚房配合了餐廳，茶園又配合了廚房；保姆和女傭適當地補充着母性的照顧，而圖書館、音樂室和舞廳的設備，則是爲了多方面的文化和社會的生活。計

劃的需要永遠不會有妨礙，計劃解放了一切。

國家需要計劃不下於家庭，蘇聯安排了一個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計劃。蘇聯的全部經濟依照有規律的計劃進行着。世界的六分之一是一個有計劃的六分之一。但在最有秩序的家庭或最有規律的工廠中，噪擾不安自然也會發生的。可珍貴的秩序，不能在一夜之間就輕易建立起來。困難發生了，必須克服；危險避免了；必須有補救的辦法。組織一個國家，不會比組織一個樂隊容易。事實上還有更多的困難。蘇聯經常地履着艱險，戰爭不能幫助完整的組織。但蘇聯着眼於最重要的要素，曾經而且至今仍是向着徹底的計劃經濟前進，猶如照自己的方法，處理一個鄉間住宅中的經濟一樣的靈活，而並不限於任何一個少數的階級。

蘇聯的計劃經濟和計劃工業，是只有在國家的生產機構和土地為大眾共有的條件之下纔是可能的，正因如此，蘇聯一開始就由政府或合作組織取得了所有俄國生產工具的百分之九十八的社會所有權。

蘇維埃人民追求着和正在完成着一個不愁貧乏和剝削的社會，每人依照他的能力自由工作而又依照他的需要受取貨物的一個社會；人類的個性可以因此成長和發揚的，富足的文化的发展和同志愛的一個社會。十八九世紀把文化生活給了少數人，以剝削大多數人為基礎。蘇聯是正在把文化生活給予一切人民的進程中，而以動力控制的機器為它的基礎。總之，蘇維埃的人民正在用一個國家的計劃，謀取並增加公共的財富，改善一切勞動人民的生活條件，提高全體的文化水準，以

及加強對敵人攻進的抗禦。

蘇聯的計劃的形成，開始於一九一七年十月的人民委員會，同年十二月，那一任務又交給了國家經濟最高委員會。

一九二一年，因列寧的邀請，國家計劃委員會——簡稱「哥斯伯蘭」(Gosplan)——開始工作，那直到一九四六年始由蘇聯人民委員會設一永久委員會接替。它由十一位傑出的設計官員與科學家組成；它的任務是擬訂國家經濟計劃，協助政府，審查各共和國所擬定的同樣計劃，和監督計劃的實施與完成。

本集中於計劃的檢討，固然必須從國家計劃委員會開始，但如其止於檢討那個上面的權威組織，那是不够的。必須注意，人民大眾的參加計劃的形成與執行，乃是計劃的本質的部份。我們不能僅僅看到那個為世界六分之一的幸福而制定的計劃的廣泛的範圍。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千百萬的工人與平民，不但參預計劃的執行，而且參預着計劃的形成。他們認定計劃是他們的計劃，惟有這一種基本的感情，纔使他們參預了計劃的形成，並直接負責它的執行，這纔使計劃能夠順利的完成。

因此，我保留了另外一節來弄明白這個重要點，這對於蘇維埃的民主概念也有直接的關係。我們檢討蘇聯計劃經濟的時候，必須要記住這一點，否則就有把它當作自上而下的「全體主義」(Totalitarian)方向的危險。

現在且來說明形成蘇維埃五年計劃的指導原則。

經濟計劃的基本任務是在決定：（一）應該生產的是什麼，和應該儘先生產的是什麼；（二）如何用最好的方法分配生產以適應國家的需要。如何最有效的動員原料。如何規定企業的區域分佈以節省運輸。

計劃必須決定的更具體的項目：

應該開發多少的煤、油和鐵礦。

應該種植何種穀物和產量多少。

應該製造多少的金屬、機器和各種製成品——如麵包、長靴和房屋等。

如何分配勞動力，在資本發展方面佔何種比例，而在生產消費品方面又佔何種比例。

工廠應該建造在什麼地方，俾最經濟的應用原料。

如何運輸貨物。

爲了解決這些問題，國家計劃委員會在全部計劃中另有長期和短期的目標。

照列寧的看法，動力是最重要的。因此，在一九二〇年，規定了一個大規模的「全俄電氣化委員會」（GOELRO）的長期計畫，要在十年到十五年內，把蘇聯的水力化成電力。

H·G·威爾斯曾懷疑這一計劃實現的可能性。一九二〇年，當他訪問莫斯科時，他在日記裏說列寧是屈服于電氣專家的烏托邦了。「我不相信在俄國這黑暗的結晶體中能有什麼成就的，

但這個克里姆林的小人物卻以為能够。」列寧是對的。戰爭是最後的考驗。沒有電氣化委員會，一九四二年的蘇聯就將缺少機器。沒有機器，蘇聯就將缺少大砲。沒有大砲，史太林格勒也許會陷落，那時候，蘇聯將被踏在希特勒的脚下，而英國將有毀滅的危險了。

偉大的事情全靠蘇聯有預先的計劃，經得住考驗。

蘇聯雖被批評為過度的急忙，但她對於世界的瞭解，卻勝過了她的批評者。她趕急著努力，把握了時間。

一九二八年開始了第一次周密的無所不包的五年計劃，並有着每年和每季計劃的補充，它的範圍也包括了東方或西方的政治發展的調整，並適應着科學的改革，以補助和加速它的進展。

國家計劃委員會決定每一工業部門需要的生產量，和規定目標；區域的計劃則注意于合理的全面的資源發展。例如掌握「部門計劃」的國家計劃委員會，第一步先行估計所需的靴子的數量；製造靴子的適當的機器的數量；然後，再回過來估計所需的金屬和應用所需的動力的數量。

「區域計劃」與「部門計劃」相輔而行，同時兼顧當地區域的以及整個蘇聯的需要。例如北極區域需要新鮮的菜蔬：如從數千哩外南方的農田輸送椰菜去，那必至增加運輸費用和佔去了到處所需的鐵路車輛。因此，就得完成北極的暖室實驗，以應北極的需要。這結果，自然得有計劃規定北極暖室設備所必需的玻璃、燃料和化學肥料的供給。

再舉一例。亞洲是蘇聯的主要產棉地。在以前，棉花全部運到北方的莫斯科和高爾基的紡織

廠。部份的棉織製成品，因供烏茲貝克、塔什克或卡柴赫的需要，仍得運回亞洲，這樣便須負擔很重的運輸費。區域的計劃決定在塔什干建立紡織廠，有了製成品供亞洲的需要，就可節省幾千哩鐵路的運輸了。

三大部門——金屬工業、動力工業和運輸工業——成爲計劃中壓倒一切的最重要因素。

最起碼的椰菜田需要着鋼製的鋤頭。廣大的麥田需要着複雜的鋼製兩用收穫機。鋤頭和兩用收穫機的製造需要着金屬。金屬需要燃料纜能冶鍊。這一切又需要着鐵路和公路的運輸。因此，就任何觀點看，金屬、燃料、動力和運輸是最主要的。

計劃中有兩個重要的因素是和生產的基本需要並進的；這些因素在別的國家到處忽視，而在蘇聯卻從不忽視的，——就是文化的需要和科學的需要。

列寧把電氣和機械教育列入首要的地位。一個有教養的無產者是社會主義國家中最重要份子。因此，根據人口成長分析的各種教育需要，都有縝密的計劃。科學猶如教育，自始就佔首要的地位。一九二〇年，列寧徵求了二百位科學專家服務。其中有許多人懷疑新蘇維埃經濟的意義；有的始終懷疑，多數的後來改變了初衷。但一般說來，他們在科學事業中總是每個人受着鼓勵和培植的。

在一九三二到一九三三年之間，國家計劃委員會爲了準備第二屆五年計劃，曾召集全國科學會議，不下二十四次之多。精密的科學研究年年進步着，直到希特勒的進攻。戰爭一爆發，進度

更加速了。除了其餘的科學活動外，科學院又主持着烏拉爾、西伯利亞西部和卡柴赫斯坦區域的嚴密研究。對於蘇維埃計劃經濟的意義和作用，有許多流行的錯誤觀念是需要肅清的。例如蘇維埃的計劃，並非把一定量的消費品，分配給每個人。至少在戰前，蘇維埃的計劃並不指定一定的工作叫每人去做。只有在戰爭的非常時期，蘇聯纔指派一定的工作，這在我們英國也是如此的。蘇維埃的計劃，也並不以平等量的物品分給每個人。戰爭的結果，絕未使蘇聯有任何根本的變化，——如像有人所常指出的——絕未有任何朝着資本主義方向的基本行動。

蘇維埃的計劃，恰與一般以為把一定量的消費品分配給每個人的錯誤觀念相反，它只是決定着各種消費品應該生產多少的數量，和在一定時期內依照一般需要的分配。每個人都可以拿現金去換取他和她的較多的一份物品，但他們所得現金的多寡，卻要根據他們所做工作的量和質而定。這不過是蘇維埃經濟基本原則的實踐。「各盡所能；各取所值。」一個人所得到的物品，或是用以購買物品的現金，乃是對他工作的一種報酬或工資；工人們從工資所得的總收入，經過了計劃和分配，數量上足夠購買所生產的消費品的總量，但依照工作效率的彈性，分別有着相當距離的差別。

一句話，貨幣只是爲了對付所生產的貨物而造，它只是嚴格地作爲貨物便利而適當的運動的一種流通券或一種標記。貨幣決不是一種商品，而在物價固定的地方，通貨膨脹可以避免。

貨幣還有一種另外的功用。貨幣的登賬（會計）是考核工作效率所必需的。每一企業必須償

付它生產的耗費，和通過生產品的出售來積貯原料，因此嚴格的節省支出就成爲必要。所有部門的準確的會計，可以有全盤考核的功用。

鼓勵自發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計劃也注意到這點。工廠或企業中計劃的超額完成，可以有另外的報酬。工廠中的工人都努力着完成或超過他們的目的。工人們互相鼓勵着一致努力。這不是你的成功或我的成功。這是我的成功和你的成功。假如你增產成功，我有好處。假如我成功，你也有好處。假如我完成了，我個人可得額外的工資。我在集體的增加和集體的報酬中也有份。我利己的本能滿足了。我利他的本能也得到了滿足，因爲我知道，我的生產的增加，也增加了總的生產，而在總的生產中，我的同伴也同我一樣有份的。我和我的同伴因而都被鼓勵着去尋求更快的生產方式和更廉價的生產過程，以盡量減少能力的消耗。因爲在這一增加生產的運動中，有一核心的事實：即蘇聯的工人就是工業的主人，而且大家都知道。工廠根本就是勞動者的工廠。集體農場是勞動者的農場。作爲工業的所有者的工人們都知道，生產增加了，他們的份兒也隨着增加。工人知道他所尋求的提高的生活水準，是密切地直接地跟他的工廠和別的工廠的生產聯在一起的。因此他不但希望他所在的工廠增加生產，同時也希望別的工廠增加生產。利益的共同性是很顯然而且大家體會的。烏茲貝克的一個棉花集體農場知道莫斯科的紡織廠要靠塔什干的努力。而他們穿的衣服，則又靠莫斯科的紡織廠。這一過程已經縮短了，因爲塔什干也設立了紡織廠，可以拿農民自己所供給的生棉，來紡織成農民所需要的製成品了。有色棉花節省了印染的手

續，這使農民和紡織工人都感到了便利：知識加上了工作和發明的熱誠，加上了科學的信心和鼓勵，終于產生了奇蹟。除了這些增加生產的物質鼓勵外，我們也許還得加上許多其他的動機，如勞動者的光榮、愛國心、責任感以及隨時鼓勵的高尙動機等。

五年計劃早已經過了試驗的階段。他們在和平時期中表現了成績，他們在戰爭的最大考驗中也表現了同樣的成功。這些計劃的性質是進步的，發動于一九二〇年，當時電氣化委員會決定電力產額到一九三五年增加一倍的目標。電氣化委員會實際上達到了六倍的增加。五年計劃的進程大體上是這樣的：

一、一九二八年的第一屆五年計劃，使蘇聯從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把它從中世紀提高到現代化的技術水準。全國的社會主義是當時的目標。

結果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工業東移了，原來百分之九十礦業集中于頓巴斯區，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製造工業集中于中央區，這種危險性消除了。工業移到更接近原料的地帶，很快的使落後區域現代化了。生產打破了原定的目標。工業生產達到了一九二八年水準的一倍。工業產量與農業產量相比，已從百分之四十八躍增至百分之七十。五年以後，蘇聯已成為一個社會主義農業的工業國家了。至于農業本身也一些不落後。現在蘇聯已擁有全世界最大規模的農業了。

工資上昇了百分之六十七。失業和極端的貧困克服了。現在切望的是更進一步的計劃了。

二、第二屆五年計劃的任務，是以完成國民經濟的技術建設為目標的，這很快就告完成。自

一九一三年以來，蘇維埃工業已增加了八倍，全部生產的百分之八十都來自新創的工廠。電氣化委員會的任務是完成了。工業都已電氣化，並且得到適當的分配。西伯利亞卡柴喀斯和烏拉爾煤的產量，超過了沙皇時代的頓巴斯。巨大的工業單位在東方建立了瑪格尼托——哥爾斯克（Magnitogorsk）和庫茲尼茨克（Kuznetsk）的鋼鐵康拜因、高爾基汽車工廠、乞爾耶賓斯克（Chelyabinsk）曳引機工廠及其他等等。東方的石油開發了。亞洲出產的棉花，就在亞洲的紡織廠中紡織。伏爾加、烏拉爾、西伯利亞和中央亞細亞的大農場，都已經機械化，不毛之地也可以耕種了。到一九三八年，蘇聯農業已有了四十八萬三千架的曳引機，和十三萬架的複式打穀機。

新的人口在東方激增了，於是建設新的半徑鐵路以便利他們的交通。穀物和棉花的生產都超過了目標。蘇聯達到了技術上和經濟上的獨立。實質工資增加了百分之一百零一。文盲全告消滅。在一九三八年，入學的兒童達四千萬人。科學研究所發展着：喬治亞的科學院創立於一九四一年；亞美尼亞科學院創設於一九四四年。科學實驗的機關共有二千二百六十五個。

三、一九三八—四二年的第三屆五年計劃的目標，是要使鐵、鋼、燃料和電力的生產，超過高度發展的西方國家的每人平均量。全國的生產應提高百分之五十到一百，而工資和零售貿易也作相應的增加。大眾的文化水準，應達到技術家和優秀工程師的標準。

四、最後，那從一九四〇年開始的十五年的總計劃，則「要使所有主要物品的生產，趕上和超過高度發展的國家中的每人平均量。」

那如此迫切地期待的、如此堅持地努力的、又如此忍耐地受苦的時期，終於進到了黎明。蘇聯終於拿了成功的事實面對着一個驚疑的世界了。蘇聯制度的成功已使大家都明白。蘇聯將在世界最前進的民族之間驕傲地站出來。蘇聯將領導着世界，不是用了武力，而是用了她在計劃生活和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實驗成功的力量。

接着來了戰爭，一切光明的希望受到了打擊。德國軍隊侵入邊境。蘇聯的紅軍退後八百哩，每一寸土地都經過激烈的戰鬥。蘇維埃領土的三分之一，也即最精華的三分之一淪入德國人的手裏，蘇維埃人民被掠去了以前三分之一的糧食供應，也被掠去了三分之一以上的煤、鐵和鋼。蘇聯堅持着抗戰，但她的能够這樣堅持，確是靠了第一屆五年計劃的巨大成就。蘇聯的計劃經濟會發揮了它最大限度的力量。

蘇聯的計劃給重工業配置了適當的裝備，在東方建立了有力的冶金工業和燃料的基地，把許多小的農場聯合爲大的單位，造成了土地的機械化，大大地提高了收穫量，使士兵的給養不因烏克蘭和高加索的喪失而成問題，重行分佈了她的工業，使幾百萬頃的不毛之地都能耕種，空前大規模地訓練了專家和工人，重行分佈了各種的資源，一切爲了前線，又設法使機器很快的從烏克蘭搬移到烏拉爾，俾能繼續生產而不受侵擾。當勝利來臨時，蘇聯的計劃經濟又毫不動搖的從戰時改變爲平时的生產。沒有罷工。沒有失業。蘇聯的計劃經濟在戰時是流動的，在平時也是流動的。戰時是流動的。頓巴斯的喪失，要求烏拉爾的金屬工業迅速的改變。這是做到的。庫茲尼茨

克鋼鉄康拜因一夜間的改裝，就轉而製造坦克車的裝甲了，同時，利用了當地的鐵和錳，科學實驗室也在庫茲尼茨克設立了。平時是流動的。在紅軍勝利的熱烈興奮中，農民、礦工和工廠勞動者都以同樣顯著的自動精神，重行回到了頓巴斯。

礦工們並不等待礦山豎坑的建築完成，他們學會了自己動手建造礦坑的技術。機械工人變成了工匠，很快的學會了這新的工藝，建造他們自己的工場和工廠了。婦女們搬運磚瓦，粉漆牆壁，燒飯，看護孩子。蘇聯的計劃經濟是可驚地變通的，也是可驚地流動的；自然，這主要是由于工人們全力熱心的支持，因為他們現在都已知道，他們是在爲什麼而工作，和爲誰而工作了。

重新建設是第四屆五年計劃的關鍵。工業會在戰爭中東移，加速了戰前東向的運動。它仍在向東移到烏拉爾、西伯利亞和遠東。但這並不是說西部區域將不再爲工業的重心。西部區域對於蘇維埃經濟仍是重要的，必須恢復。所以，新計劃的主要字眼不是建設而是重建，特別在于重工業和鐵路交通。自然，發展是要同時進行的：重建將儘先佔第一位。消費品也是如此。擴充生產必須在儘先復興之後。消費者所最切需的貨品的生產，乃是最優先的生產。

從社會和政治的觀點來對計劃作詳細的分析，就顯示了三個重要的原則：

一、分散工業的努力，是着眼於各共和國的發展，着眼於作爲整體的蘇聯更大的經濟財富。

例如莫斯科的工業將加以縮減，而擁有原料資源和動力的新區域卻將使之擴充。例如立陶宛的總生產將增加三·九倍——遠超過了莫斯科；擴充總是揀當地經濟自治性較大的地方。

二、鑒於戰爭破壞的大部份地方，都在易遭攻擊的西方區域，因此如軍事上考慮認為必要，或如蘇聯預見到有對西方立即或可能發生戰爭時，那從烏克蘭到波羅的海的大規模重建計劃——單是烏克蘭將吸收全部計劃支出的百分之二十一——就將停止進行。

三、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來說，大量貨物的生產額顯然是一個決定的因素，因為它的目標是要造成一個以「各取所需」為條件的富足的社會。因此，經濟和社會的考慮，跟西方區域的經濟考慮恰形成了平衡。

戰爭時期的損失是重大的。蘇聯必須，也確已重行開始，猶如她在革命以後的開始一樣。但區別是有的。當時她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的廢墟上建設。現在她是在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上建設，這基礎雖受到戰爭的破壞，但依然屹立着。因此，復興的速率，根本就非初期工作的速率可比。有訓練的人材固然遭損失，大多數仍然存在，他們具有熟練的技術和得自經驗的知識。現在是不必摸索了。

新計劃繼續着以前照顧各共和國的傳統，目的是要在整個聯邦的經濟制度之內，使她們的重建和生產力的提高獲得充份的發展，以達到各經濟部門的多樣的發展。

在遼遠的區域，如烏拉爾、西伯利亞和遠東的冶金重工業，將繼續予以增加，喬治亞將設一

冶金工廠，亞塞爾拜然將設一軋管工廠，以作為遠東、西伯利亞、和高加索的鐵鑄自給基地的一部份。還有在考慮中的是地質調查的進行，以尋求鐵礦和冶金原料的新鑛藏。電能將比戰前產量增加百分之七十。輕工業亦將增加，俾達到糧食和共同消費品的增加。穀物收穫將比一九四〇年增加百分之一百零七；甜菜百分之一百二十二；棉花百分之一百二十五；亞麻百分之一百三十九。到五年計劃完成時，馬可增加百分之四十六；牛百分之三十九；山羊和綿羊百分之七十五；豬百分之二百。曳引機、農業機器和化學肥料的大量擴充，將予這種增加以便利。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都得靠運輸。蘇維埃交通的密度是要增加的：到一九五〇年，鐵路、公路和水路的總載貨量，將為六千五百七十億公哩噸（Ton Kilometers），而在一九四〇年，則為四千八百三十億公哩噸。

計劃要求實際的國家收入，較戰前的數字增加百分之三十八，因為這樣纔能使蘇聯的總生產力上升，使貿易提高，使房屋和社會服務的支出，乃至儲蓄基金——即用於資本發展的錢——和消費基金增加。

蘇聯一向最注意的是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的訓練。原來已經從事生產的工人為一千三百萬人，依照計劃，到第四屆五年計劃終了時，更將增加新的熟練工人七百七十萬人，以促進技術標準的進步。

種種的特殊設備安排着，各種誘導的方法計劃着，以鼓勵勞動力從業已普遍繁榮的農業，轉

移到工業的各部門。文化設施以及工人社會服務的費用將予以增加——全部將達一九四〇年支出的百分之二百六十。

一般學生的人數增加了，依照計劃，進大學、高等學校和技術學院的學生，將增加到一百九十五萬人。電影院增加到四萬六千七百家；俱樂部 and 圖書館二萬八千四百家；醫院的病床九十八萬五千張；而休養中心將增至四十五萬處。

國家計劃在一九四七年第二季的數字是極高的，也許，正如「泰晤士報」所說，部份是由於蘇聯在復興中的自給。全部計劃已完成蘇聯工業總生產的百分之一百零三。許多工業都達到了很高的百分數：化工業為百分之一百十五，電氣設備百分之一百十三，橡皮工業則為百分之一百十四。

二 蘇維埃的農業

(甲) 科學的蘇維埃農民

希特勒揚言要摧毀蘇聯的農業和餓死蘇聯的軍隊。他失敗了。如我們上面所說的，蘇聯的一般生產儘管遭到了難以置信的破壞，但蘇聯的農業特別能夠保持繼續的發展。德軍到達史太林格勒時，曾奪去了六十萬方哩的蘇聯最好的農田，她五分之二穀物供給，她一半的馬鈴薯，她甜菜的百分之八十五，以及她向日葵種子的百分之六十。

飢餓摧毀了沙皇，卻終於摧毀不了蘇維埃的軍隊。在蘇維埃工廠和蘇維埃農場的支持之下，紅軍把局面改變了，希特勒摧毀了。集體農場用工作和智慧制勝了他。「耕耘新的田畝；增加土地生產力」是一致的口號。工作和科學——女人的工作、孩子的工作和老年人的工作——拯救了蘇聯。

蘇聯的婦女是強健而有知識的：一千萬個女人已成了農業工作的專家。耕地的數量和產額在戰爭中一直提高着。一個烏克蘭四口的家庭，在父親離開以後，反而把「工作日」增加了。在一九四一年，耕地增加了四百萬畝，一九四二年為六百五十萬畝，到一九四三年為一千六百萬畝。科學的農民代替了無知無識的農民。大家享有着工作，大家享有着繁榮。

蘇聯的農地經營專家乞欽（Tsitin），曾向我談到他自己對於產量貢獻的故事，他最新的成績就是人造麥。一九三七年，我會從美國漢森教授（Prof. Hanson）取到實驗的樣品。乞欽在一九三九年秋天種植的人造麥，兩年中會收穫了四次，總共的產量為每畝八十三「布雪爾」（bushel）等于八加倫之量）。

人造裸麥現在已達到了工業的階段：在一九四五年，有幾千畝田地在種植中。

一九四六年，密區林遺傳漸化中央實驗室（Michurin Central Genetic Laboratory），會從事蘋果梨子跟山檀的交接。用這種方法從蘋果和梨中所取得的維他命，要比從檸檬中取得的還豐富。

杜聶教授 (Prof. Dunin) 發明的馬鈴薯接枝培植法，可以節省三千六百萬磅的種子。賴森科 (Lyzenko) 教兒童們種植馬鈴薯的嫩芽，結果又省了十五萬噸。

中央亞細亞共和國種植了二百萬噸的穀，可並不減少棉花的收穫量。

麥加那 (Ferghana) 的六萬五千個農民建立了一條三十五哩長的灌溉的運河，使九萬畝肥沃的土地都可以耕種了。

無論過去和現在，集體農場在蘇維埃活動的所有部門中表現了最好的成績。木犁過去了。鋤刀過去了。打穀的牛拖的石磨也過去了。田地分區耕種着，一個農民即使自己有十五畝的地，他的產業也被分割為十幾塊地區，這些地區和他的家以及相互之間總有一哩的距離。

集體農場代替了農民的私有制。他們克服富農不是沒有鬥爭的，因為富農焚毀曳引機和集體農場的穀倉，綁劫蘇維埃的組織者，並特宗教來反對那根據科學的季節推算而並非根據耶穌紀元的農曆。

富農的怠工和一九三二年的旱災造成了危機。政府強迫控制着糧食，阻止着怠工，把國家救了出來。嚴重的困難經歷着。外國謠言說死了一百萬人。這是無稽的誇大，完全與冷酷的統計數字不符，照統計的記錄，當一九三〇—三四年推行大規模集體化的時候，人口並未減少。

最緊急幾年中的嚴格新聞檢查——如猶琴·李昂 (Eugene Lyons) 所指出的——不是由於蘇聯保守嚴峻方法的祕密，而是由於惟恐日本趁着蘇聯的糧食恐慌和內部困難，發動進攻。一九

三三年的豐收達到了劃期的改變和勝利。在農業上完成集體化，比在工業上還難，這需要着周密的研討。下面是它構造的大概。

農業的單位由自願結合的若干家庭構成，依照他們人數獲得土地的永久分配。不需要購買的價格，也不需要地租。出產品的課稅，便是農民對於國家歲收的貢獻。

集體農民不會受到市場波動或價格漲落的困難。他們以確定的價格出售給永遠不竭的市場。一定的最低限度的部份，必須以一定的價格售給政府；除這一部份之外的多餘，就可以合理的價格售給工廠，或團體或私人消費者，再有餘剩，總是仍由政府以一定的最低價格收購。風險一些也沒有。

價格和調整的計劃，是保護政府的，——它需要糧食來維持紅軍等等——使不致收進太多的任何一種的貨品。百分之二的強迫保險，則保護農民，以防不測的損失。他也可自願增加保險費，而得到較大的利益。

獎勵是無微不至的。凡從事十六年以上的每一勞動者，在管理委員會的選舉中享有平等的權利，並可參預基本問題的決定。每一勞動者依照自己的興趣和才能，選擇工作的各別部門。

工作的估價依照困難、經驗和技術而定，基準水平等於一個半熟練工人的平均的件工。「工作日」的償付不是用現金，而用收穫物的份兒，倘如在等待收穫的時節，那就提早償付，以應當前的需要。

在分配利益之前，先得減去賦稅、機器租賃、畜糧的貯藏、資金消耗、保險費和文化費用。餘下來的就在各成員之間，依照「工作日」來平分，這結果，自然會促進了「工作日」數目的增加和農場的繁榮。在蘇維埃的集體農場中，一個人的成功也就是別人的得益。

機器在蘇聯是歡迎的，它雖然排斥了勞動力，但蘇聯並不愁失業。新的工作等着從機器解放出來的勞動。工業的產物、養雞場、葡萄園、果樹園、或各種魚塘或養牛場，經常需要着新的勞動者。

較進步的集體農場有當地的電力廠或當地的實驗室等。他們也許還有一個飛行場或現代化建築的房屋。每一家庭有它自己的花園，以種植菜蔬、養雞、養牛或種植各種珍貴的工業產物等。集體農場都努力於專門化，努力于競賽，努力于打破紀錄；打破紀錄者常常可獲國家最高榮譽的獎章。在一九三六年的憲法會議中，就有二百六十一位的這種競爭者，共同交換着他們的經驗。

由於效率的提高，收穫量增加了；較少的人力，得到了更高的收入和利益。農場收入從一九三二年的四十五億六千八百萬盧布增加到一九三八年的一百八十七億九千八百萬盧布，這結果也就達到了生活水準的提高——無線電、自由車、衣服、書籍或樂器。更大的房屋建造起來了，休假日也增多了。農業勞動者發展了一種以前全不知道的文化。

集體農場現在確乎有一種普遍的需要，那就是用特殊吸引的方法，把人力吸收到城市去。每一集體農場有它個別的計劃，但在集體農場巨大的網的後面，則是一個總綰的國家計劃，調節着

每一種貨物生產的總量。

依照個別當地的計劃，每一集體農場有一種登記表，表中記錄着所有的居民，他們的年齡和能力；記錄着預計增加的牲口數目；記錄着專為家庭消費的耕地面積等等。餘地的耕種，是根據每一特殊區域的需要和全國計劃的需要而定的。

機器和曳引機站，除了保藏貴重的機器，並充分利用它，以減低普通費用外，還有其他的任務。曳引機站也被用作政府需用的穀物的徵集站，每一農田都以穀物償付，不是現款。曳引機站是自給的，並不謀利。中間人取消了。

還有，曳引機也是農業的大本部，專家們在那裏集會，農業講演在那裏舉行，種子在那裏出售，新的牲口在那裏展覽，並有專家的解釋。故主席加里賓說，「在工業革命方面，蘇聯採取了別國最好的榜樣，」這是對的，他同時又說：「在農業方面，我們是一條新路上的領導者，」這也是對的。科學的農業，如李維教授（Prof. Levy）在泰晤士報上所說的，在蘇聯已達到了高峯。春天的種籽可以省却秋天的播種。在乾燥的區域中，飛機很早就融解的雪上播散穀種了。飛機又被用以去除害蟲，把當天孵出的雞雛輸運到千里外去，又把子生植物從黑海帶到列寧格勒和莫斯科。蘇維埃農業征服着沙漠和充滿塵砂的凹地，它實行堅硬的底土層的種植，它建立幾百哩長的樹林地帶，它採行了掘壕的種植，白天冷，晚上暖。積雪也被征服了，它利用雪柵和雪山，保持了乾燥的地方，然後從正確的可以通風的角度上，來從事耕種。

農業向東向北推進了。輾地機披斬着荊棘，氣候表指導着農業開墾者，他們帶着馬鈴薯、北方特產的植物、各種各樣的亞麻、苧麻或甜菜。小麥、穀和棉花都運到北方去種植，解決了運輸上的困難；馬鈴薯則移植南方。現代生活中必需的橡皮是本國出產的；「古加」（Kok-Sabyn 美所產一種麻醉性植物）經過一年生長後就有了收穫，第二年的收穫量更豐。甜菜可煉製上等的橡皮，一九四一年為每畝三十磅，現在則為每畝一百五十磅。一百萬畝煉製橡皮的甜菜是一九四二年的計劃。

烏克蘭是可怕的荒蕪了，正在猛烈努力着復興。一九四三年解放後不到半年，烏克蘭就有了一百七十二萬三千頭的牛，此外政府還從中東部運來了八十萬頭的小牛。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為了供應技術工人的迫切需要，有三百萬農業勞動者加緊努力工作着。新的更高的生活水準成了到處的目標。蘇維埃的農業確是蘇維埃生活的一個高峯。

（乙）被迫的降落

「他們給你看的，只是他們要你看的，」這是批評家常常說的話。

當然，他們是如此的。我們也同樣。不過，常常又有人說，你所看到的都是虛假的偽裝的東西，這卻又不然。我會有過無數次的機會拿他們未給我看的來證實他們給我看的。且摘錄我日記的一段來說明這故事。

我在一個蘇聯牧場上寫日記。時間是上午五時。叢草滴着濃露。百靈鳥在歌唱。我是在一個

隨心所欲的地方。這是俄羅斯鄉村的中心，離莫斯科三百五十哩，離此最近的市鎮也有六哩。我是一個不速之客，突然從天而降的。

昨夜我們的飛機被迫在這裏降落。我們原是從脫必列西飛到莫斯科去。橫越高加索山和黑海是一段險惡的路程。我們起飛纔兩小時，許多人都病了。我仔細注視着油從推進機箱子裏一滴一滴流下來。工程師和駕駛員立刻動作，我們在天空裏打盤旋，想找一個降落的地方。誰也沒有驚慌。我們就在這個細草如茵、微風習習的孤寂的牧場降落了。

沒有幾分鐘，一羣小孩子包圍着我們，他們像是從地下鑽出來似的。農村的孩子們。快樂的孩子們。男孩子和女孩，親熱地微笑着。當推進機轉動起來，向莫斯科發出告急的無線電，這一轉動壓緊了空氣，把牧場的草也吹倒了，於是又是一陣熱鬧。孩子們跟着旋轉的風的激盪搏戲，猶如人們在風雪中掙扎，碰壁了，嘻嘻哈哈的退了回來，充滿着喜悅。

女孩子們起先瞪視着，漸漸的向我們圍攏來，都急着想提出問題來問。

「德國人到過這裏麼？」我們問一個漂亮的烏克蘭孩子，她看上去十四歲，實在只有十二歲。

「他們來過的，」她說。

「你們可會逃走呢？」

「沒有，我們留着。德國人佔據了我們的房子，我們住在地洞裏。」

「德國人可會殺過你們村上的人？」

「他們殺了我的叔叔。他是領袖。他們割去了他的手和脚，後來又把他槍斃。」她天真地說。

一個老人蹣跚地走了過來。此外就沒有一個成年人，於是我們又問那孩子：「你的父親呢？」

「在前線。」

「大家的父親都在前線麼？」

「是的。」

我環顧一下懇切的面龐，說：「凡父親在前線的請舉手。」

每一隻手都舉了起來，幾乎很少例外。

這裏鄉村和集體農場的工作，都由婦女和孩子們、以及少數老年人担当着。

爲了避免機器聲的吵擾，我們向着一排茅屋踱過去。那茅屋雖遠，卻可以望得見。有的都已破壞，很少是完好無缺的。它們都是古老而簡樸，卻富有風味，漆得白白的，蓋着稻草。這四方形的屋子，每邊有三扇小窗，嵌在未漆的年久剝蝕的精緻木框裏。

那園子是很大的，種着馬鈴薯和南瓜。許多白色的雞，在漫步着啄食。一頭小牛等着它的母親。

我們問園子裏一位面容愉快的婦女，可有牛奶。

「要等那幾頭牛回家來纔有，」她說。

「誰管理這園子裏的一切？」——「好大的園子——」還有誰管理這巨大的集體農場？」

「都是我們婦女負責的，」她回答說。「每一個女人，除了她自己所有的田園外，得管理五畝的公田。」

那婦人四十五歲，已經守寡十四年。她有一個十四歲的兒子和十六歲的女兒。

「德國人在這裏住得久嗎？」

「五個月。腳氣和口腔的傳染病迫使他們離開了。他們在村莊周圍築了一道封鎖線。」

正好這時候，一個女孩子走了進來，拿着一隻盛滿牛奶的破瓶，這女人就請我們到她的屋子裏喫我們所帶的「三明治」。我們欣然地進去了。那是一所整潔的茅屋，叫人想起了威爾士。房間一共有四個——會客室、臥室、磚砌地板的廚房以及人們與雞羣共用的一個入口走廊。

我們坐在會客室中一條闊大的椅子裏，這椅子大得很，可以當臥床，上面鋪着苧麻織成的美麗的粗毯子。

一條白苧麻織成的檯布動人地罩在桌子上。「我自己做的，」那女人說，顯着一種驕傲。

兩條粗絨地毯鋪在光潔無塵的地板上。

我們邀請這位女人同喫白麵包的三明治，夾了一塊最後剩下的肉片給她。

她喫了，並且說她在集體農場從未看到這樣的白麵包。我們想起了早飯，問她可有雞蛋。她說有的，還有馬鈴薯和椰菜。她叮囑我們跟她一同喫早飯。

還有兩樁事情頗使我動心。一隻高可及腰的大衣櫥靠牆放着。當我們說話時，一位十六歲的姣好女郎跑進來，從衣櫥裏揀擇一件時髦的大衣披上，又在項頸間圍了一條紅圍巾，她導引駕駛員們到村上去。「你的女兒在作什麼工？」我問。「她還沒有作工，她還在上學呢！」作母親的回答道。十六歲了，還在上學哩！

在房間的角落裏，圍掛着一條白紗幕，後面是一幅神像，一幅基督像。

這位女人得知我原來是一位主教——因為路上跑得熱了，我把裏面教衣袒露了出來——就立刻跑出去，熱誠地拿了一筐新掘的馬鈴薯回來，她用柴枝野草點起了火，忙着燒這個燒那個，我再三勸阻也沒有用。

三隻碗、三柄羹匙、和三支叉放在桌子上——一隻碗盛着馬鈴薯，一碗是椰菜，另一碗是酸牛奶，此外又從乳牛搾了一瓶溫熱的牛奶來。「集體農場的便飯，」那女人微笑說。

我們運用羹匙從碗裏夾菜，因為自德國侵入以後，瓦礫是異常之缺乏的。

一頓豐盛的便飯。有母雞生下來的蛋，有鹹肉，和粗麵包，這無疑都是這位瘦削而結實的女主人的好意，她穿着粉紅色的圍裙，綠的腰帶和白的罩衫，站在我們面前，她真是一位婷婷的女主人，整齊的頭髮拖着兩條辮結，完全俄羅斯的風度，她從她的白頭巾間，左右顧盼，總是帶着愉

快的樣子。

她年青時候是美麗的。她的一幅項頸間掛着小小珠鍊的照相掛在牆上，那還是十七年前她結婚那天攝的。

要是沒有戰爭，這個家庭還要富足些，那傢具便是證明。但一個家庭的要件仍是具備的。生活有保障。很大的私田和花園。她的工資，和集體農場的份兒。她的孩子們的前途也是有保障的；每個人都正在受高級的教育。十四歲的孩子和十六歲的孩子仍在上學。家庭中的音樂與文化也具備：男孩子有三弦琴（Balalaika），女孩子則有漂亮的舞衣。醫生不必化錢。醫藥是免費的。母親和孩子們如遇疾病或老年，都有充份的保障。

德國人去了，我們女主人微笑的臉龐上充滿了自由愉快的容色。在所謂富有的集體農場，也許還有更富足的家庭；由於德國野蠻侵略不可避免的結果，也許還有許多悲慘得多的家庭，但這個簡樸的農家，卻正是一種典型，充滿着農村的技能，生活的安定，忠誠而有希望的勞作的快樂，孩子們喫得好教得好，他們的遠大前程有保障。這就是根本的財富，就是蘇聯士兵在人民戰爭中所以這樣英勇地作戰加以保衛的。

七點鐘，一架巨型飛機在上空怒吼，我終於在我們損壞的飛機旁邊上了機，我的心是悵然的，因為我們捨棄了那茅屋中正等候着我們的早餐，同時又錯過了我們這位漂亮的女主人歡迎她的不速之客的微笑。

一次偶然的被迫的降落，安排着我親自「看到了他們所要給我看的，」這大大地說服了我；尤其因為這一次，是我在兩星期裏面到集體農場第二次突然的訪問；另一次是在亞美尼亞，我們會在太陽和煦的南方的櫻桃樹下的草地上，喫着麵包、酒和水菓。

三 計劃的科學

科學支配着蘇維埃的思想。蘇維埃當局自始就認定科學乃是社會組織必要的部份，要求蘇維埃的統治者和行政人員，必須具有某種科學訓練、和充份的科學認識。

西方國家不是這樣的。英國也不是這樣。英國多數的學者——如劍橋的科學家克羅脫（J. G. Crowther）所堅持的，認為在牛津受政治家或行政人員教育的學生，只要研究古代史、現代史和文學，現在又加上一門經濟學，至于科學和技藝是可以不管的。在牛津大學，準備從事政治事業的用功學生，只知道學習怎樣用演說和姿勢來影響羣衆；怎樣控制公共演說的技術和公共辯論的藝術。

這種「口才教育」在過去是有它的優點的，當控制人民的藝術成爲政治的主要部份時，這是最有效果的。但在今天，科學和技藝的廣大範圍和影響，已成爲現代文化主要的特點，而要求根本改變政府或行政的觀念，可是儘管如此，這樣的政府思想仍被固執着。

西歐的統治者，在他們的政府學說中，並不把科學和技藝當作社會機構的必要部份。科學和

技藝只不過是行政者所操縱的另外兩個因素。

蘇維埃的統治者和行政者，自始就認為這種態度不合時宜的，他們認為科學和技藝，乃是那改變政治問題的中心性質的權力的源泉，他們認為計劃遠比雄辯的口才重要，計劃是政府藝術的先決條件。這種重視現代科學和技藝的思想方法，支配了蘇維埃行政者的思想，這雖然也曾為已故的H·G·威爾斯所竭力主張，但在英國，仍未被視為必要。

現代科學和技藝的滲入蘇維埃政治和行政的思想，也同樣反映于蘇維埃科學工作的廣大範圍，反映于今天蘇聯所有的科學組織。

那廣大的範圍是最驚人的。

在一九一五年，帝俄一共有一百二十個到一百五十個的科學研究的中心，大多數都是附設于十個大學和散佈于高級技術學校或研究院的部門。蘇聯擁有着二千二百五十六個獨立的科學研究所。在二十五年裏面，單是科學院所造就的科學工作者的人數，已從九十五提高到四千，這些人分佈於一百五十二個科學研究所，此外又在各地設立了十個附屬的機構，包括二十二個研究室、一百三十九個科學實驗室、五個國家公園和七座天文台，在一九四〇年，這些機構中擁有着三千個工作者和三百個畢業後的研究生。而且，這科學設施的範圍，並不限于舊日的中心：它已遍佈於全蘇聯幾百個城市中。

科學的組織也同樣重要。科學都經過社會化的組織。就社會化組織這點說，就科學對社會生

活的關係說，蘇聯的科學與英國或美國的科學是大不相同的。那不同並非在於工具和實驗室的實驗。蘇聯的實驗工作，也和我們一樣用同樣的工具，同樣的化驗劑，以及同樣的慣用器械。所不同的是指整個社會生活關係而言，科學在蘇聯佔着我們所意想不到的重要地位，它受國家大規模物質和經濟的資助。

革命以前的俄國科學，跟革命以前的生產是一樣的混亂，那是由於同樣的根源，而招致同樣的後果。

伽利略在他的時代，曾領導科學界對於所研究的現象採取分別實驗的方法。他不像中世紀的哲學家那樣，只要一種一般現象的概括紀錄；伽利略決定把簡單的現象孤立起來，取得有關它們的正確的知識，然後再把這個或那個特殊的現象對於宇宙一般現象的關係，分開來研究。這意思便是科學界的分工，恰和工業生產界的分工相平行，兩者的結果也是同樣：一方面是巨大的貨物的累積，而一方面是事實的知識的累積。但倘如沒有綜合的方法，那分散的事實，必將造成科學界中知識的混亂，猶如工業界無秩序的生產和無秩序的分配所造成的混亂一樣。

蘇聯解決了社會生活中紊亂的破壞性的鬥爭，同時也宣佈克服了科學界中研究和檢討的無效率 and 浪費。

現在我們又要回到科學的社會組織，這是蘇維埃科學活動第二個主要的特徵。蘇維埃的科學是社會化的。這是基本的。蘇維埃的科學，和生活的實際事務，和工業農業以至醫藥是密切地相

聯繫的。蘇維埃的科學解決實際的問題，指示新的工業、農業和醫藥的概念和可能；它的努力，不亞於單獨的先驅者，深入根本的問題，而這些問題的解決，又反映於人類生活各種活動的想像之外，例如關於原子能的管制和應用的知識。

蘇維埃的科學與蘇維埃生活的主要活動是密切聯繫的，它有國家盡量的資助，深為各處的科學家所羨慕；科學院（Academy of Science）是蘇聯最有權威的科學團體，它的發展簡直出乎想像之外：二十五年前，科學院中從事物理和數學的研究員為五十二人，現在有二百十七人；研究化學的以前只有兩人，現在三百六十七人；地質學十一人，現在三百〇二人；生物學二十九人，現在六百三十九人。大概增加了四倍到一百八十倍。作為科學知識發展中心的高等教育機關，從一九一五年的九十個增至今天的七百八十八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學生總數共為六十萬人，從前只有十萬人。

在這次戰爭以前，每年出版的書籍約為四萬種；其中有一半是屬於技術、農業、自然科學和數學方面的。單是科學院，可說是世界科學著作最大的出版機關。

不但如此，所有這種科學的活動，還深入到聯邦最遼遠的區域。我儘能到喬治亞、亞美尼亞和亞細亞去考察，猶如到莫斯科和列甯格勒。

在蘇聯，在整個的蘇聯，規定科學研究機構的需要和規模是有原則的，從這些原則的檢討，可以具體說明科學和日常生活密切的關係。

科學研究機構和工業組織的蘇維埃設計者，完全是從蘇聯人口需要的估計出發，並且假定蘇聯的人口，在以後四十年中將激增至三萬萬人。他們需要多少的糧食、住屋和衣着？多少麵包、牛奶、靴子、襯衫、浴室、汽車和居住的空間……？這數目字是巨大的，而且比現在人口所得到的比例還大得多，因為計劃要大提高生活的水準。

國家計劃委員會的範圍真廣大，它不但處理着生產上巨大的問題，並且也保證有志的蘇維埃青年可由此獲得政治上的地位，正如有志的英國青年，在牛津大學所獲得的一樣。因此，國家計劃委員會中的位置，是很爲蘇維埃青年所企望的。

這一國家計劃，確是布爾雪維克革命最根本的產物，它是以下的方法與科學研究機關的發展相密切聯繫的。他們先把消費品的數量估計後，然後再來確定生產所需的農業和工業的規模：多少工廠，多少機器，多少金屬，多少運輸，多少農場，多少頭牛，多少種籽，多少動力。

爲了適應需要，金屬工業是必須擴展的。動力單位也必須擴充。還有那電力機器的產額。爲了農產品的需要，又必須考慮到動物和植物的改良。因此，蘇維埃的人力和物質的資源，都必須經過精密的調查，以資最經濟的運用。可利用動力的地方應該建立水電力的站；有鑛藏的地方就設置鑛鐵和冶金的工廠。千千萬萬的工人必須受訓練，俾能適應巨大的建設計劃。研究調查是到處需要的。每一活動的部門都迫切地需要科學的協助。

有能力的研究人才，由統治當局、行政者和計劃者慎重地挑選着培植着，猶如當作新的化學

原素，或新的金屬礦藏一樣。化學的專門人材，正如他所發現或開鑿的礦源，同樣是國家的寶藏。一切這些，說明了科學機構的發展和趨勢，可以幫助我們瞭解蘇維埃科學活動的許多有趣而有價值的特點。

在一方面，我們應該注意，科學實驗站或研究所，不是隨便設在這裏或那裏，而是根據某地對於科學的實際需要，然後加以設立的。在另一方面，個人要找他適當的位置和發揮他創造力的範圍，也不僅是籠統地確定的，而必須選擇一個對於他的能力確乎最感需要的地點。科學知識的動員，必須由需要來決定。

例如金屬重工業，是有日常問題的，這就需要深入研究金屬的性質，乃至物質的根本性質。因此，隨着大規模金屬工廠的建立，我們可以看到，有力的、組織完備的科學研究的機構，也同時發展起來，和專門的工業部門密切聯繫着。

有許多最好的物理研究所，是屬於重工業部的，該部所設的許多科學實驗室，組成了另一部門，稱為重工業人民委員部的科學研究組。這個機關資助了蘇聯許多出名的實驗室，例如霞斐（Joffe）教授所主持的列寧格勒的物理技術研究所，或卡科夫的物理技術研究所。

這些專門研究所的任務，是負責指導物理科學基本原則的研究，因為這乃是工業技術歷程的基礎，這些機構，都為他們有關的工業所直接控制。

有四分之三的蘇聯第一流的研究所，都位置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和卡科夫，這些地方也都是

工業的中心。不過現在，由於新的工業的發展，有許多地方如在鄧聶伯羅庇脫羅夫斯克（Дніпропетровск）或塔什干，大規模的新工廠也在設立起來。這種工業區域分散的過程，正在迅速地進行中。

這大規模的中心的科學機構，主要固然是為了解決如物質本身的構成等的比較基本的問題。但由於科學機構和工廠農場的密切聯繫，這種發展卻使蘇維埃科學慢慢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在以前，科學和實際的工作是分離的，科學家經常注意的只是抽象的問題，但現在，科學的理論卻已有機地和實際技術的需要聯繫起來了。科學和科學家到處可以接觸了。科學和科學知識已普及到更廣泛的範圍，可以更密切地應用於生活的需要。

固然，個別的科學家有發揮創造力的廣泛範圍，而且，他的貢獻和研究，較之別的地方可以獲得更多的資助，但他在全部的科學領域中，卻有他一定的崗位，必須把住它。他對於自己研究範圍以外的事物，不能隨意武斷。就公衆的觀點看來，無論個別專家怎樣的出名，但普通說的總是學院的名字，而不是個人的名字：如帕夫洛夫學院、庫納科夫（Курнаков）學院等。蘇維埃科學集體的性質，就這樣地表現着和強調着。個人的天才固然比以前更受到了重視，但却不再像早期的偉大的羅蒙諾梭夫（Ломоносов）似的被當作孤立的人物，而被當作了一個科學院的首腦和導師。

由於科學知識的複雜無窮，這種集體的工作是一天比一天的成爲必要了，蘇聯每年發表着幾

萬篇的科學論文，這一面使個別的工作者，可以完全把握自己範圍以外的任何個別的趨勢，一面也增加了組織集體工作的需要。

事情還不僅是如此。拿一個科學院圍繞着一個有顯著天才的人，那意義是雙重的，既鼓勵了年青的一代，又保持了老的一代年青。這結果是傳統和進取的健全的結合。前輩的知識，鼓勵了對於科學傳統的尊敬；青年人則有的是勇氣和意志，倘如必要，能够以革命的勇敢精神，跟過去斷絕。

蘇維埃實驗室鼓勵着的這種進取和探索的精神，獲得了每天的勝利。這可以從一個簡單的例證看出來。前輩地質學家對於高加索礦藏的可能採取了否定的態度。老地質學家們在理論上認定，這些山脈的地質時期是太幼稚了，不會有珍貴的礦藏的累積。青年的地質學家對這一判斷挑戰，他們到高山去探險，不但發現了錫、鋅、銅和砷礦，而且還發現了難得的探索已久的鉛礦和鎢礦。同樣的勇敢精神，征服了一向認為荒涼的無用的北極。

科學與工業結合的直接而有意義的產物，乃是真正的科學不能僅滿足於記錄和思索的這一個原則。敏捷行動和沈着深思是同樣的必要。協助國民經濟的建立，代替了「為科學而科學」的原來動機，而這一果斷進取的結果，使蘇維埃科學蒸蒸日上，空前未有地解決了根本的問題。

世界是可知的和合乎邏輯的；一切自然的現象都是互相關聯的；一切自然的進程都是有原因的；這些都是蘇維埃科學根本的信條。這些信條產生了有用的結果，往往是驚人的結果。世界上最

大鉀礦在烏拉爾西部的發現，便提供了一個卓越的例證。

在舊的科學之下，固然也有許多個別的孤立的發現。礦藏的探尋、記載和計劃，都是根據了地質學的地圖。那探索是無定向的，因此只是造成了一種毫無系統蒐集。

今天蘇維埃科學的觀察就深入了。地質學地圖上所標出的那些重要的點，就是開礦者在探索新礦和要知道那裏去探索時的實際問題。現在，蘇維埃的科學證明這些礦藏的分布，並非只是由於過去地質力量的偶然結果，它們是有一定規律的；它們有着相互之間和前後脈絡的必然關係；它們的分布，和原子分布在世界的法則相關聯。那些複雜的法則的發現，乃是地質化學工作的產物，地質化學是從兩種科學併合造成的一種新科學。根據數學上或然率的法則，他們已可能先行推測，然後指示礦工去着手開發了。

理論上的進步，認為在烏拉爾西部的特殊條件下發現鉀礦是可能的，這結果遂造成了世界最大鉀礦工業的建立。

這不但對蘇聯有幫助。還對科學家更有幫助：這使他在解決數理化學的複雜問題時，有了新的已知數。實踐發揮着理論，理論推進着實踐，這兩者在蘇維埃科學中結合為一了。

不統一的詳盡的科學觀察，是過去的方法。詳盡的觀察也是今天的方法，不過它們是統一的，而且注重於個別現象的主要性質更深刻的研究。事實的蒐集也像以前一樣的注重，不過，更着眼於新的理論一般原則的形成。自然，這些理論得有着鐵硬事實的支持。

不消說，到處的科學家都是如此的；理論和實際的印證，跟現代科學不能分開。但在蘇聯，理論和實際的聯繫是更密切更牢不可破的：它消除了發現和應用之間的缺陷——這在世界各處都很嚴重。在西方世界中，個人的私利，往往妨礙了新的學說和發現的立即應用——即使不是出於積極的破壞——但在一個惟有整個國家利益的地方，這却不能妨礙進步或有利的應用。

這使科學工作和科學發現有了當前的實際方向。這也增加了科學成就的普遍的知識和興趣。最抽象的理論在應用關係上表現了嶄新的性質。例如現代物理學在研究地球及其表面的嘗試中，形成了深奧的學說，這立即被應用於石油和礦藏新資源的開發，而表現了新的意義和引起了熱烈的興趣。跟鉀礦的發現一樣，烏拉爾油田的發現，也是基本理論概念跟現代地質物理學和地質化學的數理方法的直接產物，而且，在工作開始之前，絕未因私人利益而就延了時間。

本章介紹蘇維埃的科學，着重敘述的是它的組織，而不是它的成就，這樣做是正確的。一國科學的基礎，往往比它當前的成就更重要。今天打定了結實的基礎，高峯便會在明天出現。在蘇聯，立法和行政的領導者，正是拿這一種又廣又深的思想作基礎，使全國人民養成了科學思想的態度，而這便是蘇維埃科學最有意義的因素。

在高等教育的範圍中，在新的科學研究和活動的廣度上，在科學工作者的訓練和增加上，在毫不吝惜的經費支出上，以及用日常的科學成就的故事來鼓勵普通科學興趣的努力上——到處顯示着未來的希望。

這倒不是說現行的成就就缺乏。新的發現每天有，不但理論上的勝利，也有着生產力的進展，這都立刻應用於工業，都立刻由報紙公布着。烏拉爾的鉀礦和油田的發現，不是孤立的勝利。虱方面的進步，也經常為每一個人所瞭解。

例如在物理學方面，據霞斐教授最近研究的結果，認為建築物和機器所用的物質材料，是看似比現在所用的物質輕得多而且堅實得多的。他鑒於物質的機械力太低了，按理論上說應該可以變得多的，他從顯微鏡中發現了物質表面的缺點。固體的物質，實際上由聚集的原子所構成。用X光分析它們的結晶，它們的強度就可以算出。它們應該比現在的強好幾倍，蘇維埃科學家於是熱心探索着弱點。這原因發現了而且克服了，建築師和工程師可以得到了革新的材料；建築物和機器的構造可以變得更便宜、更輕、更堅實，而且可能更其盡善盡美了。

那弱點已看出是在於表面組織的分裂。舉一個例，拿熱水倒在鹽塊上，就會影響它的表面，而增加它二十倍的強度。玻璃的表面經過適當改造後，也可以增加十倍的強度。

霞斐教授和他學派的另一成就，是起於他對各種物質的電子性質的研究。大量的太陽能量達到了地球。植物僅吸收了它的百分之一。它們還不足以化為能力。霞斐說：「地球表面的每一平方公尺，是和太陽光線垂直的，它只能吸收一庇的能量。」我們怎樣把它化為能力呢？

假如我們今天已更接近了回答，那大部份是靠了霞斐的工作。在上世紀之末，實驗證明着陽光照在一塊鋅板上，會使這塊鋅板所連接的金屬線網產生電流。愛因斯坦應用光電子 (Photo-

Cell) 儀器，使光變成了電流。作為電力單位是很微弱的，這最好是充作「眼」的用途，可以指點迷霧中的船舶，和飛機的瞄準。但爲什麼不能變爲電力？霞斐譬喻這種大量電力的喪失情形，好像是「把水傾注於一個篩管，剩下來的只有很少的幾滴。」

霞斐始終是這方面的先驅者。根據了理論上的指示，他選擇了新的材料，比別的材料更適宜於轉化光能爲電能。結果就產生了更好的堅固的光電子。用在有聲電影中，它們能發出更清晰的聲音。用在開礦工業上，它們能對危險氣體的發生，立即指示警告：當最小的一塊燃燒體觸及時，那敏感的光電子就立刻會覺察到傳熱的鉑片的溫度的略微上昇。

還有一種有趣的用途，就是那敏感的針形的光電子，可以試驗一個工廠和它周圍空氣間的溫度的差別，倘如一碰到危險點，立刻會發出警告的。

關於卡必蔡的研究工作，即把溫度降到非常低，從電子的緩慢活動中來考察物質的性質，我在上面已經說到過了。我們可以看出，他和霞斐以及別的物理學家，注意的是長期的工作，這工作在眼前未必有實用的效果。他們甚至在戰爭時期中也繼續着這工作，並且得到政府的鼓勵和援助。

蘇維埃當局對於純粹數學和天文學，特別是那些沒有當前實用意義的科學，也同樣加以顯著的鼓勵。基本的理論研究和應用科學獲得一樣多的支持。

蘇聯的科學勘察，也同樣深入到地下和天空。卡拉育夫 (Krayov) 教授會深入到地下二十

哩，現在還更深入地在考察地球的構造；別的科學家，也用了精密的電學技術，深入天空，要比那超級的探照光線所能達到的，還超過八哩以上。

科學院院長瓦味洛夫 (S. I. Vavilov) 曾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起草現行的五年計劃時說：「一九四六年是原子能、雷達、火箭和無線電操縱的時代，因此增強我們五年計劃的物理基礎是絕對必要的。蘇維埃的科學家應該繼續研究物質的構造、基本原素的問題、原子核的構造、結晶體和液體。尤其應該特別注意的是原子能和宇宙線。」

他又說到應該集中注意於今天最顯著的問題，如關於運動的穩定性，和振動 (Oscillation) 的學說。

具有當前實際重要性的是改良和調節土壤組織的工作。

例如，適當的物理方法可以使泥沙變成土壤，用泥炭紙張和人造絲的廢物所造成的一種樹膠的混合物，可以把黏土變為沃壤的。

據研究的結果，顏色對於土壤熱度的反射，有顯著的作用，在盛熱的中亞細亞，白色的材料可以吸收熱度，使其蒸發為水氣；而倘如把百分之十一的瀝青液，加到列寧格勒的冷土中，則由於熱度吸收力的消滅，土壤就會變黑了。蘇聯在土壤科學方面是先進的。別國都採用它的方法和術語。蘇聯的工程師又完成了高壓力汽鍋的實驗。兩隻具有五百度高熱——已近於發紅光的熱

度——蒸汽的洛夫勒（Loettler）汽鍋，在每方吋的四分之三噸的壓力下，可以供給其所聯接的鍋管以六萬瓩的電力，這鍋管幾呎長，只有兩呎的直徑，就它巨大的電力產量來說，簡直小得可笑。

在戰時，德國人的轟炸斷絕了煤的供給，燃料大感恐慌，蘇聯的地質學家和工程師受了這一刺激，設法在葉爾上加（Ye'shanka）的村莊裏，從地下供給瓦斯，這樣終於拯救了伏爾加河畔薩拉托夫的戰爭工業。他們把瓦斯從一條很快敷設起來的十哩長的氣管通到薩拉托夫去。在今天，豐富的瓦斯就從這同一的幾乎無窮盡的源泉，經由直徑很大的氣管，通過九條河流和無數的湖泊，供給莫斯科以光和熱。從這同一源泉供應史太林格勒的管線，也正在計劃中。

化學和生物學也有出色的成就。化學家泰爾默特（Talmud）曾實驗了硬化沙礫所吸收的泥土層的效果。他預料這一方法有重要的實用意義，因為改變了泥土的性質，房屋建築和路基就可以有堅實的材料。他又估計把某種液體散滲在泥土上，可以使泥土硬化，這對於蘇聯是一件極重要的事情，因為在蘇聯，築路和建築材料的缺乏，正成爲一個嚴重的問題。

列寧農業科學院院長瓦味洛夫領導着一萬八千個的科學工作者，他們在努力實驗、改善和開拓蘇聯的植物資源。他們又蒐集世界的植物材料來實驗。

世界所有的植物都將加以試驗。有三百位旅行的植物學家，將在十年之內蒐集三十萬種的植

物，包括南美三十種的野生馬鈴薯。蘇維埃科學家認為有七百到八百種的植物具有着工業上的重要性，一百五十種出產在中國，別的國家也有不少種類。例如波斯，那野生的樹林真是豐富得驚人，彷彿是埃田樂園故事中的環境。

任何特殊種類植物的本原，可以從鄰近所生長的各種植物加以合理的推測。假如這是真的，那就可知軟麥、穀類、豌豆和杏子產自西南亞；燕麥、大麥和薔蘆產自東南亞；玉葱、桃子、橄欖和無花果產自地中海區域；硬麥產自阿比西尼亞；而向日葵則產自南美和墨西哥。

小麥有各種不同的性質。外高加索三千呎高山上所產的小麥是耐久不壞的。阿比西尼亞出產的小麥是早熟的。硬麥也出產於敘利亞和巴力斯坦。荷蘭和斯坎狄那維亞的小麥收穫最豐，實大，莖美，但遲熟，質地也不好。科學家正在想用異種交配法，把各種小麥早熟的、收穫量豐富的以及耐久不壞的性質併合起來，以產生一種新型的小麥。

讓我摘錄幾位英國科學家論述後蘇聯科學的話，來作為本章的結束吧。劍橋大學教授亞特里安（E. D. Adrian）說：「蘇聯擁有這許多的生理學者，她在未來幾年中的研究成績必將超過歐洲的一切。」赫胥黎（Julian Huxley）說：「在生物學的研究方面，蘇聯已達到了最先進的國家之一的地位。」他預言在若干部門中，蘇聯馬上要成為世界的領導者。牛津大學辛雪爾伍特教授（C. N. Hinshelwood）說：「最深刻的印象，也許就是一個無數熱情的科學工作者的社會，在全國最著名的學者領導之下，居住着最宏偉的大廈，具備着他們工作所必需的一切便利，

又享有着遍及全國的威望，這在學術史上幾乎是空前的。」

四 計劃社會中的勞動

蘇維埃勞動的組織，是那擁有廣大會員的蘇維埃職工會的任務。

直到一九四六年下半年止，職工會中央委員會的主席是斯維爾尼克，短小、肥碩，有着果斷、堅決而溫和的面容，我在蘇聯會單獨見到他。我以前也會和他見過面，那是在倫敦，當時他正同蘇聯職工會的代表，訪問着英國的職工會。這一次我又在莫斯科和他相見了。他特別在克里姆林宮接見我。

像史太林一樣，斯維爾尼克當時是職工會的主席，現在是蘇維埃政府的主席了，他款待賓客也出於樸素的熱誠，既不健談，也不隨便。他一些沒有自傲的態度，更毫不對他的客人有一些暗示，自以為是全蘇聯職工大會的第一號領袖；全蘇聯的職工大會是由一百九十一個職工會組成的，戰前擁有二千五百五十萬個會員，他是全世界最大規模的一個團體的行政領袖。

這樣大規模的職工會運動，完全以全部工業而非以部份職業為組織的基礎，應該可以成爲戰鬥的有力武器；這樣的團體倘如號召一次罷工，必將使全部工業陷於停頓的。

然而，罷工從來不發生。爲什麼緣故呢？

罷工是非法的嗎？和平時期當然不是的。國家憲法上沒有反罷工的法律規定。那末，爲什麼

沒有像別國一樣的秘密或公開的罷工呢？這主要是因為沒有鬥爭的對象，和沒有罷工的需要。行政部門或組織之間儘許有意見的分歧和熱烈的摩擦，需要着解決，但根本的鬥爭是不存在的，因為沒有對抗的敵人。

在資本主義工業中，衝突的因素總是存在的，因為兩個對立的利益始終存在。在資本主義工業中，勞動是一種耗費，是工業的負擔。一種商品的價格要看生產的耗費，爲了競爭的價格，耗費自然是愈低愈好。因此對於工資，總永遠力求其低。

但工人希望着生活水準的提高，這意思就是勞動代價的提高。因此發生了罷工。新的方法固然使生產成本減低了，但雇主要求的是利潤；工人要求的是工資的增加。他們鬥爭着。當鬥爭的緊張達到爆裂點時，我們就看到了罷工或「閉廠」(Lock-Out)。

在蘇聯，情形就根本不同。沒有追求利潤的雇主，剝削着那領取工資和追求較高生活水準的工人。領取工資的人們就是部份的主人。你不會自己打自己；你不會拿罷工來反對自己。你要奮鬥的是在克服行政上的無效率，或官僚的傾向，或個人的困難。根本的利益衝突是沒有的。

也許又有人要問，既然這樣，爲什麼還要組織職工會？回答很簡單。因爲即使當工業已爲人民所有時，仍有組織的問題需要解決，種種的設施需要安排，工人對於他們自己的團體是最感興趣的。工資率需要規定，那就必須先把技術分類，然後決定工資率。爲使工人維持高度的效率，房屋、環境、衛生和安全必須加以注意。社會保險和疾病福利需要確定和執行。

工作的興趣需要在工作培養，也需要工作以外的文化發展。職工會就是爲了這一切需要而存在。國家不但承認了職工會從事一切活動的權利，而且還積極地鼓勵它們去完成。憲法第一百二十六條說：

爲適合勞動者利益並發展民衆組織自動性及政治積極性計，保證蘇聯公民有權結合於各種社會團體，即職工會、合作社、青年團體、體育及國防組織，文化、技術及科學會社。

這是民主真正的憲章，職工會乃其實質的表徵。職工會廣大的會員，倒不僅在於登記的名冊。會員們參加着集會和享有選舉的權利：甚至當戰爭緊張的時期，各職工會會員在各地選舉中投票的仍達百分之七十八。有五百萬以上的會員——即五分之一——服務於各種各樣的委員會。蘇維埃職工會的組織，在理論上是非常簡單的。任何民族的每一男女，只要是生產者，都可以成爲職工會的一員，這不但包括了他本身的行業，譬如磚匠或鉛匠，同時也包括了他所工作的整個工業單位，無論他是磚匠、鉛匠、書記、木匠或清潔夫。

在蘇聯，每一相當規模的國家農場或工廠，便是一個小的中心區，設有它自己的學校、托兒所、公共廚房、醫院、俱樂部以至於戲院——這全是由工人們自己，通過職工會各部門來設計、建設、組織和執行的。

廣大多數的勞動者——二千六百萬——都加入了一百六十四個蘇維埃職工會；任何勞動者，除了那些有權監察或開除會員者之外，都有當選的資格。每一職工會的範圍就跟蘇聯本身同樣的

廣泛。地方職工會是沒有的。只有地方的分會。由於地域的遼闊，在若干最大工業如煤礦和鋼鐵工業中，有着區域的劃分：例如南部、東部和西部區域的鋼鐵工人，就分別組織了三個鋼鐵職工會。

在每一企業中，所有從事共同工作的各組，都自行組織突擊隊。他們定期集會討論職工會的事情，每年兩次選舉職員和出席工務委員會的代表。各別職工會的全蘇大會，每兩年選舉一次。這大會是在莫斯科舉行的，決定一般的政策，並選出常務委員會以執行日常的工作。

全蘇職工會大會，每隔兩年舉行，各別職工會得按範圍大小派遣代表出席。全蘇職工會大會由二千個代表組成，為所有職工會的最高大會。它指派執行委員會，並決定職工會政策和進展的廣闊的路線。

代表們對上向各別職工會的全蘇大會傳達意見和情報，又通過這傳達全蘇職工會大會。這全蘇職工會大會則通過全蘇職工會中央委員會，對下向每個職工會的中央委員會，發布規則和建議，並通過它們最後傳達到工廠或機關的委員會。它的指示包括着工場的衛生、文化活動和保險，但最主要則是集體的協定。

五 計劃的分配

當土地、礦藏、水力、木材、生產手段和運輸工具都為人民所有時，仍有兩大問題面對着他

們。第一個是生產問題。製造些什麼：次序如何，比例如何，容積如何以及工廠應設在何處，始能避免運輸的浪費？第二是分配問題，關於製成品交易的問題。一個是農場和工廠的問題：如何使工業有利的問題；另一個是商店的問題：如何使貿易有利的問題。後者顯然是更困難的工作。

x

x

x

x

x

在早期時候，這個問題是用過度的硬性的集中來解決的。這是權宜之計，並不適合於平時，不過在初期，當糧食的需要非常迫切的時候，這是必要的。國家一開始就統制了糧食，然後通過合作社來分配。這些合作社有許多已經存在，它的創設是爲了避免商人過度的營利，由許多個人聯合起來整批的購買貨物，然後照成本配給每一社員。這種國家集中的統制，在初期雖屬必要，但究竟是麻煩而呆板的，而且，除爲了糧食的迫切需要以外，也是無效率的。

x

x

x

x

x

蘇聯政府於是尋求着一種彈性而有效的集體貿易的新方式，當這一方式確定時，私營商人又暫時得到了新的權利，他們在市場上靈活的活動，很快就掌握了城市中零售貿易的百分之九十，和鄉村中的百分之八十。合作社出售的貨物比較低廉，但它們的組織無論如何是不够的。合作社不能適應市場的需要。貿易是一種藝術，是必須學習的。

x

x

x

x

x

新的社會主義工程師，瞭解貿易是有關大局的，曾着重地這樣指出：「在目前的條件下，尤

其是在像我們這樣的一個國度中，合作社運動實有着空前重大和決定的重要性，因為我們有着大量的的小農田地，除了通過集體的組織形式，即通過消費和生產合作社的形式進向社會主義外，是沒有別條路的。」因此，政府用了全付力量支持着合作社。社會主義本身正處於存亡的關頭。

幸而，合作社組織在俄國不算是新東西。早在一八六四年，離羅煦達爾（Rochdale）等先驅者不過二十年以後，烏拉爾的庫諾夫斯基（Кыновскы）的礦工，就已聯合到莫斯科購買茶葉，並以合理的價格在他們自己中間分配。這一運動推廣着。到一九〇五—六年的革命之後，它更得到了鼓勵，因為當時鄉間的人民都覺醒了，並且進而組織着擁有大量會員的新的合作團體。當第一次大戰結束時，會員人數從一百五十萬增加到五百萬，到了一九一八年一月，又躍增到九百萬人。

兩種特殊形式的合作社，即農業合作社和生產者合作社，平行地發展着。在農業合作社方面，出產亞麻和馬鈴薯等而同時又需要種籽和農具的農民，自動形成了組織，以集體出賣他們的產品和買進他們的農業需要品。

在生產者合作社方面，各種手藝的工人都聯合起來，集體出賣他們的產品。一九二四年，國家開始以最大努力加強着消費合作社，那努力的措施是減低價格，豁免捐稅和改善服務。到一九二九年，大規模的工業已成了一種實質的力量。爲了達到工業和農業的平衡，國家努力建立着集體性和合作性的農業，首先着手的是銷售它們的產物。由於兩方面的成功，私人貿易在兩年以後

停止了。國家和合作社，掌握了中間的地位。

同時，工資提高了。由於工資的提高，糧食和製成品的需要也增加了。國家貿易機關和合作社，竭力適應着需要的供給。最初，特別在都市地帶，國家貿易機關的發展和範圍是超過消費合作社的。從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五年，國營的商店和市場，從二三、六〇〇處增至一〇八、九〇〇處；消費合作社則從一一九、三〇〇增加到一五八、一〇〇單位。

國家逐漸變成了城市中的主要貿易者。在一九三七年，它掌握了城市零售貿易的百分之九十五，而在鄉村中，則為百分之二七·九，消費合作社掌握了百分之七一·三。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九日，蘇聯部長會議決定恢復合作社在城市的貿易，並包括鄉村在內。它授權聯邦消費合作中央聯合會（Centrosyus）收購鄉村剩餘的產品，而以國家的限價，到城市中出售；它又賦予合作社以種種的便利，俾使它們擴充自身的生產，而以充份的消費品供給城市和鄉村。原料是供給的，捐稅是免除的，一九四七年預定的目標，要設立新的生產合作社二千五百所，又預定在這一年中，除了別的物品外，更須造床五十萬架，陶器四千噸，氈鞋五百萬雙，長短襪二千三百萬雙和皮靴一千五百萬雙。消費合作社的第一件大事是改善鄉村貿易的便利，在一九三六年，它所負的責任不過限於鄉村，城市方面可以不管。但在一九四六年，它的責任卻擴大到城市了。在今天，蘇聯的消費合作社擁有會員七千六百萬，可說是世界最大的合作運動；它的統一機構建立在鄉村消費合作社（Selpo）的廣闊基礎上，這些又統一於消費合作社區聯合

會，再有消費合作州聯合會或加盟共和國（俄羅斯共和國除外）消費合作聯合總會。這一切聯合會最後又統一於一個中央的團體，叫做聯邦消費合作社中央聯合會（Central Union of Consumers Co-operation Societies of Th. U. S. S. R 簡稱 Centrosyus）。俄羅斯聯邦的各區和共和國的聯合會，都有代表直接參加中央聯合會，各加盟共和國區域的聯合會則通過了共和國消費合作社運動的代表。鄉村合作社由會員大會所控制，會員大會每隔三月至少開會一次。倘如構成合作社的鄉村是分散的，則由每年選出的代表控制之。

這會員大會另設有五人至七人的管理委員會作為執行的機關，法律賦予它以選任幹部和稽核委員會、考核會員入會、制定業務計劃以及分配紅利等等的權力。會議必須屆滿全體會員的百分之六十六的法定人數，始得召開，這在實際上確是順利地做到的：在一九四四年，出席一萬八千六百九十五個鄉村消費合作社會議的，平均佔全部會員人數的百分之八十七·七。會員的資格不分性別，年齡須在十六歲以上，並須繳納入會費三盧布及認股至少五十盧布。鄉村和城市合作社等於是金字塔的基礎，而中央聯合會則是金字塔的頂尖，它領導和計劃着消費合作社整個的制度、購買農產品、組織消費品的生產、烘焙麵包、採辦公共食糧、分配投資、定配貨物以至設計信用的分配等。

鄉村合作社的零售店裏陳列着各種的貨色——麵包、肉、魚、野味、豬油、蛋、茶葉、咖啡、酒、啤酒、罐頭食品、毛織品、長靴和衣服、文具、窗戶玻璃和鐵器——包羅萬象的各種貨

品，年年增加着，都是從區聯合會批售來的，而區聯合會，又是從州聯合會和共和國聯合會批售的。

消費合作社對社員販賣都市的出品。他們也對農民和都市販賣農產品，這樣就形成了鄉村和都市的聯繫。他們設法貯藏着糧食。他們曬乾和醃製蔬菜和水果。他們經營着麵包的製造和烘焙，這樣就使主婦們獲得解放，可以從事生產工作和社會活動了。

每年年終的紅利分配是由會員大會決定的，這都分配於股利、俱樂部 and 運動場的設備、工作人員的訓練以及麵包烘焙房設施等各項。餘下的必須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滾入基本的資金。消費合作社在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活動是很廣泛的，而且在不斷增加中。

可以想像，要有效地管制一個這麼大規模的這麼迅速地發展的又是這麼多樣性的組織，是需要高度技術的人材的。這種需要早被公認，而且正是消費合作社的許多教育活動的主要目的。

(一) 合作社設有研究院，專事訓練高級的技術人員。研究院的修業期限四年，每人必須從下列各課中選修其一：(a) 經濟和會計學；(b) 經濟和貿易，包括計劃；(c) 特別研究農產品和工業製成品的貿易。所有各部一般的必修課程，則包括政治經濟學、高等數學、統計學、歷史、簿記和蘇維埃商業組織學。每一部門特別教授着各該部門的專門知識。入學的資格，必須年在十七歲以下，修畢全部的中等教育。

(二) 較低一級的為高級職業學校，專收十四歲到十五歲的學生，這種學校共有四十四所，

全部學生九千七百人，修業期限三年。這裏訓練的都是簿記員，和物品專門家等。

(三)最後是七十一所的合作社商業學校，全部學生人數五千零九十人，學生的年齡為十二到十四歲，修業期限六年。此外還設有函授部。

教育工作是由中央聯合會主持的，經費則由鄉村和區聯合會撥付，但區聯合會至少須保留百分之二十，作為該區本身的教育費用。

不過，消費合作社雖然也參加種種一般的文化活動，但担负最主要責任的，仍是職工會。

六 進步的民主化和計劃：選舉

蘇維埃計劃不但是政府的計劃，這也是人民的計劃。這個計劃如果沒有人民支持的堅實基礎，就毫無用處，而這樣的支持是存在的。這計劃倚靠着它細胞組織的力量，那就是廣大的思想和行動的地方中心的存在，它們對於計劃的形成和執行，都切感到有直接的份兒。

蘇聯的細胞組織經歷了戰爭的最後考驗。戰爭確乎顯示了人民或細胞組織對於計劃支持的力量。戰爭產生了遊擊隊，證明了全部經濟組織倚賴人民的意志而存在，即使損失若干細胞而仍能繼續活動的事實。戰爭一停止，就恢復了更充份的組織，這完全是出於人民自己的決心和智慧，而並不等待上面的指示。這種細胞組織的力量，這種人民對於計劃的支持，這種推動計劃的人民運動，是需要而且應該加以詳細研究的，因為這和蘇聯的民主概念不可分。

蘇維埃當局認為計劃的進程便是他們社會的進步的民主化。正是這種參預計劃及其執行的切身之感，這纔使人民大眾從來未有地感覺到，他們已掌握了決定自己前途的實際權力。從人民親自參預計劃中所表現的向上流的人民的權力，乃是蘇維埃生活最顯著的特徵之一，這也證明了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根本的不同，法西斯主義只行施着自上而下的權力。

人民有權監督選出的地方當局，工廠中的職工會，以及鄉村區域中的集體農場委員會，人民的廣泛自由，可以從這裏看出來。

那選出的地方當局是對人民大眾負責的，這形成了平時和戰時的蘇維埃權力的真正源泉。這是基本的細胞。在戰爭中，即使當德軍的侵入隔斷了地方和中央的聯繫時，它仍維持着組織；和平一回復，它重又恢復了對中央的關係，並使中央亦處於它的充份影響下。這些細胞永遠把新的生命注射到計劃的形成和實施中。這千千萬萬的小委員會或地方議會，享有着處理自己事情的廣泛權力，今天也就是忙於重建村莊和公路，重行修理工場、工廠、學校或教堂的地方執行機關。中央的組織則集中注意於基本機構的復興。

蘇聯民選的代表，就是用這樣方法監督行政的首腦，這是從來所未有的。他們也把權力行施到工場和農場，行施到地方的行政，最後乃至區和中央的行政。假如這還沒有完全做到，那末確已好好在做。一九四六年三月，有幾個細心的實地觀察者曾經指出，最高蘇維埃本身的特點，就是在於一致坦白而無畏的精神。

這種進程正就是列寧所設計的，他希望國家中的每一廚子，都應當知道怎樣統治國家。爲了鼓勵人民行施他們地方的權力，因此，地方的責任自始就成了蘇維埃政權重要的目標。

列寧及新蘇維埃秩序建立者所尋求解決的最重要的問題就在這點：怎樣使平常的男女，所有的男女，能够以公民、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資格，來參加政府的日常工作？解決的辦法是這樣的：凡屬年在十八歲以上的公民，不分性別，都有權選舉鄉村蘇維埃（議會）的代表。每一鄉村有它自己的蘇維埃，每一百居民中選出代表一人。這是政府最基層的機構，它一方面受權執行上級政廳的指示，以至設立自己的法庭，處理地方的司法行政。

鄉村蘇維埃監督着集體農場、工廠企業和消費合作社的工作效率。它檢查和稽核地方機關的眼目，決定凡有違反法律或計劃者必要的罰金和懲戒。在本區範圍之內，鄉村蘇維埃是全權的。在本區範圍之外，它也應該瞭解區、省、共和國最後乃至整個蘇聯以及外面國際世界的更大的事情，並與之相聯繫。

在另一方面，它受權並被鼓勵向上級提出和它有關於任何事情的意見。這是極端重要的原則。因了這種地方蘇維埃的存在和權力，再加以事實上每一鄉村或城市的公民，有權直接選舉蘇聯盟蘇維埃和民族蘇維埃的代表，這就替政府的真正民主方式，奠定了基礎。向上的政權和向下的治權交流着。被選出的上層幹部，不但必須充份瞭解下層大多數人民的願望，而且倘若不能執行他們的願望時，還可以被撤回，這樣一來，它們就能制定法規和意見，再向下通過每級選出的機

關而達到鄉村蘇維埃。這立法和行政機構系統的各級，即鄉村或城市蘇維埃、區蘇維埃、州蘇維埃等，都是由人民自己直接選出的。

計劃方面也應用着同一的原則，計劃必須經過從上到下和從下到上的討論。一個計劃的草案，和每一工業、鄉村或個人在計劃中所佔的地位，先須根據已有的材料，經過公開的討論和解釋。這些解釋的意見傳導到上面，就轉化為來自下面的權力；地方環境和需要的意見的向上運行，產生了權力，在最後核准施行的計劃中表現着這權力。社會中的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參預決定計劃的，因此便特別關切它的適當的執行。

這同樣的原則，也確乎或多或少地，推動着職工會、集體農場、合作社和共產黨。這是自下而上的生命力的高漲，自由的表示意見、希望和意志。而且，我們還必須恰當地指出，這同樣的原則也推行到整個蘇聯，以及蘇聯全境內一百五十種以上的民族或集團之間。例如一個烏茲貝克人，他雖在塔什干的棉織廠工作，卻充份瞭解全盤計劃的意義和他的工業在計劃中的地位。他對於全國的建設努力，是有密切相關之感的。

委員會的每一份子都有控制自己命運的權力；加上少數民族和性別之間在蘇聯的完全平等；沒有任何的歧視；一切蘇維埃公民有經濟的社會的權利和機會的保障；更沒有任何對於報紙、無線電和電影的有力的獨佔；這一切原則，便是蘇維埃政府建立民主所根據的基礎。

蘇聯選舉制度和我們選舉制度的廣泛區別是需要詳細檢討的。他們是一黨制度，我們則是兩

黨或三黨制度。驟然一看，很易認為這是蒙蔽，認為意志的自由是沒有的，以至於認為雖然幾乎人人都投票，雖然達到了百分之九十九的多數，但這樣的一致性是一種欺騙。

然而，說這種選舉中一致的利益為欺騙是很難想像的，更不能說，這種經過幾星期羣衆會議和熱烈討論後的羣衆投票，乃是出於由上而下的操縱，建立在羣衆恐怖主義和壓迫的基礎上。你和蘇聯任何知識份子談話，你馬上會發現他對投票的意義具有不可動搖的信仰，他認為選舉票正是代表着選民真正的權力。這事情需要詳細的檢討，讓我們先從分析選舉的程序開始。候選人不是由黨提名，而是由廣泛的團體提名的。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青年團；所有職工會的任何部門；任何運動或文化的團體；任何戲院的工作人員或作家聯盟；或者是任何工廠或農場依法特別召集的羣衆大會。當候選人提名之前，在各種活動的中心，就在進行好幾星期的討論，以考察誰是最能為衆擁護的候選人。然後由各提名團體的代表，分組舉行選舉會議。會議中主要的討論是在決定最能為大多數團體所接受的候選人。這樣，由舉手表決選出了黨和非黨所構成的集團的候選人，這候選人也就得到了所有團體的支持。

在選舉之前幾星期，報紙公佈了各部門候選人詳細的生平經歷，讓大家自由討論着。共產黨固然佔有最大的優勢，但地方團體倘有充份的理由，也常常可以拒絕黨的提名。不過我們必須記住，共產黨本身形成了一切組織的核心，它必然照顧到他們的特具條件，而把他們推薦給全國。有極其重要的一點是決不能忘記的。這接觸到我們選舉方法不同的全部問題的核心。蘇聯在

經濟和社會的意義上，沒有任何利益衝突的人民集團，這是我們從不知道的事情，而且難以理解的。蘇聯沒有敵對的階級。因此沒有像這裏一樣的需要政治集團來代表重要的利益。因此也就沒有對立的政黨的要求。這並非就是說沒有不同意見的辯論，辯論而且往往是激烈而白熱化的，不過他們所辯論的，已轉到如何激勵生產和選擇最優秀的領導者來擴充生產的這等問題。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已像格言似的被一致接受了，它的不成問題，猶如外科防腐劑對於今天英國的醫生不成問題一樣。由熱烈討論所引起的興趣，正是蘇維埃統治民主基礎的最好證據。一九三六年的憲法草案，曾用全聯邦一切主要的語言印行了六千萬份，而提出的修正草案達十三萬份之多——一次空前未有的公民投票。一個如此徹底地運用辯論機會的民族，實具備了真正民主的先決條件。在這種爲了農場或工廠的最大利益打算的討論中，普通的男女，都成了充份自覺的公民。

這一興趣的廣度和深度，表現於勝利日那天，投票的公民的龐大百分數。我以前說過，這龐大百分數的人民的熱烈投票——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投票的佔百分之九九·七，而投票選舉候選人時爲百分之九九·一八——那只因爲選舉本身具有生動的真實的因素：票權是平等的，投票是祕密的，選舉是直接的。

民有、民享和民治，是蘇維埃民主概念的基礎，無疑地，蘇維埃人民相信他們在政府中有最後發言權，因此依照着他們的信心而行動。

在聯邦蘇維埃的選舉中，全國就每三十萬個居民劃分爲平等的選舉區。這樣，莫斯科的每三

十萬居民和烏茲貝克的每三十萬居民，都將在聯邦蘇維埃中選出一個代表。三十萬居民大致等於二十萬成年的選民。

民族蘇維埃保證少數民族有適當的代表，它是這樣選出的：每一加盟共和國推選代表一人，共為十六人。自治共和國各選十一人，——所謂自治共和國是指實質的民族集團，周圍完全是蘇維埃的領土，和非蘇維埃國家沒有共同的邊境；自治省各選五人，民族區各一人。

蘇聯現有十六個加盟共和國是：

- 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共和國 (Russian Soviet Federation Socialist Republic)
-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Ukrainian S. S. R.)
- 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Byelorussian S. S. R.)
- 喬治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Georgian S. S. R.)
- 亞塞爾拜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Azerbaijan S. S. R.)
- 亞美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Armenian S. S. R.)
- 土爾克門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Turkmen S. S. R.)
- 烏茲貝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Uzbek S. S. R.)
- 塔什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Tajik S. S. R.)
- 卡萊赫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Kazakh S. S. R.)

啓耳吉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Kirzhiz S. S. R.)

卡利累阿芬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Karelo-Finnish S. S. R.)

摩爾達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Moldavian S. S. R.)

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Lithuanian S. S. R.)

拉脫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Latvian S. S. R.)

愛沙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Estonian S. S. R.)

依照人口的比例，俄羅斯共和國在聯邦院（聯邦蘇維埃）中佔了幾達一半的席數，但在民族院（民族蘇維埃）中，它的代表卻完全和亞美尼亞的一樣，雖然亞美尼亞的人口，僅及她的七分之一。

七 捐稅·工資·薪金·所得和物價

蘇聯資助着義務教育，資助着免費的醫藥服務，乃至資助着其他一切不斷擴展中的文化娛樂，以走向「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的實現，這錢究竟從何而來？

面對着蘇聯的社會成就，這是一個最常被提出的問題。蘇聯從什麼地方取得錢呢？教育是義務的，費用那裏來？醫藥是不化錢的，費用那裏來？戲院、電影院和歌劇院的票價都是不足抵銷支出的，怎樣來平衡差額呢？對於那掃滅德國戰爭機構的紅軍，又從什麼地方拿錢來裝備和維持

他們？蘇聯各種活動經費的來源，是一個包含許多枝節的問題。這需要着解答，而解答是富有啓示性的。那錢不是來自個人的所得稅。絕對不是，這我們只要檢視一下個人所得稅的數字就可以知道的。一般說來，個人所得稅很輕。在某種特殊情形下要徵收有限的所得稅，這是有重要的社會理由的，我在後面還要講到，不過，這只有很小的數目，不到蘇維埃全部歲收的百分之五。七。所得稅如僅佔國家預算的百分之五或六，這對於英國是很少幫助的。這對於蘇聯也很少幫助。

國家所要用以維持國防、教育、醫藥衛生和社會服務的大部份收入，並非取自所得稅，而是取自集體所有的工業的利益。這種利益，蘇聯在技術上稱爲「累積」。「累積」的意思就是生產費用和市場價格之差。我們乾脆叫它爲利益。這些累積或利益要佔國家預算的百分之九一。九。捐稅則僅佔百分之八。一。

蘇維埃財產制度最大的問題，是如何形成一種可靠的工具，來動員工業的累積或利益，而同時又要增加農業的活動。

先得說些過去的歷史，蘇聯會繼承了一種不良的無效率的捐稅制度。帝俄的捐稅，就社會說有弊病；就國家說無效率。社會的弊病是在於它着重間接稅——對生活必需品的課稅，主要是糧食和酒類。間接稅把最重的負擔壓在最少納稅能力的農民和產業工人的身上。在一九一三年，間接稅和海關的徵稅合起來，佔帝俄全部稅收的百分之八十七；而其中的百分之五十九，是完全從

酒類飲料中徵得的。

間接稅對於國家的弊病，乃是在於它硬性的運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間接稅實際上達到了限度而不能再擴展了，但直接稅卻依然如故，最有納稅能力的富有階級，仍能繼續逃避，即使不是完全不納，至少毫未嚴重影響到他們的財富，這結果是既無法從直接稅來彌補減少稅收，而戰爭緊急時期的支出卻增加着。

單因酒類消費減少而造成稅收的低落，對於帝俄的財政穩定就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帝俄的戰時稅收，已無法給國庫增加一個盧布了。她唯一的辦法是發行紙幣，結果通貨膨脹，物價高漲。地主的產業原封不動，而勞工和職員階級的實際收入——即收入的購買力——則慘澹地下降了。生產減少，紙幣增加。市場上日益減少的貨物需要更多的貨幣，於是物價上漲了。

物物交換代替了貨幣。貨幣已不能代表實質的價值，人民便放棄貨幣而開始以物易物了——拿蛋換刀，拿穀換肥皂。健全的有信用的通貨，原是一個文明社會的要素。一九二四年，政府下令恢復貨幣的使用，恢復的方法之一，便是強迫農民納稅，除實物之外，一部份必須搭付貨幣。由於大家對貨幣的需要，貨幣又有了新價值。在這一情勢之下，在內戰所造成的這一情勢之下，新的蘇維埃政府定出了納稅的新辦法，這新辦法立刻在經濟上收效了，而使社會蒙受其利。這最初時期所施行的新辦法之一，固然是暫時的。但它卻有重要的政治意義。這新辦法便是所得稅，一種課於富有的個人的稅，他們以前幾乎是完全逃避了納稅，——他們雖對生活必需品如糧食也

納稅的，但和他們的全部收益比起來卻微不足道。

這種過份利得稅——通常的名稱——，完全針對着那些累積大量貨幣的人們。這主要是一種戰時的措施。這是一種具有政治目的的捐稅，不但爲了開闢新的稅源，也是爲了摧毀那蘇維埃社會的主要反對者的力量。

就外表說，新政權下的捐稅制度似乎沒有多大的變更，直接稅和間接稅都依然存在。但在實際上，那變更卻是徹底的。重心轉移了，已轉移到直接稅方面。在帝俄時代，直接稅常被忽略，富人們可以逃避納稅，但現在，直接稅已成了新蘇維埃預算最主要的項目。它成了蘇維埃政權所需要和支出的全部經費的主要源泉。

在帝俄時代，財富以及產生財富的機器和土地，都爲私人所有。在蘇聯，那產生財富的機器和土地，卻爲國家和集體的有組織的工人所有了。蘇維埃工業可以分做兩部份：一部份爲國家所有，一部份爲合作社所有，——即是由集體的工人所有並且經營着。這樣，以前一切富有財主所逃避的直接稅，現在課之於社會主義的工業，那是不會也無意於逃避的。直接稅所採取的形式，是對於一切已經製成的出售貨物的課稅：出售的貨物有簡單的紀錄，如汽車工業中的汽車，鞋子工業中的鞋子。製成品的直接稅是當出售時候徵收的，這是蘇維埃所有捐稅中最重要的一種，佔所有稅收的大部份。

現在再講所得和工資。我第一句要說，蘇聯的工資在數量上是有不同的。不平等存在着。那

是有意的。工資的不平等具有鼓勵的作用。但這不是新的辦法。早在十六年前，一九三一年，史太林曾經指出，工資的平等是妨礙進步的，因為熟練工人和生手工人的工資倘如平等，生手工人就懶得作技術上的進修。工資的不平等，是根據了一種精密的統整的計劃，假如在某一特殊情形下，某人能够得到比別人高的報酬，那準是按照計劃辦理，而不是出於偶然或好感。

工資的差別不會造成階級的差別。戰時在英國駐蘇軍事代表團中任職的克蘭克蕭 (Edward Grandkshaw) 在一九四六年五月裏的「新政治家與民族」週刊發表「蘇聯的特權」一文，說得很對：「收入水準的差別，並沒有造成不同成份的新的階級。因不同的勞動方式而造成廣泛區別是不可避免的——白領勞動、農業勞動、技術勞動、不熟練的勞動、知識勞動乃至革命勞動，——我想都可以稱為職業的共產主義。但在他們內部中間所發生的收入的差別，並不造成階級的不同，因此，一個斯泰哈諾夫運動的先驅者，他個人的收入儘可以比工廠的經理高。」

工資的差別，是在酬勞生產力超越平常的工人。它們也因工業和工業之間，部門和部門之間，地方和地方之間而不同。例如織布工業——工資率最低的工業之一——那工資的水準，就遠比重金屬工業或煉油工業的工資為低。假定以一九三八年的織布工業平均收入的指數為一〇〇，那末，重工業的就將為一六〇。

工資也因工作部門而不同。假定機械工業中的工人平均收入的指數為一〇〇，那末一個設計員的薪水當在三五〇以上，一個高級工程師在六〇〇以上，一個大企業的管理者當在二、〇〇〇

以上了。

應該注意的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作為工資的貨幣，還並未包括了一個人的全部薪水或收入。這全部，即指他爲了自己和家庭去賺取支配貨物和福利權力的能力。每一工人除了他基本的貨幣工資外——每一工業，大抵經長期透徹的討論加以規定，他本人也參加討論——還有他件工的收入，或獎勵金和他應得一份的利益分配。很少是限於或需要限於日常的工資。

除此之外，他在那叫做社會化的收入中還有份兒。這一份，他所能得到的東西不是用貨幣支付的。這是依照「各取所需」的原則而免費分配的貨物和社會服務。這包括了各種各樣的福利，而且在不斷地擴充着。它的擴充要靠工人的努力，因之對於各部門的工作和技術具有鼓勵的作用。勞動的生產率愈大，每人所得到的社會福利愈大，猶如工業方面所能給予他的工資也愈高。

要把社會所得的項目完全列舉出來是不可能的，但最主要的不外乎是疾病補助、養老金、醫藥服務、生產服務、家庭津貼、教育、托兒所和幼稚園，以及低於成本的廉價食堂等。通常包括公共水電和無線電在內的房租，是根據收入計算的，不是根據上落的市價，這決不會超過每人收入的貨幣價值的十分之一。

從另外一方面來看，如我在上面一章所說的，一個人的總收入包括兩部份，一部份是工資，可以讓他隨意消費，無論什麼時候或什麼地方。另外一部份他不能隨意消費，但實際上仍是爲他的需要而消費，消費於他和他的家庭實際需要的一切事物的供應——如防衛敵人、一切醫生和醫

院的服務、學校和大學、以及疾病補助和養老金等。

因此，一個人的生產力所得的報酬有兩部份，個人的工資和社會的福利。兩者的發展，隨着工業生產力的擴充而增加，其中個人部份則有着直接和眼前的利益。這樣，他所得的工資，依照他工作的量和質而定，社會福利是他和別人同等享有的，也和別人有同樣的責任，擴充這兩種方式收入的慾望，因此成了對蘇維埃勞動者的一種有力的永遠的鼓勵，使他在求知中不斷上進。

工資支付的不平等，是根據工作結果來支付的原則。件工便是它實施的方法。件工在英國的成績不好，但現在已為許多職工會所接受，而且甚至要求這麼辦。在以前，件工工資率是這樣確定的，先讓最熟練的工人在短期內完成一件工作，就這樣的定出一種標準，還當然超過了生手或比較不強的工人，結果引起怨恨，認為毫不社會化，現在呢，件工的工資率是經過集體協議決定的，因此受到歡迎了。這一面不致過度驅策了任何人，一面又具備着增加生產的必要鼓勵。

確定件工工資率是一樁高度技術性的工作，必須根據許多的考慮。勞動者的技術是一種。工人劃分為八級。工作的條件得考慮，有些工場是溫度適宜而舒適的，有的則因工作性質的關係，如紡織廠，溫度特高，不大舒適。在規定工資率之前，所有這些以及別的更多因素都必須加以精密的估量。

在工資率的規定中，工人們有重大的利益，他們可以通過職工會來發揮他們的意見。工資率的變更，在實行以前必須得職工會的同意，每一工廠，都有工資委員會在精密考查行政當局對於

協定的工資率的措施。

所有勞動者有各種紅利的分配，無論書記或行政人員，機器工人或手藝工人。在零售店裏，店員的紅利得視推銷貨物的手腕，以及顧客們的口碑而定；至于那在店外工作的，則得視其一定時期內的營業額而定。在鐵路專業方面，也有精密的制度，可使大批勞動者享有紅利或基本工資以外的額外件工的報酬。

蘇維埃的包工有一個特殊而合理之點，即超過最低限度要求的產量，可以得到累進的報酬。當生產率超過百分之十時，那工人可得基本率加倍的報酬。假如他再超過的話，可以得到三倍。這種對工人的鼓勵是合理的，因為「超過部份」的工作雖是同樣，但卻可以得到更大的報酬。關於集體農場的薪金，已經在論農業這章中說過了。

有一個因素是基本的。蘇聯的每一工人都是股東，他自己也知道。他在利益方面有份兒，在管理方面也有份兒。在管理方面，他可以通過他的職工會代表來參預；在利益方面，我已經說過，直接可以獲得工資，間接可以獲得社會福利。這些社會福利，有的由國家辦理，有的由企業辦理。預算的利益益的百分之二——利益是有預算的——撥充「管理基金」。超過預算數字的多餘利益，百分之五十也撥充「管理基金」，其餘的百分之五十，則用作資本和減低價格等。「管理基金」完全用於工人的社會福利——如托兒所、圖書館、食堂等等。

現在（一九四六年年底）的情形，是受着某種原則控制的。增加生產的要求是最主要的要

求。跟這配合的是達到更大增產能力的需要。用種種方法鼓勵着更多的收入和更多的學習。戰時的捐稅取消了。這是有利的。沒有像我國的特別捐稅減低了收入更多的慾望。不過，除了主要配給物品的價格非常之低外，各種各樣的食物是缺乏而且很貴的。平常物品如生活娛樂上的留聲機或無線電收音機等也是如此。

這些東西成了鼓勵的獎品。政府在解決了迫切的需要之後，就以高價出售一切這樣的消費品。高工資和低工資，其區別只是表現於收音機的有或無。這也只是表現於一月中有無享受一夜咖啡店的能力。人們都願意爲了這些小小的奢侈而努力工作，誰也不會對這報酬起嫉妬。誰也不需要節約。誰也不需要節約。

自然，政府的最後目的，是以普遍低廉的價格，供應一切需要的物品，從而刺激生產，提高所有人民的生活水準。讓貨物進入公開市場或出售非配給品的「商」店中去競爭，正是替將來作準備，平抑過份高的價格——農民拿自己土地上出產的糧食到公開市場去出售，總是標着很高的價格。但貨物如果多了，「商」店中價格的跌落常是很快的。衣着的價格在一天裏面跌落了百分之四十。依照他們的預計，配給到一九四七年年底準可停止的。

八 財產和所有權

財產在英國和在蘇聯以及在任何國家，是兩種性質的，在蘇聯，財產必須加以嚴格的區別，

受不同法律的節制。在這裏（英國），無論是人們的觀念，或法律的規定，就很少嚴格的區別。

我有一輛奧斯丁汽車。這是我的財產。它的所有權受法律保障。我也可以有份製造奧斯丁汽車的公司的股權。我所有的這份股權，在英國是被許可的，而且有法律保障。汽車和股份都是財產。我們不會把它分列於不同的法律範疇。我們握有其中之一或同時握有兩者，都是一樣的。

這在蘇聯就和我們不同，她一定要把它們加以區別，而分列於不同的範疇。蘇聯承認第一種的權利，卻不承認第二種。蘇聯承認大家有汽車的權利。它目的確乎要把汽車或任何個人需用的東西，讓一切蘇維埃公民享有。至於握有汽車公司的股份，在蘇聯就不可能，因為這樣的股份，代表着一種重要生產手段的所有權，是非法的。

蘇維埃憲法把一切財產分爲兩大類：生產的手段和消費的手段。生產手段是土地和土地下面蘊藏的一切，所有自然的資源、鑛藏、油藏和地下瓦斯，還有河流和森林，工廠和機器，鐵路、水路和天空的交通，郵局、電報、電話、店舖和商業、銀行和保險公司。

另一方面是個人的財產，即個人需要應用和消費的東西，那就是我們需要維持生存和使生活豐富的一切，如可住的房屋，可喫的食物，可穿的衣服，傢俱和烹飪用具，書籍和圖畫，鋼琴，無線電收音機，自由車、汽車、以至一切足以使生活擴大和豐富的這類東西。

在蘇聯，一切主要的生產手段，都是社會主義的或公共的財產。它們連同其稅收，都是屬於國家或合作社事業或公共團體的。

我說主要，因為一個農民仍可永遠擁有和使用一小塊的土地，以從事生產，或是一個補鍋匠，仍可他自己的工場，來製造、修理或出售鍋子；不過誰都不能雇用勞工來幫助自己。因此這樣的所有權是不足道的，它對於整個國家的經濟生活不會發生重大的影響。所有其他的生產手段、和它們的稅收以及產物，都是公共的財產。它們的作用，不是爲了任何個人的私有利益，而是爲了廣大的公衆。這種社會主義所有權，便是蘇維埃社會全部經濟生活的基礎。有了這基礎，纔使計劃經濟可能推行，而這正是蘇聯對於世界經濟史的顯著的貢獻。因爲每一社會主義的事業，是爲謀整個社會的幸福，計劃也爲了同樣的宗旨而定，它們共同的目標一致了，它們獲得了大家相互的支持。每一工業和農業單位的管理者，都瞭解他們在計劃中有利益的份兒。當計劃草案達到他們手中，徵求他們的觀感和意見時，他們也真的感到了自己是參加制定計劃的一份子。因此他們支持着這計劃，——這計劃是依照他們的利益制定的，也使他們自己的小單位，符合於偉大整體的利益，不倚靠機會和偶然，杜絕了投機或冒險，也杜絕了暴漲和暴落，而永遠給予勞動者以鼓勵。

每個單位的勞動者，也確乎同樣地瞭解計劃是依照他們的利益而定，它的順利進展，可以保證他們工資的增加，和消費品價格的減低：每一工人的增加生產，使所有的人都有利，而且不致發生任何失業的恐懼。蘇維埃公民縱然沒有汽車廠個人股份的權利，但作爲蘇維埃社會的一員，他却享有着各工廠的集體利益的份兒，這種利益是通過大家有份的公共福利，用各種方式給予他

的。因為集體的收益，維持着保護他的軍隊，給他和他的家庭以免費的醫藥，給他的孩子們以義務的教育，還有更多別的利便。他雖然沒有直接享有財產的所有權，但他間接享有的利益，倒是非常實在的。而他也完全明瞭這事實。爲了這緣故，他加緊努力着工作，倘有必要，他也願意束緊自己的褲帶，將大部份的收益，再投資於資金，俾使他和他的孩子們，將來能享受到更低廉納更多的消費品。他瞭解他有份的集體資金是在擴大中。每一公民都日益明瞭，他雖然沒有生產工具有任何部份的直接所有權，但他在生產品本身卻有着密切的份兒。他也知道，當產額隨着集體機構的擴大而擴大時，他在集體所有權中的股份也就擴大了。這給予平常工人以工作的鼓勵，並且取得了他對計劃的協助。

正如英國一個私有工廠的老闆，爲了建造新廠，便決由自己和家庭節省下來，增加資本，以謀取將來更大的利益，家庭自然都會同意目前緊縮的；蘇維埃的公民也同意爲了將來富裕的利益，而忍受目前的緊縮。因爲對於每一公民，那合作企業或集體農場，真正是一個擴大的家庭的事業。

從國有的生利資產上產生的收入是非常之大的，蘇維埃社會每年從這裏撥出巨款來增加國家的生產資本。在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之間，這擴大的資本使工業生產能力增加了一倍，再加上農業方面所用的曳引機總數增加了三倍，鐵路的運輸能力增加了二又四分之一倍。這一擴大資本源泉的發展，是聰明而有遠見的，這使蘇聯在很短的時間裏面，建立了第一流的工業和高度機

械化的農業。這使蘇聯擴大了生產，以至摧毀了希特勒的機構。

自然，生利的資本的增加，等於是國民收入的增加，也就是國民生活水準的提高。一九一三年的國民收入為二百十億零六百萬盧布；一九三三年，為四百八十五億盧布；一九三七年，一千零五十億盧布。到一九五〇年，將為二千零五十億盧布。

工資在同一時期中也上昇着。當第一屆五年計劃開始的時候，每一產業工人的平均工資為每年八百盧布。到一九三三年增為一千五百十三盧布，一九三八年，三千四百七十七盧布。社會福利事業也增加着。從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國家添辦了二萬零五百所的學校。在同一時期中，醫藥服務的預算從一九三三年的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增至六、九二七、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同時期公民的購物消費量亦從一九三三年的六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增至一九三七年的一六二、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總之，蘇維埃的公民，作為集體性財產的股東，都覺得自己便是一個迅速成長和繁榮的事業的所有者；他為了這事業不斷努力的工作，事業報答他的是工資的增加，物價的減低以及由他絕對控制的個人財產的擴大。

社會主義的和個人的兩種性質的財產，由法律加以保障。憲法第一百三十一條寫着：「凡蘇聯公民必須視社會主義公有財產為蘇維埃制度神聖不可侵犯的基礎，祖國富強源泉，全體勞動羣衆優裕文明生活源泉而加以保護和鞏固……」

如果我們以為一切的公有財產都屬於國家，那是不對的。這並非如此。有一部份財產是屬於

合作組織的——集體農場、生產或消費合作社、職工會或青年團體等。但如果以為這些團體能够任意處置這財產，那也同樣的不對：他們的行動是受限制的，必須配合着計劃，爲了整個社會的福利，也爲了他們集體所有者的福利。

個人財產也受法律的保障，憲法第十條說：「公民對其勞動收入及儲蓄、住宅及家庭副業、家常及日用器具、自己消費及享樂品之個人所有權，以及公民個人財產之繼承權，均受法律之保護。」他可以出售、交換或贈送他的財產。他可以隨意處置他的財產，但必須不違反法律，例如，他不得用於投機目的，或謀取不勞而獲的收入。所有權是附有若干義務的：房屋的所有者應該保持完整，牛的所有者應該加以保險。在戰爭或國家緊急的時候，政府得以相當的補償，徵發個人的財產。政府有權扣押財產，作爲償債或拒付捐稅的罰款。但對於最低限度的傢俱或相當比例的工資。是不加扣押的。

我大略敘述了關於個人財產的法律，看來似乎很簡單。實際上卻並不如此。特殊情形還需要許多的解釋和規定。例如我們已經說過，個人財產不得用以剝削別人。貴重的金屬只能售給國家銀行。珍貴的藝術品不得毀壞或出售國外。耕牛的所有者如未得獸醫當局的允許，不得宰殺牠們。房屋必須保持完整。任何數量和性質的個人財產，都可合法繼承。遺產稅不再徵收了，這是一九四二年以來就取消的。合作社的會員資格是不能繼承的，但股份所得的利益可以繼承。

財產除了合法繼承者外，也可以選擇繼承者，選擇對象包括很廣，如妻子或丈夫、兒子、孫

子、會孫、父母、兄弟或姊妹——不過，選擇分配財產也有一定的限度，至少不得損害了未成年者的利益。倘如沒有繼承者，銀行存款和一切財產都得由遺囑規定處置之。

繼承法規定的合法繼承人，首先是婚姻的配偶、兒女、父母（不能維持生活者），以及其他維持一年以上生活的親屬。倘如配偶或兒女都已亡故，就由父母承繼。倘如所有優先的合法繼承者都已亡故，這財產就由兄弟或姊妹承繼。又如沒有任何繼承者而又無遺囑的話，所有的財產就撥歸國家。

第七章 蘇維埃的民族家庭

一 從殖民地到民族國家

我最後的考察是在于蘇維埃的民族，我大部份的時間都化在高加索和亞洲。蘇維埃國家繼承了一個巨大的殖民帝國，這帝國會受着「一個沙皇、一個宗教、一個語言」的原則的統治。一個八百七十萬方哩的面積，包括了一百七十七種不同的民族、種族和部落，說着一百二十五種不同的語言，信奉着四十種不同的宗教，却被鐵腕的專制，強迫納入一個單一的模型，這會阻礙了工業的發展，並斷然排斥了所有非俄羅斯民族的文化語言。這些民族，在蘇維埃統治下的情形又如何呢？

列寧及其同志們接受了他們所繼承的這種地位，並且用最大的勇氣，採取從未試行的原則，擔當了改造俄羅斯帝國的任務。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蘇維埃政府一執政，就宣佈了「俄羅斯民族權利的宣言」，它規定了一切民族的平等和自主，民族的分離權，並取消了宗教的特權和所有少數民族自由發展的障礙。例如回教民族，他們的信仰、風俗習慣和文化傳統，是保證不受侵犯的，並且還受工人、兵士和農民蘇維埃代表的保護。

這是一個政治運動。新生的蘇聯需要人力和資源，以前的殖民地可以供給兩者——亞洲的棉花、烏克蘭的煤和西伯利亞的木材。它也需要所有民族的協助，以完成摧毀沙皇專制的任務。

這也是一種根據原則的政策，這種政策，在沙皇久被推翻之後，以及在完成發展的今天，始終被堅持着。一九二一年，史太林曾經說：「民族問題的主要關鍵，是在根除我們從過去所繼承的所有民族的落後性（經濟、政治和文化），並給所有落後的民族以機會，使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與中央俄羅斯相緊密聯繫。」

假如各民族是落後的，那只因爲它們從來沒有向前發展的機會。給它們以這種機會的努力，立刻就開始了，並且採取了確實的具體的經濟方式。計劃從一開始就規定着每一個民族集團應該享有的物產，特別是屬於它自己底資源和農產品；同時又鼓勵它們發展各方面的經濟，保持工業和農業的平衡。

一九三六年憲法的第一百二十三條有下面的規定：「蘇聯公民，不分民族及種族，在經濟生活、國家生活、文化生活、社會及政治生活各方面，一律平等，是爲確定不變之法律。凡因民族或種族關係對公民權利作任何直接或間接限制，或賦予公民以直接或間接特權，以及宣傳種族或民族獨尊思想，宣傳民族或種族仇恨輕蔑觀點之行為，均受法律之懲罰。」

通過精密建立的機構，這一政策是堅決地執行了，這不但供給蘇聯以廣大的資源，同時也給她以統一和團結，正是這統一和團結，推翻了希特勒的一切估計，促成了他的敗亡。蘇聯各民族

為勝利而作戰是整個的。蘇維埃的民族政策，已在事實上產生了民族的家庭。

少數民族發展的蘇維埃原則，和俄羅斯多數民族發展的蘇維埃原則，完全是一樣的，不過兩者都必須從屬於一切應照社會主義模型實施的總的原則——這就是說，資源和生產機構必須公有，並由公家管理，消滅階級的區別，禁止爲了個人利潤而剝削勞工。

這是社會主義的內容，是不變的。在那些範圍以內，可因民族的趣味、傳統和文化的不同而採取不同的形式。形式是多樣的。「社會主義的內容，民族的形式」已經是口號。確定了它的社會主義的內容，列齊對於各民族的主管理的原則包括了如下的幾點：

(一) 任何人都政治活動的權利。不但是實施每隔幾年的選舉，而是每天的直接參政，引導所有的生產者、消費者或公民，依照他們各自的能力，參加日常的管理工作。

(二) 文化自主是解除殖民地地位的第二個原則，這意思就是說，地方語言和官話(Official Language) 同時可採用，儘先以本地人充任學校教師和政府機關中的公務人員；在工業生產管理的每一部門中，百分之五十的人員必須是本地人。在消極方面，對於宗教的信仰和儀式不得加以干涉，在積極方面，鼓勵當地的人員用他們自己的語言來出版報紙和書籍，設立他們自己的戲院，以至創造一種與現代的知識和態度相吻合的土著思想。

(三) 通過了社會主義化的經濟，勞動階級取得了最高的地位。集體主義管理下的普通工業制度，已發生了水準以上的效果；權力不再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裏。

(四)民族自決的原則也有明白的解釋。所有民族是自主的，所有民族是平等的。史大林說：各民族有權加盟或退出，倘如它們跟一個非蘇維埃國家有一共同的邊疆。

各民族也面臨着俄羅斯本部所曾經碰到過的同樣的問題：「對於一般平民，譬如公民，譬如生產者和消費者，怎麼引導他們來參加日常的政治？」這一問題，已用同樣的辦法正確地解決了。

如在俄羅斯本部一樣，所有公民，年在十八歲以上者，都有權選舉村參議員，村參議會是政府的基層機構，監督集體農場、工廠和消費合作社的工作效率，等到在自己的村中完全勝任了，再逐步的進而和區、州、共和國乃至最後整個的蘇聯相結合。

每一公民，恰如在俄羅斯本部，都有直接發言權，選舉從區議會到民族議會的代表。在每一共和國中，也有同樣向上揚的權力和往下流的威權，這使得上面的被選舉的團體能夠充份瞭解基層大多數人民的願望。

個人也都得考慮到自己在計劃中的份兒。各共和國的計劃，形成的方式，已經在論計劃的那章說過了。共和國的計劃，和蘇維埃聯邦的更大計劃交織成爲一個整體，同時又充份照顧到各共和國區域的潛能和需要以及整個聯邦的需要。

職工會的組成和活動，也恰如在俄羅斯本部一樣。從事共同工作的所有工人，組織成爲許多小組，每年開會兩次，以進行討論和選舉職員，每一職工會又每隔兩年選舉職工聯合會。每一職

工聯合會在莫斯科開會，猶如所有職工會的全國聯合會一樣。每個構成聯邦份子的共和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地位是和俄羅斯本部的地位一樣的。殖民地統治已代之以真實而有力的民族生活的形式，並和真實而有力的國際主義膠合起來了。

二 亞美尼亞

(甲) 古蹟

當我們離開莫斯科，長途飛行到莫斯科，天氣是寒冷而沉悶的——我們第一次停下來加油；我們在羅斯托夫降落，有了太陽，熱起來了；到克拉斯諾達爾(Krasnodar)更熱，第一次遇到了層層起伏的山丘。我們越過險削的岩石和長着樹木的厚土的山丘，不久就到黑海的利維拉(Levina)，我們又沿海岸飛行，經過蘇溪(Sochi)、茄格里(Gagra)和別的有水的地方，到了東海岸，飛機陡然峻直上昇，橫越高聳的高加索山脈。

兩點鐘，我們越過喬治亞的邊境，那景色又和高加索一連串長着樹木的巉崖峭壁不同了，一片廣漠的肥沃的山谷，平滑地蜿蜒着，兩邊盡是峭壁和山脊。在飛過其中一個山脊的時候，駕駛員指點着底下山谷匯流的山岩上，一座高踞的城巒俯瞰着一個村莊。他說：「史太林的家。」十分鐘後，我們在喬治亞首都脫必列西降落加油。四點一刻，我們又離開了脫必列西。

四十分鐘在蒼翠的山谷、多樹的丘陵和高聳的山峯上飛行，接着是一片汪洋，邊沿的水是深

藍色的，到中心便成了迷人的綠色蔭影，當水沖激到岸邊時，則又明亮清澈，彷彿是水晶。在繞湖四周的水天一色的界線上，盡目力所能看到的，有一道奇異的白色的光線。

這便是薩凡湖 (Li-Sevan)，世界最高的大湖，比瑞士所有的湖加起來還要大，這岸邊的白色光線，是當湖的水平面退平後，退落的湖水所剩下來的石灰沉澱，這也是亞美尼亞的水電計劃推算的結果。

再飛行十二分鐘，耶列文 (Yerevan) 出現在下面了，一座齊整的大城，建立在小丘北面盆地所形成的半圓形上，又向南斜傾，穿過二十哩的平原，一直伸到歐洲最高峯阿拉拉脫 (Ararat) 的山脚，這高峯是偉大的單獨披蓋着雪的圓錐，叫人想起了日本的富士山。

亞美尼亞在一九一七年的地位是很低的。她的面積不大，她的領土會遭侵略者減小到比利時一般大小。她在一九三九年的人口為一百二十八萬一千五百九十九人，現在的人口達到了一百五十萬人，而且在迅速地增加着。她是一個有着古代文明的進步的民族，她堅持發揚着蓬勃的有個性的生活，即使在任何需要忍耐的統治下，也從不放棄向前進步的機會。以前的灌溉痕跡，在地面上是完全找不到了，但空中的攝影終於又把它發現，並且證明了當年的盛況：早在二千七百年前，亞美尼亞的工程師們，已在計劃和發掘一條四十六哩長的運河了。

遠在紀元前五二一年波斯達遼 (Darius) 王朝之前，現在的亞美尼亞種族已經到達了，一種長頭、黑髮、窄臉的民族。他們的文化是進步的，用武力把他們的孩子首先送到希臘受教育，以

後又到羅馬，終於在紀元前七十二年，亞美尼亞人受到了被征服的苦難。

建築物的遺蹟和無數的手稿，仍然是以證明亞美尼亞過去的輝煌成就。最顯著的例子是我們
在瓦加夏伯 (Vagarschapat) 所看到的紀念碑，那是一個悶熱的盛夏日子，我們坐着一輛精緻
的蔡司 (Zeiss) 車子到那裏去。司機是一個亞美尼亞人，一個最典型的活潑的亞美尼亞人。不
久就成了我們忠實的朋友。他穿着紅襯衫、馬褲和長長的柔軟的俄羅斯靴子，長遠膝蓋，真是栩
栩如生的光明人物。他具有愉快的幽默，和一個新從戰場回來的士兵的輕鬆感。有一次，當車子
在險崖邊沿轉向一個間不容髮的拐彎時，他回過頭來，對坐在後面的我們談話。我們委婉地表示
了當前的危險，他却露着動人的微笑回答說：「我是在史太林格勒開過坦克車的。」

在路上，我們看見有幾隊德國囚犯在築着新的公路，那路是和一座高聳的吊橋連接着的，這
一計劃如完成，從此就不必再打柴格河 (Zarza) 險削峽谷的兩邊攀爬了。壯碩的、紫銅色、袒
裸着上身的德國人，看來倒是結實得很。沒有過份的親熱，也沒有敵意的表示。亞美尼亞人和俄
羅斯人一樣，似乎不會培養仇恨的心理。

車子開上峽谷遙遠的那邊，越過了一頭駱駝和一匹驢子，我們又用力盤上險削的鋪着圓石
的小路，立刻鑽進綠油油的葡萄園，經過了巴拉格爾 (Parakar) 的村落，那裏都是典型東方方式
的泥屋頂的單層房屋。穿過一條柏油路，又通過幾座背背的橋，我們到達了瓦加夏伯的平原，平原
的邊沿，聳立着慈瓦諾資 (Zvartnoliz) 的古代殘跡。

我們停下來參觀一個葡萄園的大農場，這是阿拉拉脫釀酒公司的分部，我們認識了這農場的經理和工人。三百十公頃的農場是屬於一百個工人的，那是一個模範的農場，依照預定的計劃，要對別的農場起鼓勵的作用，並將改良方法廣泛的傳給它們。

亞美尼亞盛夏的中午真熱得可以，我們很高興的在集體農場陰涼的俱樂部裏休息了一會，俱樂部的大廳放着四百五十只的活動椅子，裝飾得頗為精緻。藏酒的地窖更涼適，就在這地窖裏，每年把酒用農場自造的桶裝起來，一千二百噸的葡萄可以釀造這麼兩千萬呎的最上等的美酒。

地窖的內部是完全平坦的，漆得白中帶有淡藍的顏色，一張松板製的桌子，鋪着潔淨的藍布，上面置放着一隻插了櫻桃嫩枝的花瓶。我們坐在酒桶彫成的椅子上，寫寫意意的靠着背，就開始受用一頓滋味很好的冷餐，拱得像薄餅似的扁平的小麥麵包，又溼又軟，和着山羊乳酪一起喫。接着又端來了法蘭西紅豆，那是煮過、蒸過又弄乾的，上面撒着一些茴香和別的切碎的綠色香草。亞美尼亞人喫薄餅似的麵包是用手撕扯，而不用刀割切的，倘如要豆，就用羹匙直接汲取，放在麵包上捲起來喫，好像我們這裏喫臘腸裏餅。總共的一碟或一羹匙，就够所有的人喫了。可怕的倒是管酒，我們勉強嘗了一打以上的樣品，都是頂上等的白蘭地。其實一喫就够了，但每人的玻璃杯却斟得滿滿的，剩下來就倒入一隻公共的瓶子裏。領頭的那人陪着我們喫喝，其餘的成羣地站立在周圍，傾聽着友誼的玩笑，又正經地討論政治和天下大事。

這個集體農場，是許多綿連不絕的集體農場中典型的一個，最妙的是那灌溉的一泓清水，無

窮盡地蜿蜒得很遠；我們細細考察了之後，又驅車到惹瓦諾賚的廢墟，那恰位置在漣漣的流水的邊沿，我們就在那裏懶洋洋地倚靠着坐墊休息了一會兒，我的頭隨意地靠着這位忠誠的史太林格勒人的上衣，無數的營營的蟲聲，催得我昏昏欲睡，一忽兒拂去了偶而集攏來的螞蟻，一忽兒又望着那悶熱的荒涼的阿拉脫的烟霧，或者是看着那些年青的集體農場的女郎，穿着白色的長裙子，趁休息的時間，爬到樹上採摘碧綠的酸蘋果，津津有味地喫着，我可毫不想喫。

我們考察着那莊嚴的廢墟，孤零零地，獨自在乾燥的土地上隆起着。長久以前，教會和國家的統治者和王子們，盛集在教堂和鄰近的宮殿，會有過燦爛的一幕，這幅盛景現在是難以想像了。教堂是泰伊齊（Nersia Taikzi）當紀元前六六〇年到六四〇年之間所建的，這一直完整地保留到政權傾覆的第十世紀，坍塌下來成了廢墟。這教堂的壯麗部份和樸素的構造，是亞美尼亞教會建築的典型，教堂的裏面是圓的，外面是多角形的，它的三十二隻尖角的每一角之間，有一扇窗和圓形的拱門。在圓形底層的地面上，聳起着直徑較小的圓形的第二層，托住了直徑更小的又一層，多角的圓錐形的屋頂，像皇冠似地覆蓋在這一層的上面。

現在一切都在廢墟中了：雕砌的巨大石板，有幾塊彫塑得很精緻，和彫刻富麗的柱子混雜在一起，有的散開着，也有堆積着，長滿了蔓草。這就是石頭所訴說的從前亞美尼亞光榮的故事。手稿裏敘述的故事是更要豐富的。

一天，我們偶然走過梅斯洛普（Mesrop）的墓。梅斯洛普是亞美尼亞文字的創造者。我這

大原是特別爲了亞美尼亞新教長登位的長期的熱烈祈禱而來，事情完畢之後，我去找我的朋友，他們閒居在一個低低的山脚下，柴格河流過峽谷的地方。在公路的那邊，車子停下來，冷一冷燙熱的引擎，有幾個背着重包的強壯年青的姑娘走過。她們看見了，吻着我的十字章。一個漂亮的農民小孩倚靠在柴格河的華麗的古橋上。我們和他說着話，我注意到他的項頸上掛着一根細長的金鍊，一直拖到他敞開着的寬鬆的襯衫底下。他把練子拉出來，露出了一塊聖母瑪利亞和孩子的像牌。

我們就在那村童常常洗澡的磨坊上面的淺水溝裏洗了澡，這位史太林格勒人則在入口地方充當守衛。回到車上，我們給熱心的孩子們圍住了，經過熱烈的談話後，我們躲進了一位富裕的農場女主人的花園裏，我們和她以及她的一家，坐在一棵桑樹底下的毯子上，喫着金黃的桑果。我們的女主人穿得很漂亮，還備帶着可愛的金珠的裝飾，她的三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靜靜地坐在籃子旁邊，呆着喫果子，一個又一個。

這天似乎是一個節日，在我們上面的高原，出現了一大羣人，好像在等候什麼人的來臨。我們緩緩地走過了梅斯洛普墳墓所在的村莊，這天是梅斯洛普的誕日，羣衆正在等候那爲教長登位而從世界遠處來的代表們，因爲路遠不能趕到，我們竟就代替來接受盛大的歡迎了，兩位穿着法衣的教會執事，領導我們擠過密集的羣衆，我們參觀了地下室，就站在一塊小方石的旁邊，石上點燃着蠟燭，一位年青的姑娘會刺了一些雕刻在這蠟燭的上面。我們禮拜着這位哲人，他就是在

紀元前四一二年左右，賜給亞美尼亞以字母和文字的。

(乙) 文化生活

耶列文可以誇說有許多很好的博物館，我在那裏消磨了很多有益的時間。在手稿博物院裏化上了一個早晨，如要對亞美尼亞過去文學的豐富寶藏作一公平的判斷，那完全是太短促的，二萬種手稿——其中九千種是大部頭的——用科學方法保存在空氣流通的房間裏，還有二十萬種關於一般東方和波斯歷史的補充資料和文件，特別是波斯，在亞美尼亞歷史上，發生過許多密切的關係。

較早期的手稿，還是第五世紀開始時期的東西，那當然有着最廣泛的材料。比公元四一二年還早的手稿，是用希臘文寫的。一種是第五世紀哲學的手稿，一種是第七世紀討論數學的手稿，我們又找到了第七世紀中關於化學和天文學的手稿。特別有趣的是數學論文，那還是在阿拉伯影響之前的，因為阿拉伯人要到了十二世紀纔侵入；這也比歐洲別的地方的任何數學手稿為早，歐洲最早的數學手稿是十二世紀的。

醫學論文發現於十一和十二世紀，其中有一篇討論眼睛和旁的器官的論文。十一世紀的一卷手稿是歐幾里德文章的翻譯，十三世紀的手稿則是一卷音樂書，還有一篇傳奇和短篇小說。亞美尼亞文藝復興開始要比歐洲早過兩世紀，他們研究的是歷史和科學。

有一本第五世紀的象牙簿面的書冊，那是紀元八八七年發現的福音抄本。彩色圖畫的手稿都

特別有趣味。有幅十四世紀的圖畫，畫着騎象的波斯軍隊和騎馬的亞美尼亞人的戰鬥。

一般文學的圖書館很大，要比革命前大兩倍。當這次戰爭期間，有四十五萬卷書籍都移到了蒙古，以保安全。

亞美尼亞的文學遺產是很被珍重的；每一頁手稿都由年青的蘇維埃科學家製有索引。全部貯藏在一座莊嚴的新建的大廈中，那座大廈位置在城北疆界外面的險削的草坡脚下，俯瞰着通往阿拉拉脫的大路的開頭。那座圖書館是費了四年功夫纔造成的，進去要拾級通過一段華麗的階石，水瀉在階石的兩邊沖激下去，形成了壯觀的小瀑布。

(丙) 耶列文和薩凡湖：公民生活、農業和工業

耶列文城本身是亞美尼亞新的農業和工業繁榮的中心，也已經成了蘇維埃國家成功的不移的證據了。第一流的城市建築師格里哥里安 (Mark Grigorian)，跟我們一起盤桓了一個下午，我們坐着他的車子到各處去，他根據計劃，說明着他所瞭解的這個城市的情況，初期計劃的開始，現有成就的範圍，以至未來的遠景。當他在約莫二十二年前開始工作的時候，耶列文不過是一個居民二萬五千的大村落，泥頂的房屋，圓石砌的街道和原始的衛生狀況。嬰孩死亡率達到了可怕的比例。

一九二四年的小型電力廠，促成了工廠和公共文化建築物的迅速發展。住屋的建築比較緩一步。正跟蘇聯人口迅速膨脹的到處地方一樣，住屋的供應成了主要而時常發生的問題，耶列文的

問題更嚴重，因為當地大部份的人士，都反對那壯麗地建立在離交通線很遠的廣場上的高樓大廈，來代替他們現在的住屋。亞美尼亞有有些人正和英國人一樣，寧願居住小巧的僅足容身的獨幢房子，尤其是那些住在陽光和煦的斜坡上的人們，住的都是泥頂的單層房屋，有着他們自己的小花園。格里哥里安也明知泥頂房子——特別是那空間寬闊的房屋是冬暖夏涼的，要說服他們得大費唇舌。

但是迅速發展着的耶列文的建築空間並不大，因此只能進行着樓房的建設。

耶列文在可驚的邁步中發展着，遠超過了一切原來的估計。十五萬人口的城市需要着新的計劃，這由學會會員塔瑪里安（Tamarian）設計着。可是，人口已經超過了二十五萬，而且還在擴增着，因此更需要一個四十五萬人口的城市計劃，來作為現在造屋的基礎。

我們現在考察的就是這些計劃。我們從大路窄隘的彎曲處盤旋上去，這條大路是從城市通往北面高原的；我們站在小山的巔上，四面吹拂着平原高層的寒風，城市的全貌盡收眼底。保留北面高原作為露天的城市公園，顯然是聰明的；同樣適宜的是把東南部的高原充作了柔弱兒童的家和療養院。

險削的草坡現在隱蓋了從前醜陋的泥崖，這草坡的半圓形，跟那公園中已長了六年的樹木，形成了動人的景色，像一幅綠幕似的沿了整個北邊的城牆展開着。從河的上流泛濫下來的水，每天從這裏流過，因此即使是最熱的天氣，那草色也總保持着新鮮和翠綠。北面是綠油油的斜坡，

南面有白雪皚皚的阿拉拉脫山，這真是一個大城市的出色的勝景。

這計畫已經部份完成，並未因戰爭而完全中止，它要建造一條中央幹線的大道，和別的許多要道，充份美妙地湊合這優美的背景。

這完全取法我們英國城市學中「綠色地帶」(Green Belt)的理論如像我已經說過的，把工業主要位置在南方，俾免於北風的侵襲。小山的低坡，形成了盆地的南面邊緣，一條大隧道從它下面穿過，這是從城市中心轉入西區的交通綫，它又通過一座橫跨柴格河深峽的石架橋，這石架橋，很精緻，最近纔完工的。這就是從城市中迅速而便利的出口。城中樹木茂盛，織成了避免驕陽的涼蔭；他們還準備種植更多的樹木，這一部份現代市政學的原理，鼓勵着鄉村侵入了城市：公園和草地，沿着城市的主要街道到處散佈着。

耶列文是取縮摩天樓的。因此沒有高插雲霄的商業大廈，致使交通擁擠，街道遮蔽，以及文化 and 社會的建築物相形見拙。耶列文大歌劇院的房子已經完成，可說是該城外貌的特色。耶列文本地出產的凝灰岩石——一種溫暖感的赭赤石，易於琢磨而又耐久——是現成最好的建築材料。工業集中在南面，而機關大學、專科學校、研究院、圖書館、和醫院，則都集中在北面草坡的山脚，還有專供工人，住的宏大精美的房屋。

我們到的那天，參加教長選舉的代表們都集攏來了，我們跟他們一起去遊薩凡湖，欣賞它的美麗和工程上的特點。當湖水退後，有一座沙礫的石岬，露出在湖的西北角的火山島的上面，又

高又燥。我們中的兩三位，居然從這石罅上跳入寒冷的清水去游泳。隨後沐了日光浴，隨後喫湖產的鱒魚，還有各種香草拌製的「色拉」，鮮菓和蜜餞，這都是由那伴從我們一夥人的旅館職員和廚子烹製的，我們痛快地享受了這天的盛餐。這種大鱒魚有兩三磅重，用一排鐵叉穿起來，就在湖濱找些漂來的浮木生火燒烤，其味無窮，此外又有亞美尼亞的酒和土司，就這樣完畢了美滿的一餐。

喫畢之後，我們爬上那險削的百花怒放的草原，走到一個古老寺院裏的十二世紀的教堂，一個小小四方形的建築物，典型的尖塔，現在雖沒有用處了，卻保存得非常之完整。對於亞美尼亞人，以及那來自各地的我們一行中的男男女女，薩凡真無異是麥加，我們可以看到他們虔敬地帶着壓平的花朵和小石子回去，作為他們熱愛的土地的流亡紀念品。

我們一行回到了粗陋的湖艇上，全是亞美尼亞人，但每人都帶着放逐地的標誌回去。他們開了一個音樂會，節目是包羅萬象的，從鄉村的牧歌，到巴黎著名歌壇的男高音的名曲。

我們望着這高原上的大湖，美麗而又奇幻，最初陽光閃耀，晴天碧空，到了薄暮，忽然從山那邊烏雲突起，雷雨傾盆，這一天是可紀念的。無論如何，我的主要興趣，還是在於湖的本身，在於它實用的價值，在於它的廣度、容量和高度，在於它足供各種工業建設的無窮的水電力，在於它使五十哩外的不斷擴展的荒漠中的花果欣欣向榮的灌溉力。我看這偉大的湖，乃是智慧和科學運用的原動力，它發揚着一個堅強種族潛在的能力和文化的天賦。

薩凡湖是世界最大的高山湖之一，拔海六千五百呎，約莫三百呎深，受着二十六條高山河流的灌輸，擁有着巨大的潛能。湖水流入唯一的柴格河，下流通到五十哩外的耶列文，比湖要低三千呎。柴格河的水流，一部份已經裝置好，發動了一系列的水電力站，其中最早聯繫的一段，是一九二四年建立的耶列文小站，供應着現有城市以充裕的光和電力。第二段的聯繫是在耶列文上面，建立一個更大的水電力站，供給一個大規模製鋁廠的電力，這已經計劃定當，不久就要開工了。

現行的五年計劃，經過蘇維埃工程師竭智盡力的詳細設計，又由他們定出了一種較之僅在利用現有柴格河滾滾激流的更有效的計劃，說起來矛盾得很，這計劃主要是在降低水平，從而減少湖的容量，然後由湖水供給更巨大的水電力。原理是簡單的。降低了一個高山圍繞中的湖的水平，雖減少了湖的面積，却不會減少流入湖水的容量。這樣，在熱天時候，就減少了蒸發的數量，增加了流出的容量。每一加侖蒸發的水推動着電力的渦輪。薩凡湖蓄水二十六億立方公尺，只有百分之五流入柴格河。減少蒸發就增加了可利用的電力。

因此湖水有一部份要流出去。它的水平降落一百呎，現在柴格河的出口也降低到相等的深度，使湖水的流出發生了效力。同時，從穿山六哩的隧道開關一個新出口，和柴格河在較低的水面上相聯結。這樣，水力站便可在山裏面發動了。

五十年來就需要着水平的降落：因為從較高的山谷設置一系列的渦輪站，供給八個水電力站

的水量，然後向耶列文河的下流開鑿出口，就可使水力不斷的增加。

這大量蓄水的其他顯明的結果，乃是耶列文以外的灌溉範圍的擴大。柴格河的容水量年年增加，多餘的水都可用於灌溉。三十萬畝的新的菓樹園、葡萄園和棉花場，已在阿拉拉脫的山谷間興起了。

峽谷高上去的地方，柴格河盤繞着耶列文，阿拉拉脫釀酒總公司的巨大堡牆，巍然高聳。該公司在蘇維埃資助之下，經營着這一種古代的工業，據說這原先是由諾阿（Noah）創辦的，那時候洪水剛退，他從避難船裏跳上了阿拉拉脫，這傳說你一到本地就可證實的。巨大的地窖引人下去，像無窮盡似的深達七層，進入岩石砌成的、陰冷的壁龕。橢圓形的酒桶，像小茅屋一般大，用乾燥橡樹造的，裝着幾千加侖的酒，沿走廊排列着。在裝瓶之前，先使這些葡萄酒釀成熱，然後再送到莫斯科、列寧格勒和蘇聯的各城市和各鄉村。白蘭地也是一樣，蒸溜過，裝好瓶，用特殊方法放到特殊的貯藏室裏，等他釀熟。

阿拉拉脫的全圖，是這個巨大釀酒公司酒瓶上的商標；看了這圖畫，常常令人想起這陰暗冰冷的古代的拱形地窖，我們從外面灼熱的陽光走進這地窖，就得披上大衣，然後圍坐一只圓桌，說說談談，勉強嘗飲着一打，或是二十種不同的酒和葡萄酒。除了葡萄酒外，還有小麥、和雜糧，特別是水菓，維持着一個平衡發展的農業。

有一天，我們走過一個村落，這村落的巨大而繁盛的集體農場，是完全種植水菓的——桃、

梨、杏、蕃茄……一位富足的農民請我們到他的果園裏，在他的樹蔭下喫飯。他和他家裏的人搬出可愛的東方地氈、坐墊、水菓、飲料、香草、餅乾和咖啡來，我們大嚼着，那圓熟的櫻桃低掛枝頭，就在我們的頭上。

我們主人穿一件精緻的絲繡襯衫，敞露着頸頸，一根帶子把腰身束得緊緊，他的腿和足隱藏在黑軟的俄羅斯長靴裏，是一個人類光明磊落的典型。他的妻子和孩子們，也是這樣。他撫弄着他膝上八九個月的赤裸的孩子，響嚼着大捲的塗了白色乳酪和新採香草的薄餅麵包。後來他抱了其他的孩子，領我們周遊他自己的大花園，在河的險削一邊的樹蔭下面，欣賞着阿拉拉脫的夕照。美妙無比。好一個靜寂的黃昏，和明淨無雲的天空。

從這個和那個農場收穫的各種水菓，在運往耶列文之前，先在工廠裏裝瓶和裝罐頭，我們參觀了這工廠，並受款待，試嘗着保險最開胃的東西。豌豆和青豆，又軟又嫩，彷彿在早春採集似的，還有美味的湯、醃漬品和醬油。剝製很好的麵果（麵包樹的實）做得像薄片，味道像炙牛肉片，其次端上了玉葱、蕃茄汁和包含出品百分之二十五做成的湯。

白的、紅的櫻桃，梨，杏，和別的主要產品，「狷樹」的黑莓，落花生的蜜餞和別種的蜜餞，「覆盆子」（raspberries）、桑椹、薔薇花瓣以及其他我不認識的東西，美不勝收的羅列在一起，真叫人眼花撩亂：我們的主人堅邀我們樣樣都嘗過，並且還送給我們大包的瓶瓶罐罐，這後來我們在莫斯科分送了左右近鄰，在歸途中，又分給在布拉格的友人們。

負責工廠管理的是一位美髮的烏克蘭女。落來了已有好幾年，專事訓練亞美尼亞農業中水菓裝瓶的技術，俾便配合新工業的步伐。工廠僱用了八百人，百分之九十是女的，每年出產一千八百萬瓶的水菓。這樣，亞美尼亞除了農村方面的葡萄園和菓園產品，貢獻給城市工業外，它還有利用土產鑛砂的熔銅廠，利用本地電力的製鋁廠，和利用土產炭化鈣的人造橡皮廠，建立了多方面的平衡的工業。

(丁) 文化生活

工業和農業，經過蘇維埃的創造和革新，給予亞美尼亞以進步的生活手段，並且替它的首都耶列文造成了崇高的特色。但是，它本身的生活究竟怎樣呢，物質的、文化的、精神的？個人生活，究竟是怎樣的性質？這是最重要的考驗。

我通常總是從考察兒童着手，因為人們可以看到他或她在街上、學校、遊玩場所、和花房裏；或是在列隊行進，有時沒有大人的監護。

在耶列文，我看到的幾個孩子，可說沒有什麼不合健康的，雖然不及北方氣候中的兒童那樣的強碩和紅潤，卻是更黑，更活潑，當然算得健康的。沒有像我在巴格達所看到的砂眼。即使在戰後也沒有營養不夠的樣子。沒有穿得破爛的孩子。高山上的牧羊童雖然常常衣服襤褸，但都是吃得飽，穿得暖。

我訪尋着城市中較古的區域，這些區域中還保留有比較簡陋的房屋。我說與地看到那些孩子

們生養在單層泥頂的屋子裏，顯然是非常窄小的一間，却明明都是營養充足，有許多甚至穿得很漂亮。他們又都是快樂的。舉一個例，我有一次碰到一羣活潑的孩子，在街心玩球，沒有車輛來往，因為這是禮拜天。他們都停了下來，出奇地注視着經過的外鄉人。他們一眼望見了從我帶子拖出來的十字章的藍套。爲了滿足他們的好奇心，我把整個十字章拉了出來。陽光照在金鋼鑽上閃爍，孩子們露着熱烈的樣子。於是那最大孩子走到我面前來，輕輕地拿起十字章，吻着基督的像。每個孩子跟着照樣做。最後微笑着敬了禮，他們又回去遊玩了。

有一位我新交的亞美尼亞的牧師朋友，曾私下問許多孩子和青年：

「你知道上帝嗎？」

「我們當然知道，也常常向上帝禱告，」這是回答，有幾個還說，「而且我們也去教堂的。」

「如果你在學校裏從未聽說上帝過，或者有人告訴你上帝是沒有的，你怎麼會知道？」

「爸和媽在家裏教我們的，」是回答。

我們參觀了一所很大的典型的女子學校，這也是在較古老的區域，我們看到各種程度的八百個女孩子，由四十位教師管理和教育着。因爲戰事緊迫，班次經了大大的擴充；不過她們從未增加到像我的坎脫勃里教區附近學校中這樣多的人數；她們低年級每班四十人，高年級的人數更少。每班學生的人數現在還打算迅速減少。

當我們經過一個教室，裏面正舉行着學期考試，我們走了進去，靜靜坐下，看着考試的經

過。每一女孩領到一張聽任選擇的問題表。一個名字喊到了，一個女孩走出來，面對着全班，簡短地說明了選擇的題目，然後回答有關的問題。這是訓練勇敢和自信的一種方法。演說都流暢而有準備，一般都答得很快。

牆壁四周有許多玻璃框，裏面裝着有趣味的展覽品，而且還有女學校裏不常見的器械。例如，物理教室具備着各種型式的機械，蒸汽機和內燃機各部分合成的模型，還有許多種用電的家常用具，女孩子也得和男孩子一樣，熟悉它們的性質和用途；此外更有經緯儀和普通測量的儀器。

人體模型和圖解說明的掛圖，裝滿了許多玻璃框，各種最好的人體器官的截斷部分，滿佈女孩的生理教室的牆壁。胎兒發育的精確的模型，說明了從最早受胎時起的人體生長的全部過程。除此之外，還有嬰孩或成人的骨骼的模型。精心選出的大幅油畫，植物的、生理的、機械的，掛在活動棍棒的鉤上，隨時可供教課示範的需要。只有十歲和十歲以上的女孩子，才用得着這生靈教室的。

亞美尼亞孩子們的音樂和訓練，是出色無比的，有一晚上，我們費了四個鐘頭，從下午八時到十二時，在一個很大的臨時的音樂廳中，欣賞着一個音樂會，這是由耶列文的學童，在一羣知音聽衆面前演奏的。主教、大主教和亞美尼亞教會的代表坐在前排，他們進來時都拿到一份說明書。

在友善的、有修養的聽衆面前，驚人的天才的絕藝演出了。開始是由一個八歲孩子柴卡里安（Zeda Zakarian），演奏貝多芬的「梅奴哀舞曲」（Minuet）和穆索爾格斯基的「沉思」（Moussorski's Thinking），然後挨着年齡的次序，一個又一個的表演獨奏。十一歲的孩子齊諾西安（Henrik Genossian）——一個十年音樂學校第四班的學生，演奏了裴遼士的「協奏曲第二部」（Berlioz's Concerto Part II）和休柏特的蜂曲（Schubert's Bee）。十二歲的薩基遜（Zouke Sarkison），演奏萬耶斯基的「羅曼司」（Vanyaski's Romance）和愛琪柴靈的「舞」（Egizarian's Dance）。

妙音奇曲，一個接着一個演出，聽衆興奮熱烈；一個十二三歲的男孩，獨奏小提琴，宛若一個名家，以第一隻小提琴的姿態，指揮二十四個年齡從八歲到十五歲的男女孩子的樂隊，演奏味瓦耳地「協奏曲第一部」（Vivaldi's Concerto Part I），那激越的節拍，那迅速的韻律，使聽衆的興奮達到了高潮。如雷的掌聲，夾着情不自禁的歡呼：「這兒童的樂隊，一定會轟動了倫敦、紐約或芝加哥。」

小孩們退下去之後，後半段節目，也同樣的美妙，這是由十七八歲兩個男孩組成的合奏來結束的，演奏特別有勁兒。印象同樣深刻的，是那日常勞碌的耶列文大琴聽衆的精神和感動，他們都是都受過理解和尊重這高級藝術文化的教養的。

在耶列文小汽艇上擠滿着的代表中間，引起我頻頻注意的是一位短小的人，他有着富於智慧

的面龐，非常生動的外貌。我以後又碰到他好幾次。當新教長就聖職的時候，我看見他擠在路旁的人羣中。我又看見他在幾個受優待的中間，吻着他們新選出和新就任的宗教領袖的手。

這人叫做阿拉瑪尼 (Aroyan Aramanian)，一個「信徒」，一位演莎士比亞劇的著名藝人，聲名遠揚於本國境外，而且也是建設和培植亞美尼亞新戲劇文化的要角。有一晚，我在歌劇院中遇到阿拉瑪尼，得悉了許多關於他自己過去以及亞美尼亞戲劇發展的事情。阿拉瑪尼年青的時候，足跡遍天下。他早年就對舞台有興趣。他認識了本哈特 (Sarah Bernhardt 法國名女伶)，後來加入她在布魯捨爾的劇團，這位偉大的女藝人，認識了他的能力，斷定他必有更大的造就，給他以種種的援助。他接受了她的忠告，去到巴黎繼續研究。

當時亨利·歐文 (Henry Irving 英國名演員) 的聲譽正達到了登峯造極，年青的阿拉瑪尼跑到英國去看他，剛抵杜佛，得知歐文病重，他便立刻回去了。他嘆氣說：「唉，我終於從此看不到倫敦了。」

革命爆發時，阿拉瑪尼正在波斯。他渴望回到他的故鄉，但當時要到亞美尼亞去，只有從全世界兜大圈子，從別處進去。他獲得了政府的幫助，立刻開始組織了亞美尼亞的第一家戲院，或者，毋寧說是許多世紀以來的第一家，因為亞美尼亞戲劇史的開始，還是兩千年前，優列庇特 (Euripides) 在那裏表演的時候。

阿拉瑪尼是全家愛好戲劇的。他的妻子演劇，五個孩子中的兩個，也獲得了劇壇盛譽。阿拉

瑪尼現在老了，只能偶然露演，而專心致力於訓練年青的一代，和團結亞美尼亞的劇壇。

阿拉瑪尼注定在任何情形下要成名。革命使他能够在亞美尼亞發揚藝術，獲得這樣崇高的榮譽。藝術在蘇聯，不像我們以前所看到的，只是尊貴的少數人的娛樂。藝術是為人民的。這是國家支持的。一位公認的俄羅斯或亞美尼亞藝術家，沒有經濟上的顧慮。我說公認的，不是說他已獲得的名望或聲譽。我意思是說由藝壇的許多領袖，公認為一個有才能的巨匠，猶如我國的一個醫生，須經醫學校的認可，並准許他的名字列入醫生名錄中。

為人民的藝術，國家支持的藝術，纔能使這個藝術的民族，重新開出燦爛的花，並且把自己民族的成就貢獻給世界的藝術。它深深地生根於自己過去的歷史，又沉浸於自己民族的傳統，是有很多貢獻的。

亞美尼亞的戲劇藝術，和所有國家的戲劇藝術一樣，不過是整體的一部分，這整體還包括了繪畫、戲劇、雕刻和文學。亞美尼亞當前的特殊問題，也許是如何用最好的方法，保持和發揚她的溫暖和色彩的天然的感覺——特別是色彩——像那在她漫長歷史中不斷所表現的。

在一個以前沒有戲院的國家，現在卻可以誇說有二十八個戲院了，其中八個在耶列文，一個是流動劇場，規定一年中至少兩次，訪問各處鄉村和鄰近的集體農場。據統計，每年觀眾者的人數，已達一百四十萬人以上。

每一劇場有它自己的組織，自己的房屋，自己的佈景，自己的設備。在亞美尼亞的二十八

個劇場中，二十四個是亞美尼亞的，兩個是俄羅斯的，一個是亞塞爾拜然的，一個是庫的斯的（Kurdish）。

我和亞美尼亞教會主持人一同去看了名叫「爲了名譽的緣故」（For Honor's Sake）的戲。顯然是一齣舊的道德劇，却適合現在的時代。一個富翁和他的內弟，共謀奪取一個姪兒的財產。他們以及富翁無用而酗酒的兒子，還有酷愛奢侈的長女，都不喜歡這姪兒。但幼女却和姪兒發生了戀愛，姪兒把他的承繼遺產的文件托她保管着。在富翁的想像中，以爲那文件已經燬了。她懇求着父親，告訴他那文件還在。他受了良心的責罰，祈禱上帝，而實際行動上却又不是這麼做。他信仰上帝，可毫不影響他的行動。

長子獨自維持着生活，會同他的妹子向父親提出勸告。這兒子對工業有興趣，想要建立一座工廠，這一點也頗含有適合現代的意義。在熱烈的場面中，他對他父親說：「我不是教徒，我不信仰上帝；但是我內心裏總有些什麼告訴我，你的所有行動和精神是腐爛墮落的。」這又是舊戲接觸到現實的地方。

這父親，雖爲他兒女們的規勸所感動，卻仍不改變他的主意，最後，終於奪到了那些文件，丟在熊熊的火爐裏。燒燬了。

姪兒走進來，索取文件。幼女爲了愛護他父親的名譽，對聚集的全家宣佈說，燒燬文件的是她。她說完就離開了屋子。砰然一聲。她用槍自殺在過道裏。父親昏暈過去，戲就完了。

徒然的祈禱和信教，配合着不符的行動，謀財者的奸詐，長子所代表的新秩序，他的誠摯的道德感和他爲了建設的最熱烈的願望，再加上對上帝的不信仰，不信仰上帝祇是因爲他父親徒然的信仰；悲劇的結局和它的原因，交織成了一齣有趣而光輝的戲。

我又參觀了一次民族歌劇院的精采演出，這偉大的歌劇院是剛在戰前化了三千一百萬盧布造成的，其中二千七百萬由政府撥付，四百萬是由地方籌措的。

歌劇院有四百個工作人員，每年支出四百萬盧布，一部份由政府負擔，一部份靠售票收入。耶列文劇場和歌劇院的發展，不必有經濟上的擔憂和冒險。甚至在戰爭幾年當中，也增加到五座新劇場，他們對於戲劇的文化價值的信仰，是這樣的深而且大。

一個蓬勃發展的愛好音樂的團體，不但從事嚴肅的古典音樂，俄羅斯的、亞美尼亞的和外國的，同時也從事輕鬆的民歌和舞蹈。這是由九十位藝術家的集團管理着，都由人民選出的。他們在進步中創造出自己的交響曲和樂隊，他們使用本地的樂器，一如使用四部合奏的管弦。

愛好音樂團體給我們舉行一個可紀念的民歌和舞蹈的晚會，曼妙的舞蹈主要是用手和臂表演的。北方民族的舞蹈是從腰向下；南方的是從腰朝上。手指、手、臂、肩和頭的優美柔軟的動態，必須看了纔能瞭解，猶如亞美尼亞男女服裝的顏色和形式，也必須看了纔會明白一樣。

男子是漂亮的；女人是活潑的。男子——一共二十人——穿着很長的乳白色外套，拖到膝蓋下，緊緊在腰間。外套配着藍色的大硬袖，鬆弛的藍褲，緊緊摺塞在淡褐色的高統靴子裏，靴子

上面綁着高高的紫腳套，再加上一種色彩的感染——絲襪衣，領口碧綠的、袖子又是另一種顏色、腰帶裏插着短劍和十四顆盒子砲，七顆準對腰部朝裏橫在胸膛的一邊，還有七顆，同樣橫在胸膛的另一邊。堂堂的戰鬥的英姿，配合着和女性不同的色彩優美的男性的服裝，又跟他們輕快、柔軟以及女性似的舞姿對照起來，確是令人驚異不置的。

女人的服裝之美，難以形容：漂亮、可愛、一律的形式，長裙翩翩，拖曳到脚跟，顯得是儀態萬方；精製的短衫，罩上飄逸的外衣，顯得是玲瓏剔透；強烈不同的色彩，襯托着天真無邪的韻味，形成了這樣動人的一幅波斯的縮圖，又顯得是放逸不羈。沉重的金飾物裝點在她們窄小的短衣上，跟戴在她們的頭上的二三重的金冠冕和金耳環是很好的配合。面紗一部份隱蔽着，一部份露出了她們又長又黑的髮辮。那些女人把自己裝扮得像皇后，在她們的軟底的、緊窄的、高跟靴上面跳動，沉重地裝飾着，彷彿女神一般。

有幾位顯得特別美麗，所有女人也都是眉目清秀的，端正的希臘人型鼻子，細巧彎曲的嘴唇。我指出其中的一位，比一般更像皇后——比其餘更像尼非泰（Nepheta）——給我隣座耶魯兼冷的大主教看，他說：「是的，那是純粹的亞美尼亞人，在耶列文的很少，在高中更普遍些，因為那邊，上次戰爭時候和戰爭以後，會有許多純粹血統的亞美尼亞人逃過去。」

許多舞蹈，有民族樂器的伴奏，絃，小鼓和笛子，一般是緩慢的，精細的，鎮靜的，雖然也常常頓然提到高度衝刺的運動，和呼吸急促的旋轉。一般地，他們伴奏圓轉的舞蹈的，總是幾隻

簡樸的曲子，例如年青的新娘，怕懼他的婆婆，或是一個小姑娘玩弄着從她愛人那裏偷來的好看的手帕，躲着不讓他再奪回去，直等到他拿出一塊更精美的，由他來要求同她的交換。

在歌劇院演奏壇的上首，掛着一幅動人的畫像，顯然出於一位第一流現代藝術家的手筆，精到的神韻和傑出的技巧。我詢問後纔知道他是「人民的藝術家」薩里安（Mazlup Sarian）。後來，我在劇場休憩室裏遇見他，我們談着話——一個漂亮的老人，黑髮蓬鬆，走起路來扶住兩個青年的手臂。一九一〇年，他在倫敦開過展覽會。

我力勸這位着色天才的藝術家，描繪一幅伊區米亞琴大禮拜堂儀式的細緻的彩色畫，他同意這麼做。

我參觀了亞美尼亞的藝術展覽會，並被介紹見到了許多的畫家，有幾位是可驚的年青；一位彫刻家很高興地對我解釋，他怎麼能够專心研求他自己所嗜好的藝術：收入有保障，他儘能從容工作，而不致產生粗製濫造的作品。

講到年青的藝術家，我有一天看見一個十來歲的孩子，穿着破舊的戰時衣服，手裏拿一本簿子，立在動物園裏速寫。我得了他的允許，翻看他的本子，以考察一個學童的成績。的確是一個細心觀察者優異的力作，他以他的技巧和天才描繪了動物的形態和動作。

（戊）亞美尼亞的宗教制度

亞美尼亞的宗教情況，什麼時候都是有趣的，特別有趣的是在這一時候：全國轟動着從世界

的十五個主要國家而來的一百二十四位代表的訪問，他們由亞美尼亞教會的幾個高級人員陪同，聚集在他們的祖國，參與新教長的選舉和就職。亞美尼亞教會的領袖是稱做教長的。

這是基督教會最早的分支活動之一，自第二世紀歸依基督教之後，亞美尼亞的宗教就從此和亞美尼亞民族的藝術、文學和生活發生了密切的聯繫。把亞美尼亞民族歷史上緊張時期的宗教地位作一客觀的探討，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既參加了六月的典禮，以後又有一段時間的考察，便決意抓住了這機會。這典禮儀式本身，親切美化而深刻，但毫不誇張，這引起了藝術家 and 考古學家的興趣，激動了基督教徒熱烈的興奮。基督教倚賴着教會，靠它常常有堅毅的傳統；教會更多的倚賴着基督教，俾保持着寬容的精神。

蘇維埃中央當局是完全予以支持的；無論是邀請代表和儀式的本身——如拍攝電影以廣宣傳——都表示着它積極的關切。因為遲延，因為全體代表中有一百二十四位不能及時趕到，於是使我得能多留幾天，有了更廣泛的考察的機會。

依照亞美尼亞宗教的法律規定，所有亞美尼亞教會的代表必須出席它的教長選舉，代表們紛紛從歐洲亞洲非洲和美洲而來，他們都是因土耳其的迫害而散佈在那裏的。俗界人士參加這次選舉的特別多，大多數代表確乎都是俗界的人士。

選舉在伊區米亞琴舉行，加冕典禮在伊區米亞琴的禮拜堂裏，這禮拜堂建立於紀元三〇三年，當時亞美尼亞奉行基督教為國教，比羅馬帝國奉行回教還早二十年。第四世紀末葉左右，亞

美尼亞教會脫離了外面的控制，宣佈完全的獨立。此後它一直保持著自主。猶如它在軍事上抵抗從各處來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庫爾茲人（Kurds）蒙古人和土耳其人的侵入一樣，它在宗教上也抵抗著希臘正教和羅馬的教會，伊區米亞琴成了亞美尼亞派信徒的特殊聖地。

伊區米亞琴大禮拜堂，安置在它自己靜雅的宗教建築物——僧正宿舍、圖書館、神學院、教長的住宅以及各種旁的附屬辦公處——的當中，矗立在靜悄悄鄉鎮的主要大街的背後。唯一超然出羣的建築就是禮拜堂本身，不是巨大的，是厚重的，樸實的和動人的哥德（Gothic）式建築的模型。

這禮拜堂建立在十六個世紀以前，它的彫塑石壁，是非常耐久的構造，溫暖的棕黃色調，潔淨清新，超然矗立，而且還要矗立那麼幾個世紀吧。構造是十字形的，這樣的建築設計爲了抵禦地震或圍攻，事實上也確實經歷了這兩重災難。它的牆壁是堡壘。它的地窖是大量食糧的貯藏所。清冽的水花，仍從這建築中心的泉裏噴射出來。每一處都精密地爲了抵抗圍攻打算，即使是地下溝渠的設計，也注意到把污水排除在一哩之外。

雖然歷遭侵略者——波斯人，阿拉伯人，成吉思汗，鐵木耳和土耳其人不斷的蹂躪，這古老的教會仍擁有無價的寶藏。兩把鑰匙，一把由大僧正掌管，另一把付托給副主教，可以開啓珍寶的窖藏。僧侶的權標、法衣、第四世紀的銀彫刻、古代伊區米亞琴的銀質模型、和亞美尼亞在十九個世紀以前的飾物，使得伊區米亞琴成了一個值得參謁的聖地。教堂傢具，古色古香，樸素可

愛。在那狂喜加冕的偉大日子，那色彩顯得悅目動人。一隻聖餐檯是銀質的，乃傳統的亞美尼亞大工匠的精製品。另一隻是大理石的，鋪着一張厚重的織布，二百六十年古老的砌石，塗飾着久已失傳的顏料。

大禮堂有兩個寶座，一個是十七世紀彫木的，另一個，非常華麗，是十八世紀的銀和蚌貝製的。這座建築和其中的傢具，仍保留着第五世紀却耳雪頓會議（Council of Chalcedon）以前的古老基督教教堂的樣子，只加上最新義大利畫派的幾張繪畫而已。亞美尼亞教會是很固執守舊的，它反對改革，它拒絕置備新式的教堂、傢具，猶如拒絕採行却耳雪頓以後的希臘和羅馬教會的教義。

我到伊區米亞琴第一次的訪問，是出席代表會議，參加新近去世的教長的追思會。我們到達很早，在教長住宅花園裏遇見高級牧師團。這古老的住宅樸素動人，是一幢可愛的、長長的、弓形窗的、靜靜的房子。有着靜穆的、對稱的、維多利亞早期形式的樓梯，通到第二層，也是唯一上層的主要入口。

這房子富有英國色彩，粉刷雪白，襯着淡藍的邊線。望下去是一個迷人的花園，祇有果樹蔬菜中間的小路和小河稍具形式，小河構成了有用的灌溉網。中央是一個寬大的、陰涼的、葡萄覆蓋的涼亭，構成一座愉快的葡萄棚；我們就在那裏坐下來飲檸檬汁，同時跟貝魯特（Beirut）的大主教談着話，他活像是阿休朋伊柏（Ashur-ban-i-pal），這亞述的國王。高個兒的，威儀

非凡，長長的鬚髯，修整的捲髮，高貴的鼻子，厚重的相貌，往往令人聯想到亞述的塑像；我所見過的最有威嚴的教士之一。在這裏，我們也見了最尊貴的柏拉地（Terenig Paladian），他在五個月前會從紐約同他的教長到西里西亞（Cilicia）。

亞美尼亞教會有兩個教長，這倒不是由於宗派不同，而是因為這樣一來，倘如不測，不致於沒有一位行政上的領袖，在過去，教長是常常受到迫害的。會議在大廳舉行，由臨時主席主持，西里西亞教長，跟貝魯特和耶路撒冷大主教坐在兩邊。致開會辭後，會議通過了重建圖書館和學校的決議，會議的經過都攝入了電影。

喬茲克欣（Gevork Chozekchian）大主教當了選，他自一九三八年第一百四十一世教長死後，就代理主持着亞美尼亞的教會，他有着動人的容貌，和驚人的事業。他是一個農民的兒子，生於頓河流域，在伊區米亞琴高等神學院畢業。在宗教上，他是保守派；在政治上，是一個愛國者。他的聲望在大戰期間大為增高。他拿出教會的全部力量，從事反法西斯鬥爭。他獲得了保衛高加索的獎章。

喬茲克欣在柏林學神學，也是一個音樂院畢業生，他的簡單住宅裏少數裝飾品之一，是一架大鋼琴。

尼沙揚（Nersoyan）是一本論述基督教和共產主義極有見解的著作的作者，他一直逗留在倫敦，充任英國國家廣播公司的廣播員，現在在美國執業。他介紹我給代表們，代表們誠懇地歡

迎我。會議以後，爲新近奉主召歸的教長舉行安魂彌撒。高高的聖餐檯矗立在隆起的四無遮攔的大理石聖壇上，這是在禮拜堂的東端，鋪着地毯，兩面有短梯可以上去。一幅天幕覆蓋着聖餐檯，又有一幅裝有活動轆轤的巨大的金色帷幔，當供神祈禱的時候，把整個聖壇遮掩起來，隔絕了祈禱的人羣。在高聳的銀藍的聖餐檯上，羅列着一排排的教會裝飾品。一幅聖母和孩子的畫像，正如所有亞美尼亞教堂裏的一樣，在聖餐檯後面佔據着顯著的地位，只有當復活節和聖十字節時候不同，那時節另有相當畫像來代替它。高級牧師胸前也掛着聖母的像牌，代替了十字架或十字章。美麗中帶樸素，色彩簡單，這和俄羅斯教堂金光燦爛的色彩濃厚的繁複的鑄品，恰形成了生動的對照。

當所有與會代表到齊後，就舉行選舉喬茲克欣大主教爲新的教長的儀式。他的受任是在第二天星期日，我們大家都集合在他住宅中陽光燦爛的花園裏。在大主教前面，各主要國家的代表用四根支柱撐着一個華蓋，我就在華蓋旁邊跟着走。這華蓋約莫有五呎平方，樣式像一座中歐塔的尖頂，用絲織成，繡飾得異常精緻。撐持華蓋四角的兩位牧師，把華蓋恰形成了一個斜角，俾大主教走的時候，可以看到一切。前面是一幅一碼周方的鮮艷的金緞，反射着上帝牧羊圖的金黃色的光綫。再前面，則是拿着十字架和其他形形色色重要有趣的東西的人們。十字架是銀的，還有銀色的刺繡絲絨，樣子像是倒轉摺攏的雨傘，裏覆着拿十字架的手。年齡不等穿着金黃富麗的寬袍的孩子，衣緣和披肩都是綠的，在執行着他們的職務。黃色確乎是各種寬袍中最主要的顏色，

牧師穿的法衣，便是水仙花似的金光燦爛的黃色。

奇異的銀版，叫做「克蕭茨」(Kshots)，英碟一般大小，垂直的縛在鑲嵌蚌貝的六角棒上，版的四周懸掛着銀鈴，持棒者把它搖動，叮噠作聲。「克蕭茨」意即「驅逐者」，它的功用是把蒼蠅從「聖餅」(Host)驅趕開去。持香者搖動他們的香爐，把填裝進去的香，做成一個精巧的禮拜堂的模式。

當大家一起到齊了，主教大主教和西里西亞的教長，從階梯上走下來，排列在華蓋和新選出的教長的後面。法衣非常精美，比我在旅途中任何一處所看到的更要可愛，比柴哥斯克(Zagor)的大紅大黃的法衣淡一些，卻更精巧，更優雅，真是別出心裁的設計。紫緞的底子，巧奪天工，做成極純潔的色彩，非常精細的針織。主教們都穿法衣，肩背上掛了一條闊帶，前前後後拖下來，幾乎拖到地上；頭露出在中間。法衣的刺繡，富麗之至，盡是各色各樣聖經上的景色。法衣的領子是堅硬厚重的，三四吋高，常常綴着一打或更多的聖者鍍金像。這法冠很大，拉了的形式樣，外面刺繡，這倒並不限於亞美尼亞主教纜帶的。每一主教手中拿一小小金屬十字架，在一圈光綫中，伸展着它的四肢。原來這是一個鏤空的十字架，沒有釘在十字架上耶穌的圖畫。它裝有一個金屬的把手，也跟大十字架同樣形式的套着類乎小巧的刺繡手帕的東西。主教們都把主教戒指戴在小指上，只有大主教帶在無名指上。法衣和法冠的精美，頗有中國或波斯的風味，大主教的法衣確是在中國製的，衣料就是一塊華麗的中國的香繡。另一件色彩喬麗的法衣全部裁製得

像是有六角尖塔的伊區米亞琴大禮拜堂的圖形或模型，在尖塔的壁龕裏，站立着各位聖者，盤繞尖塔四壁飛翔的，是藍翼或紅翼的天使。

大主教的法衣，背後畫着雅各的梯子，在前面是亞伯拉罕(Abraham)的假想伊塞克(Isaac)祭品。他的法冠上畫着耶穌受難以及使徒的圖像。

低級的牧師們聚集在前面：教會執事，牧師，大牧師，大僧正和教會醫生們。

行列前進，打頭的是十字架，隨後接着是一面巨大的鍍金金屬板似的旗幟。

我們沿着溫暖的、日影斑駁的、綠草叢中的扁石小徑走過去，——虔誠的羣衆沿路排成了長列，其中有藝人阿拉瑪尼，——進入了教堂的主要門廊，鈴聲叮噠亂響，政府攝影人員大肆活躍。在禮拜堂裏面，大主教一走到什麼地方，便是一陣鎂光的閃亮。顯然的，政府希望獲得這莊嚴一幕的全部紀錄。

那些主教們，手裏各自拿着自己的權標，走上講壇，坐在指定他們職務的椅子上。大主教他自己跪在聖餐檯的前面。在他後面，有兩位牧師高捧着他的法冠。黃衣的牧師團，成羣立在法壇前面，政府代表波良斯基(Polianski)，則站在牧師團後面，還有代表們，這時候，都坐在椅子上。通常大家都是站立的。大主教蒞臨了。祈禱開始。一個小樂隊奏起樂來，牧師團和人們相應唱和，歌聲壯闊，餘音繞梁，伴着單純的低音，彷彿是遠寺鐘聲。

在加冕的儀式之前，那黃色大幔，沿着聖壇放下來，遮蔽了聖餐檯和中堂的講壇，直到儀式

完畢，纔又揭開。埃及大主教孟柏耳（Mandre）穿着合身的普通衣服，拿了一根黃金頭的手杖，在大廳中走來走去，照着聖餐檯邊的隆重儀式。

大主教宣誓了，聲音沙啞而低微，筆直的跪在墊子上面，旁邊或前面都毫無倚靠。他朝着大家，忍受着僅離他面孔幾呎的閃閃鎂光。兩旁跪着兩位年青牧師。這三位一動不動的跪在那邊很久的時候，我再暗暗盼望這兩位年青牧師應該讓那老人——他是七十六了——扶住他們的手臂。我又盼望那幾位主教能夠一齊唸誦祈禱，免得個別的一個接一個。

大主教的姿態，莊嚴高貴。我心裏想起了米迦朗其羅筆下的摩西（Michelangelo's Moses）。他在鎂光下忍受着，汗水滿掛着眉額。他時時用手帕揩臉，趕蒼蠅，祇有他，以大主教的資格纔能帶手帕。各個主教循序唱着單調的讚美詩，足足經過半個多鐘頭的時間。大主教時時閉上眼睛。他的嘴唇微動着，像是在祈禱。他忍受着，毫不退縮。在一適當時間，一幅面紗放在他的頭上，他成了教會的新娘了。

然後是更多和冗長的吟誦，接着，耶路撒冷大主教跑上前去，從金鳩的嘴裏，把聖油倒在新教長的濃厚長灰的頭髮上。所有主教於是把他們的手放在教長的頭上。把油擦進去。然後跟着是祈禱，願聖靈降落在教長的身上，俾能克盡聖職。最後，他的法冠被放在面紗上面，西里西亞的教長吻他的頰，各個主教輪流吻着手和頰。

祈禱結束，第一百四十三世的教長開始了他的統治，這是一千八百年來未斷的長鍊的一環。

儀式完了以後，牧師團從人羣中擠着回到大廈去，人羣是這樣的擁擠，以致每個人都搶着祈禱，惟恐有災禍發生。

由紐約代表團領導，我們六個人手攜手的聯成一個圈子，保護着這個基督教最古的教會之一的最高領袖，突圍而出。

教長在古老的會客室裏接待代表，這個房間，平常連低級牧師也難得或從未進去過。喬茲克欣他自己也曾有三十年從未進去，一直等他做了大主教。

少數來賓在教團致敬之後，都上前跪跪，吻這老人的手。當他溫暖地吻着我的面頰時，我懷疑，以前是否也有過一個英國的基督教徒，曾在這同一禮拜堂中參加過類似的加冕儀式。

第八章 喬治亞

從脫必列西到耶列文，飛行要一個鐘點，乘火車十六個鐘點，地面和天空的景色完全不同，各有千秋。我是兩者都享受過的，但卻寧願坐火車，路傍的車站，山，河流，和平原的放大景色，草原，樹林和人生變化無窮的全景，都近在眼前。

當我們坐夜半的火車，離開耶列文的時候，天氣很熱。那位「史太林格勒人」偕同他的妻子，——十六歲時候就嫁給他，是一位愛好文學的少婦。——驅車帶我們到車站，等待着，很爲我們的離別而抑鬱不樂。我感激他始終待我像兒子待父親，我俯首吻着他的頰，他感到了無限的愉快，但車站管理員揮旗叫我們分別了。

我沒有遵守關緊窗門的嚴格規則，我大大的打開了臥舖車廂的窗戶，不久，就領略到高原涼意的空氣。夜色清新，滿月照在牧野上，我們飛馳過去的時候，留下了明確的車影。我忽然看見一個人影在車頂上蠕動，接着一個又一個。當火車中途靠站或爬上高坡的時候，那車中擠得水洩不通的旅客，——戰後蘇聯的交通，比英國更困難——常常會侵佔到腳踏板上，兩節車廂之間，或甚至爬到車頂上面。

我看見了車頂上爬行的人，這纔明白了火車規則的重要性：「關緊你的窗門。」在耶列文以及沿綫所有的車站上，我看見軍隊回來，亞美尼亞的青年和喬治亞的青年，瘦瘠，溫和細小，像史太林大元帥他自己，也有同樣端正的面貌。當我們離開的時候，耶列文正熱望着當地一個著名兵團的蒞臨，爲了表示感激和光榮，從車站到市中心的一哩長路上，準備鋪上東方的地毯，這都是由市民們捐借的。

那晚上我睡得少，因爲這樣我可以看得更多——高地上的平原，山，煙霧，三三兩兩的荒村，低低的沒有窗的石屋，牧羊童，牧人和孩子們。

幾小時慢慢的下坡，帶着我們穿過樹林和山峽，到了寬廣的流域和肥沃的土地，遍野盡是帶刺的玉蜀黍和小麥，開花的馬鈴薯，胖胖的落花生，以及紅熱滿枝的櫻桃樹。在下游流域中的農民較富足，也穿得比較好。車站上，一羣羣上車的旅客，和那叫賣的小販混雜着。各色各樣的服裝令人悅目，女人的黑髮裹着紫色的頭巾，男子頭上則覆着大皮帽。一個巧小的年青母親，穿着鮮艷非凡的本地服裝，背上的黃背帶，緊縛着一個兩歲的肥胖嬰孩，她在火車的踏腳板上拚命要擠進車廂，但是始終擠不上。

經過更廣大的山谷，和更豐饒的土地，我們最後到了脫必列西，——喬治亞的首都。我們決定在這裏延長逗留的時間。脫必列西跟耶列文是大不相同的。亞美尼亞的首都，是從貧瘠的村落，一躍而成爲動人的城市。脫必列西在革命以前就已經是一個現代的城市，有着精美的街道和

漂亮的建築物，如禮拜堂、回教寺院和教堂，以及四十萬的人口。在亞美尼亞，蘇維埃的進步集中於耶列文。在喬治亞，這首都，猶如任何重要的歐洲城市，依然保持着它的新和舊的混合，寬闊的街道，飛快的車輛，鋪道上的花枝招展，現代化區域裏的綠樹成蔭；中古化的城市中心的屋宇人寰，喧喧嚷嚷；脫必列西就是從這中心躍起的城市，一灣急流圍繞着，古舊的堡壘巍然聳峙着。

像亞美尼亞一樣，喬治亞也有過長期的、光輝的文化歷史，在一個比俄羅斯普通博物院更完備的大博物院裏，有着經過澈底科學方法整理和保存的記錄和古蹟，如原始的武器，裝有水管和水槽的精密的古代排水系統，造成偉大歷史的早期文化的遺蹟，以及泰瑪拉皇后（Queen Tamar）的遺物，泰瑪拉皇后，乃是十二世紀喬治亞的伊利薩伯。

喬治亞很早就處於重要的地位，在紀元一千四百年，有一件阿拉伯手稿記載着，法國財富據估計為三百萬金法郎，英國四百萬，而喬治亞則有標準單位的貨幣一千萬。

第五和第六世紀的早期手稿，像第十二世紀的裝訂本似的，保存下來。其他的珍藏如紀元九三六年的的一本福音書，一件原來繡花封面的第十二世紀的手稿，曾為泰瑪拉所有，裝飾着象和虎，還有第十四紀的一件附有真實的人體畫的詩篇。

我覺得比什麼更有興趣更動人的，乃是薩姆泰佛羅（Samtavro）墳墓中的珍藏，這墳墓在脫必列西的西面約十五哩，埋藏在河畔一個農村的地下，直到最近纔被發現。幾世紀以來，在人

們吃、睡和坐的房間下面兩三呎的地方，橫躺着一座宏大的墳墓，周圍是用厚重石板砌成的，裏面埋葬着列代南喬治亞省的總督。在有一座墓中，發現了一隻美麗的附有名印的指環，一面精美地鑲刻着紅寶石鑿成的頭，相反一面，刻了小字的姓名。附近是總督女兒的墓，這指環便爲她所有，她還有項鍊、鏡子以及細長彎曲的踢馬刺。所有最動人而最可愛的東西，是一只鑲滿寶石的小金盒，皇冠一般大小，有一根鏈子在它下面拖着垂飾，這背面，由精巧的夾子夾牢着，露出了一顆孩子的牙齒，那是一位母親當她的孩子換牙齒的時候所珍藏的。

薩姆泰佛羅羅位置在早期西喬治亞首都那先泰 (Metsheta) 的附近，它包括着一座古代宏大的大禮拜堂，矗立在其自己的綠草如茵的園場中，那是十一世紀時所建造的。它的巨大平坦而通風的外牆，有些部份鑄刻着浮彫，可愛的鮮紅的色澤，細密，單純，明快，令人想起了愛立克琪爾 (Eric Gill) 的最佳作品。在東端，有兩個石雕的翱翔的天使，像愛濛斯坦 (Epstein) 筆下的人物，環繞着裏面高聳的聖餐檯。燕子窠塗污了險峭的東首高牆和屋簷。從頂到腳的牆上，盡是巨大的一條條精美的石刻，那牆是用各色各樣石頭砌成的，美妙地混合成爲一個和諧的整體。

一位陪伴我們的著名建築師和他的夫人，據說每夜收聽無線電廣播，先聽報時刻的大鵬鐘聲，接着是英國國家廣播公司的新聞廣播。

我們被邀去會見喬治亞學院的人士，我們和那學院的幾位教授，盤桓了一個有益的上午，他們陳述着各部門的工作，回答着我們的問題。校長不在，上莫斯科去了，由副校長兼歷史教授的

院士楊那斯基 (Yanaskia)，代行着職務。院士凱少甫 (Ketshove) 替我們解答關於植物學的問題，蔡列脫利 (Tsereteli) 關於社會學的問題，朱平尼區維爾 (Chubinishvile) 則是關於喬治亞歷史的問題。

特別有興趣的是喬治亞文學史兼教會史教授，院士薛西里茲 (Cornelius Cecelidze) 的著作。他以前是一位牧師，大革命時候，他放棄了他的日常工作。他當了教授。他的論述喬治亞教會和喬治亞文學的代表作——他送了我一份，計兩卷——是一種輝煌的成就。他的關於教會史的講演，是受普遍歡迎的。這是我從一位嚮導我們的喬治亞青年薛西雷·陶萊茹雪維里 (Ceilly Dolenjashvili) 那裏聽到的，她是一位美好的愉快的和聰明的十八歲女郎，仍在大學裏當着研究生。她是數學家貝里茹 (George Hivi Beri-Gdcha) 的女兒。她的祖父是一位牧師，每逢假期和大節日，兒女們——一位醫生，一位藝術家，這位數學家以及別人——還有孫兒女們，總是歡聚在祖父的鄉間別墅裏，薛西雷也是其中的一個。

薛西雷愛她的祖父、祖父的家和圖書館，她說，但祖父不准她把書籍帶到脫必列西去，惟恐從此不歸還。薛西雷又說，喬治亞人是反對女子工作的。戰事一結束，喬治亞婦女回到了她們的家庭。她們不喜歡軍事服役，因此蘇聯女孩們往往在交通部門中工作。

薛西雷領着我巡視寬敞的大學校舍，陪我去看運動場，六百個大學生就在這裏準備着一年一度的旅行，到莫斯科參加全聯邦的體育週，在那裏，他們將碰到從地球六分之一的蘇聯各處來的

年青的男男女女，這是要比許多人想像還更重要的一樁事呢。

大革命的震動，在喬治亞沒有像在俄羅斯那樣的厲害，在薛西雷以及她的有趣味的家庭中，舊秩序和新秩序交替間的破裂，顯然要比任何地方來得少。例如她是共產黨員，卻並未減少她對宗教的濃厚興味。她聽着一度當牧師的、薛西里茲教授的宗教史課程，她坦白的承認說，他授課的時候，除了歷史之外，還使許多大學生，連薛西雷在內，都受到了感動，情願去訪問禮拜堂和聆聽學識豐富的老年大主教和雄辯的青年副牧師的講道。她又說：「他們靜悄悄地坐着，聽着，興味盎然。」

爲了急於要會見這位喬治亞教會領袖的大主教，我們就到大禮拜堂去，這是靠近堡壘的，舊市區中的一座堅實的建築物，剛在深深的岩石峻嶒的山谷上面，底下的河流打着漩渦。我們進去時候，正唱着早晨祈禱的讚美詩。我們站立着傾聽。聽到的祇有兩種聲音，雄壯的和美麗的歌唱。時時有這麼二三十人一同進來，做一會兒禱告。

薛西雷請問副牧師，——他穿着一身白亞麻布的普通便服——我們能否見見大主教。副牧師跑進去，不久就回來，引導我們到沿河岩邊上的一座小巧精美的房屋中，在長滿天竺葵花的走廊上，這老年大主教，慇懃地，莊重地，和誠懇地接見了我們。他短小，但是高貴的，穿着法衣，頸項間圍了一根金鏈子，拖着大塊聖母瑪利亞和孩子的像牌。他又長又白的鬚髮，襯托着俊美的面貌。

「住處很小，」他抱歉地說，領着我們到了一間會客室。一位老年傭婦拿上酒和甜品。「村裏自造的酒，沒有害處的，」這老人說，斟滿了我們的杯子，祝我們健康。他一一回答了我們所有的問題，他說他曾在基輔受教育，雖然現在老了，不能旅行許多的地方，但最近還是代表他自治的教會，到莫斯科參加了亞歷克綏總主教的加冕。

「有人建議一個全耶穌教的運動，由所有基督教會舉行一次會議，並採取聯合的行動，你們的教會是否贊成呢？」我問。

「我認爲英國的和喬治亞的教會的聯合，是沒有任何阻礙的，」他回答說，舉杯祝福我們的教會和我們各別民族間的親善的友誼。

他的副牧師，同他一起生活着，照料他像兒子對父親，穿着普通人的衣服，他說：「他這樣穿着，是因爲他喜歡和一般人民在一起，不致於太顯目。」這副牧師進出戲院和歌劇院，跟現代青年都非常之莫逆。

薛西雷和伊娜在這種友誼的、非正式的聚會中，特別高興，一直陪我們同兩位主人作着很有趣的長談。老人說伊娜是一個女孩子。「但我卻是已婚的女人，有了兩個孩子，」她說。「當母親是太年青了，」他回答說，又加上一句：「那末，你的女兒也許像是你的姊妹吧，我的孩子。」

給伊娜和薛西雷舉杯祝福之後，他說，「現在再來一杯祝福副牧師，」他轉身對着他說：「你是永遠忠實於教會的。」

我委婉地表示喝得太多，對於我的身體不好時，他便說：「那末只再來一杯；我們最後總是爲『我們的聖母』而乾盃的，」於是大家爲「我們聖母」乾了盃，就結束了這可紀念的聚會。

我們幾次訪問了平民化的大酒店，矗立在城鎮上面六七百呎高的一個險削山坡的邊沿，有一條鐵索的鐵路通往那裏。這是一座特別可愛的房子，細長的柱子，柱頭都是雕刻的，支撐着那覆蓋全部屋宇的玻璃屋頂。全屋有三層高，寬敞的陽臺可以讓人們在那裏安坐飲食，飽覽下面的全城勝景，那彎彎曲曲的河流襯托着遠處的高加索山脈。廣大的山頂花園環繞着酒店，樂隊演奏着，父母們只要化一二文錢就可以帶同孩子們，離開悶熱的街道，到這裏來聊天或跳舞，或靜靜的散步，以消磨一個黃昏。一個六歲的小女孩坐在我們對面的斜坡上。她手裏抱着睡熟的嬰孩，另外又牽着一個四歲的男孩，他們是從下午就來到這裏的。現在一起要回去了。

我們也常常換口味，上戲院或歌劇院去。有一晚，我們看到一齣有名的古代約喬治亞倫理劇，描寫戀愛和義務的鬥爭，主要完全適合戰時的意義。

本事是簡單的。有一位美麗的富家女郎，從鄰村匪徒手裏被救出來後，請求她的救命者隱瞞她的實情，惟恐她的不幸會損害了她的名譽。救命者中的一個，擊斃了匪徒，卻愛上了這女郎，而女郎也愛他。後來，他發現她已同他的朋友訂了婚。他被他的父親強迫着去參觀婚禮。那位丈夫發現他的妻子愛上了旁人，大爲沮喪，便離開家庭，背叛了他戰爭中的祖國。這位戀愛者應公爵之召，去說明經過，承認擊死匪徒的是他。他父親原是村裏的領袖，命令他去扼守敵人側翼一

個極險要的據點，他因忙於和這女郎相愛，遂致疏忽職務，遭敵人突破了陣地。那父親又羞又怒，殺死了他的兒子。另外那位背叛國家的青年，也終於自殺了。這齣倫理劇，所着重的要點，是說明當戀愛代替了義務時，跟着來的便是悲劇。戲演得很好，而且充份表演了古代風俗和服裝。音樂是地方的，單純的。戲院經理後來招待我們，說明這音樂是和音（Over-tonal），有些是拜占庭歌，有些是農民的歌謠。

又一個晚上在歌劇院裏，經理招待我們，由這位男高音在辦公室中再度爲我們歌唱，一位崇拜者把一大束鮮花遞交我們獻給他。他是因了美妙的歌喉，放棄原來專攻的醫學，而獻身舞台的。

傑森（Jason）和他的阿戈諾茨（Argonauts）找尋金羊毛的傳奇，（希臘神話——譯者）暗示着這一部份世界最早的活動，也暗示着它和希臘以及西方的關係。替人類竊取火種的普洛米修士的傳奇，它的發源便是在喬治亞，也許可能和古代的巴庫富源有多少聯繫。

喬治亞毗連土耳其的邊境，迤邐數百哩，擁有雜居的人口三百七十萬。紀元三四五年歸依基督教，直到一九一七年爲止，它始終是半封建的。在黑海沿岸一帶，亞熱帶的農業十分發達。它種植着大量桐油，可作油漆用的。茶，煙葉，和各色各樣的水菓，特別是葡萄和檸檬。全部巴庫石油供應的三分之二，是通了巴士米（Batumi）山隘的油管和鐵道。就它的大小而言，喬治亞擁有着比蘇聯任何區域來得高的水電力，它並且以很快的速度，發展着她的水力資源。有四個新

的水電站，包含電容量共十六萬九千瓩時，現在正建造中，一九五〇年可以完成。到一九五〇年，學校的數目將增至四千三百三十三所，學生人數將達六十四萬兩千。醫院病牀將增至一萬七千九百張。在一九四六到四八年，喬治亞的全部投資為四十一億三千萬盧布。同時我們必須記住，這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一個在一九三九年僅有人口三百五十四萬二千的民族，其中都市的人口為一百零六萬六千五百六十人。

在一九三五年，工業生產總值已從四千三百萬盧布，增至六億四千零九十萬盧布。

蘇維埃變革的另一個證明，可以從醫生的人數看出來——一九一三年為三百五十一人，一九四〇年為四千六百七十人。

第九章 亞洲

一 引言：地理和歷史

亞洲的許多共和國，處在它們自己的一個世界裏。在這個世界中，水從高大山脈中的長年積雪流下來，當它重復消失在大片焦土和沙漠之前，支持着生命，又被生命征服着和利用着；這世界，夏天受烈日的燒灼，冬天因朔風而僵凍。

我們從史太林格勒飛到烏茲貝克，——這亞洲各共和國中的皇后；從上午七點四十五分到下午四點二十分的一次長途飛行，祇短短停下加了一次油。在六千或八千呎的高度中，我們橫過了「裏海的窪地」(Caspian Depression)，一片棕褐色的貧瘠的土地，間或交錯着乾燥的河床。兩個鐘頭看不到一棵樹，後來看到了僅有的一棵，乾枯，發育不全，完全孤零零的獨立着。在塔什干到莫斯科鐵路綫的一個荒涼的車站上加了油，我們又再飛行，飛得比以前更高，看下去幾百哩，都是生命完全絕跡的不毛之地：沒有樹，沒有草，沒有生命的足跡。泥沙、荒漠、鹹土的窪地，荒涼得異常靜寂。一霎那間，我們看到莫斯科——塔什干的鐵路綫，像一條細小的銀絲，從無限的荒涼中飛馳而過，消失在地平線上。

我們飛機的幾個駕駛員，都是能力高強的人。他們會給莫洛托夫駕駛到舊金山。他們根據了在英國短促逗留的認識，帶回了一則完全誤會的英國戰時生活的故事。有一個女郎，在海德公園向這位較年青的男子招呼，說要他確實相信，她已有兩天沒喫過東西，飢餓逼着她出賣靈魂。這男子又看到別的許多女郎，在公園裏閑蕩，也似乎懷着同樣的目的。因此便信以為真。但我們始終相信，在戰時的倫敦，決沒有年青的婦女會缺乏工作和食物。這個女郎撒了謊。這一類故事，也發生於在蘭撒斯脫廣場（Leicester Square）間路去美國的女郎，從那邊回來的士兵，常常要他們的友人確實相信，有百分之五十的英國女郎在結婚之前就懷孕。柏林也有這一種女郎，把他們先前在俄國人手裏遭遇的同樣故事，告訴我們的士兵。

經過八小時的飛行，那模糊的東方地平綫上露出了一行山丘——這偉大的帕米爾的前哨。少許的綠色發現了，這是水光瀲灩的中央亞細亞的邊緣，再飛四十哩，飛機低低掠過了巨大的、設計完美的、現代化的塔什干城——烏茲貝克的首都。我們盤旋了一會，降落下來，就驅車穿城駛向我們的目的地。

一座大城；塔什干的戰前人口是五十八萬五千多，戰時因為難民湧入，增多至一百萬，這些難民，主要來自十六個加盟共和國之一的白俄羅斯。城裏的主要各處，高貴的街道交叉，莊嚴的白楊或菩提樹成蔭；鮮艷明媚的花園裏，有巧小的泉水噴射飛濺，棕色的石砌小道從寬闊的大路分開來，點綴得這城市很美麗。塔什干充滿着高級南歐城市的風光。

我們的住屋是一種中等大小的鄉下房子，從靠近一條窄巷的公路走進去，四周環繞着花園和菓園。一個游泳池增添着它的愉快。花園裏盛開夏季的花，菓園裏結着夏季的水菓——梨和桃子、梅子、蘋果和葡萄，生長在樹上，跌落在草地上，或在每次餐時裝到我們的碟子裏。

這房子本身，祇有底層，有一間很大的公共室，兩邊是無牆壁的，只有柔軟白色的帷幕遮蔽着，令人想起了美國富翁的鄉間別墅。這位俄國太太管理着這房屋，一身包辦了主婦、母親和顧問的職務。我們舉行了一次招待學者、科學家、行政官吏和舞蹈家的大宴會，她安排得很周到；她醫治着我們的小毛病，她給我們燙衣服或補鞋。當我們從灰塵飛揚的小巷裏進來時，她吩咐手下小姑娘擦掉我們鞋子上的泥土，或是當我們想要午睡的時候，就拿墊子到陽台上，或是爲了涼快些，灑水在陽台上面。她管理這「房子」，安排得像佈置很好的英國鄉下別墅一樣的圓滿，甚至當我們離開以後，她還是關心着我們。我在疏忽中丟下了一隻不會注意的鞋子，但是她終於想了種種方法歸還，四個月以後，經由倫敦的蘇聯大使，這鞋子送到了坎脫勃里。

雖是中夏，氣候可愛而宜人。白天熱，可並不叫人感覺難過，晚上，從帕米爾吹來的風，涼爽痛快。塔什干和一般東方城市完全不同。清潔，沒有飛虫。我睡在菓樹底下，沒有蚊子的叮擾；流水潺潺，和爛熟的桃子軟洋洋的落下，是打破這南方夜晚的靜寂的僅有聲音。一個模糊的影子蹲伏在地面，整夜的一動不動，這是一位烏茲貝克的兵士，坐在那邊保護我的。

在烏茲貝克是有許多東西可看的，我們趕快開始了我們的參觀。用餐洗臉以後，我們驅車去

看一張影片，以戲劇方式描寫斐加那運河（Ferghana Canal）的鑿掘，這運河乃是亞洲的一件偉大的業績。

這電影脚本是伊娜的一個朋友寫的，——一位年青的，「懶惰不堪」的，新國歌的製曲者之一——故事開始是王子戀愛一位姑娘。他提出要鑿穿山岩，放出所需要的水的代價是和她結婚。他失敗了。但王子失敗的地方，平常的蘇維埃人民卻成功了，這部片子便紀錄了他們成功的經過。農民的大軍打通了運河，使得沙漠像玫瑰似的開了花。

在映演正片之前，這片子首先着重指出了中央亞細亞生活中的某些主要東西，水的重要性。亞細亞的人民只有靠了水纔能夠生活，蘇維埃的亞洲，用科學的澈底辦法，利用着水，並且充份注意到它經濟上的潛力。

在烏茲貝克，我們遇到了各方面的人物，農民工廠的經理和職工，教師和孩子們，教授，科學家，歷史學家，考古家，藝術家，演員，作家和劇作家，宗教領袖，以及城市和政府的首長。我們遇見了共和國總理，和東方回教界的宗教領袖伊默姆。

我們要好好研究這迷人地方的地理和歷史，自然也得同時研究它現在科學的方針，它的農業、工業、教育的和文化的活動，它的平民生活和烏茲貝克的全部政治構造，以及它四面的鄰居，跟它一起構成了中央亞細亞民族的集團，擁有全部人口兩千一百萬。

蘇聯的亞洲部分，構成了這偉大的整體的八分之七，一直伸延到烏拉爾山，烏拉爾河，和裏

海之東。中央亞細亞則是這亞洲部份較小的部份，緊靠着那把蘇聯從伊朗、阿富汗、印度和中國隔開的巨大山脈的北邊。從那些中央阿爾帕斯山流下來的水，經過巧妙的利用，造成了可驚的肥沃。當十三和十四世紀，在像成吉斯汗鐵木耳這等人的統治之下，中央亞細亞的城市就已經繁榮一時，出現了神聖的波克哈拉和黃金的薩瑪根（Holy Bokhara and Golden Sama kand）兩大城市。在這裏，即使到了衰落的時候，仍還閃耀着天藍色的黃金色的尖塔和圓屋頂的回教寺院。那些古城在蘇維埃的統治下重新興起了，每一個有價值的古代紀念碑，都經了恢復和交修，舊日的古蹟，都小心地加以保留，並技巧地給納入了新的模型。

水的科學的應用，供給了動力，拓展了灌溉，同時又培植了耐旱的樹木，抗拒流沙的侵犯，支持強韌的居民，讓他們跟其他蘇維埃土地一同享有着它的新近才知道的富源。

中央亞細亞包括了五個民族的集團——塔什克，卡柴赫，啓耳吉茲，土爾克門和烏茲貝克。最後四個發源於土耳其，塔什克發源於波斯。讓我們先說中央亞細亞的地理和歷史。

塔什克鄰接着印度和中國，是一塊有高峰、冰河、深谷和險削山岡的地方。它頗像瑞士，卻比瑞士四倍大。它的人民是高大的，藍眼睛，直鼻子，在人種學上近乎現在的伊朗人。這一度強盛的、分佈廣泛的人民，千年來逐漸消沉着。在今天，他們的國家被趕入山隘裏，他們的個人則廣佈在中央亞細亞。塔什克人雖有健美的體格和漂亮的容貌，始終不過是替別的民族服役的伐樹者和汲水者。富有的阿迦可汗（Aga Khan），一個回教部落的領袖，就從這批窮苦的山地人

身上榨取着大量的錢財。在沙皇時代，塔什克人只有百分之〇·五是識字的，他們的食物，主要只是一種桑樹果子做成的餅。

塔什克古代的貿易路線有三條，一條經過阿爾瑪·阿太，另一條經由印度、伊朗和高加索，第三條經過紅海；自從這古代貿易線切斷以後，塔什克就喪失了外面世界的接觸：失去了古代的文化，沒有獲得了新的，她保留着早期社會的有趣的殘片。許多人認為塔什克人是一切民族中最古的，是我們種族的起源。

在塔什克和中國之間，聳峙着巨大的帕米爾高原，這世界的屋脊。史太林峯高達二四、五九〇呎；類非爾士峯則為二九、一四一呎。

科學在帕米爾一帶發現了豐富的資源，和廣大無所不包的範圍。它的低處山谷在海平面上——萬三千呎。那裏曾經有過考古學和人種學上的發現，掘到過稀貴的物質；宇宙綫也在那裏探索着。

卡薩赫從伏爾加延展，東向一千六百哩到中國的邊境，從橫貫西伯利亞鐵路南向一千哩，達烏茲貝克的贖界——烏茲貝克本身南接阿富汗——面積一百萬平方哩，等於美國的三分之一。卡薩赫人共約六百五十萬人，主要從事畜牧，他們坐的是馬鞍，他們穿的是獸皮，他們信奉的是回教，而他們喫的是沒有一定的食物。

卡薩赫的礦產是豐富的，它擁有蘇聯所有已知的銅、鉛和鋅的蘊藏量一半以上，在卡拉根達

(Karaganda)，有着蘇聯第三個最大的煤區，在大草原中，則有着蘇聯最肥沃的土地，卡薩赫是有燦爛的前途的。阿瑪·阿太——「蘋果的父親」，乃是這遼闊土地的首都。它所處的環境很華麗，白雪皚皚的山巒籠罩着它廣大絕全景。經過阿瑪·阿太——它的人口在二十年內增加了七倍——一部分沿着一條公路，通到中國內部，我在一九三二年，會和築造該路的美國工程師陶達少校 (Major Todd) 到過，從那裏運輸食物、武器、醫藥品以及其他裝備，幫助中國反抗日本的侵略。

邁土西鐵路，南北都經過阿·瑪阿太，通過外西伯利亞鐵路連接着塔什干和卡薩赫，這是一度會為原始部落民族的驕傲，這是他們造的。

啓耳吉茲，這處於中央亞細亞東邊的小小山國，鄰接着中國的大山脈。人口一百五十萬，以前是游牧民族，窮困、饑餓、憔悴，——居住在黑色鐘形蓬帳裏的一種民族。今天的啓耳吉茲人，卻接受了一種安定的農業生活。新的運河擴充了耕地面積百分之七十五。集體種植增加了棉花和甜菜的收穫。工業發展着。煤礦開鑿着。用於製造電燈、重合金的、極有價值的稀有金屬，蘊藏量極豐富。工程師建造着廣大的啓耳吉茲公路，超越巨大的阿爾帕斯山，通到中國。科學家發現了「古加」(一種麻醉性植物，可煉製橡皮，見上)，一種天然的橡皮，一種珍貴的橡膠樹的代替品。十畝「古加」可出產一噸橡皮。幾百萬畝的「古加」正在培植中。

啓耳吉茲是中央亞細亞所有民族中最最落後的，在蘇維埃給它們一種文字之前，一向沒有

字母。

在中央亞細亞的極西和極南部份，蜿蜒在伊朗北境的是土爾克門，這遠近聞名的暗紅地毯的國家，人口一百三十萬；一片乾燥焦枯的土地：它全境的百分之八十，完全席捲在加拉庫（Karakum）的黑沙裏。在中央亞細亞，再沒有一個地方，有比土爾克門感到更嚴重的水荒問題了，在那邊有幾個城鎮中，從鹹味的裏海汲取來的水，必須經過蒸溜，纔能用以解渴和烹飪。

蘇維埃科學家一刻不休息地爲着這旱地的問題想辦法。他們把這天然鹽的沉澱應用於工業，他們又把化合物洒澆到過往的雲層，試驗着造雨，有時也會得到了成就。

最後是烏茲貝克，它的重要超過了所有的鄰國。它位置在卡薩赫之南，土爾克門之北，恰居中心，它的面積有十六萬方哩，比英國還要大，它的人口六百六十萬，比瑞典略少。

烏茲貝克是所有蘇維埃共和國中，說明蘇聯的民族政策和活動成就的最好例證。烏茲貝克地方雖是又熱又燥，但從帕米爾高原流下來的水，却給它以充份的灌溉，因之適合於種植棉花。棉花是白色的黃金，它使摩罕默德的子孫和封建地主發了財。現代科學改良了種植，使大河流注到沙漠，利用了水力的灌溉。這結果使得土地肥沃了，棉花的產量增加了四倍。

烏茲貝克的起源，以至它跟全部中央亞細亞和外界的關係，是一個有趣的故事。塔什克人原來是波斯人。其他的四種民族，卡薩赫人，土爾克門人，啓耳吉茲人和烏茲貝克人，却都是土耳其人，但可不能和現在小亞細亞的土耳其人相混雜。這些民族，在十世紀到十五世紀之間，是從

亞洲來的游牧民族，最早見於歷史上的，乃是在中國的一種奴屬的部落。

它們迅速地散處到西方和南方，在紀元五四六——五八二年的時期中，達到了第一次的高峯。紀元五六七年，他們和羅馬人通商，跟希臘人合作對抗波斯人。他們在這時期的洶湧推進，帶了一股源流到中國：一九三二年我曾在甘肅遇見過土耳其份子。另外一股則到南方和西方。他們遍佈了南亞細亞抵達波斯普魯斯海峽的君士坦丁，侵入到高加索和亞塞爾拜然，他們架設了到歐洲的人類的橋樑。

在這些侵入民族的紀錄中，留下了兩件特別重要的事情，對中央亞細亞發生了深刻的影響：成吉思汗的沒落和他的孫兒鐵木耳的崛起。

跟聖法郎士同時代的成吉思汗，在十三世紀從北方席捲而下，剩下了破壞算是他的遺產：他的孫兒鐵木耳，這跛子，却在薩瑪根的光榮時期，留下了更可貴的和更長久的記憶。他的鐵騎，西到高加索，南達非洲和印度，殲滅了從高加索到極西的壯男，但他却赦免了有技術的工匠，把最優秀的份子放在薩瑪根，從事建造無數的建築物，這些建築物的光輝至今仍是亞細亞的珍寶。

偉大的，雖然是殘酷的，鐵木耳留下了一個偉大的帝國。勁敵消滅了，秩序恢復了，商業繁榮了。但是，這是一個「孤家寡人」的帝國，缺少民族或經濟的聯繫，它終於崩潰了，這正說明泰雷郎特（Talleyrand）的名言：「你可以靠槍刺幹什麼事情，只除了在它上面坐下來。」

從鐵木耳帝國的廢墟上，崛起了烏茲貝克，而以薩瑪根、波哈拉和曼耳夫（Merv）爲它的中心。

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陷入土耳其人的重圍，使中央亞細亞受到悲慘的影響，東方和西方的陸地的聯繫切斷了，政治上和藝術上一個輝煌的時期結束了。錢常是統治階級所需要的，但因當時商業停止，錢源斷絕，於是便取之於對普通平民的苛稅勒索。中等階級和無產階級都相對地削弱了；文化凋萎了；帝國分裂成爲幾個小邦，其中主要的是那在美麗的斐哈那山谷中的科根（Kogand），回教學術中心的波哈拉，和南方的商業的樞紐曼耳夫。他們在社會上都是反動的，彼此之間經常發生着戰爭。

這就是俄羅斯人開始向東和向東南大舉進攻時候的形勢。彼得大帝在十八世紀的初期，就和印度阿富汗中國來往通商。中亞細亞是他的使節往來經過的地方，也就成了舉世屬目的中心。從一八三五年以後，由於俄羅斯勢力日增的結果，這些分裂王國的權力衰落了。最後，中央亞細亞終於被併入了俄羅斯帝國。

當蘇維埃的早期，通常總是對沙皇的武力擴張取仇視的態度，認爲這對人民有害。後來的蘇維埃歷史家，却受着明白的鼓勵，認爲這統一光榮的。更年青的人民都把握了這觀點，辯護着這政策，即使是沙皇的政策。

鮑台萊夫斯基（Bonderevsky），一位來自教德薩的年青的猶太難民，同我們在亞洲一起居

住，是我們在蘇聯所碰到的最能幹的年青人之一，就竭力替這種沙皇的統一辯護，雖然，他無疑是反對沙皇的目的和經濟的。

沙皇對中央亞細亞的集中統治，在經濟上的利益當然是在供應亞洲棉花以現成的市場，樹立工廠的核心，和鐵路系統的骨骼。從蘇維埃社會主義的觀點看來，這許多工廠是有決定意義的；由於工廠的無產階級的建立，它們成了掀起革命的種子。

鮑台萊夫斯基又指出，假如讓中央亞細亞落入了波斯或阿富汗的手裏，那情形就更糟了。

十月革命在中央亞細亞迅速發生了影響。波哈拉落入了布爾什維克的手裏，接着是其他的地方。全部區域最先組成土耳其斯坦共和國，但是因為全部中的若干部份，有着它自己特殊的文化，蘇維埃政府便明智地決定，給每一部份有各自發展的機會。最後組織的方法，是成立五個共和國，以代替一個。

二 工業和平衡的經濟

在那巨大的、嶄新的、塔什干的市中心大廈的一個寬敞的房間裏，我們和烏茲貝克的總理，作了一次長時間的、有趣味的會晤，他是一位漂亮的年青人。他的外交部長也參加，我們討論着許多事情：如一九四四年二月所頒布的允許軍隊和外交上有更大自主權的命令；農業和工業的新計劃；電力資源的發展，以及文化綫上的各種事情。

這位總理對我們保證說，這一九四四年的命令不是具文。它的應用範圍很廣，特別是對波斯的关系，因為這兩個國家在經濟上和文化上，有許多相同的地方。更特殊的，是對阿富汗的關係，阿富汗的北境毗連烏茲貝克，在商業上、工業上、政治上和文化上有直接的影響。至於軍隊擴大它的權力，在目前顯然較少關係。

我們接下去說到農業和工業。許多新的工業，機器大廈，航空工廠等等，正在計劃中；新近發現的鎢、鋁、鐵和煤，將加以很快的開發；煤氣和石油的探尋就要進行；塔什干附近是可能有煤氣的。

水力將被利用到最後的一個盎司：沖激的水流將加以節約，而完全用於灌溉。一個大水電站在戰時開始建造，且已完成了，另外還準備在薛爾河（Syr River）上的佛根（Farkand）建造一個新的，不久就可成爲新的化學工業的中心。

這位總理特別強調平衡工業的重要性。烏茲貝克需要小麥和曳引機。俄羅斯需要棉織品。這奠定了相互交換的基礎，也就包含着危險。烏茲貝克只能供給俄羅斯一半的棉花和絲，以交換小麥和曳引機；烏茲貝克必須竭力避免一種孤立的經濟。

同時，鑒於古巴的前車之鑑，她的全部經濟是專靠糖產的，當她糖的市場遭排斥，以致受到嚴重的損害——烏茲貝克因此籌劃着一種比較安全的平衡，除棉花之外，更種植和製造許多物品，以供她自己國內的消耗，這也間接的影響了運輸經濟，發生附帶的刺激作用。

在以前，塔什干需要把她所有原棉，經過長途輸送到莫斯科去，要等它變成製成品回來後纔能供國內的消耗。在今天，烏茲貝克的棉花卻在烏茲貝克的紗廠裏紡織了。

我們辭別總理，又去參觀塔什干的許多紗廠，我們考察着從原棉變成完成的織布和印花布的全部過程。

烏茲貝克紗廠從美國方面學習得來的很少，從蘭開夏方面學來的更少。各部程序科學的配列，加上全部的科學管理，到處可以看得見，而且又整齊又清潔，相當注意到美麗和愉快的環境。鄉村侵入了工廠，紡織間一直通到綠樹成蔭的花園，這在一片炎熱的地方，是何等的美妙。灌溉的流水在花叢中嗚咽，而百花在潔淨無烟的碧空下盛開。

紡織間是依照十二年前最優良的設計建造的，已經過時了。隨着工業的擴展，更涼快、空氣更充足的現代化的工場在它們旁邊建立起來。我在莫斯科會遇到這位設計建造這些紗廠的人。可惜有一點是塔什干不及曼徹斯脫進步的：那就是軋軋的機杼聲，震耳欲聾。幸而，工人們和管理者間，高度的組織和密切的合作，大大的節省了所僱用的工人的數目。一個女郎管理着數目難以相信的紡織機。

在別的部門中，我看到一部染布機器，那是十二年前從一家有名的蘭開夏公司定製的。要三天功夫才染得好。在那旁邊，放着一架蘇維埃發明的機器，卻只需三個鐘頭就完成了同樣的過程。

我在一個寬敞的辦公室裏，向工廠的經理作請教的訪問，我坐在桌子旁邊，桌上散放着各國最新的紡織刊物，都已翻閱得很舊了。在英國，甚至是官方，往往有一種想法，以為廣告在蘇聯是無謂的，因為工廠經理們出售貨物，沒有什麼選擇的餘地，所有貨物，都經由莫斯科的一個中樞選擇和訂定。當然，訂貨確是集中的，但各單位仍有選擇的廣泛範圍。因此廣告在蘇聯，仍是重要的，這點我們倒不應該疏忽它。

我們駕車到了遠遠的薛爾河畔的一個水電站，該站供給着一家製造阿摩尼亞和氮化物的巨大化學工廠的電力；由於節省勞動的機器的具備，工廠中所用的人力少得不可思議。

烏茲貝克參預着新的五年計劃，這計劃推進着她的生產力多方面的發展，和她的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要完全做到這點，必須考慮到烏茲貝克在整個經濟中佔的地位。

它在戰時供給了俄羅斯三分之二的棉花需要，現在的目標，還可有更大量的增加。在一方面，由於大規模採棉機械的使用，節省了不少的勞動力，科學化農業的基本生產的過程，是比較前達到更高度的機械化了；在另一方面，耕地的面積增加了，特別是在斐哈那山谷齊勒夫賽（Zeravshan）的水廠，波哈拉和高立茲（Kokhezm）的沃地，便是爲了完成這目標而籌劃的。烏茲貝克所有投資的百分之四十左右，除了適應工業和全聯邦的需要外，都已列入五年計劃的灌溉項目下了。

工業發展的主要目標，就在供應農業機械的必需品——其中如採棉機——即使在目前一種蘇

維埃式的模型，已可立刻應用於大量的生產。

第一座鋼鐵廠是戰時的成績；第一家軋花廠將是新五年計劃的成績。

蘇聯最大的煉銅廠之一，將和大規模的製鋁廠一同建立，此外還要擴展稀有金屬的發掘。城鎮和鄉村的電氣化，為烏茲貝克未來的五年計劃的特色之一。其他特點是種植農村副產品，建立一個玻璃廠和食品工業。消費品將和房屋一同增加。

三 亞洲的農業：棉花

米區林遺傳漸化工作對於蘇維埃的意義，莫過于在塔什干全蘇聯棉花研究所的中央選擇站。研究所中的棉種，來自每一個出產棉花的國家，特別是從埃及和美國。擁有廣大實驗農場的研究所，產生着完全新的棉花的變種：耐病棉；早熟棉；容易紡織的長纖維棉。

對於我，乃至一般棉業界所最感興趣的，當是那新的從棕褐到碧綠的各種各樣天然色的棉花。因為這既不褪色，又是天然的，不必經過人工的印染。幾乎同樣發生興趣的，是那些紡織中的棉花，具有很多羊毛的優點。我在一冊迷人的有色棉花的樣本上，看到已經出產的一種灰綠色的毯毯，是用該研究所發明的不染色棉花織成的，現在亞細亞的許多農場上，多已種植着這種不染色的棉花。

我們在所長卡那區 (Sergei Kanah) 的周詳指示之下，在棉業研究所化了整整一個上午。

天氣很熱，從塔什干驅車到研究所，經過一段塵沙飛揚的污穢的顛簸的公路。研究所却是涼快舒適的，四周綠色的棉花園地，令人心曠神怡，有極好收成的希望。我們和各別的專家參觀每個實驗室。我們和有色棉花創造人史脫魯曼（Strumal）討論着有色的棉花。

卡那區穿了一套白色的熱帶衣服；史脫魯曼則穿着美麗的、烏克蘭刺繡的白襯衫。主要都是棉織品的服裝。

早晨的檢討，依照蘇聯通常的辦法開始，首先是這研究所工作的一種正式的說明。聽了這顯然極有價值的講解以後，許多問題提了出來，接着是詳細考察實驗室、農場和各種程序。這幾位專家都很熱心地解釋着。

這研究所的目標，是生產織物所需的質地更好、花樣更多、價錢更賤的原棉。研究所設在亞洲的烏茲貝克首都的塔什干，是很合乎天然條件的，因為那裏出產着蘇聯所用棉花的百分之七十。用於植棉的所有棉種的百分之九十，都由這研究所供給，它和每一個蘇聯的植棉農場保持着密切的接觸。

研究所和農場間的聯繫確是非常之密切，每遇一種新的有價值的變種發現，就立刻被推薦和傳佈到亞洲所有的植棉農場。例如過去二十年來，曾發出三種完全變異的棉種，可以傳播更好的棉種。

到一九二七年為止，棉種僅限於是本地的。收成不好，纖維又短。到了一九三二年，本地棉

種和北美的特別是埃及的種子交配接種後，產生了新的變種，具有埃及棉的長纖維，同時又具有埃及棉所沒有的本地棉的特質，這都傳播到各農場中。一九四〇年，開始大量生產更長纖維的棉花，更適合技術上程序的變種，耐病的，特別能夠抵抗菌狀疾病的特別變種，也有代替羊毛的棉花變種。

戰事加速着這個進程。在一九三二年，祇有百分之二·三的棉花，是長纖維的變種。到一九四三年，這百分比增加到九十。在一九三二年，纖維的平均長度是一吋；在一九四五年一又四分之一吋，在許多特殊情況下還要更長些。經過改進抵抗消耗的品質後，消耗減低，每年可節省八萬噸的棉花。

經過種子的混合交配，也經過泥土、培養、光和熱以及各種灌溉方式的影響，許多改造是完成了。從國外來的一種是收成好、纖維長、很堅韌，能抗疾病的變種，當它和短纖維的、却是耐寒的本地變種交配混合後，仍保留着所有它的優良品質。一種新的高斯·希爾蘇士（Gos Hir autumn）不枯的變種，經改良後，已大量的減少了流行在植棉地帶的眩暈病。新的高斯巴拉丹斯（Gos Barladense）的變種已改進到早期成熟，且有大的圓莢。這後面的變種的得到，是經過了埃及種和秘魯來的種子，長期而繁複的交配的手續。

在種子混合方面，史脫魯曼會有許多引人興趣的發現。史脫魯曼是一位金髮、謙虛的人物，他是南方人，看來卻更像北方人。在他的試驗室中，全部矮樹，靜靜地長着彩色的圓莢，一排一

拂地排列在模子上。此外還有毳毛似的彩色球，和足球一般大小，叫人感覺到紡織，正和欣賞美色一樣。

應該注意，中央亞細亞的彩色棉花，同秘魯或厄瓜多的棉花，毫無關係。這卡那區的變種，（由所長自己名字命名的）是一種棕褐色的纖維，從交配劣質的高斯希爾蘇土棉花而得到的，這棉花沒有商業價值，經過蘇聯的選擇，發展成爲最佳的變種。

綠的、藍的、以及各種顏色棉花的發展，是採用了俄羅斯所謂「遙遠的混合」（*distant hybridization*）方法，這就是交配各種不同的棉種——高斯巴拉丹斯，高斯希爾蘇土和高斯潘潘拉森斯（*Purpurens*）。開始把那從這些變種所得到的棉花，用於白色纖維的最後交配，還不過八九個年頭。許多還待等以後的努力。

屬於塔什干棉業研究所的許多選種站，現在培植着一連串的混合種，綠的、深綠的、藍的、粉紅的、灰黑的、和深藍的纖維。純黑色的棉花還沒有發現。

不褪色的和紡織技術上所必需品質的混合棉花，有着不斷的進步。在許多選擇的棉種中，已經發現了一種固定的深綠色和深藍色的具有適宜紡織的五公分和更高的強度。一九四七年，天然的棕色、深綠色和黃卡其色的棉花，在烏茲貝克和土爾克門共和國，種植了三萬英畝之多。各種各樣顏色的棉花變種——藍色，淡綠，粉紅和橘紅——尚在試驗種植的階段。

烏茲貝克的農業不僅限於棉花。要在塔什干考察科學化的農業，也不僅限於棉花站。例如，

我們曾考察了許勞台爾 (Stroudter) 的政府園藝站，實驗着種植水菓、草莓和亞熱帶的植物。該站擁有一百八十三公頃的農地，有四十位專家和二百位助理員管理着。我們考察了種植過程中的葡萄、蘋果、無花果、石榴和其他的水菓；例如三十六種變種的釀酒葡萄；四十種變種的沙漠葡萄。

蘋果在烏茲貝克是一種主要的產物，從前，鄉村裏只有兩種變種，早在六月就成熟。現在有了十四種，還有其他七十種的變種，要到七月纔成熟。我們看到許多蘋果樹，已長了十三年，是可活到六十年的，每年平均出產半噸；有些樹則產一噸。一塊兩英畝半的園地，每年可出產一百噸左右的蘋果。纍纍的果實是很重的，因此支持樹枝成了重要的問題，我們會考察了試驗中的九種方式。在大菓園裏，許多問題是必須考慮到的：支持物必須是有效、價廉、可以辦到的東西，而且又要可以讓曳引機挨近樹幹去耕耘。試驗結果，已發現了六十種良好的無花果的變種，有些每年能夠出產一百公斤。這些菓樹都種植在彎曲的地方，冬天埋藏在深深的雪層下面，以禦酷寒。

新的和改良變種的小植物，廣泛地分佈着，播種在烏茲貝克農場上：在一九四一年，會分佈了七萬種的植物。

我們參觀了一個集體農場，那是我們每天走過的許多農場中典型的一個。我們在門口遇見領班的牧人；一個短小、矮胖、強壯的人物，面色棕黃，在他的金繡便帽底下，露出了修剪得很短

的黑髮。他佩戴着技藝優良的勳章。

在巡遊農場之前，我們受到了茶會的招待，我們坐在放滿水菓的矮桌旁邊，那是在四壁凌空的涼棚中的台上，台上鋪着非常可愛的綢布，我不自覺的想脫去我醜觀的鞋子，但我們的主人，卻裝着「不要緊」的手勢，阻止了我。水菓甜美極了，尤其是甜瓜。這次田園的宴會中也有酒，像在中國一樣，斟在巧小的玻璃杯裏，合理的份量。我們吃吃談談，也有演說和歌舞。男人唱，女人唱。那些農民，我到處看到他們，都是有力的，健康的一羣。女人結着烏黑的各色髮辮，帶着沉重的金耳環，卻並沒有常見的金牙齒。她們載歌載舞，手指，手和手臂作着各種的姿態，許多本地的來賓對歌舞大聲喝彩。

我們參觀了許多傳種的馬，蘇維埃政府因為這農場的成績好，會給它六匹高大的英國種的好雄馬。我們同兩個怕羞的男孩子說話，一個十三歲，一個九歲，他們兩人騎在馬上，好像賽馬場上的騎師；那個最小的曾經騎了他的好馬，參加全亞細亞的賽馬，得過優勝獎。

這是一個農場完整的全景，真美麗。一月玉葱長得深及腰際的田畦，一望無際地延伸到遙遠的地平線上，灰綠的花球的波動，變得愈來愈小，直到它們成了一片朦朧的煙霧，這樣的景色，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倘如梵訶（Van Gogh）住在這裏，一定會把它們畫下來。棉田的情調，也是可愛的，二十吋高的矮樹，排列着像馬鈴薯，翻過起伏不定的山丘，構成了一排排各種顏色行列的優美的圖案。

政府最近以一千噸的小麥，和這個集體農場交換了等值的棉花。該集體農場會獻贈政府一筆戰時的禮物，除了別的東西外，其中有九十六匹馬，——三十六匹是英國種，還有一百八十萬盧布。

在戰前，該農場的工作人員有八百五十個工人，戰時減少到五百五十個，但實際上，由於女人的工作和大量機械的幫忙，等於是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在我們的歸途上，鄰近的許多人攔住我們，邀請我們去赴相似的宴會。同一晚上，我們在歌劇院裏看奧塞羅的演出，我們認出了許多集體農場的朋友，並且和他們談話。

四 烏茲貝克的文化生活

烏茲貝克下絕大決心消滅着文盲。我們訪問一個有着五百五十四個女孩的學校，分做二十二班，三十二位教師教她們。我看到大一些的女孩在考試，小一些的在玩迴旋的遊戲，和我們孩子玩的差不多。我們跟一羣在遊戲的女孩們有趣地談着，知道這班上的人種是混雜的，有烏茲貝克人，塔什克人，韃靼人，還有少數從敖德薩基輔白俄羅斯疏散來的孩子們。

塔什干本地的孩子當然佔多數，我和一個打着三十二根小黑辮子的十二歲的女孩談話，那些辮子很潔淨，她告訴我，一禮拜只要打一次。一個頗為瘦弱的孩子，仍然有些營養不足的樣子，是從列寧格勒來的。另外一個六歲，從敖德薩來，她在三歲時候就離開，她已記不得來的經過。

一個從基輔來的活潑美麗的十二歲的女孩告訴我們，她的父母都是醫生，她父親在軍隊中服務，她母親在塔什干行醫。她和她母親同別的蘇聯家庭住在一起，很擠，却很快樂；這孩子是樂觀的，所有那些小客人，和她們的主人都混得很友好，她們對於截然不同的氣候和水土，也顯然沒有什麼不慣。

初等教育已迅速地完成，現行五年計劃的最大項目，是要在一九五〇年成立四千七百四十所學校，足容六百萬以上人民中的一百另八萬五千個的孩子。

不過，在烏茲貝克，消滅文盲還是在初步的階段，烏茲貝克的目標，是要採行一種科學的世界觀，從事補充工作，提高真實知識的普遍水準。孩子們必須瞭解他們國內生產和分配的全部組織。拿般恩斯（Lenard Barnes）的話說：「他們必須把握這社會的過程，當做一個整體，而且明白它是怎樣在運行。任何人如缺乏這種瞭解，就不可能負起公民的責任。引導到這方面去的許多主要的路徑，便是圖書，出版物，影片，無線電，劇場，學習和討論團體的補充，函授學校，夜校，和其他等等。」

至於那些路線上的進度，可以從幾方面來估計。在一九三六年，用烏茲貝克地方語言出版的書有一千二百十三種，一千一百二十萬冊。發行二百二十二種的報紙。

革命以前，烏茲貝克沒有戲院。到了一九三六年，她却有了三十七家的戲院，和五百六十四家的電影院。自從它第一家戲院或歌劇院的開辦，不過十二個年頭，現在，成羣的觀眾，都擠着

去看大家所愛好的席勒，莫里哀或莎士比亞的戲劇。成羣的年青的男男女女，都擠着，搶着去看「奧塞羅」冗長的對白，它不經刪節的演出，足足要四個半鐘頭。

我們在歌劇院裏看過一齣精彩的好戲，這戲取材於烏列克貝克（Ullebek）的故事——跟伊利莎白皇后同時代的一個烏茲貝克國王——他是一個有名的科學家和天文學家，受劇烈的攻擊，最後爲反動的回教祭司所暗殺。

我坐在作曲家底太太的旁邊，她告訴我許多關於亞洲戲劇圈內的事情，其中有「奧塞羅」第一夜上演時的有趣故事。這悲劇纏綿悱惻，使觀衆充滿了熱烈憤慨的情緒，觀衆竟至打斷了伊柯（Iago）的話，向奧塞羅大聲叫喊：「別相信他，別相信他，他說謊。」

這歌劇充滿了生動的色彩表現。回教的藝術，由於宗教上的理由，傳統地避免人物的刻劃，而發揮在色彩和形式方面。舞台掛幕，是燦爛的緞面，鏤空精繡着許多匹白馬，在歌劇院裏，一幕一幕的起落着，介紹給我們精心傑構的古代烏茲貝克服裝的偉大場面。這中間最美的，是一幅華麗生動的畫面，襯托着烏列克貝克的中國太太的出場，她是一個儼然女后樣子的面孔蒼白的女人，坐在她的銀色御座上，中國人的淑靜，跟熱烈的亞細亞的色彩，和狂放不羈的情調，成了對照。

烏茲貝克政府爲了上演這歌劇，特別拿珍藏在波哈拉的古代服裝借給歌劇院，借此鼓勵民族和傳統的合理光榮，並更進一步的提高社會主義形式中的民族的內容。

新的歌劇院還在建造中，四個月內可以完成，將造得和莫斯科或列寧格勒的任何一家戲院子一樣的精美，採用傳統的東方情調的建築。

五 薩瑪根

從那距塔什干西南二百二十哩的薩瑪根的發展中，可以看到民族和傳統的光榮的高峯，我們飛行到那裏，在大風吹括中，我們的駕駛員巧妙地降落在草原中的一個小飛機場上，深深的古代水道，縱橫迸裂着。

這黃金時代的薩瑪根的傳奇，是名不虛傳的。在燻爛的亞細亞的碧空下，淡玫瑰紅的磚牆，翡翠綠的和土耳其玉藍的屋瓦，覆蓋着尖塔和球形的圓屋頂，到處金碧輝煌，美艷奪目。

在這場所的一座古城，長遠以前為亞歷山大大帝所毀滅。回教徒在七一年，又把它後來重建的城市化為塵灰。他們在這裏建立了一個輝煌的阿拉伯學術的中心，一二二一年又為成吉思汗所破壞。但當一三六九年鐵木耳定居薩瑪根的時候，那至今殘存而小心愛護的光榮又復開始了。經過沙皇時代淒涼的荒廢，那許多燻爛的回教寺院和圓屋頂，倒塌成為殘垣；作為古代學術中心的薩瑪根很早就失去了它的影響。蘇維埃秩序的來臨，及時保留了殘存的遺蹟。古蹟在小心中恢復着，並且作着考古學上的檢討，同時並進的是迅速的工業和一般文化的進步。

列其斯坦 (Riikistan) 或中央廣場，是這城的高處。烏列克貝克，辛但 (Sin-dan) 和鉄拉卡

利 (Tila-Kart)，這三個高貴的專門學校環繞着它，各學校的大門口，前面裝飾着高大、深銳的拱門，幾乎碰到較小拱門和寶塔正面的尖頂，——所有屋頂都蓋着瓦，淡玫瑰紅的，藍的，綠的和金色的，設計精奇，十分和諧。回教世界的藝術，總是充滿了色彩和幾何學的形式。

這些專門學校中最小的一個，是鐵木耳的孫子烏列克貝克在十五世紀時建立的，以數學和天文學出名。

聳起在東北角的一個更大的廣場上面的，是鐵木耳的夏宮，附近則是他的伴侶柔達 (Shah-Zindeh) 的墳墓。這墓是十四世紀建造的，內部裝飾得很華麗，矗立在一個層臺上，走四十步可到。

當然，照我的角度看，鐵木耳的墳墓可算是一切莊嚴偉大的極峯了。它的小禮拜堂頂上是一個巨大精美的圓屋頂，裏面鋪滿藍色的有幾何意味的花卉圖形，和黃金的鑄銘。許多簡單的紀念碑，它們的形式也是可愛的、長的、低的和狹的。我量了一塊，五呎乘十三吋乘十三吋，是暗綠色的軟玉，一道短短的、磨損的大理石欄杆環繞着它。

鐵木耳的墳是同樣的小，複製的回教的尖端拱門，綉調很美。鐵木耳葬在棺材裏，這是違反回教習慣的：他死在外國，他的骸骨是這樣帶回來的。這棺材曾於一九四二年打開，蓋拉錫莫夫用生理學的技术，重繪了他的容貌。

訪問薩瑪根的前兩天，伊娜做了一個夢，當時告訴了我們。她說，她的頭割了下來，她拿在

她自己手裏，却依然活着。我們立在被稱爲「活王」的烏列克貝克兒子的墓旁，——意思是仍舊活着——聽着對我們很爲新鮮的故事，據說他割掉了自己的頭，以免得落入基督教徒手裏，他用自己的手拿着頭，忽然不見了，我們回想着伊娜的夢，自然而然地討論到鄧恩（Dunn）的學說，和根據它寫成的帕列斯脫萊的戲劇——我們年青的蘇維埃朋友對這兩者都是熟識的。

在一四〇七年鐵木耳所建的一個大回教寺院的廣場上，矗立着一根巨大的大理石的支柱，這上面鐫刻着可蘭經，面積有很多平方呎，四分之三打開着，當回教法師翻着經文高聲朗誦的時候，可以坐着休息。

參觀烏列克貝克的露天氣象臺，是這次遠途旅行中的一件快事。我們在路旁，被阻斷了一會兒，好容易纔等到一部破車把我們帶走。我們休息着，我們等待在一個小茶室裏，那旁邊流過一條小河，天氣熱得厲害，伊娜就和我在河裏的清流中划船。「她一定是處女，」鄉下人耳語着，又說，「沒有一個結過婚的女人，會露出 大腿去划船的。」氣象臺印象最深刻。一個巨大的，細緻的，刻度精確的大理石圓周的一部分，深深地通入地下，又在另一邊通了上來，沒有這樣高，裝有一個古銅色的軌道，旋轉着許多天文學的儀器，天文學家在它旁邊附着的扶梯上走來走去。

這裏推算着那使烏列克貝克因此出名的天文的數表，在伊利薩伯時代，英國的旅行者，也許是她的朝臣，曾來考察烏列克貝克的氣象台。因爲他是熱心科學的英雄，烏列克貝克的記憶，被

光榮地紀錄着；關於他的生平和慘死都有劇本。

我真留戀這可愛的古城，和這舒服的鄉間別墅，從那圍着刷白高牆的古舊污穢的小巷裏進去，我們在這裏進餐，在這裏歇長夏的中午。舊式的花園，游泳的水池，巨大的喬木，——葡萄棚遮住陽光晒熱的一邊，開放北邊習習的涼風，我們就在這裏歇晷。——確實是適應薩瑪根的景色；我們在那裏隨意吃水菓，休息，抽煙，聊天。我們的女主人又陪我到更涼快的一間內室，這陡然使我回想年幼時候的海邊非常涼快的屋子，還有它的傢俱，綠色的百葉窗，和維多利亞式銅牀和鐵的牀架上面雪白的被褥，我在離開以前，很舒服的在這上面躺了半個鐘點。在更早世紀的高貴而愉快的紀錄，和蘇維埃工農世界跳動的新生活之間，這是一個閒適的維多利亞式的插曲。

蘇維埃生活的目標已經支配了薩瑪根，它以考古學的技術恢復着古代的東西，但却通過了一種對於科學權力的現代的熱烈的忠誠，懷抱着爲了那些東方國家中以前從不知道的人民的大眾的目標，同時也充滿着對於生活和命運的信心，所以，當我們跟我們的駕駛員重上飛機，飛回塔什干以前休息一會的時候，所有的青年就圍住着我，熱切地提出成百的各種問題來談論。

六 亞洲的宗教制度

從俄羅斯進入亞細亞，是從一個基督教的世界進到一個伊斯蘭教的世界。伊斯蘭教的信仰仍

在亞洲盛行，統治了兩萬萬的人類，它的影響遍及中國、亞細亞、印度、阿拉伯和非洲——橫貫兩個大陸，從東方的太平洋到西方的大西洋。

伊斯蘭教當作一個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開始的，——因此我們應當這樣叫它，而不應叫回教——它佈很廣，雖然在實際上是一個熱帶地方的宗教，氣候溫和地方皈依的人數較少，在西班牙、西西里、馬爾太、或希臘沒有永久的根據地，即使在土耳其，也僅是保留了一個不穩固的立足地。

伊斯蘭教雖仍在馬來亞和中非洲一帶傳佈着，可是已證明比之基督教，對於現代化的精神更多抵觸，因之迅速地青年中間失去了地位。

它的創始者，這個神祕的阿拉伯人，在他四十歲以前一直隱居在麥加，比耶穌要遲六個世紀。於是，猶如聖女貞德，聽見許多或早或遲的呼聲一樣，他也聽到和注意到了一種呼聲，由此創立信仰，深深地叩動了人類的心絃。

早期和後來的呼聲是不同的，後來的呼聲，允許摩罕默德有十四位妻子——大部分實是他友人的年齡較大的寡婦，——召喚他用火和劍來傳播他的宗教。他的更早期的呼聲，有着更高貴的音調，使他能夠擴展一個比之當時衰落中的拜占庭帝國的，更寬廣、更潔淨、更新鮮、更是強烈政治和社會意義的理想。

摩罕默德是一個「漸進主義者」，不贊成激進的社會改革，雖然禁止殺害嬰兒，虐待動物，

却不能算是社會的業績，戒酒也不是的，最初是諄諄教誨人們，要專心信仰，後來又成爲絕對的指示。

摩罕默德對社會科學的貢獻，最好用他最後一次的語錄來說明：「你們人民！聽到我的話，了解我的話，要知道每一個回教徒就是另外一個回教徒的兄弟。你們大家都是一樣平等的。」

在宗教方面，摩罕默德的特殊貢獻在於嚴厲，它片面着重恐懼和危險，矯正了上帝較弱和較多情的概念。對於摩罕默德上帝是強力的人格化了。阿拉（Allah）這個名詞，就是「強者」或「有力者」的意思。這種對於超越一切的、完全的、純粹的、絕對的和獨斷的的權力的信仰，就它最好一面來說，是產生了莊嚴拘謹的性格，有些像蘇格蘭的卡爾文基督教，（Scottish Calvinistic Christian）。它最壞的一面，則是造成了不道德的宗教狂。

上帝的概念被當作了超越一切的絕對的權力，而意志是抽象的，可以隨意改變爲相反的方向，這就弄得沒有一定的道德標準。你在今天做一件事，明天可以完全與它相反。人類唯一的責任是服從，回教，這個字的意義就是服從。

蘇維埃政體被迫着和回教的宗教狂交鋒。在今天，緊張局面已經大部份解決了，最初是很厲害的。蘇維埃當局不作正面的進攻，甚至連瀆犯這個字都談不到。例如伊默姆仍有一個以上的妻子。蘇維埃當局堅持的是要所有公民遵循依照科學路線的一種廣大的現代教育的標準，它督責伊斯蘭的宗教，不能在真空中推行，而必須在具有鑒識的男女中間推行。回教只要能夠訴諸迅速地

接受教育的社會，它就可以存在。這在一般方面，深刻地影響了回教對於道德的態度，在特殊方面，也影響了對於可蘭經的態度。壞的一面，必然是要死亡了。

從一種角度來看，回教徒當然有感謝蘇聯的理由，而且確是明白的。回教徒跟所有公民一樣享有公民自由，也有作為信徒的信仰自由。在以前，當那以沙皇為後盾的東正教統治一切的時候，兩者都是沒有的。

我自然急於想和回教世界發生直接的接觸，我毫不放鬆的設法，終於和全亞洲的回教領袖伊默姆盤桓了第一個的禮拜五，——回教的祭祀日，這一天，在回教寺院禮拜之前，最初是普通的招待，後來，在他的鄉間住宅中，消磨了一個長長而安靜的下午。我們首先在教會和政府的聯合辦事處相見，並且受到了正式的招待，這個地方是從一條悶熱、狹窄、塵埃滿佈的，但另一面却很乾淨的街道走進去，一排排都是泥壁的無窗的房屋。

伊默姆是八十二歲的一位老人，瘦瘠黝黑的臉孔，鬚鬚蓬亂，穿着一件深藍色的綢袍，在門口迎接著我們，依照東方的禮節，引導我們到一個狹小的房間，這房間的長度，剛好放下一張十二吋高的桌子，桌上滿堆着數不清的水菓、糖果、和甜品，款待著我們。鮮艷柔滑的綢褥，鋪在地上，算是坐墊。

兩位花白長鬚的老年的回教法師（Mullahs），一位啓耳吉茲人，一位卡薩赫人，殷殷向我們勸茶，不停的把新茶從悅目的茶壺裏，傾注到雅緻精美的淺淺瓷杯中。回教的宴會，向來沒有

啤酒，酒或酒精，這在我是很愉快的。

伊默姆沉默寡言，他自一九一四年訪問麥加後，獲得了帶佩綠色頭布的權利，和担任要職的資格。同他一起吃是靜靜的。沉默不是無禮貌。談話斷續不停。他不時勸我吃，替我的盆子裝滿水菓，替我的杯子裝滿大塊糖果，接着又提出問題：

「在英國天氣熱嗎？」

「沒有這裏的熱，也沒有這裏的冷。」

「你們在英國有食物嗎？」

「維持健康是足夠的，但要像此地這樣的一個宴會，那就很少，」我相當有禮貌地微笑着回答。

我們說到孩子們，他們的健康，無論這裏的或蘇聯任何地方，同旁的亞洲城市如開羅或巴格達的，恰形成強烈的對照：沒有蒼蠅，沒有污穢，沒有害病的眼睛。

生活在塔什干也是很重視的，尤其是孩子的生活。

「孩子們，」我想着這些事實不禁插口說，「是一個國家真正的財富，必須小心注意他們體格上和心理上的訓練。」

「上帝幫助生活，」是他簡單的回答。

伊默姆受的是回教的教育。他能流利的講好幾種亞細亞的語言，他當然懂得阿拉伯話，這是

可蘭經和祈禱所用的文字。

噢，談談，連續了一個鐘頭。於是我們到回教寺院去。緩緩地步行着，穿過悶熱狹窄的街道——伊默姆是從來不坐車到回教寺院的——我們走過了訓練回教法師的有六百年歷史的學校。我們走進了圍繞着有二百年歷史的回教寺院的禁垣。

他雖然管理着塔什干五、六十個這樣的回教寺院，有幾個甚至比這裏更偉大更莊嚴，可是伊默姆却表示寧願在這較小的地方做祈禱。

「我是在這裏學祈禱的，」他說，「我的父親也是在這裏學祈禱，我的心在這裏。我願意在這裏祈禱。」

這個回教寺院很小，只能容納五六百左右的禮拜者。我們訪問的那天，坐墊鋪滿在前廊的低矮的石欄杆上，這前廊則冷清清地聳立在一段階石旁的羣衆中間，我們坐下來，看看裏面的人羣，又看看按照規定地位站在外面的人羣，各人都在自己鋪席的前面。那樸實和誠懇的表情，確是一種令人感動的景象。

這悶熱的、寂靜的、七月早晨的氣氛，再加上那在靜靜街道上緩步着的等待的羣衆，充滿了靜默的虔誠的意味，隨後又做祈禱，非常的簡單，這不禁使我回憶起我所知道的、我所愛的、嚴肅的安息日和嚴肅的祈禱，那是當我年青的時候，八九月悶熱的天氣，在蘇格蘭的阿朗(Aran)島上。

音樂、偶像、儀式，是沒有的。只有人面對着面，和看不見的神妙莫測的上帝在一起。伊默姆的兒子，大聲而清脆的歌唱，領導着祈禱。他是一個活潑愉快的法師，披件燦爛的黃袍。祈禱者採取兩重的方式：時間劃分為個人和集體的祈禱。當換到個人祈禱時候，一個人依照規定的姿勢，站在他自己的鋪席前面，他的頭巾角垂下，像祈禱時做過的一樣，他的手忽然越過臉孔拉下來，好像洗臉的動作——然後逐漸地彎下身子，作着約莫七種祈禱的姿態，最後是前額觸地，表示完全服從的態度。

爲了國家軍隊，或其他社團的需要，不時有集體的祈禱，由回教法師領導。然後大家一起匍匐伏地。有一次是爲了英國集體祈禱。大家都匍匐伏地，當羣衆立起的時候，一個感情衝動的老人，熱烈地吻我的手。

所有祈禱者，都是男人和成人。婦女和不满十三歲的孩子不准進入回教寺院的大殿。女人只能限在簾幕掩隔的邊廂。

祈禱之後，我們驅車到伊默姆的「鄉居」，一邊接近城鎮，因此得從一條窄巷走進去。另一邊則毗連着曠野。

從悶熱的街道走到清涼的庭院，是令人心神爽怡的，這庭院像一個網球場的大小，四周寬大。低低的，刷白的，泥頂房屋在各方面圍着它。一個水池，充滿流水，周圍是許多小路，佔着庭院一半的地位；在其餘部份，有一個大的磚壇，和一個較小的，各個都相當於大的或小的房

間，還有一對床，可以在夜氣清新中睡覺，晚上不會有蚊子的攪擾，白天沒有一隻蒼蠅。

朝着外牆，第三個磚壇矗立在成列的房間的空隙中間。掛着織造精良的毯毯，它鮮艷的色彩，更是華麗悅目。這壇磚上鋪着柔軟的絲墊，我們坐在上面，矮桌子上放着一百多種碟子，還有其他華麗的東西。葉子疏朗而寬大的樹木，蔭蔽着我們，擋住了烈日，卻並不感到黑暗。散碎的溫暖的陽光，柔軟地透過一動不動的樹葉，落在水池和桌子上面。

這是一幅動人的景色，悄悄的，充滿着靜趣。雖然有二十個人圍坐着閒話，但談話聲音是輕的，斷斷續續的，和諧地混雜着流水潺潺的聲音。兩個服役的回教法師，和那些傳遞烹調碟子的人，穿着柔軟的氈靴跑來跑去。偶然看到一個赤腳的孩子，在遠遠的小路上面，不時比走還快地在滑溜着，一些也沒有聲音打破這下午的和諧的靜穆，這是一個漫漫的長晝。我們坐了五個鐘頭，吃了這一餐，隨着日光的推移，我們又從這個壇移到另外一個壇上去。

開始吃的時候有重要而簡單的儀式。我們大家一起坐好後，伊默姆拿了幾片圓麵包，茶托一般的大小，一分為兩，分一半給每一個客人。

切分麵包是重要的。這是一種宗教的舉動，一種象徵，一個聖禮，一種內心和精神意義的外在看得見的表现。我們恰是坐在主人旁邊的客人。我們喫得特別多。我們加入了這一家庭的圈子。我們變成了朋友和兄弟。我們和主人發生了最密切的感通。他也讓我們共享着兄弟般的感情。

這共有的意義，可能是所有宗教起源的最早因素；固然直到今天，許多宗教仍保持着各種不

同的方式。有句俗話，說宗教開始於共有，同志愛和友誼，這是實在的。切分麵包和所有種種的表示，也許可以視為社會主義組織的宗教方面的補充，是生活上的精神的鼓勵，是友誼和愛情的創造。無論做的什麼事情，就是宗教。因此，這切分麵包的簡單動作實具有重要的意義，——極其重要，即使是那完成這舉動的人，常常並不瞭解它全部的意義。

這個宗教上的因素，是東方顯著的特色，也許因了這緣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能在那裏找到更合適的土壤，用科學的方式來擴大這同樣的原則。

這餐飯吃得很平凡，不停的勤吃也許是唯一的插曲。食物大部份是水菓，最後來了肉，銀串的羊肉片，一人一片。

過了三個鐘頭，我附耳對伊娜說，「我們現在也許可以走了吧？」

「當然還不能哩，」她回答。

接着，伊默姆的孫子走進花園來，一個漂亮高大的青年，微露笑容，頭髮剪得很短，用繩牽着一隻大黑羊。我正打算讚美這家庭的愛物，卻被邀為這動物祝福；這祝福的公式是「爲了上帝和客人。」

我唸了這公式，也就決定了這可憐的動物的命運。它被牽了出去。宰殺和烹煮了。不到一個半鐘頭，它又回來，盛在一個大碟中滲和着許多湯，這次宴會中的最後一道菜。

同時，伊默姆很快樂的對我說：「客人餐後應當休息，」就陪我到周圍寢室中的一間，這是

他自己的寢室。平常的，卻是舒服的，它的泥牆塗了顏色，繡刻着花紋。我在一張高鐵床的白被單上，睡了片刻，以後聽見有輕微的脚步聲，在庭院裏走過。一扇開着的門誘引我，我走了出去，到一寬大的花園，遠處是空曠的田野。

在一條小路的盡頭，我看到伊默姆的兒子，穿着他輝煌的黃袍，在他的妻子說話，她手臂裏抱着他們底嬰孩。他招呼我過去。我照着做，因此居然獲得了不平常的特權，看到了這屋子中的一個女人，因為女人是決不出現在宴席上的。伊默姆還有兩個妻子活着，他的第三個妻子已經死了。別的女人我一個也沒有見到。這年青的回教法師究竟是屬於新的一代。關於這些事情的改革，遲早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重又回到宴席上，因為太陽的關係，這次已經移到第一個壇上了，我們喫着一種名叫「柏羅甫」(Plov)的名菜，那是用米磨碎的胡蘿蔔和羊肉做成的，一碟好菜，却是油多了些。我很有禮貌地用我的手指，猶如我的主人所做的，他用他自己的手，給我揀些羊肉，我們用手巾揩抹着我們的手指。

羹匙是準備着的，那是爲了需要用羹匙的人而備，美麗的羹匙，木製的，精繪的，古色古香，正和那伊默姆鼻上夾着的無色塑料的眼鏡——最後這名詞是近代的——同樣的稀奇古怪。吃完最末一道菜，我們起身告辭，伊默姆便問我們肯不肯住上一禮拜，他要每天殺一隻羊，他又叫采姆把他最小的孫子抱到我們面前來。於是我們要求，可否讓我們看看其餘的孩兒們，兩個男孩

和一個女孩。這老人很高興，孩子們來了。

小愛彌兒賽特 (Emil Sait)，這最小的孩子，立刻做了我們的朋友，玩弄着我的手錶，他所進入的世界，是和他祖父八十二年前所進入的，大不相同了。

當我們準備離開時，伊默姆的兒子，拿了他父親送的禮物給我們，豪華的綢袍，以及插着花和香草的帽子。

這回教社團，據伊默姆對我說，從蘇聯獲得了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他們爲了報答起見，也會以社團的名義，在戰事危急的時候，貢獻給蘇維埃以大量的金錢和困難的交通情況下所能運輸的許多食物。

第十章 蘇維埃外交政策

蘇聯是一個和平的力量麼？蘇維埃力量的問題解決了，惟一留下來的問題是她將如何運用她的力量，她是否侵略的，擴張主義的，和帝國主義的呢？蘇維埃的外交政策究竟是什麼？

讓一九三九年三月史太林的歷史的演說來回答吧：「蘇聯的外交政策，是明白而毫不含糊的。」

一、「我們擁護和平，並加強與所有國家的商務關係。這是我們的立場，我們將忠守這立場，只要這些國家對蘇聯保持同樣的關係，只要他們沒有侵害我們國家利益的企圖。」

二、「我們願意跟所有與蘇聯有共同邊境的鄰國，保持和平的，密切的和友善的關係。這是我們的立場，我們將忠守這立場，只要這些國家也與蘇聯保持同樣的關係。」

三、「我們願意支持那成爲侵略的犧牲者並正爲他們國家獨立而奮鬥的所有民族。」

四、「我們不怕侵略的威脅，我們準備對那企圖侵入蘇維埃邊境的挑釁者的每一打擊，予以加倍的打擊。這便是蘇聯的外交政策。」

再沒有更明白的了。蘇維埃的外交政策一些沒有神祕的地方，從來也沒有。自始至終，蘇聯

要求着和平，但又從來不忘「和平不可分割」，——她自己發明的名言——並認為除了集體安全之外不能有安全。

蘇聯有着企求和平的偉大動機，她勸告任何國家不能靠戰爭取得什麼，即使是勝利者，因此她必須明白這點。三十年中，她兩次受到了毀滅戰爭的創傷，並兩次獲得了勝利。當蘇維埃歷史開頭時，強加於她的五年戰爭，使她損失了幾百萬的生命，和幾千萬萬的財產。希特勒殘酷的進攻，使她償付了一千五百萬生命和兩次五年計劃辛苦贏得的財富的三分之二的代價。

蘇聯的追求和平，不但出于消極的而且也是積極的理由。只有和平，纔能實現她新社會的邏輯的結論，因為在她的內政上，以奮鬥求和平，以競爭求合作為原則，而沒有像希特勒以發動對外戰爭來掩飾其內部不滿的這種壓力。

蘇聯的行動，自始至終支持着她和平的保證。蘇聯當機立斷地一反沙皇的帝國主義政策。蘇聯自動放棄了她在中國的領土權利；消除了所有吞併君士坦丁的俄羅斯的夢；跟十一國鄰接的國家簽訂了互不侵犯公約；簽署了凱洛格白里安的反戰公約，並加入了國際聯盟，堅決地在文字和精神上尊重國聯的義務。

蘇聯又自始至終是集體安全的保衛者，她號召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反抗侵略，——必要時就用武力。當日本進攻東北和墨沙里尼侵入阿比西尼亞的時候，她會這樣的勸告；她又勸告保衛西班牙、奧地利、中國和捷克斯拉夫。蘇聯單獨表示了行動的願望；其他的國聯會員拒絕了她。

單獨的自動的完盡了她對中國和西班牙的國聯義務。

當捷克遭受威脅時，蘇聯又依照蘇捷公約表示了願予立即援助的立場。她更主張召集歐洲的強國會議，共商維護捷克領土完整的辦法。白廳沒有答覆。後來，當波蘭和羅馬尼亞遭受威脅時，張伯倫拒絕了蘇聯第二次的召集會議的建議，認為時機未熟。蘇聯每一次傾向集體安全的努力都遭了攔斥。她同意國聯盟約所規定的會員國應假道給另一會員國以合作保護盟約的條款，她會向波蘭假道，俾蘇維埃軍隊得前進對抗納粹。波蘭拒絕了假道的便利；英國和法國支持着波蘭的拒絕態度。

這結果造成了一九三九年夏天英蘇談判的破裂。集體安全崩潰了，史太林預見到它在歐洲的失敗。在德蘇互不侵犯公約中，蘇聯看到了這是她惟一的路，由此獲取喘息的時間，以加緊增強自己的防衛力量。過去的事實顯示了「綏靖者」的真正動機，是在轉移戰爭——假如戰爭發生的話——來反對蘇維埃的社會主義。

勞合勳爵 (Lord Lloyd) 在其「英國的境遇」(The British Case) 一書中，——該書會得當時英外相哈立法克斯的稱讚——會論到德蘇公約道：「這是希特勒最後的背信。這是對歐洲的出賣。」德國之所以獲許重整軍備，那只因爲她將是歐洲反「布爾雪維克主義」的堡壘，因此有「希特勒的背信」云云。

集體安全崩潰了。蘇聯爲自衛計，便跟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公約。這不是聯盟，這只是表示

希特勒答應不進攻蘇聯，假如蘇聯答應不進攻德國的話。

蘇聯既回到了森林，自然必須採取一切自衛的措施，最主要的一點是移動列寧格勒——她第二個最大的工業區——以東的芬蘭邊界，從二十哩改為七十五哩。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五年的蘇芬協定，明白地表示了那動機是為安全，不是為侵略。波蘭和波羅的海諸國的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區，經過了投票，重又成為蘇聯的一部份，這些地方即是當第一次大戰時從蘇聯割去的。

這樣，蘇聯不但預見到納粹的陰謀，實際上，也正如希特勒後來所承認的，這也釘住了德國的百萬大軍和大量蓄積的配備，使不能用於打擊英國。

甚至是當自己面臨危機的時候，蘇聯也從未一刻不忠於世界和平的目的，也從未一刻忘了集體安全乃是和平的永久基石。她曾經聲明，只有尊重國際法，纔能完成和平，而這又必須以所有盟國的集體武裝力量為基礎；這一原則表現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波蘇協定，又重現于一九四二年五月的英蘇公約，並經莫斯科四強宣言的保證。

蘇聯對外綱領的另一項目，特別足以說明她對外面世界和鄰國態度的，乃是她民族自決的原則。早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列寧和史太林簽署了一個蘇維埃的法令：允許從前臣屬的各民族有分離權。現行憲法支持着這一原則。任何構成的民族，如非完全包容在蘇聯之內，可以分離。一九一七年，芬蘭獲許分離了。一九四二年，亨利·華萊士在美蘇友誼協會中致說：「在實踐行種族的民主上，蘇聯也許已經比世界上任何國家更進了一步。」

這就是蘇聯對於外面的國家，對於世界和平，集體安全和民族自決的一般的態度。除了這一般的態度之外，我們要瞭解蘇聯對於接壤鄰國的特殊態度，同時必須記住兩個極端重要的因素。第一個是西方世界在兩次大戰之間時期中的敵視和猜忌。另一個是俄國會從西方和南方，從成問題的地帶遭受一再進攻的事實：從瑞典的阿道爾夫斯（Gustavs Adolpbus）；從法國的拿破崙，從德國的凱撒威廉；從西方的九協約國加上第一次大戰後的日本以及從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希特勒。所以，蘇聯切于要獲取西境的安全，以避免最近兩次戰爭中恐怖的重複，是毫不足怪的。

關於蘇聯對東歐鄰國的態度，我認為泰普林（Tajlin）在最近「世界問題」廣播中的幾句話，說得最明白：

「別錯以為蘇聯的政策是特別的複雜——實際上是最簡單的。第一，蘇聯關切她最近的鄰人巴爾幹國家，猶如我們關切我們的鄰國——法國、比利時和荷蘭。第二，蘇聯特別關切這些國家的經濟生活，——猶如你關切一個國家在最近二十年來集中於經濟革命的全部發展。第三，蘇聯人認為他們驅逐德國人而受到的犧牲，對於巴爾幹國家有貢獻，因此，他們自應得到這貢獻的代價。」

當人們想到這些事實時，總指責蘇聯是擴張主義者，這樣的指責是不健全的。且來看事實。在戰爭中，主要是由於軍事上的必要，波羅的海諸國，芬蘭的一小部份，貝薩拉比亞，「寇松線」（Curzon Line）以東的地區，和東普魯士的一小塊，都併入了蘇聯。除了最後的一小塊外，

所有地方都是革命時期俄國的一小部份，而除了波羅的海諸國的民族外，其餘都是俄羅斯人、烏克蘭人或近於俄羅斯血統的民族。

（試與美國的所得比較一下。太平洋上的島嶼，這是我們在聯合國中反對的。冰島的航空基地，這是冰島政府不願的。強迫丹麥接受格林蘭的聯防。沙地阿拉伯的航空基地。軍事和警察顧問的派駐德黑蘭。以軍事配備積極支持希臘和土耳其——後者恰位於蘇聯的邊境。（支持中國的內戰）（此處刪略一句——譯者）。美國已直接或間接地控制了世界四分之三的地方，至少從這一國度來說，指責蘇聯為擴張主義者是絕不公平的。

蘇聯從不追求孤立。她現在也不想孤立。她比從來更堅決地要阻止世界墜入她所認為的過去的錯誤，她在外交上也許不夠巧妙，然而她要學習，並且是強大的；她知道她要的是什麼，她接壤的鄰國對她有重大的安全關係，她仍相信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她的合作的願望可以從許多徵象中看出來：她教育青年從事外交和經濟上的對外服務，她視此為要務，也是長期的政策；學校中的英語課是強迫的；學校教科書中並無對英美的謗詆。現在，蘇聯已第一次與全世界大部份的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史太林在一九四二年二月的演說中，指出西方盟國在戰爭中有相當的貢獻。史太林又指出戰爭是可以避免的，倘使原料和市場，能在各國之間，依照她們經濟的比重，經過一致而和平的決議來周期地分配的話。世界合作的大門是開着的。

第十一章 批評家和批評

戰爭的結束隨來了批評家的興起。首先是報紙，然後是書本；很少是嚴肅的，大部份是輕浮的；公然敵視的作品，有許多在某些人中間找到了市場，那些人在意識上根本仇視社會主義，蘇聯的勝利雖會使他們不敢作聲，卻從來沒有緩和。另外一些人，常追求着烏托邦，認為人生問題有很快很容易解決的辦法，認為一個完備的樂園，已在蘇聯自天而降，一看到這些書本，便更慘澹地感到了他們自己所造成的痛苦的幻滅。

科斯脫勒 (Arthur Koestler) 首先是這些幻滅的人。他追求着俄羅斯的烏托邦。但當一接觸到現實時，他就感到了強烈的反動的痛苦，因為他所看到的，不是在他前面翩然而降的天使，卻是原來經濟上的農奴和精神上的奴隸，慢慢地實質的經濟平等和自由的基礎上，昇到建設新文化的勇敢的事業，不過，他們也會悲慘地遭到過去遺下缺點的阻礙，在艱難的路上躑躅，也許會有失錯，以致批評家冷嘲，膽怯者畏縮。

科斯脫勒之流所不能理解的是成就的深大。奇蹟已經出現，一種完全新的秩序已在試行，並無匱乏的情形；經濟的奴隸已成長為經濟的人，而且還在希特勒自己的巢穴中摧毀了希特勒。猶

如萊特 (Wilbur Wright) 第一架重於空氣的飛機一樣，——那是繩索、鉛絲和木片構成奇異的東西——這隻新生的鳥已從地上飛起了；它飛着。

華斯 (Alexander Werth 英國記者) 在蘇聯住了好幾年，他是親眼見過蘇聯的艱苦掙扎的，後來他旅行到斯托克霍爾摩，寫道：「在離開戰爭幾百萬哩，離開俄國很小差別和很小紛擾的日常生活的——一個新的世界中，全城照耀着霓虹的燈光。這裏有雲集的大小車輛，火車是舒適的，不像莫斯科般的擁擠；鋪子裏你要什麼就有什麼。」

但聽他再說下去：「然而，我却始終懷念莫斯科，儘管它是簡陋而雜亂，儘管它有悲劇和喜劇。」

莫斯科儘管有一切不舒服的缺點，但它有着未來，華斯是瞭解這點的。

不過事情不僅是如此。事情還有甚於突然的幻滅。科斯脫勒和別的敵視的批評者還用一種忽然從蘇維埃社會主義中發現的手法，來施行攻訐，那完全是可理解的，那是出於他們個人的不負責任，幾乎跟放縱差不多的不負責任，他們愛怎樣就怎樣做。

現在，我們且從科斯脫勒的自白中來選出他幾種攻訐的根據：

(一) 從革命第一年到一九二九年的這一時期中，平均生活水準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四，到了一九三七年，這水準竟比革命以前還跌落了百分之三十二。

荒唐之至！基本的糧食是從一九一三年的八十萬萬派因脫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十二萬萬二千

萬派因脫。別種糧食也表現了同樣的增加。蘇聯同時期的糧食輸出卻減少了。那末如果這過剩的糧食不是爲了提高生準，却到那裏去了呢？莫非蘇聯人把它拋到海洋中麼？社會和文化方面的經費，也從一九二八年的三十萬萬盧布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二百五十六萬萬零四千五百五十二盧布了。

(二) 在所有大國中，蘇聯是從來不刊布生活水準指數的。

我們也沒有。我們刊布一種生活費用的指數，主要爲了限制公務員的工資。誰能真正算得出生活水準的指數呢？沒有一個國家進行這種工作的，而蘇聯尤其困難，因爲在蘇聯，收入大部份不是以金錢而是以社會的福利，如免費教育，免費醫藥，再加上大量的疾病和養老福利金以及各種文化娛樂等。

(三) 一九三六年的憲法，又承認繼承爲合法，保證每一個人有根據遺囑而不受限制地處分財產的權利。

我得說明，社會主義從未確定完全的平等。社會主義的合法繼承是一種社會公平的行爲。而且，因爲沒有一個人能把他的所得投於資本主義的謀利，沒有一個人能靠剝削別人的勞動來過活，因此，也就沒有一個人能夠建立和施行寡頭或絕對的政治權力。

(四) 高級學校和大學須納一定的費用，又造成了教育的不平等。這一規定，使六十萬貧苦家庭出來的學生，因無力納費而只能失學，這樣一來，高等教育又成了富有子弟的特權。

真是荒誕無稽的批評。大學的納費，最高也不過每年四百盧布，那是任何學生只要工作一個月就可得到的。而且，我在到處說過，貧苦家庭的孩子，都享有教育的權利，這就使任何有志深造的孩子們都有着機會。

(五)蘇聯公民是不許閱讀或接觸外國報紙的。

外國新聞紙在蘇聯沒有賣。但我們在莫斯科大學圖書館閱覽室中，曾看到過包羅萬象觀點的書報。在塔什干，我們遇見的一個蘇維埃公民是經常看圓桌月刊(Round Table)的。在莫斯科和脫必列西，我們遇見的好幾個蘇維埃公民，都在經常聽英國廣播公司(B. B. C.)的廣播。

(六)在德蘇互不侵犯公約之後，德國反法西斯份子都被引渡到納粹的德國。但這批評者又說其中三個是在奧國政府中任職，兩種說法是自相矛盾的。

比科斯脫勒更荒謬的是威廉·懷特(William L. White)的故事，這早經駐莫斯科多數有名的記者，公開指摘為無稽，惟一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這些故事都發表在銷路廣泛的「讀者文摘」和一家英國報紙的星期刊上。

比這些攻訐更具破壞性的，乃是我國在奧地利和柏林的兵士所傳說的故事，因為這是更易相信，而且還含有多少的真實。不過這些故事，正如我們比較公允的記者所指出，是並不符合於它們票面價值的。英國士兵沒有和蘇聯士兵會合的準備，如像他們早就在準備和美國士兵相會合似的。所以當他們一看到穿得不好，配備不好的蘇聯士兵時，他們就相信了德國人的宣傳，以為

德國軍隊的失敗，只是「敗在寡不敵衆，敗在不顧生命和災難的野蠻游牧民族。」德國人的宣傳自然是荒唐的，但德國人的目的，原在離間盟國的團結。這真是雙重的不幸，盟國的兵士在敵國的土地上相會，因言語的隔膜既不能談話，而我們的士兵又很少能得當局的幫助，來把握蘇聯的實際情況。英國的士兵從來不知道柏林街上用馬車代替摩托車的理由，不知道蘇聯的戰線長達幾千哩，不知道爲了輸送和安排二千萬流離失所的蘇聯人的運輸，要比在柏林街頭巡邏的更忙碌，不知道紅軍的制服是曾經經歷了幾千哩的戰線，不知道「游牧民族」難以抵抗現代的武器，不知道蘇聯的人口總共不過一億九千三百萬，而德國人連同它的盟國和奴隸，可以動員三萬萬的戰鬥員和勞工。英國的大兵們更從來不知道，蘇聯第一線的部隊多半已經在英勇的戰鬥中犧牲了，這也拯救了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戰士。

我們當局確乎不願讓英國公衆知道我們戰時損失的真相，最顯明的一個例證是英國國家公司拒絕史密斯(Howard Smith)的廣播，他的廣播原擬在外長會議前夕發表，內容包括了絕對正確的事實，大意是說：「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蘇聯公民的犧牲，包括戰死和餓死，要比英美公民兩次戰爭中犧牲的總和，還大過十五倍。她在工業和農業方面的物質損失，則要超過一千倍。」這物質的損失，幾達美國每年一千六百七十億美元的全部國民收入的三倍；二千五百萬人無家可歸，這等於是英國人口的一半以上。這廣播的原稿，後來幸而由「圖畫郵報」(Picture Post)全文發表了。

講到體格，有許多被稱為「貧血」的人，可能是亞洲和蒙古人，他們的體格都是小的。我的一個喬治亞車夫，在北方人看來也許是貧血的；他卻是社會的健全份子。蘇聯擁有着一百五十種的民族和語言。一位高級的英國教士告訴我，一個面貌漂亮的紅軍孩子不能讀俄文，他一定是文盲。然而他能讀喬治亞文或亞美尼亞文麼？我問着。他可從未想到這一點。

陶茲議員 (N. Doda) 首先發作，放出一套故事，說對付「那些擠集在蘇聯佔領區中無家可歸和挨餓的幾百萬難民，」是怎樣的殘忍和毫無效率，接着是大批通信記者的響應。這批「難民」偶然逃走是有的，但並非被驅逐，而是出於自動；他們惟恐留在那裏，將受到德國人臭名昭彰的殘酷方法的虐待。史太林會對我談起報紙的惡劣影響。蘇聯的報紙和無線電，也曾攻訐英國和美國。但我們的記者華斯和美國的聯合社記者基爾摩 (Eddie Gilmore) 卻都指出我們西方盟國對於蘇聯的偏見，批評和攻訐，實在還要厲害得多。

在積極的方面，華斯又指出任何國家的報紙，從未像蘇聯騰出這樣多的地位，登載着聯合國的消息，登載着貝文、貝克以及其他英國代表的詳細演詞，一如莫洛托夫和維辛斯基的演詞。華斯又否認蘇聯人避免外國記者的謠言。他說：「我在四年中到蘇聯人的家裏，要比十年中到法國人家裏次數還多。」

更嚴重的，在某種意義上更似是而非的，是道德的理想主義者的批評，他們從絕對價值的觀點上，對蘇維埃的價值發動整套一連串的攻击，說蘇聯是反自由主義的，反西方的，反基督教

的。他們指責蘇維埃當局損害個人的神聖權利，爲目的不擇手段，濫用手段，一切行動根據了目的決定手段的原則。

就先拿最後一點來說。說目的決定手段，並不含有用不正當的手段，纔能達到好的目的的意思。這是武斷。一種大家認爲錯誤的行爲，也許在特殊環境中是對的。因爲在某種環境中是錯誤的，也許在另一種環境中就非常對。舉一個例，說謊是錯誤的。對，但這永遠是錯誤的嗎？絕對的理想主義者說是的。真正的道德家却說：「在我下判斷之前，先讓我聽聽在何種的環境場合。」讓我們舉一具體的例子。在森林中一個冷僻的地方，有兩條路分開着，你遇到一個小孩正往其中的一條路跑。不久你又遇到了一個人，你明知這人對小孩不懷好意。他問你小孩往那條路走。你說了真話，就害了這小孩。說是另外一條路則又是說了謊。我是否必須說謊纔對呢？我是否必須採取不正當的手段纔對呢？

絕對主義者要說不：真實是一種絕對的價值。我却一定要說是，真正的道德家會同意的，一切精神健全的道德的人民大眾也會同意的。

我要駁斥那種爲了目的不擇手段的指責：我在某種場合中的行爲是錯誤的，但在另一種場合中就對，一種行動的對或不對必須根據它全部的脈絡，根據它最後的意義來判斷，而不能根據任何絕對主義者的標準；這必須根據它的益處，它對於所有人類生活，包括對我自己和別人的利益來判斷。這並不破壞應以真實爲義務的總的原則。它反對違反真實的原意，而使它變成「絕對」：

把它變成不管天塌下來也要死守的法則。

再舉一個例。暴力是錯誤的。但是否就此永遠不用暴力呢？假如你的姊妹遭強姦，你是否就不用力來反抗她的侵犯者呢？絕對主義者在理論上是會說不的。東方真正的絕對主義者也說不，而且還用實際行動來貫徹他的理論，這也許連西方坐在安樂椅中的絕對主義理論家都要噢不消的。非暴力的絕對主義的教條，邏輯地引到了和平主義，並由這種絕對主義者，在和平時期宣揚着，——這終於鼓勵了希特勒胆敢對我們發動殘暴的進攻，和妨礙了共同反法西斯陣線的形成——但一到了全體主義戰爭時候却就破了產：佳特 (Tard) 和羅素以及別的更多人們，不是有一時候離開了和平主義者的陣營嗎？

在東方，人們似乎更徹底，更合邏輯。任何的和每一種的生活方式的神聖原則，被尊崇為一種宗教的原則；必須視作絕對的法律而予以嚴格遵守。佛教不但拒喫魚肉，甚至不肯拂去臉上的昆蟲，其中更嚴格的一派還叫你戴上口紗，免得你偶然吞進了一隻蒼蠅。他們願意讓世界保留着昆蟲，猶如我們比較不徹底的和平主義者，願意保留希特勒一樣。

還有一些人雖然不贊成這種絕對主義者的立場，却仍認為非暴力主義乃是一種西方和基督教的美德，便在過去四分之一的世紀裏，把它的不服從的原則，應用到蘇聯嚴肅的事情中，作為打擊蘇聯的巨棒，針對着蘇聯早期的暴力：沙皇之死，富農的消滅，嚴峻的清黨，蘇聯對於這些攻擊的答覆大概是這樣的：

他們可以說，你們，不惜以任何的代價，必要時還用暴力，來阻止希特勒把鎖枷套到你們和你們孩子的手上。你們願意犧牲千百萬的生命來阻止它。那末，你們卻又爲什麼擺出道貌岸然的面孔，來向我們說教，我們難道不能以僅僅幾萬人生命的代價，來掙脫那幾世紀來摧殘壓抑我們祖先，現在又摧殘我們的同樣的鎖枷嗎？

理想主義者能否說你是在以錯誤爲正當呢？

他們的回答當然不。說這是錯誤的，是一種武斷。任何行動的是非，必須拿它全部過程和結果來判斷。從它全部的過程看來，這是毫不錯誤的。

歷來偉大的道德家，從伯拉圖到黑格爾，從來沒有一個離開過這種根據全部過程來作判斷的規律，純粹的基督敎理論也完全是如此，雖然清教徒和天主教徒，有不變的羅馬敎法律和禁條，再加上希伯來教徒的苦行，目的都在加強絕對的法則和規律。

基督敎創造者自己是反對絕對主義態度的。拿安息日 (Sabbath) 來做例子。誰會否認七天中休息一天對於人們的好處？蘇聯已經回復到遵守這個原則。拳撒勒的耶穌本人是遵守這個原則的；他打破了到禮拜堂的習慣，而實行一天的安息。然而他反對把這變成「絕對」。這樣的做是根據了正確的路綫——關切人類的幸福：安息爲了人，不是人爲了安息。耶穌爲了對人類幸福最大的關切，不惜打破傳統習慣來達到它，就從這一方面出發，爲了疾病的、無家可歸的、貧窮的，而反抗傳統和他當時富人的特權，最後也因此犧牲了他的生命。

人類的幸福：這曾經是而至今仍是一切善和道德最後的考驗。你離開人類的幸福就決不能爲善。只有一切爲了人類幸福的規律是對的。

從這點着眼，列寧和基督間之的距離就縮短了。列寧寫道：「我們認爲我們的道德完全從屬於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利益。」他意思就是說，一切事情都必須爲了普通人民的解放，和終止人對人的剝削。他意思就是說人類的需要必須放在中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或保護部份利益的超自然的絕對主義者的前面。列寧和基督一樣，認爲人類幸福纔具有最高的價值。

被用以衡量蘇維埃社會的「至善論」的標準，却並未被應用到任何別處，甚至更不常用到那運用「至善論」者自己的私人生活和行動，這不但因爲那應用者自以爲具有優越的舒適的感覺，而且也因爲這樣的做，能夠得到享受階級熱烈的歡迎。他們避免批評有許多人特別認爲滿意的現行的社會秩序，這社會已因蘇聯的成功而非蘇聯的失敗，而發生了危機。這種「至善論」方式的攻訐是並不困難的：從另一個完全不同的系統中行動的觀點，來批評某一環境中的行動，是比較容易的。

這種「至善論」的批評的真正危險，是在於它無視積極的成就。它只知永遠不滿意於絕對理想的不完備，却不懂得理想縱然尚未完備，可已真正見之於現實。蘇聯當然還沒有達到充分的完備。當普羅米修斯從天上大鬧回來，帶來的不是新聞自由，而是可以烹飪和取暖的火。作爲現代的普羅米修斯的蘇聯，用同樣姿態帶回來的，不是新聞自由等類有價值的東西，而是更基本的切

實的禮物——免於貧乏的和不安的自由、充分的就業、享受、健康和教育。這成就就是應該熱誠歡迎的。

「至善論」者毫不顧到這所有的成就，卻只知集中於批評，這就使那些一開始就根本仇恨蘇維埃秩序生活的人們，引為同盟者。理想主義者自己實已投入了反動的陣營。超越一切的理想，成了可能的理想的敵人。

蘇聯也曾有缺點，有錯誤，有過不對的地方。那一國家是完全沒有過失的？過失必須注意，而加以改正。蘇聯有許多事情是我們希望趕快取消的，例如對於外國通信記者的限制。有許多已經取消了，我們最近會看到許多新聞限制的撤銷。蘇聯日益成長的力量使我相信，蘇聯的自由必將日益擴大，而蘇聯的力量必將跟和平以及她所尋求的和平行動一同成長。

我們也應該時常記住，一個具有限制的計劃經濟，使得我們中的有許多人討厭。蘇聯願意為了更高度的自由而犧牲了較小的自由。誰能因此責備她？在作細節的判斷之前，先得看清這整體的圖畫。

第十二章 結論

蕭伯納描寫過他的一種經驗，使「一羣只能喫飯的羣衆，組織成爲一個有目的和原則的軍隊。」這句話，恰當地描寫了蘇維埃人民的經驗。這同一的過程，產生了蘇維埃的成功：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了從混亂到秩序的偉大的改變。

我們生活在一個變革的世界中。地質學家和動物學家昭示我們，從來的時代有一個進步變革的方向，每一時代的人類總是追求着這一方向，除非他們願意像寄生蟲似的倒退，或像貝殼的化石似的躲縮在一旁。

組織，在這裏是一個關鍵的字眼。組織是進步演化的方向，從無機到有機，從無生命到有生命，乃組織的一個步驟。從單細胞到多細胞軀體的步驟，是組織的一個步驟。較高級的哺乳動物有着最大數目的部份和配合中樞管制的最高的複雜構造，象徵着進步的高峯，單一的頭腦通過高度有效的靈敏的神經系統，指揮着四肢。哺乳動物在行動上柔軟易變，多半並不倚賴它們的環境。

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也可以同樣看出這完全同一的步驟，人類的歷史繼續着以自然開始的

歷史。個別的人類細胞，併合成爲一個社會的有機體。原始的農夫和工業家，學會了合作，放棄他們獨行其是的方向，大家聯合起來，以在更高的階段上享受更充分的自由；猶如以繩聯結的阿爾卑斯山的爬山者，集合了他們的力量、技能和機智，像密切相結的運動員，爬向不可攀達的高山。這種較高的組織的步驟，導向我們所謂「文明的生活。」

環境經常地要求着更進一步的組織。馬克思、列寧和史太林注意到一個分裂爲許多主權國家的世界，沒有最高的道德律或統一原則的限制，這是自然資源——土地、鑛藏、水力或別的偉大生產的單位——掌握在私人手裏的一個世界，結果就在個人或集團之間，引起了爲了所有權和控制權的分裂的鬥爭，使同志愛和友誼受到了壓抑，貨物的分配也不是根據需要的規律，而只是根據着利潤。

跟那類乎蕭伯納所謂「只能喫飯的羣衆」的環境相反，且讓我們來考察一下蘇聯的經濟及其現在的實際。代替了分裂國家的不合法的主權，不承認中心和無情抹煞別人文化的支配者，我們看到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已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出現了，在那裏，一百五十個以上民族或民族集團的古文化，都得到了鼓勵、撫育和發展，但大家都由一個共同的經濟紐帶或管制，聯繫在一起。

我們看到，代替了自然資源以及生產和分配手段的自私而無組織的所有制，一個高度有組織的資源和動力的結合，已產生了可驚的實際結果，使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全部的權利、特權和幸福。

福：工作的權利，休息和享受的權利，養老、養病、以及喪失工作能力者撫養的權利，教育的權利；婦女在經濟、國家、文化、社會和政治生活一切範圍內和男子平等的權利，不論民族或種族，凡屬蘇聯的公民，在一切經濟、國家、文化、社會和政治生活範圍內的平等的權利；信仰的自由；言論，出版或集會的自由；人身不可侵犯的權利——同時也規定着法定服役和義務的權利，這却是別國憲法所未有的。

這些向蘇聯公民保障的廣泛權利和特權，也許還沒有完全實現。蘇聯在一個新文化的開端：我們則在一個舊文化的終點；他們已經成就了很多，而他們在循序實現的過程中還將更多，雖是受了戰爭可怕的挫折。這戰爭也一樣悲慘地剝奪了所有國家的權利、自由和幸福。

在這憲法和蘇維埃的一般實際表現中，究竟跟基督教創造者質樸動人地所宣告的判斷的標準，有什麼不相符合的地方呢？當時他說：「我餓了，你給我喫；我渴了，你給我飲；我是無家可歸者，你給我住；赤身露體了，你給我穿；我病了，你來看我；我坐了牢，你探望我。」

這樣形成的集體主義，確實實是集體主義的科學，指引着我們預見到演進的下一階段。這也是確乎積極而實踐地發揮了基督友善和博愛的至理的集體主義。

麥克摩萊教授(Prof. John Mac Murray)認為，對上帝的信仰，儘管還有更多別的因素，至少卻必須包括生活的能力，以成爲一個統一世界中的全部事物的一部份，假如這種說法正確的話——而我是認爲正確的——那末就再沒有比蘇聯無數建築者更富宗教性的了，因爲蘇維埃的共產

主義，正要爭取生活的能力，使成爲全部事物的一部份。

哈佛大學的何金教授 (Prof. Hocking) 報告了他和一位同事的談話：「不久以前，我和一位精神病學者的同事談天。他說：『最近，我發覺到一些似乎很重要的東西。……這是一種把瑣屑事情構成世界一天的印象的方法。人們看不到它們中間的趨勢。假定有一種趨勢爲我們所不能明白確定，但多少是可以窺見一些的。社會的演進既當然有方向，爲什麼在歷史中就沒有？假如有這樣的一種趨勢，那末我們人類不是順從它便是反抗它。順從它，總得要有某種和平的解決方法，反抗它就必將招致內心的暴躁不安。要對它有信心，就總得有一種無論是好是壞的拘束。我疑惑着這是否就是你所認爲的宗教的意義？』」

「『是的』，我說，『這便是它實在的內容。偉大的宗教家似乎有一種把握，以爲他們是順應世界趨勢的。他們有一種爲着合理生活的感情，他們認爲這乃是世界的要求。』」

這些話也許是歌德的偉大名言的回聲，歌德說：「在宇宙和人類——其餘一切都不過是附屬品——歷史中最簡單而深刻的命題，乃是信仰與非信仰之間的衝突，一切的時代，如信仰確立，而形成于信仰之下，那末它必將是燦爛、崇高而繁盛的。」

的確是如此，在伊娜·考拉科莫斯科耶，在卡拉加諾夫，在莫慶那夫人和她的兒子，在卡必葵——在一端的普通人，在另一端的史太林，又在中間無數的蘇維埃公民——的身上，我看到了男男女女都受着信仰的鼓舞，這一信仰，號召他們去建設和正在建設一種符合于世界向上趨勢的

新秩序——一種有着最崇高的目的，使人們兄弟般相愛，和基於人類的平等自由的秩序；正因為如此，我這纔感悟到蘇維埃各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燦爛、崇高和繁盛的因素，而認為她並非是敵人，卻是全世界宗教最好的盟友。

譯後記

五年前，上海還陷在日帝國主義魔掌中的時候，有位朋友輾轉借給我一本H·詹森氏的「蘇維埃的力量」，我讀完幾章，歡喜極了，心想把它譯出來。可是結果因為沒有地方出版，終於放棄這「宏願」，很沮喪地把這本書還給了那朋友。從此以後，這位慈祥的英國坎脫勃里副主教，在我的腦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時時在英美書報上注意着他有沒有新的著作出版。

去年年底，我在美國雜誌上看到本書的廣告和書評，立刻寫信托紐約的劉尊棋兄代購一冊，尊棋兄真熱心，不到十天就把書寄了來。這本書是去年十一月出版的，寫成本書當在一九四六年年底和一九四七年初。可說是介紹二次戰後蘇聯情況第一本最詳盡最客觀的著作，材料都是根據親身考察的，詹森先生爲了寫這本書，曾在蘇聯旅行和考察了三個月之久，他而且還得到別人所難以得到的機會，因此這些材料尤其顯得可貴。

本書的美國版原名「戰後的蘇聯」，英國版爲「蘇維埃的成功」，中譯本改了今名，是爲了便利發行，實在並不好。我覺得最能標出本書內容的當是「蘇維埃的成功」，因爲在本書中，作者確曾忠實地詳盡地立體地刻劃了這世界六分之一地面上的人類成功的全貌。作者的學識是淵博的，他的觀察是無微不至的，他從蘇聯的個人生活說到蘇聯的計劃、工業、農業、醫學、科學、宗教、文學、以至政治外交各方面，這無疑是認識蘇聯一部最完備的著作。作者對於蘇聯少數民族

怎樣從殖民地地位昇到平等的人民共和國的經過，解釋得特別詳盡，這對於世界上一切被蔑視被壓迫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人民，尤其是寶貴的榜樣和啓示。也許因為作者自己是副主教的緣故，他對於蘇聯的宗教方面格外敘述得詳細，但這對於我們認識蘇聯也是極有幫助的。這本書描寫和解釋並重，既不枯燥又不空洞。但最最可貴的卻是作者具有一顆爲人類、愛人類的偉大良心，這顆良心始終在字裏行間跳動，而這，正是目下許多專事造謠侮蔑的西方作家和新聞記者們往往缺少的東西。因此，在「汗牛充棟」的歪曲介紹蘇聯的書籍中間，本書特別顯出了燦爛的光芒。我譯這本書是在今年一月底開始的，中間因爲生活粟六或事務上的羈絆，會中斷了二個月，以致一直拖到半年後的今天纔出版，實在深覺內疚。

我特別要感謝H·詹森先生，他親自爲這中譯本作序，使譯本生色不少。倫敦陶大鏞兄替我介紹詹森先生，王德鵬金仲華毛之芬史濟煊陳兆桂諸兄不斷地鼓勵或指示我，我在此併致誠摯的謝意。

最後，我個人謹以此書沉痛紀念姪女曼羅的亡故。她今年二十二歲，是一個聰明活潑的有志上進的青年。肺結核奪去了她的健康和生命。當她偃臥病榻的時候，我常爲她講述本書的故事。她往往興奮得從床上坐起來，並且提出許多極有意義的問題。她不止一次催促我譯完這本書。誰知現在當這本書終於出版時，她竟已不在人間了。

譯者學識譫陋，錯誤一定難免，誠懇地請求讀者不吝指正。

譯者 三十七年八月一日於上海。

H·詹森先生訪問記

陶大鎔

深秋了，倫敦已冷下來。今天，朔風裏，還飄着霏霏的雨，陰濕、蕭殺、凜冽，走在路上，手都有點兒僵。

大前天，收到詹森先生的信，他說今天下午要從坎脫勃里出來，約我去談談。冒雨趕到帝國教會俱樂部，在四層樓，一位老太太把我引進一間會客室，壁上生着火，坐在爐旁揉揉手，驅散了身邊的冷氣。

會客室裏，佈置得非常雅潔、樸素，有些古香，桌面放着幾份當天的報刊，書架上全是聖經，有各種不同的版本，我隨手翻了翻。四點光景，詹森先生悠然進來，面堆笑容，緊緊地握了手。

「勞你久等了，今天沒有淋到雨吧？」他的語氣，總是那麼慈祥。

「沒有什麼，我剛到不久。這幾個月，你倒是太辛動了。聽說美國領事館已給你簽了Visa，你又要僕僕旅途了。」

「是的，上禮拜剛辦妥，這回總算簽成了，我要特別感謝這三百多位朋友，（按今年八月，

美蘇協會會邀詹森先生赴美演講，美領事藉辭美蘇協會爲非正式團體，拒簽護照。這一次，是美國三百多位文化教育宗教界的知名之士聯名邀請的——筆者）美國國務院的決定，往往這樣不容易捉摸。」他帶着英國人慣有的幽默。

「你打算什麼時候動身？」我追問一句。

「我預備十一月一日離英。」他一邊說，一邊扭亮了電燈。「先到加拿大，就十天，再去美國，全部旅程暫定六個禮拜，我要回來過聖誕節。」

他愈說愈有勁，誰也不會相信，他今年已有七十四歲高齡了，紅光滿臉，比我上次見他時還要豐潤。一位白衣女侍端了茶進來，他謙和地對她說：

「多謝妳，妳能再給我們弄些土司與蛋糕嗎？」

我們若着茶，他突然回憶到過去：「我生平到過不少地方，我最留戀貴國，我尤其喜愛你們的茶，清香可口，別有一番滋味。一九三二年貴國大水，我曾在揚子江流域賑災，那三個月，使我念念不忘。貴國同胞的淳厚和蘇聯人民的熱情，在任何國家都很難碰到。我常說，亞洲領導世界的時代，就快到來，蘇聯與中國，將是全人類的大希望。」

「美國人不是自誇什麼『美國世紀』嗎？你這次到美國預備帶些什麼禮物給美國人民呢？」他倚在沙發上，托着茶，聽到這句話，馬上把胸挺直：「美國戰爭販子以爲有了金元，又有原子彈，就可獨霸世界了。我這回去，倒要瀝胆坦告美國人民：美國的金元，並沒有用來救濟

別人，也沒有真正幫助別國經濟復興，不過爲了建立金元殖民地。貴國深受其痛，你一定很了解。就說我們的工黨政府吧，也被金元迷醉得不像一個樣子了！」

他歇了歇，飲口茶，又接着說：「講到原子彈，人人曉得它可怕，但已毫不神祕了。美國好戰份子總以爲蘇聯沒有，最好今天有兩架美蘇飛機互撞失事，明早就向蘇聯擲原子彈，把社會主義炸個乾淨！在我看，蘇聯不一定沒有原子彈，照美國一位科學家推算，蘇聯今年也會有了。就說蘇聯沒有吧，美國能把蘇聯炸完嗎？一旦美國炸了蘇聯。紅軍馬上可把歐陸佔領，美國又怎麼辦？再炸巴黎、羅馬、布魯塞爾、海牙以及其他都會嗎？再把全歐炸平嗎？」他頓了一頓：「也許會炸的，但美國那來這麼多原子彈？」他輕鬆地爽朗地笑了。

茶點送了進來，麵包已烘得發焦了，他取了片，嚼得很費力似的，說：

「我相信勃蘭凱特教授（P. M. S. Blackett，曾任英國原子能顧問委員會委員，現任曼徹斯特大學物理教授，近著「原子能的軍事與政治後果」一書，轟動全英。）的研究，也許可以醒好戰份子的原子夢。根據他的研究，一顆原子彈的實際炸毀力，大約等於二千噸的普通炸彈。這次大戰中，英美投在德國的炸彈，共達一百三十五萬噸，還沒有真正折損德國的作戰力與軍火生產。而一百三十五萬噸的普通炸彈，就相當於六百七十五顆的原子彈的實際炸毀力，六百七十五顆原子彈，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即使原子戰爭比這更可怕，對於蘇聯並沒有致命的威脅！蘇聯太大了，它有八百七十萬方

英里，不憐我們英國祇有八萬九千方英里，它每方英里的人口密度祇有二十二二人（英國約為五百人——筆者），原子彈所能炸毀的面積，不過幾方英里（按廣島一彈，炸了四·七方英里，長崎一彈，炸了一·八方英里——筆者），美國又怎麼炸得尤蘇聯？」他把茶托放回木盤，輕輕拍了下膝面的麵包屑，更富信心地說下去：

「我對世界和平的前途，倒并不悲觀。戰爭的危機，的確有；但在眼前，美國還不敢發動戰爭。這正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努力爭取和平的時期。你剛才問我，這次要給美國人民帶些什麼禮物去，我沒有什麼，我祇有一顆和平的心，我要對美國老百姓說：另一次戰爭將會毀滅文化、毀滅無窮的生命與財產，却毀滅不了社會主義。戰爭祇會製造貧窮，貧窮的唯一救星，就是社會主義。原子彈決計炸不掉社會主義，祇有一個更理想的社會制度，才能來替代社會主義。我還找不出比社會主義更理想的社會制度來，我在蘇聯親眼所看到的一切，覺得比任何國家都更合乎基督教的博愛精神與大同主義。」

「噢，我倒忘了，你那本『戰後蘇聯印象記』的中譯本，已出版了，我上禮拜剛收到二冊，是譯者托我轉贈給你的。」我忙從提包裏取出來，遞了給他。

「真有趣，我的原序竟也印得這麼雅緻。」他高興極了：「可惜我不懂中文，否則我一定要逐字逐句地念一遍。」

「這是什麼字？」他指着譯者所題的二行字，朝我射出好奇的眼光。

我告訴他「詹森先生惠存」是什麼意思，他會心地微笑，他特別欣賞譯者的那顆私章，用手點着說：「貴國的古典文化，真令人晌慕，這是一種極有詩意的藝術。」

他翻來翻去，問道：「這本書是在那裏印的？」

「在上海。很受歡迎。」

「上海也能翻印嗎？」他略露驚訝之色，把書放在桌角上，很欣慰地添了幾句：「我的那本『六分之一的社會主義世界』（The Socialist Sixth of the World），已譯成二十四國文字，這倒不一定因為寫得動人，但我說真話，記真事，祇要真，就一定會感人，你說是嗎？」

「我們中國也有一俗諺：真金不怕火燒。」

「中國人真睿智，這句話太富哲理了。」

「現在許多人多稱東歐有『鐵幕』，你到過東歐好幾次，是不是準備再寫一本東歐印象記之類的書，也好給世人多明白些真相。」

「我戰後曾訪遊東歐三次，除了阿爾巴尼亞，其他六國（指波、南、捷、保、羅、匈——筆者）都到過了，我計劃寫本書，資料已整理得差不多，從美國回來，我就要動筆了，我希望明年春夏之交，可以寫成它。」他摸摸壓在腦後的雪白的銀髮，前頂禿亮，顯出他是一位博學深思明辨的科學家與思想家。

「中國一定歡迎你的新著，還會把它譯成中文。」

「書一出來，就立刻送你。我看貴國的社會經濟生活，有點像東歐，貴國的將來，不但要吸取蘇聯建國的經驗，東歐那種苦鬥的精神，也實在值得景佩。」

盤裏的茶食，祇剩下幾件，他又揀了件給我，我摸出錢來，看看已過四點半了，他明白我的意思，搶口而出：

「我們難得暢談，你多坐一會。要到五點，才有別的客人來，別忙走，還早。」他永遠這樣懇摯而親易近人。

「你這次參加洛克勞和平大會，觀感還好吧？」

「這是全世界知識份子的第一次大結合，確乎很難得。」他看着爐裏的火，聲調激昂起來：「但它的建設性與積極性，總嫌不夠。英、美的少數代表，很想從中破壞。單單大會宣言，就爭持了好久。在表決的前一晚，英國代表舉行過一次大會，我被選為臨時主席，原想促成一個共同的建議，討論了幾點鐘，不歡而散。表決那天，英國仍有四人反對，他們回到倫敦，還發表了些不負責任的談話，真是件憾事。」

外邊的風，瑟瑟地吹着窗格，他回頭望了一眼，再接下去：「我還記得一位西印度代表的控訴，最令人激動。他講得一口極流利的英語，劈頭就說：『我是西印度人，我不願用英語，我不願在外國流亡，請幾位反對宣言的代表，少奢談言論自由與行動自由吧，在你們的國家裏，為什麼沒有我的言論自由與行動自由呢？』他的演辭，博得最熱烈的雷掌。」

我們的話題，又引到了新民主國家。

「真是奇蹟，剛隔兩年，新民主國家已面目一新了。這次開會回來，我重訪波蘭與羅馬尼亞，路過二千四百英里，我所得的最真切的印象，祇覺得他們有活力、有自信、有燃燒着的希望。二年前的瓦礫堆，現在都蓋成新的民房與大工廠了。」說到這裏，他右手指着熊熊的火：「它們的建設熱，好比一把火。魯羅馬尼亞這樣落後這樣貧困的國家，在路上，也瞧不見遊民與乞丐了。實在了不起，它們主要靠自己。蘇聯也幫它們，那和美國幫西歐不同，蘇聯并不要東歐變成它的市場或者殖民地，蘇聯并不干涉它們的內政，蘇聯祇希望它們早些站在自己的腳跟上，完成新民主主義的建設。在布卡萊斯特，我與羅馬尼亞的財政部長談過一次，他告訴我，羅馬尼亞的財政收支可以平衡了，國內生產與對外貿易都完全恢復了，土地改革與國有化政策正在加緊推行，要把國民經濟奠立在一個更穩定的新基礎上。從今年六月以來，物價已分期抑低三次，勞動階級的實際工資，都提高了。他相信羅馬尼亞不必隔許多年，就會走上社會主義之路。在每一個新民主國家，都懸有一個更高的社會理想。」

「它們還不懂有理想，並且一定會把理想化爲現實。」我插進一句。

「一點也不錯，這一定會變成現實。我常這樣想，一個經濟比較不發達的國家，如果要建設社會主義，最好走東歐這樣的路，也許更現實些。」我聽了這段話，更覺得意義深長。

「你講爲東、西的矛盾與聯繫，總結在那裏呢？」

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概括它，也許因為雙方對民主的看法不同。西方國家的民主，祇講形式，蘇聯與東歐的民主，是講內容的。我自己是英國人，」他縱聲笑了：「我也曾向別人驕傲過我們的民主政治，我多少不免有些偏愛它，但我相信一位失了業或者吃不飽的工人，是決不會珍視他自己的選舉權的，事實上，他們永遠享不到被選舉權。蘇聯與東歐就不同了，它們的人民，雖沒有鼓吹法西斯主義的自由，却能享受真正的法律平等與經濟平等。平等才是民主的內容，蘇聯給我的深刻印象，就是平等：男女平等、民族平等、機會平等、教育平等、一切平等。」他用手這麼橫一下，表示什麼都平等。「這平等，才是自由的骨骼，才是真自由。我們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流了這許多血，難道爲了爭取一個鼓吹法西斯主義的自由嗎？」他聲調由低沉轉爲高亢，像面對着羣衆的場而在演說。

「這東、西國家的真民主與假民主，涇渭太分明了。但你剛才說對於貴國的民主政治，還多少有些偏愛，能不能再讓我請教一下嗎？」我跟着問下去。

「對了，你切切不可誤會。我說偏愛，是偏愛我們的民主傳統和政治家風度，並不是偏愛我們的社會制度。」

「我到英國有兩年了，我看工黨政府一天天在向右轉，現在已同保守黨合流了，你覺得怎樣？」

「說來話長……」他感慨無窮似的：「一九四五年那次大選，工黨的競選綱領，確實很進步，

工黨當了選，我們都寄予很大的期望。想不到上台第一天，就變了節。我願告訴你一件趣事：本來，在艾德禮內閣的名單裏，道爾頓任外相，貝文任財相。邱吉爾就向艾德禮提出嚴重的警告，如果不把貝文調任外相，一定要弄垮他的內閣。艾德禮新馬上任，他又一向長首長尾，在新閣宣誓就職時，道爾頓先到，艾德禮竊耳告他，他的職位已與貝文對調，弄得道爾頓欲辭無從，有苦難訴。直到去年道爾頓被保守黨哄下台後（去年十一月十二日，道爾頓無意洩露了預算秘密，引咎辭職——筆者），這件事才慢慢傳出來。從這兒，就不難明白爲什麼貝文要跟邱吉爾了！」

「真的嗎？有趣極了！道爾頓是否代表工黨的左派？」

「他是一位左傾的學者，確有社會主義的信仰。在工黨上層領袖中（工黨有五巨頭，爲艾德禮、莫里遜、貝文、克里浦斯與道爾頓——筆者），他最開明，最激進，也最孤立，他與克里浦斯和貝文是死對頭。他下了台，想在野之身，領導左翼，革新工黨內部。艾德禮恐怕再生意外，又硬把他拖進閣來（現任蘭開斯脫公國大臣），當然，轟道爾頓來革新工黨，是不成的！就是貝凡（衛生部長）與辛威爾（陸長），也還不行。」

「那末誰能使工黨保持左傾呢？克羅斯曼嗎？齊里亞克斯嗎？」

他頻頻搖頭：「克羅斯曼是一個投機主義者，老是搖擺不定。齊里亞克斯的才識與威望，都很能領導工黨左翼。本來，在工黨內部，以齊里亞克斯與普拉茨·米爾斯兩人爲首，有着一個强有力的反對集團（指反對工黨右傾領導集團而言——筆者），對工黨政策，還可以發揮一點批判

與督責的作用，但不幸得很，今年四月事件發生後（指工黨一部份左翼議員，致電議社會黨，預作競選勝利——筆者），齊里亞克斯放棄了堅定的立場，向右傾領導集團讓起步來，普拉茨·米爾斯孤掌難鳴，竟被開除工黨黨籍，這是工黨進步集團的一個大損失。」

「照目前這樣，下屆大選，工黨還可能當選嗎？」

「可能是有的，但在國會裏，怕再不會佔到現在這樣的壓倒優勢了！」他口氣非常肯定。

「工會還會無條件支持工黨嗎？」

「我看工會與工黨的內部，將會一天天分化。」

我再摸鏡一看，已近五點。「今天談得真痛快，現在我該告辭了吧？」我站起身來。

他把手伸過來，更溫暖有勁了：「我們聖誕節再見！」

「祝你一路平安，給美國人民帶去一份和平的禮物，廓清戰爭歇斯底里的叫囂！」

歸途中，冷雨打在臉上，手倒不僵了。坐在地道車裏，恍若「和平老人」的聲音，還繞着我的耳邊。我記起他那句「我最留戀貴國」，我應該把他的真摯的友誼與同情之愛，傳到祖國來。

在燈下，疾筆追記了這篇談話，雨還綿綿不歇，無線電裏報告島國北部已在雪花紛飛了。

一九四八·十·廿五·於倫敦。

勘誤表

頁	行	誤	正
一	一	蘇聯，和美國：	蘇聯和美國，：
一	四	對於贊成社會主義組織：	對於贊成社會主義社會組織：
二	一	坎脫布里	坎特勃里
四	末四	對於戰後蘇聯社會：	對於戰後蘇聯社會、：
七	一	福音教徒新聯合的：	低教會派聯合的：
七	四	我遇到了教育家戲劇家、科學家：	我遇到了教育家、戲劇家、藝術家、 科學家：
七	九	許多學院研究員以亞及：	許多學院研究員以及亞：
一一	四	一塊又塊：	一塊又一塊：
二四	六	：：的大花瓶；	：：的大花瓶裏；
二四	末七	那伏爾加河是附近流過的，	那伏爾加河是在附近流過的，
二四	末六	進餐時候	進餐的時候
二九	七	宏壯簡單而：	宏壯、簡單而：

三二	五	它負責一團四百五十英：
四〇	一	：一同工作之後，
四〇	末四	伊娜父親在：
四五	末四	(Smoeny)
四八	九	森林中一個小：
五九	末四	她遇到了亞歷克西·柴姆科夫，
六四	六	我們在餐室裏一見到他，
七一	末六	：「是否錯的呢？」
七九	末六	：十三
七九	末四	世理石中：
八五	末八	這個人的辛艱的、努力的、勇敢的、犧牲的熱愛和了解
一〇〇	五	倘如情形必要墮胎：
一〇九	末二	我們今天到的是：
一一五	末三	：公共洗衣處所
一三七	末一	一千九百個：
一三九	一	我看了帕列斯特：

它負責一團四百五十萬英：

：一同工作，之後，

伊娜的父親在：

(Smolny)

森林中的一個小：

她遇到了柴姆科夫，

我們在餐室裏見到他，

：「是否錯的呢？」

：十三世

理石中：

這個人的辛艱的、努力的、勇敢的、犧牲的熱愛和了解

倘如情形必要，墮胎：

我們今天看到的是：

：公共洗衣所

一千九百個：

我看了帕列斯脫萊：

一三九	九
一六一	三
一六一	末五
一六三	二
一六八	末四
一七六	二
一七六	三
一八六	八
一八九	五
一九三	一
一九五	三
二二九	末三
二四三	六
二五一	四
二五二	末四
二五二	末三

（Mowgli）

：福音教會聯合會的主席。
 ：福音教會已：
 ：福音教會：
 發揚的，富足的文化的和：
 西伯利亞卡柴喀斯坦和：
 在東方建立了瑪格尼托：
 曳引機也是：
 呢？
 ：所要給我看的，
 ：是指整個社會：
 民族權利的宣言，
 長途飛行到莫斯科
 特別是那空間寬闊的房屋是：
 而機關大學、：
 還有專供工人，住的：

“Mowgli”

：低教會派聯盟的主席。
 ：低教會派已：
 ：低教會：
 發揚的，富足的，文化的和：
 西伯利亞、卡柴赫斯坦和：
 在東方建立了：瑪格尼托：
 曳引機站也是：
 呢？
 ：所要給我看的，
 ：是指對整個社會：
 民族權利的宣言，
 長途飛行到史太林格勒
 特別是那空間寬闊的房屋——是：
 而機關、大學、：
 還有專供工人住的：

二五四	末六	二十六億立方公呎，	土耳其人
二五五	末四	外面灼熱的陽光走進……	第十四世紀的……
二五八	五	……露着熱烈的樣子。	是通過了巴士米
二六〇	五	Part	農民工廠的經理
二六八	末四	土耳其人	阿瑪·阿太……
二七九	末三	Part	經過阿瑪·阿太……
二八五	末二	……	南北都經過阿·瑪阿太，
二九〇	一〇	是通過了巴士米	高斯·巴拉丹斯
二九三	二	農民工廠的經理	高斯·希爾蘇土
二九三	三	阿瑪·阿太……	高斯·巴拉丹斯，高斯·希爾蘇土和高
二九三	七	經過阿瑪·阿太……	斯·潘潘拉森斯
二九三	末五	南北都經過阿·瑪阿太，	更是強烈的……
三〇三	末五	高斯·巴拉丹斯	Part
三〇四	四	高斯·希爾蘇土	土耳其人
三〇四	七	高斯·巴拉丹斯，高斯·希爾蘇土和高	第十四世紀的……
三一四	末三	斯·潘潘拉森斯	是通過了巴士米
三二〇	三	更是強烈的……	農民、工廠的經理
		遺蹟磚上鋪着……	阿爾瑪·阿太……
			經過阿爾瑪·阿太……
			南北都經過阿爾瑪·阿太，
			高斯·巴拉丹斯
			高斯·希爾蘇土
			高斯·巴拉丹斯，高斯·希爾蘇土和
			高斯·潘潘拉森斯
			更是強烈的……
			遺蹟磚上鋪着……

三二一 七

三二二 末七

三二八 末二

三三二 末一

三四〇 三

銀串的：

那是用米磨碎的：

：中致說：「在實辭行：

八十萬萬派因脫

列齊和基督間的：

銀針串的：

即是用米、磨碎的：

：中致辭說：「在實行：

八萬萬派因脫

列齊和基督之間的：